

右派言論選集

(續編)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內 部 資 料
注 意 保 存

右派言論選集

(續 編)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耗 墨 開 · 9 $\frac{1}{8}$ 印張 · 253,000字

1967年10月第1版

196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0

統一書號：3106·67

定 價：(4)0.70元

目 次

吳开斌的右派言論·····	1
一、吳开斌在辯論會上的發言·····	1
二、吳开斌的第二次發言·····	29
徐真的右派言論·····	41
一、在华中工学院农工民主党座談會上的發言·····	41
二、在华中工学院老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43
張 地：論政黨在國家中的地位·····	46
刘繁华的两篇文章·····	56
江心紋：領導及其他·····	67
曹修恕、廖長江：民主生活中的暗影·····	72
雷鳴（雷英元）：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76
一、“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76
二、“再論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78
才言（孟广鎔）：十大建議·····	81
陈嘉勉：給武汉医学院××的三封信·····	84
邱永春：再論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群众自发运动·····	93
古希天的右派言論·····	98
一、“正視錯誤，提高威信”·····	98
二、古希天的答复·····	101
陈柏华：一个根本的社会問題·····	103
李雨三在全院師生員工辯論大會上的發言·····	113
封章諫：自我檢查·····	122

刘清源：看看党员·····	127
胡善恒：墙壁问题·····	129
王圣麟：一点“谬论”·····	131
前哨（楊林）：无名小卒十八间·····	135
凌晓光的右派言論·····	138
一、凌晓光在6月14日的发言·····	138
二、凌晓光贴出的大字报·····	141
三、凌晓光6月17日下午的发言·····	142
李文咸的右派言論·····	145
一、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的綜合·····	145
二、李文咸的“反右杂感”·····	146
欧阳咸禹：我的思想檢討·····	146
赵基高的右派言論·····	157
刘源清的右派言論·····	160
一、刘源清在鳴放中一些右派言論的綜合·····	160
二、“且鳴且爭”·····	162
三、“折墙填沟”我們如何發揮助手和桥梁作用·····	164
張芝田的右派言論·····	168
易 成的右派言論·····	173
一、“冤家哀鳴”·····	173
二、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能否改变·····	176
宋西的右派言論·····	179
一、“地位不能代表真理”·····	179
二、5月4日上午在报社各部、組負責人联席会上的发言·····	181
三、5月25日在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新聞工作座談会上的发言·····	182
姜弘的右派言論·····	185
一、在大鳴大放中到处点火放毒的作品和書信的一部分·····	185
二、大鳴大放中各次座談会上的发言·····	194
卢盛模的右派言論·····	207

一、卢盛模的两支毒箭	207
二、卢盛模在“鳴”“放”中的言論（摘录）	213
吳丈蜀的右派言論	216
一、5月24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民主黨派成員、非黨科組長 以上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216
二、5月25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藝組第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217
三、6月7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第三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218
和穆熙的右派言論	220
陳家鎔的右派言論	226
一、5月25日至29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藝組整風會議上的發言	226
二、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第一次全體大會上的發言	227
三、6月13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共青團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228
汪 誠：領導者和黨員和非黨員	230
潘之辛的右派言論	232
一、“整風雜感”	232
二、關於儲安平等人的問題	238
三、“相對論淺解”	241
張 章的右派言論	254
趙光華的右派言論	256
沈會葵的右派言論	264
王冀民的右派言論	268
郭笑雲的右派言論	273
蔡培元的右派言論	276
一、向誰去嗚咽訴不平	276
二、風評	280
李肇基的右派言論	282
一、6月4日在中共武漢市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282
二、6月10日在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第三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283
三、在長航黨委兩次召集的民主黨派、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座談會	

上的发言	286
周庆余的右派言論	288
厉无咎的右派言論	292
彭一湖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296
李华庭的右派言論	298
周世瑞的右派言論	301
錢 鋒的右派言論	304
韓紹斌的右派言論	307
馬伯鵬的右派言論	309

吳开斌的右派言論

按：吳开斌系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級学生，在武汉大学曾以他为首的借帮助党整风为名，組成“火焰报”編委会。反右派斗争以前，他們疯狂的到处点火、煽动群众，企图推翻党在武大的领导。这个材料是根据武汉大学“学习简报”整理的。发言是他在武汉大学学委会举办的民主講坛辯論会上講的。

一、吳开斌在辯論会上的发言

我感觉，苏共中央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特别是在20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做了許多工作的，主要是糾正了斯大林的偏差，求得人民生活的提高。斯大林同志在这些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例如斯大林同志执政时，对东欧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以领导者自居，以长辈自居，对她们不够尊重。斯大林同志的錯誤与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有排他性，只注意团结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别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当然，对帝国主义是应该排斥的，但是在目前的确有第三种力量，象埃及的納賽尔呀，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諾呀，印度的尼赫魯呀，以及緬甸的吳努他們这些人，基本上是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陣营之間的，走的是两者之間的道路，当然走不走得通是另一个問題，但是他們的确是在那儿走第三条道路。要他們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信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他們既不愿意走帝国主义道路，对他們就应该团结，这样可以壮大自己，孤立帝国主义。但是斯大林时代

就根本沒把團結這些國家提到日程上來，那時候社會主義陣營是孤立的。現在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做了一些工作，就好像用一個大麻布袋把尼赫魯呀，蘇加諾呀都裝過來了。現在反帝國主義力量占了世界地區和人口的一半，這是有利於我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亞非會議以後，由於我們主動地做工作，情況就變好了。其所以變好，我認為與赫魯曉夫的政策分不開，是在赫魯曉夫指導之下的。蘇南關係是斯大林同志人為地破壞的，斯大林同志應當負很大的責任。現在既然對不丹、尼泊爾都要團結，而南斯拉夫基本上和我們差不多，難道不更應該團結嗎？但斯大林同志過去却粗暴地破壞了蘇南關係，弄得蘇南人民沒有辦法往來，南斯拉夫曾經孤立，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地想把他們拖過去，但他們還是堅持下來了。當然也有危險，南斯拉夫在困難的時候可能倒向帝國主義。赫魯曉夫同志執政以後，有了很大的改進，這是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的。我對蘇聯的基本情況是樂觀的，是有信心的。蘇聯不愧為我們的老大哥，很多地方仍然是我們的榜樣。雖然過去有錯誤有缺點，但是正在改進中。

但是，我對蘇聯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覺得蘇聯在某些地方還是比較保守的。什麼地方比較保守呢？比方說，去年陸定一同志在懷仁堂作了一個演說，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標誌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了這個方針。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起了積極的效果，大膽思考，不拘泥於前人的意見等等，都是好的，學術空氣也逐漸濃厚起來。當然，一年多的時間里不可能有什麼轟動世界的成就，但是已經可以看出有不可磨滅的成績。這個方針的提出是英明的，直接推動了文化科學的昌盛和繁榮。但是蘇聯對這方面的反應却很冷淡，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他們對思想界，文學界都抓得很緊，當然他們是好心羅，跟陳其通同志差不多，怕毒草太多羅，怕人民受毒羅，怕唯心主義思想借尸還魂羅，但我覺得他們膽子太小。不敢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對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現。如果你相信馬列

主义不可战胜，就用不着怕。我們搞了一年，也并没有天下大乱，“草木篇”也并没有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毛主席也說过嘛，“草木篇”来一两百篇也没什么关系，我也是这样看法。苏联过分小心，对保守的言論很感兴趣，如陈其通同志的文章很快就轉載了，大胆的意見就不登載。去年10月間周揚同志在一个报告里提到，有一个人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去問苏联的哲学家米丁同志，米丁同志說他个人不能同意。米丁同志是苏联的一个高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可見苏联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人对这个政策还是認識不足的。这个政策在全世界引起反应，象波兰哪、捷克哪、南斯拉夫哪，都很欢迎，認為这个政策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踏步前进。西方的报纸也表示滿意，認為中国現在开禁了，他們認為中国过去对于文化是严密統治的，現在好一点了。可是苏联直到目前还是反应不大。毛主席在今年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連美国的“紐約时报”这样的反动报纸都全文发表了，波兰的估价也很高，認為毛主席的报告是切合于东欧各国的情况的，有普遍意义。但是苏联呢，仅仅在报纸上登了一下而已。我認為在这一点上莫斯科落后于北京，不管他們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如果他們赶上来，我們当然應該欢迎。（笑声）他們做得对的，我們应当向他們学；但我們做得对的，他們也应当向我們学。

这是我对于苏联的内政外交問題的一些看法。下面我想談談第二個問題：对資本主义世界的看法。

我个人并不贊成資本主义制度，但是我觉得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共存的，我想資本主义至少要和我们这一代相处下去。当然罗，由于历史发展的規律吧，資本主义是必然走向灭亡的，誰也不能否認这一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論問題。要想把理論变成现实，还需要作巨大的努力。我曾經这样考虑过：在本世紀的下半世紀我們还很难看到資本主义的全部复沒。資本主义直到現在还是强大而很可怕的敌人。也許我对資本主义的估計比

較高了一些吧，我認爲它還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說一下子死不了。固然，報紙上經常宣傳，說大英帝國什麼日漸衰落，搖搖欲墜。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大英帝國是搖搖欲墜，可是三、五年還斷不了氣，而且這還是跟她過去的情況相比較而言的。英國是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大不如從前了，但這並不能說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毫無進步。不管英國也好，法國也好，事實上是發展的，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科學技術也有了很大的增長。當然不能空口說白話。原子能發電站是蘇聯第一個建成的，發電能力是5 000瓩，以後不久英國在北部的哈威諾也建造了一個原子能發電站，發電能力是100 000瓩，而且以後還要繼續建立；而且在氫武器的生產方面也很注意。報紙上常常把英國說成一個破落戶，其實這個破落戶也不可忽視。法國也是值得注意的，也在那裡搞原子能發電站，以新的裝備和新的技術革新國民經濟部門。不要把他們估計過低。更可怕的事實是東方有個日本，西方有個西德。日本在最近幾年來的發展是很驚人的，去年日本的經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號稱造成了日本資本主義史上第一個最繁榮的年代。在去年，日本的造船業達到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造纖維，日本的紡織工業，日本的化學工業，都有非常驚人的增長。在最近幾年來，日本的資本家，或者說壟斷集團吧，對工業投入了大量的基本投資，他們對工業下了本錢，而且很捨得下本錢。所以這是日本近幾年來經濟發展得很迅速的有力的證據。當然，我們的報紙不大報道這樣的事實，對於我們近在咫尺的日本三島，過去一直是忽視它的。日本現在已經是我們很可怕的一個對手了，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點。另外在西德吧，西德最近幾年來，它的工業發展也很使得美國和法國吃驚，現在在西歐市場上西德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力量了。西德在軍火工業和機器工業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天西德和日本，一個在亞洲，一個在歐洲，已經形成了帝國主義集團中間兩支新起的力量。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這說明資本主義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現

在我們从理論上把它叫做进入了“总危机”的时代，在生活水平方面，在绝对数字方面，有很大的增长。最后我还談談美国：美国现在是帝国主义陣营的首脑，过去我們好象害怕自己有崇美思想吧，不敢談到美国的工业，对美国有些东西怕談。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既然是事实，那么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也沒有必要。不敢面对事实，我認为那是胆小鬼。可以談談这些問題。我也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科学是有很惊人的发展的。当然，由于資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有些方面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需要准备战争，它需要获得利潤，所以在追求战争，追求利潤的冲动下，也能够刺激科学的发展。我看到几篇报道，談到关于美国建設原子能发电站的問題。现在苏联已經建成了一个，准备建第二个，但是美国现在准备建多少原子能发电站呢？准备建15个，包括各种类型的原子能发电站。在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美国大大超过于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說，拿鋼来講吧，美国年产量达到一亿吨，苏联只三、四千万吨，中国只三、四百万吨。我算了一下，把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鋼产量加起来，仅仅相当于美国鋼产量的一半，或者多一点。如果我們要赶上美国的話，不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所能办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時間。就拿汽車的产量来看吧，这个数字是两年前的数字，就是在55年，美国汽車年产量达到六百万輛到七百万輛，当时还是美国的汽車工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是生意不好，馬力还开的不足。据熟悉汽車工业的人講，美国汽車工业潜在能力很大，每年开足馬力制造一千万輛不成問題，就是在开动不足的情况下，每年都可以生产七百万輛。那么我們看第二个国家吧，就是英国。英国汽車产量是占第二位的国家，它跟美国比較差的很远，英国的年产量是一百万輛，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后面按次序排下来，就是西德、加拿大和法国，它們每个国家每年的产量大概几十万輛的样子。苏联的汽車每年产多少，我不知道。那么中国是可怜的，第一汽車制造厂修成以后，今年只生产四千輛，那么，第一汽車

制造厂的设计能力是三万辆，要达到设计能力，那还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就中国汽车工业目前的情况看，要赶上美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另外，在石油方面，在电力方面，在有色金属方面，美国的产量也是很大的，包括战略原料吧，美国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居世界第一位。再我们看看美国文化发展的情况吧。当然，我不是指好莱坞的电影，不是讲这些事，就拿电视台来说，美国现在电视台是三百个，全国有三百个广播电视台，苏联是九个，其他的国家呢？有三个的，有两个的，有一个的。把全世界电视台加起来，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另外，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很努力于制造核子武器，比如说，洲际导弹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前不久我看到报上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制成了一种橡皮飞机，这种橡皮飞机可以带到身上走，把它折好带到身上，自己要想飞就把它打开飞上去，可以带到八千公尺的高度。另外，在美国出现了公路城市，是沿着一条公路几十里几百里，形成漫长不断的城市。我讲的这些东西，决不是吹嘘资本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号召大家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我讲的这些东西，说明什么问题呢？只是说明我的一个论点，就是我认为资本主义在目前还是有很大生命力的，直到目前为止，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我觉得我们国家里宣传工作存在一个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个错误吧。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感觉到解放后很多年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敌人重视不够。那么，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的风气就是资本主义不堪一击，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好象三天两天就要死的样子。那么，在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在书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包含着矛盾，什么它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总是这样讲，讲它总危机要来了，讲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过份从说理上来分析资本主义，而很少联系到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很长时间内我们生活在

真空里面，就是生活在理論和教条里面，不大了解資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到底是怎样。我認为这一点对我们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过低的估計敌人就容易使自己放松警惕，就容易使自己麻痹，你說資本主义已經日落西山，气息奄奄，那我們还需要努力干什么呢？你說資本主义不堪一击，那我們至少会对資本主义放松一点。我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間内养成了一個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愿意談資本主义的成就，就是不愿意談資本主义某些优越性，好象你一談，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自認为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怎样呢？只說社会主义好哇，資本主义不好哇，就是拥护社会主义。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認为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要使社会主义战胜資本主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們战胜資本主义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战胜資本主义，首先要研究資本主义，就是对資本主义保持高度的注意吧。对于資本主义經濟文化的发展，对于資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它的政策密切的注意，就是了解敌人在那里做些什么。敌人在那里睡觉嗎？他們也在为保卫他們的制度来作垂死的掙扎，就是他們有很大的瘋狂性吧！我們不認識这点，我們每天坐在家里，把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拿来翻开一看，好象資本主义总危机已經到来，于是就感觉天下太平，我觉得这对我們青年一代没有什么好处。你說是不是宣傳了資本主义优越性就丧失了信心了呢？就害怕了呢？也不是这样。我們現在中国很貧穷很落后吧！但是我們整个国家是有信心的，我們并不因为我們貧穷落后，比資本主义苦，那么我們就向資本主义投降，我想我們中国人民决不会象这样做吧。正因为我們感觉自己差，感觉我們处于不利，我們更要努力赶上人家。在这方面适当的把資本主义国家建設成就向国内介紹一下，引起人民的注意，引起有关部門的警惕，我認为是完全必要的。你要战胜敌人，你就必須了解敌人，敌人发明了橡皮飞机你还不知道，飞起来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敌人在原子能方面有些什么成就，我們过去不大談的，但是，同学要問：报上沒有登，你

怎么知道的？我就直接在报上看到的，不过很小，就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一点，很不引人注目，要是马虎一点，你就看不到。过去对于苏联的东西进行大规模的宣傳，我认为是必要的，比如說，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的时候，我记得我們“中国妇女”这样的杂志都进行了宣傳，使全国妇女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时事手册”、“中学生”，凡是沾了一点边儿的杂志都宣傳了；报纸上也发表了什么文章啦，通訊啦，报导啦，画了原子能方面的图解，訪問記，从各方面宣傳。就是宣傳苏联的成就，有没有必要呢？我认为完全有必要。那么宣傳中是不是应该注意苏联的东西是主要的，资本主义是次要的，就应该有一个主次之分呢？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如果在宣傳中不注意这点的话，那就是犯了錯誤。如果现在用第一版头条的消息宣傳资本主义的成就，那是錯誤的；但是連八版八条也不宣傳，那是更大的錯誤。那么这些情况在过去更严重一些，知識分子不敢开口，不敢談到资本主义某些科学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风，成了风气，誰也不敢談，我认为这是我們国家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这有什么可怕的？談一談对我們只有刺激作用，感到我們现在很不如人家，努力埋头赶上，老是不談，老是夜郎自大，我认为这对我們一点好处也沒有。我认为今后在主要宣傳苏联的同时，也应该拿出一定的篇幅来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特别是着重报导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使全国人民都了解，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这两大陣营都在拚命地向前赶，都在竞赛，现在是誰赶上誰的問題。那么，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必要。每年每国的經濟数字，法国、英国、日本的都发表一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必要，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数字跟我們的比較一下，看看我們赶上他們还需要多少年，还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把这个向工人、农民，向知識分子宣傳，是有好处的。当然，这点在目前有些改进，比如說，科学院已經办了些什么杂志，象“科学消息”“学术界”这些东西，不过这些杂志比較專門，一般的讀者看不到，有些也看不懂，是

不是尽可能通俗些地把它介紹一下。总的論点，我認为資本主义还是一个很强的敌人，目前为了战胜它，就必须了解它。附帶談到国内目前不敢談資本主义是一个缺点。主要就是这么几个論点。

下面第三个問題，我想談一談南斯拉夫問題。

我对南斯拉夫很感兴趣。什么时候开始感兴趣呢？批判了斯大林以后。因为我是从这点来理解南斯拉夫的：感到南斯拉夫人很有骨气，当时在斯大林专橫粗暴的外交政策指导之下，差不多东欧国家基本上都是察顏观色然后行事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南斯拉夫就与斯大林对抗，我感觉南斯拉夫有点味道，好象值得研究一下。所以批判斯大林以后，我就主动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我感到南斯拉夫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很大不同。南斯拉夫的优点之一吧，就是它的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南斯拉夫为什么革命比较彻底呢？她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他們在对敌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时候，是南斯拉夫的人民軍和苏联紅軍共同动作，在解放貝尔格莱德，把法西斯侵略者赶出南斯拉夫的时候，他們是并肩作战的，那么这就跟东欧情况，主要的由苏联的軍队来解放的那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南斯拉夫的革命是比较巩固的，就是說南斯拉夫的党是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它原来就与人民群众有联系，南斯拉夫領袖鉄托同志这样的人是在斗争中与群众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南斯拉夫领导人是有群众基础的，就是南斯拉夫有力量吧，这就是为什么南斯拉夫在过去敢于跟斯大林碰碰，南斯拉夫在很多方面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东欧有些国家在去年下半年普遍地产生了反苏情緒，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說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些国人民心目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苏联某些政策损伤了他們人民的自尊心，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但是，南斯拉夫她就沒有吃这个亏，她就比較果断一些，当时即使在斯大林的威力之下，南斯拉夫並沒有屈服，当然后来在斯大林同志主持之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陣营。南斯拉夫被开除以后，处在非常困难的

境地，就是处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吧，孤伶伶地一个人。但是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并不因为自己的困难而放弃社会主义，他們坚持下来了。这一点我認为表现了南斯拉夫同志們的勇气，很大的决心，据我个人对南斯拉夫的一些領袖們在这点上我是很敬佩。我記得我們中央写的文章里面，也在談到南斯拉夫同志們那段时间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的确是这样子。南斯拉夫当时受了委屈，但是，它自己并没有失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而且我認为南斯拉夫是比較寬宏大量的。那么，当时它受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很厉害的指責，說它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把他們开除了。在七、八年以前，南斯拉夫遭到了很大的攻击，但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到了貝尔格莱德以后，我們看鉄托同志表现得还是很好的，就是不咎既往吧，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着想，他們沒有鬧意見，沒有鬧成見；苏联来主动找他們恢复关系，他們很愉快地接受了，并没有故意留难，而且也沒有发表声明把苏联以前作得不好的地方罵一頓，沒有表现意气用事，沒有表现这样的东西。虽然鉄托同志是一个小国的領袖，但是在这一方面，我認为他是表现了一个大国領袖的风度的，我个人是很欽佩他的。苏联在最近以来，是主动地改善了苏南之間的关系，不过我認为在苏联某些地方、某些看法，我还是不够滿意。比方說，在匈牙利事件以后，鉄托同志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了一篇演說吧，但是“真理报”发表了一篇評論，評論鉄托的演說，那么当时里面講到这样一些問題，苏联他們有这样的意見，还覺得你南斯拉夫还講人家干什么呢？你自己有很多缺点嘛，比方你农业就搞得不好哇，比方你还接受美国的錢，要美国的錢，就在这点也攻击了南斯拉夫，这点苏联是不够好的，表现苏联还帶点情緒吧，苏联那么大一个国家，赫魯曉夫同志都是六十几岁的人啦，还帶点情緒。我还記得好象我們中央也对这一点有点儿意見，这当然是内部消息罗，好象在莫斯科也講到了这一个問題。其实南斯拉夫的农业发展，是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南斯拉夫

在过去几年与外而是隔绝的，南斯拉夫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此，南斯拉夫的工业有一定的发展，那么农业还是来不及照顾，这在农业方面还是有些缺点，那么今天大家作为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都是战友，我认为对于对方的缺点不应该嘲笑。苏联对于南斯拉夫农业落后，应该进行帮助，应该给它贷款，给它输出机器，向它派出农业专家，帮它规划农业；我认为应该采取这样一个帮助态度。但是苏联在这方面作得不够，并且把南斯拉夫农业落后当作一个口实，在必要的时候来反驳南斯拉夫。对苏联这点我是不满意的。我当时就讲了，我说“苏联‘真理报’真扯蛋！”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真理报”，我看到“真理报”这一段我不满意，所以我就骂了“真理报”一句。另外关于美援问题，我想谈一谈。美援当然不好，因为它是钓鱼用的吧，不过，如果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那么我认为在必要时接受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当南斯拉夫处在很困难的时候，是接受过美援，不过南斯拉夫并没有出卖自己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南斯拉夫没有参加美帝国主义所策划的排他性的军事集团；南斯拉夫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国土给美国当军事基地。南斯拉夫就是用了美国几个钱，将来还是要还给它的。而且在内政外交上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并不是拿了几个钱之后，就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所以我认为当时接受美援，当然不够好，不过也应该理解人家那种情况，是很困难。那么今天你说它不应该向美国借钱，那你就借几个钱给它嘛；我认为苏联现在可以借几个钱给他，让它把美国的钱还了就是。不应该拿这来嘲笑人家。今天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边，不仅是南斯拉夫接受美援，波兰政府也接受美援。波兰政府它说如果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我们愿意接受美援。它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谈判，就是你不附带政治条件，我何乐而不用一下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所以拿这个东西来攻击南斯拉夫，我认为是不够好的。当然我并不主张我们的国家去接受美援。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波兰

它要接受美援我不反对，但是作为中国来说，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有中国民族的自尊心。过去美国在中国搞得怎么样呢，我看到了一点，所以我不愿意中国政府去接受美援，当然我们的国家也不愿意接受美援。另外我对南斯拉夫的一些内政问题，有些兴趣。南斯拉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吧，就是它的经济权是下放的，就是国家对于这个经济企业的生产不作直接的领导。当然也订计划，也有方针，也有个具体的安排，还不过不是象我们这边这样子控制得很严密。那么这样作，是否有好处呢？也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这坏处可能是不够集中吧，那就是国家对全国的经济情况，不能得心应手很好地指挥；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防止了很多的官僚主义。那么苏联现在就是这样作，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我认为以后管理经济的权力是可以下放的，每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不一定要中央和国务院来管理，那么中央可以通过一个方针，一个计划，把这个权力都交下来，让下面管。有人攻击这一点，叫作修正主义，什么修正主义？就是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因为如果是完全没有领导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呢，南斯拉夫是领导，不过领导的方式不同。那么苏联又把经济权下放啦，放到各个州，各个共和国，这是不是苏联也是修正主义呢？我的看法不是。

另外，我对南斯拉夫的工厂工人委员会也是有兴趣的。南斯拉夫在工厂里面，最高管理机构是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值得研究，南斯拉夫好象也是在试行嘛！我看我们国家里也好象在试行，什么职工委员会，也是在试行中，我认为也不妨多试试，苏联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多试行，但是其他国家有什么新鲜东西，新鲜材料，也不妨拿到我们国家来试一试。如果好的话，就拿来采用，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至于方式方法，我认为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是好的就可以采用，如果工人管理委员会这个形式好的话，我认为可以采用，没有什么了不得。

南斯拉夫国家里面对文学艺术是不作直接干预的，这是他们

在最近几年来的改进。我记得在南斯拉夫电影周的时候，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家曾到中国来跟中国电影界谈到这样一些问题，他们说过去的南斯拉夫也是采取行政领导的办法，采用行政机构来领导艺术，因此在过去也发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就是把文学艺术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抹杀了，好象领导工厂生产、农村生产一样，这就是忽视文学艺术的特点！这就使得过去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事业不够繁荣，不够兴盛，人民也不满意，后来南斯拉夫的党发觉了这点后，他们作了改变，特别是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改变的方法是对文学艺术事业不作直接干预，但有一个方针，就是为人民服务吧，但是它没有象我们国家里这样层层的一套机构，文学艺术家可以自由组合。那次电影艺术家主要是谈的电影方面的情况，他们说一些导演、编剧、演员、美工、摄制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组合在一起，自己愿意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这样就避免了行政上的过多干涉，使艺术家们产生比较大的积极性，这个方法在南斯拉夫使用的结果是好的，经验证明，是能够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团长谈到这个情况很兴奋，他谈我们过去电影事业是不够好的，人民也不满意，最近一年多来我们的电影事业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在学校也看过几部南斯拉夫电影，我拿来与中国电影比较了一下，也与苏联电影比较了一下，我认为他们的水平是很高的，的确是这样，水平是很高。在这方面中国也好像叫过一阵，比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在上海有些电影作家就提出来了，要求创作的自由组合，当时好象名单也拟好了，不过现在也没有下文了。据我看也可以试一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可以按南斯拉夫这个经验试一试，但是一直就好像没有搞过，长春电影制片厂也还是那个老办法嘛，这是固步自封，不作改造，那是不会有进步的，有很多东西都要经过不断实验，就是不要保守！人家的一点一滴经验都应该重视，可是中国电影过去叫了一阵后好象就没有下落了。当然，我对于南斯拉夫某些优点的肯定，并不等于说我主张我们走南斯拉夫的

道路，我沒有这样的意思，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根据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它适合于南斯拉夫，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所以我不要求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但是，我希望对南斯拉夫的具体經驗，应该引起注意，供参考，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对南斯拉夫准备了一顶帽子，就是修正主义，一谈南斯拉夫就给你戴上一顶帽子，就是修正主义，你就不能讲话。我就有些想不通，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有些同志对修正主义自己都不懂，但是可以随便骂别人是修正主义。只要它能走向社会主义，只要它能提高自己人民生活，修正主义有什么了不得；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生活，不能使国家富强，就是馬列主义也不赞成。换句话说，如果馬列主义真要修正的话，那么就是修正一下也没有什么可怕，馬列主义本来是在不断地修正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在发展之中，该修正的就修正，所以我认为在名词上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对南斯拉夫也有一些地方不满，南斯拉夫比较骄傲一些，比如主张它的道路是最好的，好象全社会主义阵营都应该走他的道路，所以它这个就错了，你这个道路走对了，但是别人走就不一定对，所以铁托同志在这方面缺乏个人的谦虚，我同意过去报纸上对他的一些批评。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也不好，有点大欺小的味道。在南斯拉夫里面还有些现象是消极现象，就是在南斯拉夫市场上美国电影占很多，大约占了90%以上，这种现象还是不好的，黄色电影进入到南斯拉夫，自由市场泛滥得比较厉害一些，国家控制的市场比较小，资本主义市场比较大，所以我认为南斯拉夫是有缺点的，现在我们看南斯拉夫要全面看，优点和缺点都罗列出来。

现在我谈谈第四个问题，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新闻自由，而是说我们的新闻报导受一定的限制，这在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全国的报纸、广播电台、杂志社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在全国的非党报纸据我所知道的只有四家，那就是大公

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除了这四家报纸外，全部是党报。报纸、杂志、电台全部是党办的，这有没有好处呢？好处也有的，就是比较一致吧，要反右派都反右派，要增产节约都增产节约，要百花齐放都提倡百花齐放，所以在鼓动人民同心同德，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它是有好处的，就是从上到下协同动作，一个动作。在我们的报纸里面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我认为这是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官司就打不清，有的主张社会主义，有的主张资本主义，有的主张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人民容易受到各种坏东西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内基本上都是健康的，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也有坏处。有些报纸都是清一色的，这产生什么坏处呢？就是一般化、公式化。这个太严重了，过去大家还是讲在文化艺术作品里面有公式化概念化，可是报纸里比文艺剧作里还要严重，有些新闻的公式化简直严重得不可收拾，我举个例子，比如举行酒会吧，最后一定讲酒会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差不多七八年来每次酒会都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又比如中央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那么接着就写在座的有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就完了，写得非常枯燥，非常一般化。那么介绍一个新的城市，就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怎么怎么不好，电话不灵，道途不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怎样怎样好，最后就是今后展望怎样怎样。有个时期报纸上大規模介绍土产品有些产品可向外面换回钢材多少吨，它总是用钢材打比，很奇怪，不用其他的比，不管是草料也好，鸡毛也好，鸭毛也好，蚕丝也好，茶叶也好，总是说可以换回多少钢材，我就很奇怪，不能换回别的东西吗？老是钢材。这正是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报纸由于是清一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失掉了生动活泼内容，它就流于一般化。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全国只有一个通讯社，就是新华社，你用它的稿子也好，不用也好，反正只此一家；那么我们的报纸呢，都是党办的罗，就是赔了本也是党掏钱，这些

个报社的领导人，他对于报纸的销路总是放在其次，强调政治性是好的，但是对赚钱蚀本他是不大管的，至于这报纸是否受读者欢迎，大家是否真心诚意掏钱来买这份报，就不大管，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象这样办报早就没有饭吃，因为资本主义读者是有选择性的，譬如说他可以看“泰晤士报”，可以看“约克逊邮报”，可以看“星期论坛报”，可以看“纽约时报”，如果办得不好的话，他可以不买你的报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报纸，力求把内容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否则它就没有销路，他就没有饭吃嘛。现在我们这里呢？国家办报是有好处，坏处就是养成某些工作人员不踏实，马马虎虎的作风，就是在新闻工作上不求改进，总是老一套，最主要问题就是“供给制思想”吧，反正办好办坏都是政府的，没有一种东西刺激他努力向上，努力把报纸办得活泼一些，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把报纸办得象资本主义那样了，每天发表一些女人的消息哪，或者好莱坞的电影介绍，但是我要求报纸在某些地方，在技术上象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地方学习——在标题上、辟栏上新鲜、活泼、大方、醒目，带有刺激性，能够鼓动人，办得漂亮一些，对于同样的新闻有不同的写法，可以形式多样化一些嘛，在新闻学中也可以“百花齐放”，你说“宴会一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你可以写成别的东西也可以嘛，应该鼓励在新闻中间也产生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风格。我们现在看报纸的确只看到政治性的内容，在艺术上没有什么享受，这是很干枯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过去有这样一些看法，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那么现在国家可以允许私人办刊物了，比方沈阳办了个“芒种”，就是私人办的，巴金他们就私人办了个“收获”，象“诗刊”基本上是臧克家他们私人搞的，我看他们搞了以后，天下也没有大乱哪！没有什么了不得。我们可以让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私人办的通讯社有好处，能够和国营通讯社竞争一下，你办得不好，其他的报社会选我的新闻，不选你的新闻，那你就吃不开，你就不能靠你们那国营的牌子来吃饭，你就不得不努力，

你不努力的話你就威信扫地，你就沒有人看。那么多办几个通訊社，专业通訊社也好，綜合通訊社也好，也可以“百花齐放”搞下子。搞一个通訊社专门报道文教消息可以呀，搞一个通訊社专门报道农业也可以呀，也可以专门办个文学报纸，象苏联的“文学报”一样；采取风格多样化的办法，头版头条不一定专门发表社論，我們現在报纸好象有一个不成文的規定，好象只有社論才可以放在头版头条，記得丁玲同志过去在延安办“解放日报”的时候曾提了这样一个意見，她說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从形式来决定，从内容来决定要好些；她又說，只要在当天來說是最重要的东西都可以放头条，比方說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在当天是最重要，就可以放在头条；比方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赛了一场足球，在当天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放在头条。这个就不一定叫做資本主义的报纸，无产阶级国家也还是要知道打球的情况吧，也还要欣赏文学艺术吧，現在我們的报纸都有公式化，就是說人民日报做了一个榜样放在那里，各个报纸照学，人民日报怎样作，下面就怎样作，其实只要我們懂得方向是为了社会主义，那么就是党办的报纸，也可以来个“百花齐放”，每个报纸都有自己的特点，富于当地地方的色彩，有自己独特的文笔，我記得过去解放前的报纸，也有特别受人欢迎的栏目，有的是“星期論文”比较好，它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副刊办得特别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通訊栏办得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国外大事的述評办得好，各有各的特点。解放后的报纸，你說那个报纸有什么独特点呢？你說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各有它的什么特点呢？我就很难說出来。也就是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差不多，湖北日报和湖南日报差不多，湖南日报和江西日报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要有私人办的报纸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你說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旁边又出来一个民办报纸，你說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編輯他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舒服，你办得不好，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不要看你是市委宣傳部办的报，因为人家掏錢他不管是公营、私营，正如象看演戏

一样，他不見得要到国营劇場去看，私营劇場要好他一样去看，你說我是国营劇場一定要看我的戏，这个道理恐怕講不通，現在允許私人办剧团，允許私人办刊物，为什么不允許私人办报和办通訊社呢？我認为是可以的。但是說私人办是不是讓反革命分子办，不是这个意思，那反革命分子不但不許他办报纸，那講話也不許他講。你說私人办报是不是走到资产階級方向，你看全国有四家非党报纸，就有三家出了毛病——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我也承認这次批判他們的报纸是出了毛病，不过出了毛病可以糾正嘛，出了毛病之后人家还是看出来，党和国家还是看出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还是愿意改进，他們向人民請罪嘛，那么他們办得不好，出了漏洞，更能显得人民日报的正确来。另外我認为應該扩大报纸的报道面，現在我們的报纸的报道面是不够大的，总是那些东西，剛才我講的适当登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过去还有这样的意見，我認为怕什么呢？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也可以登登，看他倒底講些什么鬼話，怕人家受蒙蔽，可以在登載的同时发一个評論，把他評一下，那么过去对这东西不这样作，所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紐約时报”把毛主席的报告全文发表了，那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的問題也可以全文发表的，譬如艾登在下院的演說，富尔在議会的报告，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国会的講演，杜勒斯在記者招待会上講話的全文，发表了以后再加以評論，人民不会上当的，看了艾森豪威尔一篇报告就相信资本主义啦，这反而是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不相信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是能够認識到的。过去在内部办的“参考消息”給高級干部看的，在学校里現在放寬了尺度，发到講師一級，不过面扩大了，内容就縮小了，密的范圍就小了一些，那上面的东西也沒有什么了不得，我也看了一点，当然不是偷看，我也是經過別人允許的，其实我看那里面也沒有什么东西完全值得保密的。那上面有篇消息談到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蔓延，这东西有什么保密的呢？这东西放在参考消息里面，好象只有講師以上的知識分子才能看，这流行性

感冒蔓延在公开报上登也没什么了不得，参考一下尤其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消息，那完全可以登，讓全国人民知道那有什么不可以。至于那些外国代表团对中国的看法，外国記者所写的，对中国当前重大的运动，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們发表的評論，也可以摘要介紹一下。这讓人民看到了是不是脑子糊涂了，有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沒有政治头脑的，那你就有选择的登嘛，或者人民日报登，贵州专区报、什么农民报就可以不登；你还可以分一分工嘛，就可以把报道面扩大一些。現在老实講我們有些糊涂，只看到这一边情况就沒有看到那一边情况，不知道資本主义对我們的看法怎样，对我們的反映怎样。

另外，对于資本主义国家某些理論文章，也可以登一登，当然文汇报犯了很多的錯誤罗！不过它有一点还是优点，是可以肯定的，文汇报第四版有一栏叫“外論选輯”，就是專門登載外国富有代表性的意見，这对于我們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資本主义国家輿論界的情况，了解資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动态，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有些能够看到参考材料就有些了解罗！但是絕大部分看不到就是“瞎子摸象”，根本不了解情况。我記得最近关于禁运的問題。好象美国控制不住这些国家了，很多国家要开放“禁运”了，这个問題我們只能看到我們这方面的意見，看到外国很一般的意見；現在外国工商界他們的报纸，有些資本家个人的看法怎样，不大清楚，文汇报这方面作得比較好一点，我記得关于“禁运”方面他們登过一些文章，登过美国“經濟学人”杂志，登过日本“朝日新聞”，“朝日新聞”报，好象登过美国“新政治家与民主战士周刊”，登过他們东西，这可看出他們这些杂志、报纸实际是代表外国某一个阶层的意見和看法，都是某一个阶层的喉舌，看看他們对这些問題的看法，头脑会更清醒一些，但是过去这样做就是文汇报一个报纸，其他的报纸都沒有这样作。另外我觉得現在对新聞記者的束縛比較多，过去一两月上海、北京很多新聞記者座談，談新聞記者倒霉得很，到处保密，这里保密那里保密，你說国防事

业应该保密，工业的某些部门应该保密，但是我们保密得很宽，教育有些地方也保密，最保得可笑的是北京西郊动物园到了一些动物，记者去访问时说要保密，好象动物报道出去都有失国家机密，这在很多地方造成记者很大的不便，层层限制。比如武汉一个记者谈要到长江大桥去访问先要搞一张总的采访证，就是长江大桥工程局发的一张采访证，然后如果你想到桥上去看还要有桥上采访证，如果你要到桥下去看，还要有水上采访证，好象你到工地去看有工地采访证，推而广之，怎么得了，有厨房，有宿舍，有卫生科，那是太广了，就是人为造成了很多束缚，如果你不相信这记者，你根本不给他采访证，如果你相信，你就发给他一个总的采访证，不分什么桥上桥下，你说这记者能看桥上就不能看桥下，好象他在桥上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到桥下就叛变了，那有这种情况呢。过去有些地方对新闻记者人格也是尊重不够的，象劳动报记者控诉说，有了外国代表团来了，他跑去照相，派出所把他抓去关一点半钟，说不该随便照象，这个东西也影响我们的新闻工作，很多地方造成很多人造的束缚，使新闻记者的活动处处遭受困难。我认为这束缚应该把它打破，应该打破。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第五个问题：立场问题。

我也并不是一般的反对立场，不过我也常常感到这点，就是把立场问题绝对化以后，的确，容易鑽到又一个牛角尖去。在某些现象上不能完全由立场来解释，比较简单的现象，用立场来解释比较容易，比方说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农民说是好，地主说是不好，这很清楚，这很简单；但是生活上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有些复杂问题就很难解释，这我过去并没有否定来讲，而是说我对这问题感到兴趣，过去我曾经讲过这样的问题——立场也好，党性也好，这样的东西同科学性、真实性是否有距离，是否有矛盾，关于矛盾有对抗性有非对抗性，这是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过去我在班上也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举个例子吧，

就是南斯拉夫，我对南斯拉夫很感兴趣的，在苏南关系不好的时候，記得苏联曾經把南斯拉夫罵得很厉害，說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說南斯拉夫鉄托、兰科維奇匪帮，說南斯拉夫是警察林立，說南斯拉夫到处是絞刑架，說南斯拉夫經濟破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說南斯拉夫国内暗无天日，当时我記得苏联惊险小說也好，电影也好，总是說空降队伍大部分是由貝尔格莱德起飞的，当时，談到民主国家里面的問題，南斯拉夫大使館就跑不了，当时从各方面現在看起来簡直是誣蔑南斯拉夫，当时漫画上把鉄托同志画成一个狗，頸子上挂一个炼子，手上拿一把斧头，血淋淋的，当时經常在情报局出版的刊物——“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这杂志上发表，当时根据苏联看法，南斯拉夫很不好。中国也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都跟着苏联罵南斯拉夫。后来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以后，又說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好的罗，說基本是社会主义国家罗，公有制达到70%罗，主要是工农专政罗，这些七七八八的話来了。我們报纸刊物馬上改变了态度，如新观察就登了一篇“鉄托元帅下命令”一首詩，登了一張南斯拉夫胖小孩照片，說这胖小孩多么可爱罗，从各方面来粉飾南斯拉夫，我不相信南斯拉夫会在一天之内截然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这里面就有問題了。从前的报纸也是有立場的，以后的报纸也是有立場的，可以說报纸还是一家办的，苏联是“真理报”，我們是人民日报，党沒有改組，編輯还是原来的人，为什么前后对于南斯拉夫完全不同。这問題是值得人深思，是不是当时为了立場，为了党性就抹杀了事实，看不見事实，比方說苏南关系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苏联也了解了南斯拉夫一部分真实情况呢？难道苏联的领导人从上到下都認为南斯拉夫是一团糟，还是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到那貝尔格莱德一看不是那样子，以后就改了，是不是那样简单，我看不至于，就我說党性和立場有时服从于国家的政策，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国家認为需要怎么作才好，就強調这东西，有时很难使人相信这一点，就在比較复杂的

現象面前，很难用立場来解釋。我跟很多人爭了，他爭不贏，就說你这是立場問題，你沒有立場。這問題不能說服我，要說服我你用道理來說服，最后你沒有办法了，就說你是立場問題，光拿立場來說，這不是好漢。沒有事實，搞來搞去光跟人家扣个帽子。在生活里面存在互相矛盾、无法解釋的事很多，我过去很苦恼，我不愿意說我的立場的問題，但是这問題得不到解决。

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說关于国际法的問題，在朝鮮战争中，我們就抓住国际法的問題，就說是美帝国主义对战俘非人道待遇哪，你不符合国际法哪，根据国际法把它譴責了一通，后来发生細菌战的时候，又根据国际法說你不符合国际法哪，那就是很強調国际法；后来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說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否合乎国际法，我們有些同志把我們罵了一頓，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国际法是資產階級的，要什么国际法？我們根本不管那一套，我們从无产阶级利益来考虑，不要受資本主义国际法的束縛，所以搞得我很糊涂。你說你干脆都不承認国际法，那在朝鮮戰場上也不承認国际法，因为那是資本主义的一套，但是有时候承認，有时候不承認，那換句話說就是这个意思：对我有利的就承認，对我沒有利的就不承認。是不是这样一个問題呢？我說是的。至于有时是不是过分強調立場，有时感到与真实性和科学性有些距离，过去这是我們长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再有个問題如象苏加諾和尼赫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們基本方向沒有改变多少，我国對他們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剛解放的时候，对苏加諾也好，对尼赫魯也好，看法都是不好的，我記得剛解放不久，出了一本“新名詞詞典”，后面附了很多人，象专家名人，有反动派啦，各个栏目，苏加諾是放在反动派里面，但是去年苏加諾到中国來訪問的时候，我們說苏加諾是偉大的領袖，叫做什么加諾兄，到处叫，你說苏加諾究竟是好是坏，要是坏就不應該叫他来，要是好的話，为什么过去叫他“反动派”？过去說尼赫魯是潜头的，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是有时在外交詞令上，比方赫

魯曉夫到印度的時候說尼赫魯是偉大的政治家，但這種話是有立場的，這和科學性是有点距離。是不是偉大的政治家，這是個問題，當時為了對國家有利，就需要這樣講一講，這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說有時立場問題並不是“萬靈膏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簡單的問題上是比較有效，在複雜的問題上不一定能搞通的。那麼，我這個錯誤是來歷很久的了，如果大家不能把我的意見打破，我一直要帶到棺材里去。當然我認為在這次把問題搞清楚，立場也好，党性也好，與科學性、真實性是不是有距離，是不是完全一致？與無產階級利益與客觀實際是否完全一致？如果這問題能解決的話，那我思想會大大提高一步。

下面談第六個問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

這問題很大，應該由蘇共中央的人來談的，不過我過去很狂妄，對這問題想了一想，所以有些看法，我還是老著臉皮來講一講。

我認為20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20大以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有發展的，是有巨大成就的，具體表現在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間，解決了幾個根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起來革命的問題，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革命，解決了敵我矛盾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怎麼和敵人鬥爭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20大以前解決的，這方面當然和列寧、斯大林分不開的，他們有很大的功績。但是斯大林沒有解決這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一個就是執政黨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程中間怎麼處理自己和人民群眾的關係，這問題斯大林沒有解決；而他著作里看不出他對這問題是有深刻理解，也可以說斯大林不懂得這問題，那麼，這問題很重要，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為了革命的綱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夠了呢？就不要注意其他的問題了呢？現在根據一年多來的國內外形勢說明，不夠的，就是執政黨還不

懂得这一点，就是自己怎样调整自己同人民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党群矛盾问题，这问题是毛主席解决的。这问题上我认为毛主席是把马列主义发展了一步，是给马列主义作了新的贡献，是马列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伟大的创造，当然毛主席也是一个根据最近一年多来国内外的形势，深思熟虑了的，特别是同斯大林问题，同波匈事件是有关系的。斯大林功绩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但是斯大林就不太懂得怎么相处和人民的关系，就不懂得区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苏联为什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呢？恐怕和斯大林的認識模糊是有关系；就是苏联肃反的扩大化，把很多无辜的善良的人民和完全没罪的共产党员杀害了，就是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的问题，同时斯大林在他晚年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人民的要求，对人民群众不够尊重，对人民民主权利不够尊重，就是说他的主观上当然是为人民谋幸福，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也没有想到一个革命政党不只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即须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还是要尊重人民群众，这问题在波匈事件里得到最好的说明了。大家知道波兰事件发生在前，匈牙利事件发生在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是搞得很厉害的，是拿着枪杆干的，那么哥穆尔卡在去年11月20日作的报告里面他承认了群众这样作是对的，他认为一个执政党陶醉在胜利里面是最可怕的，就只看到经济数字的上涨，看到学校多办了几个，看了什么合作社增加了多少，或者是双轮双铧犁增加多少，光从物质上去考虑这些问题（我这是引伸他的意见，他并没有讲双轮双铧犁的例子），没有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那是很危险的，在波兹南事件里确实是揭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许多阴暗面，这些东西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过没有办法，它是事实。他说过去在工农业里面，在政治生活里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他说波兹南事件的确是给党和政府的一个警告，这样看起来就是在波兰过去也是这问题没有处理好，波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嘛！解放后的发展、建

設成就也很大，但人民还是不滿意，人民不滿意不僅是說有肉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這就夠了，因為人民不是生物，他不限於生物的要求，他還有人的要求，執政黨只注意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而沒有注意到尊重他的權利，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給他一個人的生活，他還是不滿意的。

在匈牙利也是這樣子，匈牙利事件也說明群眾並不是反對匈牙利經濟制度，並不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當然後來有反動口號：“退回土地”，那是在小農黨反革命分子混進來以後；群眾最早起來攻擊拉科西、格羅集團的主要是說他們官僚主義，不關心人民疾苦，高高在上，官僚機構太龐大了，沒有很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肅反問題擴大化，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提問題，而主要還是提人民和黨的關係問題，所以匈牙利事件直接原因是黨群矛盾，由於黨群矛盾引起了匈牙利事件，然後由於帝國主義操縱和參與才把事態擴大化了。如果在匈牙利國內原來搞得很好，就是風平浪靜，帝國主義煽不起來。毛主席這個報告的意義就在於解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根本性的問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所以毛主席報告不僅在中國受到廣大人民歡迎，在波蘭、捷克這些國家也得到很好的反映，也認為毛主席報告替他們解決了很多問題。我們也看到了資產階級國家對此反映很大，認為毛主席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問題也是過去沒有解決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應該怎麼樣？以及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該怎樣？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現在看起來最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團結，儘可能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原則我認為也是適合的。過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有排他性的，赫魯曉夫在這點上做得比較好，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內，彼此相互關係過去也是解決得不好，過去資本主義造謠，說是東歐國家好像是衛星國，蘇聯是太陽和

月亮。你要說这一点也沒有道理，就也不相信，的确有一点卫星的味道，的确是那样，很多地方由于他們是小国，由于力量不强，党的力量各方面都不强，因此对苏联有点害怕和过分尊重，苏联也的确是这样，把他們当小国，不尊重他們，譬如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撤換問題就拿到莫斯科去商量，这就是很不合理的現象，当然自波匈事件以后，苏联政府認識到这样的錯誤，我們看波匈事件苏联政府也有很大的改进，譬如发表苏联政府宣言，对自己过去錯誤作了檢查。关于同波兰作生意賺了波兰的錢也退了一部分，关于苏軍在外面駐軍的問題重新締結了协定，这协定同过去协定比較是比較严格的。就是苏联軍隊不能随便行动，必須当地政府的同意。我認为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苏联是大国，波兰、捷克是小国，不过就国家來說都是一样，我們現在比尼泊尔大得多，我們也沒有欺侮尼泊尔，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小国不能歧視，对自己的小兄弟那为什么要歧視呢？应该团结友爱，在大家庭里生活，这問題我認为是在20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才很好解决的，在以前是沒有解决的，因此在20大以后就解决了两个带根本性問題，我認为这是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地发展創造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不是說从前不健康，就是从前有缺点，这点沒有解决。

最后，我談第七个問題，是两个小的問題。

就是对昨天有些不太合事实的，有些誤解的两个具体問題吧，在这里简单地談一下。我不愿每一件每一件去解釋，因为我的錯誤很多，現在多一件少一件对我不在乎，不过个别极突出的我要解釋一下，因为这与我的名譽有关。昨天有人說我反对一夫一妻制，男女只要双方爱慕就可以同居，这句话我是沒有講过的，我思想里沒有这种想法，但是有同志揭发了，我檢查了我的思想，的确沒有这印象，因为我对一夫一妻制还是非常感兴趣，我为什么要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呢？这对我做人的观点來說，从我的所見所聞來說都是不习惯的，我根本沒有这种感情。关于

第二個問題，我是談過的，不過把前後都抽掉了，就顯得很荒謬。有一天我與幾個同學談到共產主義建成後，人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就說共產主義建成後，人的個性會得到最大的解放，就是那時候人可以按着自己的願望做着自己所願意的，一切人為的束縛和共形式都要消失；有的同志說，那不會搞亂？我說不會搞亂的，我說那時候人們有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不會搞亂的，我說什麼形式都要取消，到那時候男女雙方只要互相愛慕互相同意，就可以同居。有的同志說：那還行？我說因為那時候有高度覺悟的保證，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現在的形式是到區政府去登記，領結婚証，而共產主義建成後，國家和黨都要消滅了，沒有區政府，你到那裏去登記呢？後來這個同志報告時，就把我的前後話都抽掉了，說是我現在主張這樣做，那當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在此解釋一下，不然有人會說我只二十幾歲，為什麼思想這樣腐朽，墮落到跟美國的阿飛差不多，所以我感覺很沉痛，把這個問題解釋一下，其他不合事實的就算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馬列主義的問題，有人揭發我說馬列主義是要煙消雲散的。我講過，我現在還在這裏講，馬列主義肯定是要煙消雲散的。為什麼說馬列主義將來會煙消雲散呢？我的論點是這樣的：馬列主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定階級的產物，那麼馬列主義也是屬於一種歷史範疇的東西，那麼它有它的歷史任務，它的歷史任務完了，它就完了，我們現在喊馬列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都是表示人們對它的尊敬，群眾對它的愛戴的感覺，你以為真的馬列主義就會活一萬歲嗎？那就是極端的糊塗，其實不會這樣，就是將來的馬列主義也不會象這樣，比如說共產主義建成了一千年兩千年、一萬年兩萬年以後，馬列主義是會有的，也沒有什麼用處了，當然就可以煙消雲散了。當然，它作為人類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是會保存在人類的思想寶庫里的，就象過去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莊子、老子思想，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孟德斯鳩思想，盧梭、佛爾泰思想，他們也是永

远保持在人类思想宝库里的，永远不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馬列主义也是不朽的，因为这也要放进去。但是如果以为几千年几万年以后还有一个“馬列主义教研室”，每天講馬列主义，我就不相信这样，我敢肯定要烟消云散，事实一定会这样子！关于我的思想就談到这里吧。

以上所講的就是我在20大以后由于自己原来思想的糊涂，感觉到應該独立思考，我思想上成了自由市場，东想西想，乱想，想出了这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看法。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罗，过去我也是个苦悶的探求者吧，有些問題我得不到解决，我很苦恼，过去有些問題我不是沒有問过，比方說苏芬战争問題我就問过同学，他也不能給我滿意答复。所以有些問題我只有自己思考，自己思考以后，我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故意胡鬧，还是看了些書，看了些事实，看了些材料經過反复思慮以后，得出了这样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間今天我認識到有些地方是錯的，以后我自己可以批判自己罗，自我批判。但是有些地方我还没有認識到錯誤，我还認為是对的，所以我今天呢就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过去思想上的一些看法都把它講出来，希望大家把我当作分析批判的材料罗，可以加以分析加以批判，帮助我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我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大家說服了我，把我的論点击潰了，粉碎了，那我繳械投降，决定投降；如果你沒有說服我，那我决定不投降。就是这样的。所以希望我也把这次反右派斗争看作是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也認識到我有許多东西是成体系的一套东西，这个气味和馬列主义的气味还是不太同吧，老留着这套东西的确也很伤脑筋，搞得不好呢就根据这些錯誤的思想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来，我愿意把这些东西糾正；但是糾正必須先加以認識，希望同志們能够大力帮助。过去反对我的观点的同志們，希望他們今后还是本着这个精神，繼續对我加以反对；至于过去贊成我的同学，可以根据今天的認識來談一談，不要看到今天形势不利就都來反对，連原来贊

成的也不贊成了，这样不是大丈夫的气概。

二、吳开斌的第二次发言

第一个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問題。

我个人在过去政治学习当中，曾經对这个問題发表过一些意見，主要就是怀疑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反革命問題。当时第一个論据就是根据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三批材料，它很难說明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我感觉在这三批材料里面，恐怕充滿了的就是一些牢騷；对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不滿意，对一些文艺现状进行攻击，当然里面有些下流話罗，人身攻击罗，罵人罗，有这样一些东西，不过我認为象那些东西都是很长时间的信件吧。这些信件經過收集以后，加以注解，加以摘要，再加以解釋吧。經過摘要、經過选择、再經過加工的东西，那么跟原来的东西就有一点区别，显得更突出、更集中、更触目惊心。他那些信件里面曾經也談到一些其他問題，也可能对文艺界好的現象也表示过滿意，或者对某些东西有些好的意見，但是为了說明他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吧，或不好的集团吧，把这些可能都刪掉了，剩下来的都是缺点和錯誤了。这就使人感觉得胡风反革命集团問題很严重。所以我就感觉怀疑，經過注解的东西，我認为也还不能說明它是反革命集团。就是說从那一些材料中来看吧，胡风集团在文艺界是一个有野心的小集团，同时有个別成員品質很恶劣；同时这个小集团有它自己的綱領，有它自己的一个組織，不是很严密的吧；同时这个小集团是跟党所领导的文学事业相对立的。恐怕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說明这样一个問題，我好象記得人民日报的編者按上这样講过，好象是这样一個集团在当时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我在当时看了这三批材料以后，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結論来。可以說他們在当时有这样的野心，想篡夺文艺界的领导，但很难看出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主席或国务院总理。在过去我对仅仅是凭这三批材料就来断定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是有些怀疑的。当时我并没有下结论，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党和政府另外掌握了其它材料，那么我就当别论。如果有些材料是很机密的，不能向群众公布的，但是国家确实掌握了，那么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论点，当时我的意见是希望政府能公开审理胡风，把他的问题公布出来，公开审判吧，使全国人民都能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当时根据一些现象来看，也使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候，曾经逮捕了很多人，这些人中间后来有一部分释放出来了。比方说，在武汉地区的有名的胡风分子王采、王凤，前不久在报纸上还登了王采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同学说，王凤也出来了。我还听到人说过，就是有人在武汉市的百货公司里买东西时，曾碰到曾卓和他的爱人，而曾卓是武汉市胡风分子的头子罗。另外我又听说，胡风集团在华南的骨干分子朱谷怀也已经出来了。在今年二月间或是三月间，我记不清了，有一个出版社登了一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书，新的翻译书要出版了，在这些新的翻译书里面包括有吕荧的一本书，就是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是新译本；还有一本是满涛翻译的书，是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集”。当时我就很怀疑，这些都是新译本，这是出来了以后译的吧！在监狱里是不允许做翻译这样的工作的，不过是不是允许，我不知道，但当时根据那些迹象来看，好像是出来了。而且我还听到一些流言，说什么满涛已经出来了，但名字改了，不叫做满涛了，而且还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究竟是不是，我也不敢断定，所以当时根据这些现象来看，使我产生一些错觉：在逮捕胡风党徒们的时候，是不是对每个人逮捕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风分子？是不是都是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所以当时产生一些怀疑罗，不过我的怀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话，我就愿意放弃这个论点。到后来我曾经看到周扬同志有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里说，他肯定胡风集

团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他說前不久在江西得到了一部分材料，那么这就是我从前所不知道的罗。既然有了新的材料，这新的材料我没有看过，那我就不能对这个問題发表意見了，所以关于胡风集团問題，我从前有过那样的思想活动，但现在，我愿意放弃这个观点，既然有事实嘛，我就尊重事实。

第二个問題是有同学要我談談上层建筑的問題。

这个問題太大了我实在无法談。上层建筑这个概念非常广泛，我过去曾經談过一些意見，就是稍为沾了一点边，不是針對整个上层建筑，但是我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有一点意見。这个意見是由于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后所想到的，当斯大林这个問題全部清楚以后，我感到很震惊，在苏联这样的制度下，为什么会发生象斯大林这样的錯誤，这个問題各持一端，鉄托同志講斯大林錯誤是制度的产物，而苏联主要是把个人品質归咎于个人的原因，那么鉄托同志那个“制度”两个字的含义何在呢？不大清楚，如果是指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的政治制度，那我認為也不能說他沒有一点理由，你說象斯大林所犯的这样大的錯誤，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嗎？个人負責嗎？难道說这个制度沒有一点缺陷，沒有一点毛病嗎？这个問題很难令人同意，在斯大林犯了錯誤以后，有人問赫魯曉夫，你們当时都是苏共中央的委員，你們当时知道不知道呢？或者知道了为什么不提出来呢？結果赫魯曉夫关于斯大林的錯誤曾經有一个解釋，說他当时也是知道的，不过当时不能提出来，因为当时整个苏共中央都是处于困难的地步，就是当时斯大林的威信在苏联的各族人民中間很高，人民非常愛戴和信仰斯大林。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提出来跟斯大林不同的意見，批評了斯大林的話，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反对党反对苏維埃，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叛徒。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自己还有杀身之禍。他的解釋是这个样子罗。这样的解釋就更不能說明問題，反而更暴露了問題，就是說赫魯曉夫他們这样一般人在当时是知道斯大林的錯誤，那么当时沒有提，这当然与赫魯曉

夫的个人有原因，也許是原則性吧，給他扣个帽子，但是我認為这个制度还是有些問題，既然斯大林有錯誤，为什么制度本身不能保証一个公民，甚至中央委員当他犯了很多錯誤的时候，为什么整个的部长會議，整个的苏共中央以及当时的監檢部門，司法部門，都不能够通过正当手續起来制止，起来干預，起来提意見。斯大林当时威信当然是很高，大家是很尊重斯大林，那么是否这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法紀，整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可以不管了。如果說这个社会制度是很健全的話，一点毛病也沒有的話，那么人民也好，苏共中央的委員也好，應該有可能通过正常的手段和正常的手續来表达自己的意見。那就应当指出斯大林的錯誤，如果斯大林坚持錯誤不改的話，就撤換他嘛。我認為，究竟是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要紧呢？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更要紧呢？斯大林的錯誤是很长时期的罗。不是一朝一夕，在那样长的时期內不可能得到糾正，那么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到，某些政治制度是不够健全。不是正常的集体領導的原則被破坏了嗎？民主生活貫徹得不够，使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講話，也不愿意講話，看到一个最高的領導同志犯了錯誤，我認為这就是政治生活上的不正常現象。这种現象长期得不到糾正，絕對不能解釋为个人原因，所以我認為斯大林同志的錯誤，跟苏联的政治制度有一定关系。但是，关于具体关系究竟怎么样，應該由那些同志負責，那我沒有仔細研究过。过去嘛，也是脑子随便想一想，講一下子，今天要我深刻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第三个問題，我想談一談我的有些思想跟我在整风中的行动有那些联系。

关于整风运动，我过去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我不仅是把它看成是克服三大主义，我不把它的意义局限在这个上面。就是說，我对这次整风运动所抱的希望不仅是克服些公文旅行啦，文牘主义啦，或是不关心人民疾苦啦，或是留助教多留几个黨員啦，我不是把意义局限在这个上面的。当我看到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

时，我就联想到毛主席一个很英明的报告，就是“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那个指示报告里面对于那些阐明得很清楚，就是说整风的主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呢？最突出的表现在党群矛盾上面。而之所以有党群矛盾，是因为党本身存在错误和缺点，而党本身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表现在三大主义上面，因此克服三大主义，就有助于缓和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就有助于解决党群矛盾。党群矛盾解决了的话，就容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跨进一步，我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整风运动的。刚开始看到整风指示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波匈事件，我就把整风运动和一年多来当前国内外重大形势联系起来考虑了一下，因为我认为整风的意义很重大，绝对不是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是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我是这样来理解的。所以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是感到很迫切的，感到刻不容缓，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要马上解决，带着一种急躁情绪，那么，在整风前一两个月，我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罗，不过为了说明问题，也要提一提，我是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忠实读者，光明日报我还读得少一点，文汇报自它复刊以后，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读的，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它的编排、它的新鲜的标题、它的独特的风格，使我爱好，更重要是它的思想和我的口味很相投，我感觉得文汇报有很多地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我当时这样讲文汇报不愧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当时我的确非常崇拜文汇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文汇报犯了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方向，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不到这一点，当时我记得在文汇报上有许多专家、名人、教授发表文章，比方说我现在还能记得的象王恒守、王造时、张孟闻、黄鸣龙这样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国内有名的人，特别是象王造时，过去是救国会的“七君子”，我对他的道德、文章、人格一向是很尊重的，对他们的言论，我从来没有怀疑，而且是非常相信的。那个时候

他們所發表的文章，把黨的錯誤和缺點，是誇大了；另外他們所講的一些東西，主要是在文教、衛生和科學研究這些方面。我聯系他們的發言，考慮了一下，的確也是這樣，我自己過去感覺，對工農業方面我不大清楚，但在文教、衛生和科學研究方面，的確是有很多缺點，今天反右派鬥爭應該提出來，他們把錯誤和缺點誇大了，但是絕對不能認為他們過去所講的是全部造謠，全是假的，如果全是假的，那麼今天整風就沒有必要進行了。他們講的東西的確還是有些根據的，但是由於他們帶了右派的情緒，就容易把它誇大一些，而當時這些誇大了的東西，在我思想上起了導火綫的作用吧，我就全盤接受下來了。當文匯報上揭露了一些問題，差不多我們每天在寢室里都要互相談論，而且感到我們國內問題的確是相當嚴重，如果再不解決的話，前途也是很危險的，當時有這樣的感覺。但是當問題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認為在整風里面也不會犯很大的錯誤了，思想上發展到這樣地步，我認為基本還是正確的。但到以後思想就走到一個歧途去了。怎麼走到歧途去了的呢？我從當時形勢來考慮，我逐漸產生了這樣一個錯覺，什麼錯覺呢？我想這次整風運動，是比較特殊一些，與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都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黨發動群眾來整自己，所以我就感覺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得縮手縮腳一點，害怕一點，怕痛，不夠積極，這當然不是我對全黨懷疑啦，中央我是相信的。中央如果沒有決心的話，它就不會提出整風的指示來。但是當時我的確懷疑黨的某些基層組織和某些個別黨員，他們有些怕痛，對於整風運動的重大意義是認識不足。當時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大“鳴”大“放”，走在全國的前面，特別是上海，當時很令我興奮，當時中共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他打開了大“鳴”大“放”的局面。而在其他地方，就不是這樣，在武漢市就是很沉悶。當時報紙上也三番五次地批評了，說“春風不渡武勝關”，在西北來講，“春風不渡玉門關”，在四川來說，是春寒沒有解凍。在當時從全國來看，

也就只有少数地区和少数领导同志表现了大“鸣”大“放”的决心，表现了要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决心。据我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下层党组织和某些党员本身并没有认识到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提出要整风，提出要开座谈会，恐怕还是组织性的保证，服从上级的决议。我在当时是这样讲：我说这个运动是比较特殊一些，群众是不是应该主动一些呢？群众如果不主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整风运动就不会弄得很彻底。因为这个运动不象过去那样，全党上下一致动手，同心合力，这里面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决心大，有的决心小，所以我认为在有的地方，党的决心表示得不够的地方，群众就应该主动些。而在群众起来以后，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是不能按照党的原来意图划一个小圈圈，在这个圈圈里面要你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要你讲什么，你就不讲。所以我认为整风运动既然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问题，那就不能依照某些党组织的狭隘观点、保守观点，或怕痛，而群众就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你要我批评公文旅行，我就讲一讲这个现象，你要我批评留助教留党员，我就谈些鸡毛蒜皮的现象。我当时有了这样的错觉，要群众起来，打开一下局面。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是逐渐发展的，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我就听说中南民族学院语文专修科，成立了自己的行动委员会，同学们有自己组织了，对院内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还打算到北京向国务院请愿。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意这样一个组织的，我认为他们只要不造反，只起来提些意见，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并不是要与共产党争天下，只是对院内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意见和解决办法，我认为那是可以的。华中师范学院和湖北医学院，当时也因为党委不同意同学们大“鸣”大“放”，同学们就自动起来鸣放，打开了局面。这就更刺激了我认为有些东西必需自己起来搞，依靠党委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报纸（指火焰报）发表了篇北京书简。北京书简是右派分子写的，其中有一句话当时在我的思想中起了一些作用。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次运动是一次群众的自

发运动，当时我特别欣赏那“自发”两个字。因为北京大学的运动也是自发的起来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自发起来的，所以我认为自发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思想发展下去，到以后也就成为不尊重党委领导，跟党委对立，单搞一套，到最后发展成抗拒领导，最后发展成与党争夺领导权。我和有些同学在一起组织了伪中文系鸣放委员会，这是伪组织，当然现在我感到这是我一生的耻辱。当时我为什么想搞一个组织呢？我是有一个思想原因的，因为我个人当时不相信武大党委，在这里可公开说，我当时对刘真同志也不相信，我跟刘真同志打交道也打得不少了，在长期的过程中我感到他的决心不大，魄力不足，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党，必需要有自己的行动，对党委来施加压力，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我也感觉有些东西需要组织一部分同学，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些事情，至于要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就要解释一下罗，并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也不是说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当时确实没有这种思想，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点，更没有这样想过。我当时想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北京大学开始整风之前，就看到北京大学在我看来所谓是“新气象”，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这个校务委员会是作为全校的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当时党委也参加这个校务委员会。那时我记得光明日报曾经登过这样一个消息，好象是关于科学奖金问题，好象原来党委提出一个建议，后来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了，这个事件曾在报上大肆宣扬过。当时我感觉这是个好现象，但是我并不是认为反对共产党是个好现象，而是我感觉到解放以后，一个行政机关否定党的决议，否定党的建议还是第一次。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里体现了群众更负责，对自己的事业更负责，当感到党委的决议不切实，不正确的时候有勇气把它否定。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后，党委也认为是正确的，所以我认为过去党委负责制，不管什么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决议，有时就难免不有一些偏差，那么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

吸收一些对办高等教育有經驗的老教授参加，广泛的听取他們意見，使党委在領導全校工作时考虑得更周到一些，避免少犯些錯誤，我認为是正确的。所以我对校务委员会这个东西是很感兴趣的，而且很希望在武大也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所以我原来搞伪中文系鳴放委员会时，当然这是我思想上的想法，还未提出过，就是想准备成立以后，宣揚这一事情，而且准备向武大、向湖北省委提出这样一些要求。

在整风期間，北京大学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們过去的紀念堂里面本来摆着罗蒙諾索夫象，后来把这个象弄掉了，而放了一个蔡元培的象，我欣賞它这一点倒并不是因為他們把俄国人的象弄走了，因为罗蒙諾索夫也是偉大的学者。就是我感觉北京大学突然又想起了蔡元培，这件事情使我很受感动。当然，蔡元培死的时候，我还是小孩，但当我长大以后，我是深深的感覺到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文化和科学史上是占据了一个重大的地位，我确实認为蔡元培是一个可說是相当偉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家。自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那一段時間里面，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的气魄很大，兼收并蓄，什么东西都可装得下去，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界出現了一片繁荣气象，比如象李大釗，象陈独秀，他們都可以在北大講学。当时蔡元培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認为是了不起的。蔡元培对推进北京大学的学术是有发展的，是有一定貢獻的，因此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功臣，應該肯定他。因为这个象就連想到这样事情，我想到当时武汉大学学术完全不够濃厚，在学校里面对这些有学术成就的老前輩尊重不够，过去在很多問題上过分強調政治条件，而对有几十年研究經驗的某一个学术界的权威尊重是不够的，在我們学校里頂頂大名的是党委書記、人事处处长这样的人，而不是某些专家和教授。所以我認为这是不够正常的現象。但我并不要求把党委書記和人事处长打下来，我是認为党委書記有名、人事处长有名，但是某些专家和教授也應該在学校享有盛名，这就是應該把学校里学术空气搞得更濃厚一些。

在北京大学很活跃。比方开辯論会、自由講坛、办刊物。有时我很想把这一套搬到武大来，就是很愿意按照北京大学的方式吧，把武大所謂改造一下。当时我对北大的东西很欽佩的，但是我考虑到这样一些东西，恐怕不是武大的党委所愿意接受、所愿意努力来推行的，这就应该团结一些同学来宣傳这些道理，争取在武大能做到这些事情。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要組織鳴放委员会的思想基础。

另外关于党委負責制問題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我并没有发表过言論要反对党委負責制，我没有講这样的话，但在思想上我是想过的。思想上是反对党委負責制的。至于講与沒講不成問題。这个問題我是这样看的，关于高等学校内的党委負責制問題，在很早就有人提过，好象今年春天就有人提吧，在北京的一些座談会上，就有一些教授提出过，已經提出民主治校和教授办校的这样一些問題。那么今天重翻一下以前的报纸还也看到这样一点，在当时是当作一个学术問題提出来的，或带学术性的問題，但是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而是研究一下党怎样更好的领导高等教育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討問題的。在这件事情以后不久我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是否可靠我也不敢担保。听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問題已經开始委托“民盟”和“九三学社”来研究。这是我听到有人談过的。当时我这样講，中央既然委托别人研究，我們也可研究一下，可以表示自己意見，以后刘真同志在不止一次大会上談过这个問題，关于党委負責制的問題你們可以討論，你們可以研究。所以当时我对这个問題也很感兴趣，而且是倾向于取消党委制的，但取消党委負責制不等于取消党委制，党员就要組織一个党委会嘛，而是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领导学校，党委来领导校委会，通过校委会来起作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今天有某人一講取消党委負責制，于是他就变为右派分子，我認为这是不公正。当然有这样情况有人是借着这样幌子，实际上是要反对共产党，表面上好象是反

对党委負責制，实际上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但是也不可否認，有一种人他确实是为了党的事业，是想把学校办好，的确是为了把工作做好，的确是为了把学校办好，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当然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于研究。即使在主張取消党委負責制的人中間也有两种不同情况。現在很籠統的凡是提出取消党委負責制的人都給他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認为是不公正的，这样，以后知識分子就不会講話了，因为知識分子受了委屈嘛，管你負責制不負責制，我一个月拿几百元錢就算了，根本所以不講話。我在剛开始搞时，也有过这个消极思想，关于大事件可以不发表意見，那么我也可以优哉游哉嘛。所以我認为这个問題还值得研究一下子，就是很好的分清是非吧，不要使有些人遭冤。但有人他是右派分子，就是不反对党委制也是右派分子，这个問題恐怕还是应区别的对待。简单的邏輯往往是不能解决問題的。

有个同志递了一張条子說：“你認为整风不止限于除‘三害’，那么你同意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权嗎？”这个問題是否是这样的，整风不限于除“三害”并不等于同意說“爭民主、爭人权、爭自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間还大有活动的余地。我認为整风是不限于除“三害”，因为除了除“三害”以外，其它違法乱紀是不是也应该反一反呢？也应该反。現在我仍坚持这种看法。中央的整风指示也談到这个問題，还說：在整风中如果发现了違法乱紀的現象，要給以組織上的处分。中央的整风指示中也說明了这一点，就是我們的整风也不只限于除“三害”，就是超出“三害”的某些重大的違法乱紀現象也应该进行处理。我今天的看法也是这样子，就是說，是不是只有“三害”才能在整风中提一提，而其它就不能提呢？那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如果說整风不只限于除“三害”，也不会違反中央整风的指示。那么是不是說这个牵涉到制度問題，我認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不可动搖的，但不等于說，社会主义下的每一个制度都是完美无缺的，我認为只要在整风中，只要发现某一个具体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或不完备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改一

改，也不至于会发生天下大乱吧，比如說有些东西已經改了嘛，例如选拔留学生制度已改了嘛，这不是改制度嗎？現在好象說，整风一超出“三害”范圍，一說要清算某些制度就算是右派分子，那我在这里也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們的国家实际生活情况已經說明了这一点，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改，有些現在已經在改了。

又有人問：你在整风运动中是否想爭夺領導权。我剛才已經講了，在中文系我是想爭領導权的，而且也爭过。

还有一張条子，要我講一講与林希翎的关系和我对林的看法，这个問題我已經在班上講过一次，同时也写过一次材料，要講到林希翎的問題，恐怕也需要一个多鐘头的時間，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講，大家如果同意的話我就准备一下，不是三言两語講得清的。林希翎的政治观点也很复杂，她也不是一个很簡單的人。

徐真的右派言論

按：徐真系华中工学院教授，在鳴放中发表了一系列右派言論。这个材料，是根据华中工学院所整理的材料选編的。

一、在华中工学院农工民主党座談会上的发言

小組討論会是我們的思想訓練班，在班上歌功頌德是最穩妥不过的。对政策稍異議，或是对社会现象提点批評，那么“对新社会有抵触”，“思想有問題”一大堆帽子就会落到头上来，不甘做落后分子的人，于是被訓練成“国王的新衣”的贊美者；不愿随声附和的人只有少开口一条道路可走，結果，阿諛成风，被阿諛的人得意忘形！官僚产生了！宗派形成了！社会腐化了！

爱听好听的話的人，当然也爱講好听的話，把一件本来不是美滿的事件，說成一件美滿的事件是相当費力的，虽然也說得出一套道理，可惜道理是片面的，經不起全面的辯証，好在受訓者早学会少开其口，很难得有人起来反駁。比如增加工資吧，大談照顧的一面，避开物价穩定問題的一面；又如定額选举吧，只談怎样怎样民主，而不正面地触及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限制方式的理由；再如面食制品中摻用其他食粮的先进方法介紹吧，不仅說制品的外观好看，并且声称营养更丰富了。这些都不是老实话，說者明白，听者也明白！只因各人皆不甘做落后分子，大家怀着鬼胎在贊賞国王的新衣！

我們为什么要怀着鬼胎过日子？我們不好講老实话，开誠相見嗎？說明在現阶段的社会里，领导者不得不抓紧些，民主还不

得不受若干限制，总的目的是怎样怎样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說明我国今年粮食歉收，或者需要运些到外国去換建設物資，所以縱使营养差些，大家應該忍受而粉与杂粮和用的措施，这才是实事求是，亲切如家人父子的談話，一家如父母子女，遇家庭有困难时，为什么每能无怨言地合力度过难关；无他，开誠布公而已。共产党把农村每年在旧社会里理應餓死人的事件消除，貧雇农的生活提高（提高不多，但面甚广），已是无量功德，何苦气量不寬，不放过一点細枝末节，硬要講成十全十美，天衣无縫，令人有是非难辨之感！黑也是你說的，白也是你說的；結果必然是：算了吧，除掉国王的新衣的贊美者，閉起嘴。或曰：是非是有的，应以是否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做衡量标准，这人儼然以为講好听的片面話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这是淺短之見，有时从权用用是可以的，要知終非正道，尤其用这个方法來对待知識分子，不好听的話有刺激之功，使听者能够全面地多多发现，从而进一步解决那些客觀上已經存在的矛盾，一味歌功頌德，天下的幻象会使听者麻痺，社会腐化——使得我們光輝灿烂的前程被推远，岂不可惜！

现在是鳴的时候了，上面所說的已成过去陈述，說來沒多大价值，怕回忆，怕触着过去的痛处的人，在风头上虽一时容易被迫承認錯誤，风头一过也容易老病复发的。我歌頌鳴放政策，我歌頌这付社会防腐剂！不过，现在的清規戒律还多哩！共产党即是真理，毛主席被捧成了不容怀疑不可能有一絲一毫錯誤的神，自思想改造迄今，我始終想不通这个辯証邏輯，就如我在民主党派某会上发言，說了几个共产党不是，事后一位关心我的同志（我感謝他）起来問我是不是共产党三字为共产党员四字之誤，我一時慌張起来，承認是的是的，事后想来，这仍是“好听話”“有顧慮”的例子，共产党里有腐化到不堪容忍的共产党员，如大字报上所宣布者，共产党难道沒有責任？毛主席雅量非凡，他說：如果批評倒了，那就該倒！我現在还很担心有此雅量的領導者是不多的。

以前，愛听好听的話，愛講好听的話的风气是領導們培养出来的（若以春秋責备賢者之义，就說是共产党縱容出来的也可），現在那些藩籬虽經拆除，而讓不好听的話与共产党三字触及的人及关心他的人仍然有如惊弓之鳥，其故何哉？

二、在华中工学院老教师座談会上的发言

我們学校有許多矛盾。主要的是什么？縮小来看，是宗派主义占上头。

我对主人翁的問題，我認为共产党的优越感太重，他認为是主人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湖北日报上有人談到这句话不对，也还有一部分人反对、反駁，也有人說这种說法是否認共产党的領導权，我不贊成这种意見。斯大林說：“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意思是吃苦在先，別人做不到的，共产党员能做到。现在是享乐在先，这句话則反而也可解釋为优越感。有优越感，就有了特权，这样就坏了，因此，違法等行动也就沒有关系，造成一系列自私，不信任別人，只信任少数人的反映情况，这些人也就認为是特殊材料。我以前当教研室主任有顧慮，現在沒有了，我心想，明朝派一大将一定有一宦官做监兵，我虽是將軍，但秘書是监兵。我有这种想法，别的教研室主任是否也有这种想法。

共产党员一般看来是好的，肯做事，肯牺牲，但我是敬而远之。如对彭副院长，洪德銘副教务长，我很尊敬，但不敢接近。他們对我很客气，但态度傲慢。洪副教务长有时沒等人說完話轉头就走，很使人难为情。彭副院长沒等人說完話就做結論。当然小事不要介意。不过对我相当的客气，我还怕接近，那么，对不客气的那些人，就更怕了，这是脱离群众，偏听偏信，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

人事处的作风要注意，最怕惹他們。你一进門，好象你是偷

他的机密的。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抓住了人家的尾巴。抓住了人家的尾巴，材料都掌握了。这种作风值得检查，要做到心服，不要抓尾巴。审干前，我不敢说话，掌握了材料那得了，因此，形成雇佣。主是共产党员，佣是非党人。在鸣放前完全是主雇关系。在我们学校揭发很多而严重的问题，但更严重的还在农村，更厉害十倍，那里是土皇帝。因为在高级知识分子，对我不起还可登登长江日报，大写其文章，彭副院长等水平也高些，所以，大矛盾还在农村，学校矛盾解决了，还要把社会上的矛盾解决，农村的领导横行霸道。现在鸣放了主雇关系有取消的可能，但还离的很远，鸣得好，就可以取消，消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以后。鸣放低落是不好的现象，比如主人请女佣人，佣人不敢说小少爷的坏话，现在允许说了，女佣人心里就舒服了，有点象主人，但如果再反映，主人不骂小少爷，这就没有什么意思。鸣有两种鸣法：一种是吐苦水，最容易鸣；第二种是向小少爷提意见，吐了苦水就要处理、解决，如果佣人说饭没吃饱你还不给吃饱，提小少爷的意见就提不起来了。现在报纸上说有人否认领导权，冲淡了警惕，这意思就是不应把非党提的高，我看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把党压低，不是抢领导。共产党员象大兄，非党象小姊妹，父母对待他们要一样，不要分心，做大老兄的怎样做法，要承认他们是姊妹，要自己做榜样，爱护姊妹。解放后的确是做了模范，但有些共产党员却做了春秋中的“史法”？（记的音，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意是并未起模范作用，相反的起了坏作用）我希望把主佣关系取消。

提出几点意见：

- 一、要诚恳，不要怀疑，你对他诚，他也对你诚。
- 二、重视法律尊严，违法者是不重视宪法，是守法观点淡薄。
- 三、共产党创造性不够，只有毛主席一人在创造，要毛主席说了才能动，绝对服从，思想改造也要一切服从，硬要我承认，直到现在我还想不通。斯大林有毛病，为什么说毛主席就没有毛

病？毛主席只一个人，精神有限，单只靠他一个人，那有这样的精神呀！“百花齐放”就应该百花齐放吧！我看创造性还不够，我这种说法可能是修正主义吧！

教学改革方面：

几年来文件特别多，多到不能执行，我对洪副教务长说：“做计划好，我不会做，我会的，又不愿做。”我们乡下有一句这样的话：有人捉麻雀，抓紧了怕死，抓松了又怕飞走。我感到我们学校也是这种情况，学校宁愿捉死麻雀，那当然有成绩，肯定的但成绩并不会高。

在师资培养方面实在有苦，自己身体不好，自己没培养，助教培养还快，我对洪副教务长说：“我是吃老本，三年吃完了，要我培养很吃力，太重了。”学校人员太多，可裁去些，如系主任还需副的，教务长这么多，科学院的部长十几个，怪不得是统战工作吧！每个党派一个，是否考虑省去些。

我爱人在夜校教了三年书，一直没转正，她说她年龄老了，做半年算半年。我那时在国民党为她找事很容易。我并不介意这些事，但为什么殷副总务长的爱人一下就有了工作呢？呵！他是共产党员，这使我感到我不是主人翁，我想做主人翁，做不到。

張地：論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

按：張地是中南財經學院統計系三年級农业班学生，这个材料系摘自中南財經學院“学习快报”。

(1) 寻求最适当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为什么要提出寻求最适当的领导方式的問題呢？是因为我們国家現行的管理制度——党委制，存在一定的缺点。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党委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把这种管理制度的缺点十分明显的暴露出来了。1953年民主德国的柏林暴动，1956年波兰的波茨南暴动，同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而特別使人感到震惊的，是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的斯大林違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則的长期专橫政治。所有这些事件，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們的注意。在实行党委领导的几个兄弟国家中，一两年来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改組，如波兰的八中全会，匈牙利拉科西和格罗的被赶下政治舞台，保加利亚的撤換契尔文科夫等等，表现了这些国家在以往的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倒是处在巴尔干半島的那个四面孤立的社会主义小国南斯拉夫，自她的搖籃时代起，一直西受帝国主义的阴謀干涉，东受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排斥，反而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南斯拉夫国内政治一直是稳定的，她的领导者，和她人民团結日益紧密。她在內政和外交活动中表现得生气蓬勃，十分活跃。把这两种情况比較起来，人們自然会发生这样的疑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党委制的問題，

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管理制度的問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早就指出过：象柏林、波茨南、匈牙利的暴动，象斯大林、拉科西、格罗式的政治人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制度的必然产物。事实正是这样，尽管上述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表现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尽管各有其特殊复杂的客观原因；但这些事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是由于权力过度集中，違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則，侵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所造成的。故此我以为有必要把我們現行的国家管理方式，把我們党在国家中的地位，重新予以审查。尽管我們和各兄弟国家在以往的工作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績，但我們决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讓这些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过程中的成就麻痹了我們的政治嗅觉。我們今后道路更长，任务更光荣而艰巨，因此我們應該对国家的现状抱着健康的批判的态度，研究它，不断改进它，这才是对于我們偉大事业的高度責任感的表现。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方面，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积累了許多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应当總結和研究这些經驗教訓。假如有了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我們还要繼續犯这些錯誤，那么，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原諒自己了。

“社会主义今后的命运……首先取决于这种成果进一步扩大，取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对自己的成績采取健康的、民主的、和批判的态度，它需要一种不可抑制和深遠的愿望去謀求最好的国家制度”。

（2）党委制問題提出的客观原因

以前，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誰也不曾想到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問題。当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縛，使不少党的干部，甚至象斯大林这样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也僵化了。他搞了一辈子的政治，連人民内部有矛盾的事实，一直熟視无睹。他是这样糊涂，把一些内部問題也統統用简单鎮压的方式处理了。当时，社会主义陣容大部分思想人物，个个象是醉翁，喊出了一

片空談的歌功頌德的声音。現在，只要想想斯大林錯誤的严重后果，想想匈牙利事件，就理解到这种空泛的歌頌的危害性！（当然，我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恶毒的反对现实的論調。）人們对斯大林和拉科西的錯誤是怎样解釋的呢？說这是由于人民思想意識中殘存的个人崇拜思想，和斯大林个人品質上的缺点所造成的。这样看法，斯大林的錯誤似乎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負責了。对于波茲南匈牙利事件，說是由于工人群众落后、帝国主义挑撥和国家某些政策的缺点造成的。这些解答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卡德尔同志指出：“这种意見不仅是巨大的錯誤，而且是一种幻想，这样的結論会麻痹社会主义意識，远远不能說明对問題的原因有了真正的認識，不能正确地解决問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向我們进了言：“問題必須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我对南斯拉夫的同志們結論表示贊同。我認为这是真理。因此在現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不惜尝受可能发生的风险，甘当众矢之的，以求把这个重大的是非問題在大家政治积极性高漲的情况下爭个清楚明白。

（3）我国和苏联政治制度：党委制，党委政治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制度的概念：“我們所說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讓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維埃制度。我們这里所指的政治制度是这样一些政治方式和方法的总和：这些政治方式和方法隔絕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讓他們有可能去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卡德尔同志譴責这种政治制度說：“这种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實質上已經变成了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当然，卡德尔同志的这些話，主要是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說的。我国的政治現狀自然与当时的匈牙利不同，但基本政治制度——党委制是相同的。我国之所以沒有产生象匈牙利共产党那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原因是我們党的領導人物是謙虛的，

兢兢业业的。只是因为这个人因素，我們党才有异于匈牙利共产党。但我們党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原先匈牙利共产党是一样的。因此我以为南斯拉夫同志的批評对于我們也基本上适用。应当仔細研究。

我国現行的政治制度是党委制，它与宪法所規定的政治制度是有差别的。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从事党的工作的人，而是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公民，对于我国現行的政治制度是不大清楚的。所以，写到这里心里非常惴惴，恐怕会有許多不尽符合事实之处。这段是我的文章中最基本的环节，也是最薄弱的环节，同学们要反駁，最好从这段着手。

以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觉得我們国家的管理制度与宪法規定的出入很大。宪法上規定的：一切权力属于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但日常所感到的国家权力是属各級党委会。你們看，中共中央委员会似乎比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大些，省委会比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大些，体现在职权上，就表现为省委書記比省长权力大些，县委書記比县长大些，而在我們班上也似乎团支部書記比由全班选出的班主席大些。現在各級党委都設有与各級人民政府相对应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往往代替和平行政府机构的工作。总之，在国家生活中，首先看到的是占全国人口六十分之一的党組織的作用，其次才能看到包括党員在内的六亿人民的政府的作用。这样做法是不是很恰当的呢？我以为不恰当。管理领导全国的本应当是全国性的机构，而不能是部分性的机构。这是合理的邏輯。如果党委机构直接干預国家的事务，就会削弱政府的作用，就会引起人民某种程度的反感，就必然会发生党群間的矛盾。虽然我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也得到人民无比深厚的爱戴；但党与群众、党与国家終究是有界綫的。这必須划分清楚。列宁在从事組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就已說过：不要忘記先进部队与趋向于它的一切群众的区别。不要忘記党与群众在組織上还有一条分界綫。假如我們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

办政府的工作，结果是费力不讨好。有了错误，首先把责任推在党身上。而一切别有用心心的政治野心家，也常常借此攻击我们党。

随着人民政治积极性的高涨，党委政治愈来愈不能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要求。在解放几年以来，由于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由于国家美丽的社会主义远景的鼓舞，人民的觉悟是提高了。而且今后会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社会主义已在全国人民的思想生了根，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全民的事业。人民政治积极性高涨，就是原先一些落后群众也改变了“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他们也要当家作主，过问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党委政治是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这种政治制度与人民的民权要求发生矛盾。这种政治制度不能最有效地动员全体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不能有效地调动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因此卡德尔同志说：“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应当使已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觉悟的劳动人民群众，能够经常地表现出他们的最进步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没有阻碍地改变旧制度。”这是许多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的国家里的主要要求。

其次，目前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党直接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党本身也是不利的。党在国家中这样突出的、不恰当的地位，使党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和争权夺利的现象。这甚至各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有这种表现。象苏联的贝利亚，匈牙利的拉科西，中国的高岗和饶漱石等，这些人虽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肩负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重担，其中某些人本来也是诚诚恳恳的革命者，但到革命胜利后，竟然蜕化变质，抱着个人动机在搞政治，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再则对党本身的处境也是不利的。现在，党的地位，党员的权力，使得社会上不少功利主义分子非常眼红。他们围绕在党的周围，一次又一次的申请，千方百计钻进党内，把党员的称号作为敲门之砖。

目前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确有不少这样庸俗人物混进党内。党在三十多年的斗争中，至今成员已发展到一千多万，而

其中80%以上的八、九百万党员是在党掌握政权以后加入的，这样迅速的发展，固然一方面表现党的工作和理想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这80%以上的新成员中，或多或少抱有个人动机的是有其人在。如果我们不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党的这种处境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第三，党委政治，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也有缺点。往往容易党政不分，把党和国家混同起来，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国际矛盾。斯大林在世时期，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的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与各该国的党政不分现象有因果联系。在党的关系上，苏联共产党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可以直接干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因为党政不分，这种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往往代替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不自觉成了对各国的政治的干涉。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关系史的第一页上，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记录。不仅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去年赫鲁晓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苏南两党关于匈牙利发生争论后，他就在两国关系采取不恰当的措施。苏联在对帮助南斯拉夫兴建炼铝的问题上，故意为难，虽然铁托总统在去年底已经呼吁过，不要把两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造成两国关系的不和，但是在前几月中两国之间仍不免出现较为紧张的局面。

总之，党委制的政治制度，不论对国家和对党本身都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讨论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不论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鲜花还是毒草，只要动机是善良的，其工作本身都应受到社会进步势力的赞助与支持。

(4) 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取消党委制，加强政府机构，把人民的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机关

我在上一节里已经论证了党委政治对于国家和党本身都是不利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调整党与国家的关系，主张取消党委制，

把政府作为唯一的职能机关和权力机关。而在将来，当政府中的暴力机构被淘汰以后，它的經濟管理的机构将会相应的加强，剩下的这些机构，象计划机关和經濟委员会等的組織，就成为社会的唯一的领导形式。这正是共产主义最可能适用的社会組織形式。因此，取消党委制，加强全民性的国家机关，是政党逐步消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上层建筑准备工作的重要步骤。

今后全体社会主义的成員以及其中的各种政治集团，都不能直接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他們都有同等的机会經過政府机构实现自己的綱領和政策，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国家选举应当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重大的事件，社会领导机构的新陈代谢，应当由全国人民参加的选举运动来实现。人民为选择最賢能的领导者，应当欢迎开展广泛的竞选活动。竞选是擇优去劣的好方法，資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他們的政权，我們也可以把他們的經驗拿过来，加以改进，为我們的政权服务。我們反对資產阶级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相互恶毒攻击的竞选，但应当欢迎同志式的互相批評、互相监督、彼此揭发工作中的缺点的竞选。同志与同志間、个人与个人間、党派与党派間的竞赛，对于我們的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今后我們党可以通过它的正确的建設綱領，通过它的德才兼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信，并由人民推选到政府中去的成員，来实现它的领导权。至于各級党的組織一定要与国家机构分家。党組織，各級党的負責人就只能做党的工作，如发展党员，向人民作宣傳教育工作等等。总之党的工作者应当記住卡德尔这句话：“建設社会主义只有一部分取决于领导力量的主观愿望。”“领导的力量应当只致力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解放和維護这种力量，防止各种因素的干扰。”这样做，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活跃起来，而同时由于竞选和竞赛，也能刺激各个政党改进本身的工作，主动的接近群众，更加百倍努力地爭取群众的信任。

我以上一些不成熟也无多大說服力的初步意見，一定会受到

同學的反駁，人們會質問：

一、你要各個黨派，包括象民革、民盟、民建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和中共一起競選，一視同仁，不是喪失了階級立場嗎？

答：沒有喪失階級立場。因為我主張開展廣泛的競選活動，並不是為了資產階級，我將來也不一定就會投他們的票。我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已經高度覺悟了的人民群眾中不斷會產生的新生力量有充分的機會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人民群眾參加政治活動的方便條件。資產階級政黨不管採取什麼手段，在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中其他進步勢力的競爭中，不可能得到任何便宜。因此，這樣做不會傷害全國人民的利益，故沒有喪失階級立場。

二、你要取消黨委制，把人民的政府作為唯一的權力機關，是反對黨的領導！

答：不是反對黨的領導。怎樣能是反對黨的領導呢？政府是全民的組織，我們黨員也是人民，他也有分呀。黨的成員，也正如每個普通有政治權利的公民一樣，可以自由地選舉他所愛戴的人，自己也可以被選到政府裏面去實現黨的意志。這怎么能說是反對黨的領導呢？我們應當相信自己的力量，應當相信人民群眾有物色正確領導者的能力。

我們應當相信自己的力量，決不要對國內的右派勢力、資產階級政黨有絲毫害怕，或擔心（當然，並不等於放鬆警惕），現在，國內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政派能與我們黨相抗衡了。只有我們的黨政治實力最為強大，它有一千多萬成員，並在人民群眾中享有絕對的威信。因此在競選中我們將會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機構中取得比現在更多的席位，那時候，資產階級政治人物當不到官不能埋怨任何人了，現在他們沒當上副總理，大發牢騷，叫什麼“黨天下”了。將來牢騷也無從發起了。埋怨誰呢？只怪他們不合時代要求。如果實行競選，開展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的競賽，

那么，不要多长一个时期，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流派，都会被淘汰下去。我們也用不着提长期共存的方針，它們能够存在好久，就讓他存在好久。（当然并不等于讓它不受限制地活动）要是被淘汰了，可怪不了誰。

因此取消党委制，不仅不是反对党的領導，恰巧是加强党的領導的方法。

退一万步說，要是在某次选举中，或某个地方的选举中，中国共产党人沒有选上，失败了，怎么办呢？社会主义不是沒保證了嗎？不会的，要是果有此事，社会主义还是有保證的。要知道現在已不象解放前那样，維護社会主义事业的不仅是共产党，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群众，现在社会主义已成为全民的事业了。人民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至于共产党如果真的沒有选上，那也不是坏事。象拉科西和格罗等人的共产党，可能会被人民抛弃，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匈牙利人民早先能够通过和平的方法扔掉他們的統治的話，那么匈牙利的工人、青年学生和苏联士兵也就不会再一次的流血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天大的喜事。

卡德尔同志說：“共产党的真正社会领导作用不能由法律規定，党只有根据客观的社会发展規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我国是一个大的穷国，人民生活苦，内部矛盾自然也比较复杂。要領導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必須寻求最完善的政治制度，調动人民所有的积极因素，讓大家当家作主，“以便使它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动力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經濟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通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自觉的主动性得到巩固，并且以此自卫”。因此我們不能以过去丰富的革命傳統为口实，来抗拒对这个問題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問題必須公开討論。

(5) 不取消党委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 但速度要慢一些

主張取消党委制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而只是领导方式問題的討論。领导人方式方法对于事业的成败只是起促进或延緩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的影响。党通过政府机关来领导全国，固然是比較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假如一定坚持現行的国家管理方式，也不一定就会丧失社会主义事业。苏联的經驗已經証明了这一点。苏联一貫实行党委制，不是已經建成了社会主义了么？問題只是这个过程比較緩慢而已。如果苏联采用南斯拉夫的方法的話，今天的成就就会更大一些。

既然現行的管理方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关于这个問題的爭論不管其結果怎样，是有可能在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下达到調和。

政党或迟或早是会消亡的。現在不消亡将来还是会消亡。因此关于取消党委制的問題的爭論只不过是時間的爭論而已。我以为我們現在立即取消党委制的条件也許还未成熟，但我国現在对立的階級基本上消灭了，我們就應該具体地考虑取消党委制的問題，并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的政治准备，也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有效方法。

(6) 簡短的結論

一、取消党委制，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机关，就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此这个主張的理論基础是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二、取消党委制的事实根据，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建設經驗。

三、取消党委制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方式，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重要的政治准备。

四、取消党委制不是暴破式的突变过程，應該逐步地前进。

刘繁华的两篇文章

按：刘繁华系武汉大学物理系学生，这个材料选自“武大右派言論汇编”。

一、关于理想的社会問題

(1) 前 言

在苏南关系破裂后，看到一些对南斯拉夫的批評性的文章，便对其产生恶感，后来苏南关系日趋改善，苏联方面承認了对南斯拉夫所犯的某些錯誤，因而引起了我对南斯拉夫的注意；时至本年看了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的演說后更感兴趣，了解了并且大部分接受了南斯拉夫的观点。此后更是密切注意南斯拉夫的情况。

由于从理論上了解了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質和社会結構并接受了其观点，于是我便得出了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加上广泛的民主自由等于理想的社会。二者不可或缺。因此我的一切思想都来源于此。当然由于資料的缺乏对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的了解还嫌不够，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南斯拉夫路綫是否正确，历史将会作出結論；我对它的評價是否过高，希望大家討論。

这些問題就涉及到我的思想核心，只有对我的思想核心作一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方能对于我的言論找到答案。孤立地考虑个别的話語是得不出正确的結論的，一言以蔽之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公正的。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

(2)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的建設过程中，必須保證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自觉积极性和劳动人民的行动自由，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动力和社会經濟关系本身的稳定性，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权力的多方干預。为此就必须有适应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各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平行发展，这就必須发展各种民主机构。这是在社会結構的选择中所必須考虑的問題。

社会主义建設并不是象建筑房子那样简单，它是一个有机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力量应当致力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解放，換句話說应給以更多的民主自由。党必須根据客观的社会发展規律实施领导，党必須通过各种社会因素使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社会主义自觉倾向借整个社会結構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使社会在結实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必須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單純的只要掌握了政权然后依靠一定的国家权力和計劃机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注意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結構的健全，而其主要内容就是民主自由。

总的一句話，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应当順应已經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觉悟的劳动人民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要求。使其自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以便使建設社会主义的社会内部的动力更加强大。

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現象是复杂的，如果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階級斗争愈来愈尖銳化——来理解过渡时期的現象那是錯誤的，他所犯的肅反扩大化的錯誤正是这个公式的直接結果。如果只是通过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冲突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太简单了，这将会使人們忽視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而这一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成为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的社会力量。当着国家政权相当巩固的时候，官僚主义和宗派主

义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之間形成冲突，以致引起劳动群众的不滿时，这时反革命势力才可能变成严重的政治因素。只有正确的理解过渡时期的矛盾关系并認真的全面的去探找产生矛盾的基本因素才能作出合乎社会发展規律的正确处理。任何違反客观規律作出的决定将会受到历史的批判。

教条主义对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馬列主义理論的发展是不利的。教条主义者害怕人們討論和研究理論問題、社会关系問題。如果在教条主义的束縛下人們只能宣傳、体会或解釋各种政策措施，缺乏对重大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以致使思想工作丧失了任何創造性的刺激，这就将使得难以形成社会主义的自觉傾向——而这却是保持社会主义基础稳定的强大社会因素。

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占居主要地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彻底消除具有特別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消除三大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付以强大的力量消除当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傾向——这是現阶段的严重的政治任务。

綜上所述，有下列論点：利用一定的社会結構形成社会主义的自觉傾向，借着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动力来建設社会主义；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复杂的社会現象，根据客观規律予以合理的解决。

(3) 南斯拉夫概述

I. 国家性質和社会性質：

1.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享有平等权利各主权民族的社会主义民主联邦国家。
2.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屬於劳动人民，劳动人民通过其所选的各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議会的代表各工人委员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代表并直接通过选举罢免复决选民会議公民委员会公民参加行政管理和审判以及通过其他自治方式行使权力

管理社会事务。

II. 經濟基础:

1.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經濟部門生产者的自治与市区和公社劳动人民的自治，构成全国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础。
2.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生产工具有下列四种所有制：公共财产国有财产人民合作組織的财产和个人与法人所有的财产。一切矿藏和其他国家财富水源自然动力資源空中和陆上运输邮政电话电报广播事业都是人民的财产。
3. 国家通过总的經濟計劃依靠国家經濟成分与合作組織的經濟成分同时保証对私有經濟成分的一般控制規定經濟生活和經濟发展的方針。

III. 政治体制与經濟結構:

1. 保証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各方面的自治，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依照法律和劳动人民代表机关——各人民議會和各人民委員會的其他决定所載明的一般社会权益而行使自治权。
2. 經濟部門的生产者特别享有下列自治权：劳动集体有直接和通过其所选出的和有权罢免的工人委员会农业合作社会議及其他代表团体管理其經濟单位的权利；生产者有被选为該經濟单位代表团体的代表的权利；經濟单位有独立确定其經濟計劃的权利；經濟单位在其完成对于社会公众集体的任务后有独立支配該单位的收入的权利，并且在这方面保証該經濟单位获得法律所規定的最低收益；經濟单位在其收入限度內有确定其工人工資的权利，并且在这方面根据法律以社会公众集体的基金保証經濟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資。生产者根据宪法和法律在經濟計

划的体制内行使自治权。劳动集体根据建立经济单位的法令获得自治权。

3. 人民委员会依靠各经济单位各协会和联合会以及公民的积极性在经济的自治团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生活方面与市区和公社的发展方面有独立管理有关公众集体一般权益事宜的权利。
4. 一切公民在合法条件下担任公职的机会一律平等。
5. 公民享有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请愿和控诉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判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

(4) 南斯拉夫透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劳动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下面将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南斯拉夫现具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具有较多的民主自由，这正符合我的关于理想社会的公式。因此我就按照对南斯拉夫的分析来叙述我的理想社会的模型。从下列几方面进行分析：

I. 不强调行政管理的集权：

既然社会主义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社会主义利益与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因而他们不强调国家权力对人们的干预。他们主张不仅是用法律条文而且重要的要用非强制性的社会道德来规定社会关系，这种社会道德必须逐渐代替许多法律的规定和行政约束，这就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社会关系的行政管理和在一般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干预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南斯拉夫采取了杜塞官僚主义产生的措施。

他们同时实行执行权的最大限度的地方分权，这能够使群众直接控制执行机关的工作使劳动人民在实际上能自由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能防止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化。这种执行权的地

方分权制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力量自由发展的需要。

当然他们也绝不允许削弱劳动人民政权的统一或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致，相反的在大胆实行执行权的地方分权制中政治机构还必须保证制度一致所必要的职权，还要保证一定的社会集权。由于阶级敌人还存在，对于某种形式的民主权利还是要加以限制的，必须消灭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II. 社会自治：

在社会主义所肯定的制度内随着一切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自觉和自然发展倾向，必然会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南斯拉夫把社会自治原则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的原因。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需要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自觉积极性可以更自由的发挥，因此就必须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的自治制度，而这种自治制度将产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巨大的社会内部的动力。

工人阶级不仅要领导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斗争，而且还要领导从生产资料的国家管理的方式过渡到社会管理的方式，这样劳动人民就能直接担当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任务。这就是南斯拉夫所理解的过渡时期的任务。

劳动人民的自治原则和民主原则不只适用在政治方面，而且还适用在生产与分配方面，适用在经济管理方面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方面。总之，民主原则已基本上作为主导原则用在国家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认为这是最能杜塞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政治体制；而这种政治体制又如国家机能的消亡作准备，这正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

III. 政党民主与个人民主：

公民选举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并不是由于他们属于什么政党，而是由于他们知道这些代表的主张和意见，这些代表值得信任。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这是从政党民主走向个人民主的一

条道路，他們認為这种个人民主比任何形式的政党民主都能表示劳动人民的愿望。这或許是杜絕宗派主义产生的重大保証。

在南斯拉夫劳动者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們有权参加管理其所工作的企业或以公民資格因感兴趣而参加管理教育卫生社会治安和其他社会組織。

他們的新聞也較自由，既有党报又有非党报，新聞来源广泛，所有通訊社发布的消息他們几乎都会接受。在学术上也較自由，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說同时存在，都有出版的机会，各种各样的作品都有。

每个国家的电影都有，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又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

Ⅲ. 对缺点的估計:

由上所述，可知南斯拉夫的民主自由是較广泛的。但是亦有缺点，茲叙述如下:

1. 过分忽視了党的領導作用，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相提并論，沒有重視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所謂由政党民主过渡到个人民主是否有弊，还值得研究，而它有利的一面是能避免宗派主义的产生。

2. 全盘的經濟計劃性不够强，強調了地方經濟計劃。对小資产階級采取放任自流态度造成了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的泛濫，例如他們存在着雇农制度土地买卖制度等。

对于經濟，国家无法作严格的控制，破坏了国民經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則，由于生产和銷售都是自由进行，产生了投机取巧和追求利潤的傾向，由于各个企业的工資自由决定，造成了工人的盲目流动。

3. 过多的放映美国的黃色电影影响了人們的心理健康。

(五) 后記: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觀中，提出了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論問題，而这个問題正是要求广泛民主自由的理論根据，而南斯拉夫

正是按照这个理論来建立和发展它的社会結構，这可从上述的分析中得到証明；三害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也在上面作了一般性的回答。

这个理論必須发展，使其更加完善，由于我不是政治家，对于这个理論作进一步的詳尽闡釋，将超出我的知識範圍之外；但希望馬列主义的理論家对此問題引起注意，并进行討論和研究，以期对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貢獻。

我們的国家具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如把民主自由进一步扩大，这将使我們的社会更加美好。我正是从这个动机出发提出爭民主爭自由的口号，然而現在看来这个口号在客观效果上起了极不良的作用，这是我深为痛惜的！但从此使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政治教訓：善良人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語都有被敌人利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可能。今后必須引以为戒！

二、关于学术自由問題

偉大的革命理論家恩格斯曾这样說过：“德国的工人运动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繼承者”，“我們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以我們不仅繼承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尔为光荣。”这就是我們的导师对于唯心主义的評价。應該承認从康德的“純理性批判”出版到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出版的短短数十年間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給人类創造了一分可貴的历史遗产，因此正确地对待这分历史遗产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必須說明，正确对待唯心主义并不等于承認唯心主义是正确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它起了助长思想发展的作用，它看到了唯物主义者所忽視了的事实，它观察到了不易解决的現象，它更注意到了不易解决的問題。例如主体有能动作用这件事实常为过去的唯物主义者所忽略，而唯心主义者却观察到了。当然唯心主义也曲解了所看到的事实，过于夸大了

困難問題；他們給科學所作的哲學結論和給哲學所作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

若干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判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着，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着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引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如果一切學術問題都只允許一個答案，這是不好的。如果這個答案是全面的還好，如果這個答案具有片面性那就有流弊了。對於學術問題的正确結論往往不是短時間內可以作出的，必須通過曲折的複雜的爭論過程。

哲學理論的鬥爭不能簡單的運用強力的鬥爭，而是一種細致的深入的鬥爭，一筆抹殺，實際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近年來對於唯心主義的批判往往採取一棍子打死的簡單辦法，只許批評不許辯護，認為給別人扣上一頂唯心主義的帽子就萬事大吉，事實證明這並沒有很好的解決問題。必須對唯心主義者的許多論點進行仔細的分析，給以有力的辯駁才能擊敗唯心主義者。在鬥爭的同時又豐富了唯物主義。歷史已經證明哲學的發展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互鬥爭的過程，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進行鬥爭之間成長起來的。既然唯心主義還存在，與其讓它在偽裝的隱藏的形式下存在，不如使它公開化，給它以宣傳的自由。唯心主義公開化，就更便於哲學思想鬥爭的展開，更便於思想的活躍，更便於理論水平的提高。同時必須指出，哲學領域內的爭論，決不僅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爭論，而且還包括唯物主義陣營內部的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

上面的敘述正是我主張學術自由的根據，我們必須在鬥爭中發展真理。但是我過去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在任何時期內適用，認為黨提出這個政策太晚了。下面再談談具體問題。

我曾經說：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观点在黨的思想政策的

貫徹中起了支配作用，這種估計是錯誤的，但是有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观点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前面曾引証了：一句話，教條主義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即是明証。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有人把“三毛流浪記”的連環畫一筆抹殺，理由是說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應該有三根毛的人存在，他的毛應該更多一些，更胖一些。難道能把這種可笑的說法僅僅孤立的看成是那個人的無知嗎？不是的，這是一種庸俗社會的观点支配了他。這種观点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各个方面。又如勒柏辛斯卡婭的“活質學說”，李森科的“種內無競爭說”，威連斯的“草田輪作制”等都在動搖，然而過去却在這些學說上插上唯物主義的標籤，凡是對此學說表示懷疑的都被認為是反對唯物主義；不學習蘇聯，而且不給反對者的論文以出版的機會。有個人為了入黨，首先批判自己的摩爾根观点，聲明接受李森科观点；後來看到李森科观点動搖，據說他又批判了自己的李森科观点。這說明了什麼呢？！

我過去也認為新聞不夠自由，其根據是：1)沒有政論性的文章，對國內外大事沒有獨特的見解，對政府政策沒有評論。對正確的政策當然不能任意批評，但是就不會有不正確的政策嗎？舉個例子說，斯大林對內對外政策都犯過錯誤，特別是對南斯拉夫犯過錯誤，為什麼當時的報紙甚至連赫魯曉夫這樣顯赫的人物也不敢提出批評呢？2)報紙的內容和体裁都很狹隘，報道重大的政治經濟情況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應該有深入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細致部分的報道呀！前一時期蘇聯作者曾和波蘭作者進行過一次論戰，為什麼不可以報道呢？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也是存在的，雖有“檐角頻傳的烏雀之喜”，但也有“云深難掩的古今之哀”。當然喜是應該報的；但是報了“哀”，正確的解決了“哀”，不一定會起消極作用吧。例如最近政府報道了“廣西餓死人的現象”，政府對此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樣對幹部是一個教育，群眾又一次深深感到政府的英明偉大，這正是積極作用。當然有極大的社會影響

的东西是可以不报道的。消息的迟緩也是一个缺点，新聞变成了历史。在报纸的版面方面也是千篇一律，近来略有好转。过去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上面的分析正是我当时提出思想解放的理論根据和事实根据。我們必須消除人們的思想被教条主义束縛在一根繩子上的現象，人們的思想必須从教条主义和各种清規戒律的束縛之下解放出来。当然我看問題的某些观点还是有問題的，希望大家批評，我自己即將作出檢查。

江心紋：領導及其他

按：江心紋是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301班学生，这个材料原载华中师范学院“学习快报”。

解放后我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国内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联共二十大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瘫痪，波匈事件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有瓦解的趋势，苏联已有孤立的危险，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宣告破灭；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都说明了历史的发展形势的演变速度是很快的，在我们国家中，有些问题已经落后于这一客观形势，落后于人民的要求，已经和时代的特点不相称了。

(1) 关于领导问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积极的自觉的斗争结果，不管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的手段多么阴险和狡猾，多么残酷和野蛮；不管他用的是军事镇压，道德压力和政治欺骗，都没有吓倒中国人民，都不能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因为它给人民的不是自由、民主和幸福，而是监狱、贫困和死亡，这就注定其失败的致命伤。

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是苏联的直接帮助，苏军解放东北，这是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据点，再就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们的共同努力。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事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由共产党领导，因共产党是较大的党而且拥有军事实力和根据地，有苏联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掌握了马列主义革

命理論。雖然共產黨是勝利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沒有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付出巨大的力量和代價，勝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革命的勝利首先應該屬於人民的勝利，而不能歸功於共產黨，今天共產黨誇大自己的作用，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不應該的，事實上，沒有民主黨派，也不會有今天的新中國，退一步說，如果沒有共產黨而有民主黨派，新中國仍然存在。

共產黨在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中，在奪取政權的殘酷鬥爭中，的確有很大的功績，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但是今天形勢已經變了，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是爭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和調動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因素建設祖國的時候，共產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英明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关系也應該隨形勢而改變，也就是說不應該是領導與被領導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

有人說共產黨的領導是憲法規定的，其實憲法並沒有規定，而是規定了無產階級領導，把無產階級領導說成是共產黨領導，實質上就是沒有把黨和階級區別開來，當然，我並不否認共產黨有領導中國的權利，但沒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有人說沒有共產黨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意味着自由和幸福，是人类的理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信念，孫中山早就提出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參考新出版的孫文選集），因而社會主義的方向是中國人民奮鬥的方向，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靠人民自覺地積極地努力，因而必須發揮各黨派的作用。

另一方面憲法規定一切權利屬於人民，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不是某一個階層或政黨的國家，因此，只要是為祖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任何政黨都有權管理國家大事，但是由那一政黨執政，應該完全由人民來抉擇。人民會知道那一政黨較適合於管理國家大事。如果共產黨認為絕大多數人民是擁護自己的，而且全憑自己的能力也能博得廣大人民的信任和擁護的話，那為什麼不敢讓民主黨派提出綱領來進行競選呢？正因為共產黨估計到競選是

会碰到对手的，所以不这样做，或者認為一党长期的执政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对人民的幸福較有利。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是沒有缺点和錯誤的，如果这缺点和錯誤沒有及时发现，那是很危险的，对人民是沒有利的，正因为这样党提出了“互相监督”的方针，竞选就是最好的监督形式，我們拥护共产党也相信民主党派，并希望民主党派在领导国家方面也負起責任来。

(2) 民主与自由

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民主是有集中的、有指导的民主，这种制度并不坏，但是片面的強調集中忽視民主就是等于专制，反之強調民主而忽視集中也是不对，民主与集中是协调統一的，在集中过程中也应该体现民主，今天我們的民主是不够的而集中又多了一些，甚至有些問題由党直接决定，这显然是对民主权利重視不够，正因为这样人們追求民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出自于激动而是出自于体验。

我并不認為我們这个社会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前不仅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甚至思想自由也受到約束，今天言論是极自由了，而且有宪法的保护，但迫于社会风气，人們有話是不敢暢所欲言，因为怕挨整。

(3) 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与灵活性，党曾公开提出要組織联合政府，于是今天不提了，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来又加上了共存的基础，說不定又会来一个解散民主党派的理由，党也曾說过“言者无罪”，而现在又在“言者无罪”的后面打一个問号，这有共存的一方面，但是在国内或国际上，都不是良好的。

(4) 向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点意見

我觉得中央对反革命力量的估計是值得研究的，根据5%的

指数，那么全国六亿人中就有3 000 万反革命分子，这当然是不包括已被镇压和在台湾的反动派，也不是少年儿童，同时工农群众及党团员是极少的，那么这3 000 万反革命就大部分存在知识分子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就反映了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存着主观主义，希中央检查一下。

(5)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缺点，对此曾有人上书党中央，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恰巧他们都是不正派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人民向党提意见也就有顾虑了

党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不要避重就轻，承认错误人民是会举手拥护的，决不会天下大乱，也不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6)关于我院肃反运动问题

我院肃反运动基本是正确的健康的，但缺点也很严重。

① 在学院设立法庭和监狱，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因而是缺点。

② 我院曾捕人，既然全国而论，捕错人是个别的，那么很可能就是指我们这里，因而是缺点。

③ 采用斗争形式是个错误，这实际上是公开审讯和逼供，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在大众面前被迫坦白交代，这种对心灵和精神的打击，难道比拷打更愉快吗？精神创伤比电椅的死刑更幸福吗？

④ 有人说只要打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成绩都是主要的，因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可以破坏一件巨大的工程，但一个好人，也可能对社会主义有巨大的贡献，如果这个人因为被斗争而在精神上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这不是更痛心吗？因而从数量上看问题还是可以的，我说打错的占多数，而是说明的缺点严重。

我并不否认肃反运动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

但从肃反的目的和效果来看，我院肃反成绩就显得缺点严重。

我希望院党委认真的检查交待承认错误，也不会损害党的信誉，真正的信誉是人民给予的。

(7) 对我院反三害的估价

反三害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有缺点，同学们对院党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在大鸣大放中出现谩骂和诬蔑党的言论，前一种是对党整风有利的，后一种是有害的，学院对我们提出的意见，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这表明党是乐意采纳同学的意见的，其次在郭副院长的报告中，没有提出产生我院存在缺点之原因，对这表示遗憾。

最后我希望党打破顾虑，继续进行反三害，勇敢地承认错误改进缺点，应该承认党内是存在着严重缺点的。党在前年曾整了胡风集团，今年又整右派分子，那么明年又整什么？看来一辈子也整不完，而且越整越多，这说明党内缺点是严重的。不应该固执实行早已失去人心的政策。

我们希望党记住中国的二句古话，“顺民者兴，逆民者亡”“识时务者为豪杰，知民意者为英雄”。不要迷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要以为自己几千万困党员，因为他们都是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当他们意识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当他们意识到党有偏向时，那么他们是会自觉的和党内缺点与错误作斗争的，希望党果断地勇敢地改进缺点，不要再躊躇了。

“按”上面是我的思想在这鸣放阶段中的总反映，我认为我的观点和思想是正确的，反正我有这思想，且迟早都会表现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提出来和同学讨论。

希望同学们展开争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不过我希望同学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要乱扣帽子，正确意见我是乐意接受的。

曹修恕、廖长江：民主生活中的暗影

按：曹修恕、廖长江均系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生，这个材料原载该院“学习快报”。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没有充分的民主，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打算提出肯定和否定结论。肯定说，这篇文章中有许多原则立场错误，但我们就愿揭露自己的看法。

可怕的等级制度

文明的人们都曾经唾弃过印度卡斯特制度，因为他们为了统治者特殊的利益，人为的把人们分为四个等级，而付与各等级之不同权利，可是想不到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少人也热衷于这种做法，虽然这种等级没有以法律的条文颁布，但它却有形无形地存在着：“党员一等，团员二等，群众三等，历史复杂成分不好(?)的人自然是最低层”。如此仍然不满足，他们又把各等级分为先进、中间、后进三等，于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形成十二级楼梯，这样在我们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毫无例外地带上了“等级的烙印”。由于客观事实是如此明显，你知我知，因此无论在学术讨论中，社会运动中，日常生活里，不是心平气和的公平以待，相见以诚，而是本能的用鼻子去嗅等级“分别对待”，迅速作出粗暴的结论，第一等级的人也自以“特殊材料”造成可以教育指挥任何人，任意诬蔑乃至撤职坐牢，再以我们两人切身遭遇亦可说明。我们年幼参军与战士共艰苦，同战斗，出生入死，只亦因为属于第四等级的人，乃公开遭到无理处理复员，这是严重违背复员条例的（按军官不到一定年龄或疾病和业务不熟是不复员），想当初我们放下学业，响应号

召“欣然来之”而料想不到在一夕之間竟又決定揮手而去，難道軍隊黨委可以撕毀憲法條例的明文決定“士為知己者用”，我們把黨看成母親，誰料想黨的成員從部隊到地方竟如此冷酷不信任，在軍隊憑“等級烙印”看人，到學校里亦根據我們的“祖宗”劃入落後分子之列，並且到處散布猜疑、排擠的情緒，“士可殺不可辱”是什麼摧殘了我們純正的心靈，損害了人的尊嚴，“昧沒天良”的做法，實在令人心酸。

党政不分

再看看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一面說是“人民民主專政”“統一戰綫政權”，可是從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十五把交椅上坐着的盡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再看中央以下各崗位，事無分高低類不分巨細，從國務院到百貨商店，從工廠到學校最基層，一定安插一個共產黨員充為領導身分，因此，黨可以把軍人去指揮科學研究所，派百貨公司經理來管理學校。（在這里我又想起了不妨聯想到我們學校系統的班三角制，這不就是極不合理的違反民主原則的作法嗎？為什麼一定要派遣黨員來統率“群氓”？任何一個黨員都比任何一個非黨員強？）在這里我們又想起了李萬銘這個大騙子，為什麼他從中央一直到基層暢行無阻、官運亨通？這還不是正因為他首先冒充了黨員，然後才憑着“第一等級”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騙過了人們。話又轉回來，如果“第一等級”者既能真懂業務，又能辦好事，當然是一百個的好。可是，我想不通為什麼這樣偏愛而又放着許多“智者”不用，即使安插他們的職位，也不過是“有職無權”，不能觸犯黨員，因為他們是代表黨的，反對他，就是反黨，也就是反革命。試問，難道非黨同志擔負了領導工作就取消了黨的領導嗎？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就變質了嗎？黨若不承認是由于自己不相信人，那就是把社會主義事業看成僅僅是黨員的事業，而不是千百萬群眾自我解放的事業。二者必居其一。今後若仍然繼續党政不分“包辦一切”，人們會感到溫暖？且能充

怨言？

对我国法制的看法

下面，我們想談談我国的法制問題中的一些看法。少奇同志說过“只要未違反法律、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教科書中也写明“法律是严峻的，什么人都要受法律約束。”又說：“社会主义法制是最完善人道的。”可是，某些人却違背了这个結論。在一些事件中，我們感到執法者和保卫工作者不是依法律条文办事，而是带着有色眼鏡，凭着嗅觉、“等級”的本能；因而使許多人遭到无情的監視、拘捕、囚禁（包括我院一些教授）虽然沒有“連誅九族”，可是，九族的声望也从此好不了（物理系××搜查到妻妹，許多鎮反牽連姨父）。在这里，我們不是打算討論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我們想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不能不感到我們民主生活、国家法制問題上的暗影。我們不懂法律，但我們認為若只是从党中央已公布的第三批材料来看，把过去的历史問題及当年書信往来，文章中斷章取义的摘取，而沒有公布現行反革命活动的証据，就以党代政，通过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的言論和編者按代替了人民法院的宣判，宣称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剝夺了被告的发言、只有原告单方面的申訴，仅凭这点就很难說明我們法制的完善，而今天事实上又有些胡风集团中重要分子陸續釋放，陸續工作，这样做既不公开告諸人民，又不宣称他的罪状，如何教他本人和周圍的人信服呢？法制、理性被无理破坏的实例，在我們这里真是不胜枚举。多少人被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甚至鎮压、被斗、使少妇变寡妇、幼儿变成孤儿……令人寒心。就以政治教育系100%斗錯人來說，这难道不能称为对理性的瘋狂破坏！

試探着這些問題产生的根源

是什么造成了這些問題的根源？

有人說，把三大主義反清了，問題便可解決，我們認為這樣做是能解決問題很大部分的，但是我們可以想到：三大主義產生了認識根源和一定的客觀歷史條件外，是不是還有着他的社會根源，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與社會制度密切關聯。比如，生硬的把自己的成員派遣到各個小崗位“做頭兒”以家長式統治進行“黨包天下”，以黨專政橫蠻的包辦專制一切，（當然，有些單位中央省市一級有些民主人士但不廣泛）又如何不排斥形成宗派主義；“僅以天下為己任”“黨委決定包辦一切”“讓他寄人籬下”。不分時間、地點、條件、“偏愛偏信蘇聯”“黨員團員”又如何不形成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由於宗派主義的排外性，排內性，主觀主義的獨斷，偏信，又如何能更多地聽取群眾意見，不產生官僚主義呢？

再說，人們沒有社會主義法制的保障，等級制度的權威駕馭法制，怎能不再發生人權受侵犯，保證今後領導沒有斯大林式的悲劇產生呢？

我們承認是什麼使我們民主生活上蒙上一層暗影，人民沒有充分的真正的民主生活，必須挖根追下去，“我們承認社會主義制度較之歷史上任何私有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如果有誰要回復到人剝削人的私有制，我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和敵人拚一場死活，堅決的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可是我們並不認為今天的制度已經是絕對完善。從當前政治生活窒息，法制的破壞，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環節上的缺陷，必須迅速地加以調整”。我們不滿意黨的專政。它是等級制度產生的禍根，我們擁護黨的領導，但反對一千二百萬人的獨斷一切。（要更加擴大民主——這句是最近修改的）我們提倡理性明智，鄙視唾棄用鼻子代替腦筋，不尊重自己，及不尊重別人，那樣的偏聽、偏信、偏行，我們擁護毛主席，但如果不符合群眾利益也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

同志們：勇敢行動，破壞共應該破壞的，肯定共應該肯定的，這是一次救黨救國的運動。

雷鳴(雷英元):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按:雷英元系华中工学院电力系二年級学生,这个材料是根据該院提供的。

一、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听说近来几个月有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他們向每个人伸出那枯僵的求乞的手,他們是无辜的儿童和老人,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极其受到爱护和尊敬的人們。嗚呼,我們国家的老人就是如此受到尊敬,我們国家的花朵就是这样的受到培养,我們要問,难道国家真的沒有办法嗎?不!国家不是根本沒有办法,而是根本不大管这些,因为他們現在是人上人了,貧困求乞在他們腦里也沒有絲毫遺迹,他現所需要的是享受,是与穷人隔离开来,把他們的子弟与穷人的子弟隔离开来,办他們更舒适更腐化的貴族子弟学校(如八一子弟小学,武汉干部子弟学校等),是的,他們解放了穷人,这只因为他們在那时是穷,現在他們再也看不到当今的穷人了。他們蒙住眼睛瞎喊,現在沒有穷人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我們要向社会主义呼吁,你們不要隱瞞真象啊!中国人民是非常穷的,一个頂頂有名的中国教授还当不得一个在街上搖鈴的美国老人,因为这个最穷苦的美国人在街上搖八小时鈴就能得到每日三块多美元薪金,至于那些流落街头的中国人就不用相比了。

有良心的中国人,我們能对他們去开不管嗎?中国人民不是一向有捐献美德嗎?在抗美援朝那艰苦的日子里,都捐献了那么

多飞机大炮，现在为什么反而见死不救呢？是不是怕掏你们的腰包！

本来中国是可以不这么穷，我们可以过得比现在舒适一点的生活，我们可以不养那么多的军队，可以不向苏联购那么多的军火，可以不那么快的发展国防工业，这只要做到我们象南斯拉夫一样，消除人为的什么阵营，同学们！大家也还不忘記，愚蠢的斯大林曾疯狂的叫喊：南斯拉夫如何如何反动，如何如何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明明白白的摆着，事实是最公正的裁判。

愚蠢得等于自杀的人们，南斯拉夫和一切国家友好，不参加华沙条约，接受来自各方的援助，难道这就改变了它国内的政治制度吗？这样它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吗？它们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是不是就变成了董事会了呢？我試問你們，你們为什么不学好样而偏偏要学自絕其路的坏样呢，这难道是符合人们的最大利益吗？我不得不警告你們，你們的把戏在导致人类的毁灭！

同学们，你們想想看，我国大概会多于美国几倍的军队，（美国280万）至于英法那更用不着谈了，他们那样富足的国家还只养这些兵，怪不得人家的生活富裕了，为了祖国的繁荣，我們要求，削減军队，降低军人的薪金，把这些年青力壮要奉养老幼的军人打回家去供养自己的父母和子女。

讓我們大声疾呼，领导者猛省吧！赶快从死路上走回来。

当然上面这是一条最粗的套索，不过我們还不能忽略另一条套索——各级机关学校企业四种机构的并存，就拿我們学校來說吧！有院行政，党委会，团委会，工会的领导机构，在后三种机构中繁殖着那么多的专职干部，这对国家又是一批多么巨大的开支啊！这个重担加在人民头上，是很不应该的，我建议取消这些专职干部，至少这笔钱不应该由国库开支。

当然，上面这些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行不行得通、要怎样才

行得通，有待大家进一步的磋商。

二、再論中国为什么这样穷

吾人的淺見，得到諸君的启齿，深表感謝；更令人可喜的是表明我国的青年，还没有沉睡，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人类的未来。在这里我首先称赞陈亮君那种認真确切負責的精神，他提出了許多确切的数据（与我国公开的数据相符），同时感到遺憾的是“公民”沒有象陈君那样做，他用了欺騙的手段不打紧，反說別人“事实不确”，反說別人的論是“标新立异”。

諸君差不多都灵活地把近几年来所学到的历史、政治知識运用到“中国为什么这样穷？”这問題上去了，我也部分的同意你們的意見，即是由于帝、官、封的三重压迫和榨取，也許我是盲目地信任書本知識吧！因为我还有很多問題不是套書本的公式所能解釋的。我就老是这样想：既然帝国主义的援助是“搶夺”，为什么很多資本主义国家都要求美援？連英、法、印度、波兰也不例外。西德在美国的大量援助下，工农业恢复和发展得那么快！这作何解釋呢？可能諸君也不只一次地看到过和听說过：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場，他們搶夺……既然貿易对美国有利对我们有害，为什么美国还不愿到中国来搶夺資源呢？我們却对美国的放寬貿易大吹大擂，难道現在我們就甘心受他們的搶夺了嗎？

再說，一提起中国这几年来的連年内战、抗日、解放战争，总而言之是战争連着战争，我就不能不連想到斯大林——罪恶的斯大林！是他的“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殘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領導权”……等革命的哲学，造成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国共的分裂，埋下了十年内战的种子，拖进了日本帝国主义……总而言之，把中国的生产力倒退了几十年。假若从北伐战争以后国共仍然合作不是一下子想把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互相困結一致建設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可通

过議會斗争达到和平的过渡），中国万万不会这样穷的。当然上面这翻話也許大大的触怒了諸君和那些还没有发表意見的人們。的确，也許我的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不过这是已过去的历史事实，既然过去了的事情，我們就用不着談它，今后我是不准备在这方面发表意見的了，即使大家再提出来的話。說老實話，我上一篇文章的本意倒不是想說一个“穷”字，至于“穷”，我們是穷慣了的，問題是我們今后的前景使我們担忧。諸君都是主張要加强国防的，当然，若是在国际事务上已經无他路可走的話，我也十分同意你們的意見。現在問題就是如此：二个陣营的針鋒相对，互相敌視，互相勾心斗角，互相这样扩軍备战下去，后果将是怎样呢？这难道是符合世界人民最大利益的嗎？即使万幸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是这样下去是不可能避免的），經常維持这样大的国防开支，也是人民所不能容許的（假若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的締造者的話），他是決不会不积极的寻找第二条道路走的。

可以肯定的說，现在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是全人类的复灭，我們决不能再这样的盲目的走！

既然是走不通，該怎样办呢？道路只有一条，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有人說南斯拉夫的道路中国走不通的。对的，那些还想維持二个陣营的对立，还想造成世界緊張局势，漠不关心人民的生死的人，当然是說走不通。你們忘記了美国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嗎？的确，美国真的把中国看成最危險的敌人，它难道不希望消除一个最危險敌人嗎？它怎样会不希望有中国这样一个朋友呢？至于說：中国和美国也友好后，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是用不着担忧的。对这个問題，我們應該从两方面来考虑：（1）中国的内部情况已与旧中国截然不同，我們經過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中国人民达到了空前的統一和团結，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了，他們对一切事物有分明的辨别力，同时国家已将社会主义的建設打下了巩固的物質基础（如国营經

济已占統治地位，农业合作化了，工商业已合营了等）；（2）现在的时代已不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那样时代了，帝国主义国家不能不考虑到人民的觉醒，事实上它已經考虑到了，不是有很多殖民地得到了独立嗎？

在这个問題就要收場的时候，我再次提出来：我們現在走的道路其結果将怎样？人民需要的是毁灭呢？还是生存？要生存該怎么办？不要忘記我們是人类幸福的謀划者，我們應該主动的想办法。

才言(孟广鎔):十大建議

按: 孟广鎔系中南財經學院教授, 这个材料是根据該院提供的。

最近我院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 特在政治学习委员会下由党内外同志成立五个組, 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十大原則性的建議以供五个組参考, 并希望各政治学习小組討論发表意見。茲将十大建議列后:

一、建議成立与过去研究处不同性質研究部以解决任教多年而身体不宜于教学任务, 但又有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教授的安排問題。

甲、由具有上列条件的教授組成研究部, 直屬院部。

乙、研究部主任由具有上列条件的教授选举之(两年改选一次)。

丙、研究部下設各組, 根据所研究的門类多少而設立之, 組长由組員选举之。

丁、研究部由于某研究上的需要, 也可約請任教的各教师参加。

戊、研究部是一个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起带头作用和創造学术空气的組織, 并不是领导全院进行科学研究的行政领导机构。

己、凡年富力强而任教不久的教师, 如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担任教学任务者均不得調研究部作为它的成員之一, 須另由院部妥为解决之。

二、建議凡以教学級領工薪的人員一律要担任課(研究部的教授除外), 否則必須改为行政級領工薪; 凡以行政級領工薪的人員一律不准担任課, 否則必須改为教学級領工薪。凡教学人員

必須具有正式大學畢業程度並有教學能力者，或有教學能力並有專門著作者亦可任教。凡行政人員必須根據經驗、能力和資历来分配其所擔任之職務。

三、建議凡有關教學和科學研究的處、科、室、館必須由教授或講師兼任。至於正副院長也必須由教授兼任，不允許以黨齡為資格而不學無術的黨員來任正副院長，如黨員中有具有任教能力的教授，也可以兼任正副院長。

四、建議明確規定院系學術委員會必須具有有關學術性質的職權（教師升調、評薪、評選論文等），不得把一切一般行政的事項交到學術委員會來討論。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也必須由各系按名額選舉之（兩年改選一次），但不得採取提名選舉或選舉數人再由領導圈定的辦法，也不得一人兼院系學術委員兩職。同時各系主任及各教研室主任（改為教研組組長）也必須按照上述選舉辦法選舉之。

五、建議除院長辦公室設有秘書以外，全院所有秘書一律撤消，並撤消各系系助理，另設副主任和干事協助之。

六、建議福利補助金由1953年起清理，要求公布名單，如有領補助金不合理者一律追回，並由有關分配補助金者作公開檢討。

七、建議關於工資問題，凡未經傀儡的工資改革委員會通過的黑市工資一律即時取消；凡經過傀儡的工資改革委員會通過的工資一律重新根據學歷、資歷、教學和研究（行政人員根據經驗、能力和資歷）進行評比，必要時向本人要文憑和聘書以資證明。至於所謂德才兼備的“德”也不能從宗派主義上（黨團員必有德）形式主義上（諾諾無意見）教條主義上（奉承領導的一切言行）來解釋，必須從教學研究上和真正馬列主義的品質上來認識某人的“德”。

八、建議由黨委會和院務委員會（按教學行政、學生、工人的重要性選舉不同比例的名額組織之）聯席會議決定政策、方針、計劃來治校，如取得一致意見，當不成問題，否則以院委員會的

意見为治校准則，而党委会不能以指示或命令代政，至于党员在工作崗位上必須受各級行政的領導，不允許专橫跋扈以“党员治校”的姿态出現。

九、建議把人事处撤消，以后有关人事問題統归院长办公室另設专人负责，其职权仅限于登記人事，至于升調之权，均必須由院委会根据学术委员会意見或群众意見通过才能执行。至于院长办公室需要設立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并領導秘書（秘書科撤消）和人事等工作。

十、建議凡五个小組討論有关某人的問題时，需要由当事人双方或本人出席會議說明事情經過或进行爭論。至于每个人的档案袋不允許人事处人員任意凭自己憎愛乱写，須交本人看过認可后盖章才能有效。

陈嘉勉：給武汉医学院××的三封信

按：陈嘉勉系武汉大学物理系学生，这个材料选自“武大右派言論汇编”。

××：来信收到矣！殊因心情激动，未能如期回函，致歉！老友寄来相片我已收到，我很感謝。

数天来本人感情已达总爆炸的程度。回忆数年来官僚老爷們的殘酷屠杀，拍馬屁的走狗們（按：官僚老爷是指党的領導者，走狗是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无辜的人們的迫害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今天还是記憶犹此，血腥未散，真可謂之血洗的时代矣！今天是受害者說話的时候了，我們要报复。

最近以排山倒海之势，爭鳴之声，响遍各地；而武昌珞珈山却是沉默无声，寒气凌人，仍在官僚們恐怖統治之下；而我們这些自由的灵魂仍在官僚們宝座之重压下。吁夫！

前天我們中文系的朋友們向党委提出大鳴大放，立刻放、立刻鳴的正义要求，使得老爷們感到恼怒了，于是下令各支部要我們这些学理、法科的同学不要理会文科同学之意見。然而不是过去了，办不到！次日清晨，从中文系中发出了巨大的呼声，大字报飞遍各地，其内容之可怕，标語之惊人，鼓动力之巨大，可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其中有和营（按：和营是指伙营、合伙办的意思）之定期专刊，如“炮火”、“火焰”、“淋浴”等其他大字报，如含泪的控訴，“阴森森明月无光，黑魑魑鬼哭神号”之揭发及“張勃川滾出去”！“武大老牛破車”，“中国毒头張勃川”（張勃川乃副校长也）。

諷刺性文章可謂多矣哉！現搞一則如下：張斌說“我讓这个党

員你“拉”！說的好，“讓”“當”二字尤其妙。在某些人看來黨員是官銜，入黨是當官，而當官的人豈可批評，怪不得他要吹胡子瞪眼睛、連黨員也要讓人當了！

又有提名為：“不鏟除官僚統治，誓不罷休”之控訴，其文如下“官僚主義者殺害了我們的同學——因為革命不是綉花，官僚主義者用鬥爭、禁閉來摧殘我們的同學——因為這是教育的最好方式，啊！革命不是綉花，好一個革命不是綉花；啊！教育的最好方式，好一個最好的方式。嗚呼！可咒罵的東西！向死者哀悼，向生者鳴冤！”

一時大爆發起來的憤怒的火焰，席卷一切！凡有良心之人均紛紛地拔劍而起；而那些當官的黨員先生們，學法律（即將政治當飯吃，沒得馬列主義就要餓死的君子）的法官們，以及借此時機向官僚立功的獅子狗們，亦居然欲鳴而鳴不下去，欲爭而結果惱羞成怒。哈哈！真可謂積萬年之雪恨勁暢矣！

當晚八時半，在我校小操場由黨委書記劉真（新調來）給全校做報告。在六時許，操場就是人山人海，中文系之大字報花花綠綠，盡忙眼底；而講台之前大書之曰：“反對右傾，大膽鳴放，武大還是寒氣凌人，我們要春天”；“張勃川滾出去”；“張勃川愛人當護士去”；“張勃川十大罪狀”。高呼口號之聲振天動地！而劉真之胆乃飛之天外矣！罪惡是見不得太陽的，而真理永遠屬於群眾。劉之發言，用意惡毒，在於分散注意打擊鳴放，維護官僚的統治，以考試等來吓同學（特別是理科）等等，其後仍禁止喊口號，中文系有數條大漢奮然上台，大聲高呼，號召起來鬥爭到底，獲得排山倒海之掌聲。而黨員們則順機搗亂會場，在同學發言時，公然號召同學退出會場并帶頭紛紛退去，并力竭聲嘶地大講：“鳴！走啊！走啊！鳴！鳴！”……然而我們這些人的命是操在這些人的手里，我們的一生，我們的所有的幸福和幻想，我們盼望的生活和未來，都會被這些人毀於一旦，我們可以被他們活活殺死，可以被他們鬥爭、禁閉。他們的雙手沾滿死去的無數青年男女的

鮮血；沉痛的父母的眼泪。而他們还要鳴，还要趾高气揚地叫！还要統治，还要領導，还要教育，还要考驗。天下之黑暗，如无穷尽之黑暗，愈来愈黑，可怕矣！回想过去的的生活，真可謂鬼兴神无，杜鵑泣血，慘不忍睹者矣！而在此混乱之中，刘真仍旧好汉不吃眼前亏，下令散会，由数名手持博壳（按：指手枪）之武士帶領之下上汽車逃之夭夭！

今天形势愈来愈緊張，而斗争也尖銳与复杂了。然而任何力量，均将阻擋不住怒火。巨大的长达数米的巨幅标語出現了，程千帆（中文系教授，民主人士）也支持我們之斗争；党员成了“过街老鼠”；同学紛紛捐獻紙張、笔墨。飯堂工友也捐獻漿糊，假如要罢課我举双手贊成，要斗争我坚决拥护，同学！官僚主义的罪大极了，与我們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过去他們整人如麻，大兴阿房宮并雷厉风行；而今天搞到自己头上，一切要从团结愿望出发，和风細雨……同学，这是自己人啊！妙哉！好一个自己人！而我們即是敌人，是牛鬼蛇神，沒有生之权利的人，而只有他們才有和风細雨，小风小雨；哈哈！确实好写意矣！再配上数株桃花玫瑰則更美哉！有人問这是对敌人，这是敌我不分，說的好！妙！90%的同学是敌人，敌人多矣众矣！

按余观之，此次所爆发之标語，其力量其艺术足抵新中国开国以来之成就，而有过之！事情在发展中，我們要斗争，我們將繼續前去“韧”的战争，一时英雄之感，决非我們秃手所能形容者也。……（后略）

·嘉勉·

* * *

老友：自上月等你一信后，一去又是十天。在这期間，武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都发生着新鮮的事，而每天都使我无限激动和悵惘；我預感到一种还在萌芽的新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

我想答述一下运动的概况，上月28午，武大一千多学生包围行政大楼，要求鳴放的自由，要求民主，在群众压力下，党委書記

刘真被迫接受：①立刻大鳴大放，減輕考試。②公开人事档案。③立刻改組“生死衙門”人事处，自此轟动整个珞珈山的鳴放运动自发地开展了。新的言論和口号层层迭出，以往生活中的无穷黑暗被揭开了。只要有良心的人都会为我們的时代而痛苦的憤恨，运动开展后，大量記者涌进珞珈山，但报纸却百心对我們实行新聞封鎖，于是又引起了一百多人包围“长江日报”編輯部的事件。在运动中过去的积极分子成了落后分子，过去的落后分子成了积极分子，党员成了“众矢之的”并充当便衣警察和打手！一时间世的大字报，有一百多种都各有自己的編輯部，形式更是五花八門，如小品文，詩歌，长篇大論戏剧等等，每天晚上都举行全校性的辯論会，都是群众倡議和领导的。每次辯論都达深夜，如主題为：“解放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无情的”“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等等，参加的人有教授、同学、各兄弟学校代表一千人以上。光明、文汇报均有記者参加，其次全校性的控訴会更是层出不穷，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如陈怀九事件，×××等，当受害者在台上控訴时，在座师生，无不痛哭失声，事实之惨状真是惨不忍听!!!

够了，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会知道和同情受害者，都会憤恨这些丧尽天良的劊子手的，但是单凭憤怒和同情是不够的，不能将运动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揭发上，不能局限于肃清三害，消灭一些官僚主义，或解决本校本单位的一些不合理的表面上面，我們必須把問題（按：应为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这次运动，在党内是一次整风运动，在党外是民主与反民主的革命斗争！直至今天这种民主革命运动仍被一些人理解为“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整风”这种論調上，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别有用心的。他們要我們蒙上眼睛，关在籠子里，仍象过去一样用鼻子去生活，企图压制群众自发性的民主高潮，但是我們要大喝一声，这是办不到的！鮮明的事实替我們辯护，請問有几所大学是在党的领导下“和风細雨”地帮助党整风的？这无疑自我安慰而已！

1949年的勝利，開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革命，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這是社會的大進步！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原則，誰要回復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就要用整個生命去和他鬥爭，但是1949年的革命是在極不徹底的基础上完成的！它帶有了強烈的封建性和濃厚的農民革命情緒，而在革命理論上則更是幼稚，因而顯然地受到斯大林錯誤理論的影響，中國革命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主要是解決了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肅清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余，但是對於怎樣去締造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領導人民去建設社會主義建立新生活秩序這樣一些重大問題則是得不到解決的。革命的根本上是建立真正的上層建築，可是幾年來都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工業化的步驟就是值得懷疑的！幾年以來形成了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個問題作學究式的爭論是可笑的。因為憲法上並沒有規定那些人有特權，而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又好象與統治階級格格不入，是的，這點我不否認，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的痛切感受中體驗了它！共產黨形成了“家天下”，大權在握，孤宗統治；上至中央，下到窮鄉僻野，無不在共產黨員的統治和監視之下，什麼人坐什麼汽車，吃什麼樣的飯，穿什麼樣的衣服都有規定，人們被無形地劃分為等級，黨員是一級，團員是二級，普通群眾是三級，官僚地主是奴隸，而在每一級之間又分工人出身，中農出身……。你如果不幸降在下等，就命定永遠不能翻身！你在中國就只能過下等人的生活。因為我們的黨老爺，非階級論者，已往在檔案和鑑定上為你算了命，共產黨員成了盛氣凌人的高官顯貴，你要申訴嗎？到哪裡去申？報紙雜誌，檢察院也是黨老爺，他們會把你當反革命！由於一黨專政和盲目的自大狂使共產黨變了質，與人民相距一萬八千里。中國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真正名符其實者不到二百萬！歷史證明，沒有任何政黨是完全正確的，任何專制統治到後來總會被人民的憤怒所毀滅！一黨專政無論如何不能把中國辦好的！他們不認識在革命基本結束，敵我矛盾趨於次要的

时候就应该大胆地讓群众去干預政治，共同建立新国家！而他們只相信自己，因此一些愚昧的做法就出現了。例如在文化科学上唱单調子等等。中国是6亿人的中国，并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然而我們现实生活所告訴我們的，却是一幅怎样的图画？我們盼望的生活青春，我們理想的未来幸福，难道就是这样的嗎？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但是所使用的手段无疑是狂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殘酷斗争！受害而含冤九泉者何止千万？！这种做法是无人道的，錯誤的。在肃反問題上扩大化了。成千上万的人无辜受害，全国遍布集中营，而其手段之殘酷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来得悲惨和可怕！在这里法律都絲毫不起作用。共产党员有无上的权力，有生杀之权，有私設法庭，任意捕人、关人、斗人的权力，在这里我們嗅不到一点民主的影子！举胡风事件而言吧（我不是替胡风辯护，只是举例）就“人民日报”所揭发的材料而言是不足以判定胡风集团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因为并没有公布他們反革命活动的真材实据，而且在运动中只有原告說話的权力，被告根本不能替自己說話和辯护，于是就只能操于“人民日报”的手中，报纸一些零星材料、張言双語、断章取义想当然地硬加上一个反革命的罪状；而党员作家附和趋势的人則应声而起你唱我和。要是有人想辯护一下那就会粉身碎骨。整个肃反运动是在一种可怕的方法論指导下开展的。它主要是：“力图找出一些材料以証明其是反革命而在表面上沒有矛盾”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人民日报”社論“在社会主义日益巩固和壮大的今天，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会越猖狂，斗争就会越激烈”。这显然是斯大林錯誤式的翻版。肃反运动中，奇怪的是宪法根本不起作用，人身沒有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人的尊严受到破坏，共产党人根本不要法律。在他們脑子里只有斗争！斗争！打、杀、奸强什么都出来了，这令人想到过去的农民革命！

我們要求建立律师制度，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不受任何力量

的支配，他捍衛法律、人權和真理。目前的人民法院、檢查機關就是官僚分子的天下，黨員居其中焉，“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根本要不得的！

運動向何處去，我看這次運動，可能在很長的時間內繼續發展，也可能以一場悲喜劇而告終，要看黨中央的態度和我們的努力。知識分子究竟能做什么，在這運動中看得很清楚。我們需要團結和堅持，擴大運動的範圍和影響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從上而下的發揚民主和從下而上的群眾民主大風暴究竟是不同的，我們需要徹底的解決絕不能滿足於某幾個人許諾式口頭上的承認，整一下風等等。這樣一些無關痛癢的生活檢討會上這無疑地視群眾為“阿斗”，可是事實上只有“阿斗”才會視群眾為“阿斗”！一切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事無大小，一律按照法律行事。在南斯拉夫，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新的東西，這意味着斯大林時代的結束和新时代的開始。我們必須擺脫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勢力，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最後人類所最終盼望的生活青春才會到來！北大成了這次運動的先鋒和號角，他們成立社團進行活動，並將成立“社會主義民主黨”……一切都在於努力，在於鬥爭！

可是目前存在一股逆流，一股暗流；它力圖倒轉運動的方向，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長時間的機械論統治，使得人們在精神上陷於麻木和保守狀態。共產黨員根本就不能領導這次運動得到勝利。因此我們須要群眾大刀闊斧的去干！當然我並沒有打倒它的意思，因為這是不合理的。總而言之，今天單是喊喊共產黨萬歲之類是不夠的，我們要喊理性的原則萬歲！真正的民主自由萬歲！真正的人權平等萬歲！

我很希望你在這些問題上發表意見，假如不大影響你的考試的話，正等待着你的來信。

祝

好！

6 · 6 放。

* * *

× ×：

你最近給我兩函均已收到，今晚特回此信，然由于時間之匆匆，未及思考，故不能令你滿意也。

中國之問題，若你有可能我們在暑期可以詳細的討論。我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掌握政權就意味決定一切。四九年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開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革命，並保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前階段為後階段做了準備，並決定了後階段的勝利。因此，我並未將中華（中國革命）的二個時期混淆（淆）。革命假如只做了破壞舊的而並未建立新的，則不能謂其徹底也。中國目前之制度有巨大的缺陷，因此引起了全國人們不滿，根本並未建立起真正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如民主、自由、藝術、科學等等，而此點在今天則是最主要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缺點？不能說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物，因為這是不合理的，其原因是由於中國之落后，即中國革命之落后性，中國革命有封建性及略革（按：“略革”意指革命不徹底性）之情緒，蘇聯個人崇拜之產生是由於帝俄是一個落后愚昧的國家，俄國革命之落后性，當然我不能否定其他原因，然此點極其重要也，此問題在“斯大林時代”一文中有詳盡的闡述，在此不多說了。

你來我校使我大吃一驚，你校在校名問題上居然爭論如此之久，實在令人難解，依我之見不必如此，你們避開最主要的東西不管，而去和幾個不學無術之黨員爭氣，改校名亦是全國普遍性之事，之（只）寫之（這）一具體例子也。只有從根子將三害根除，才能最終解決問題。目前全國爭論最熱之問題如黨委制之問題，黨之領導問題，民主自由人權平等之問題，均極必要。知識青年應該將眼光看的更大更遠，大胆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並與全國各兄弟學校之爭鳴聯合起來，以形成一個巨流。各地之高等學校均將鳴放，局限於一些更名換姓改領導，這樣一些只有女人才感興趣的事情上，實在令人難解也！可笑的是許多人的腦子卻以教條化，只能整天看看馬列主義之類，看到聲音略有不同者更大

惊小怪，此乃更庸俗之人也。此問題我与老友之見解是針鋒相对的。最近我校有同学到汉口演講，貼标語，市民們將我們当成反革命，这种人真不愧为阿Q之子孙也。武汉有些知識分子居然洋洋得意地向我校全体同学，写数封公开信，通篇說些陈言烂調等教条主义的文章，說什么“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知識分子是沒有知識的”等等，激起了我校师生之万丈怒火，此种人連眼睛也沒有了，因为他們什么都看不見。“人民日报”的社論是标准的保守夹教条，不值一看，最近我校特为此种事情，全校八十二家报刊宣布停刊，抗議并举行了游行示威。（按：一部分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当时的形势，煽动群众，准备在六月八日举行游行示威，但大多数群众并没有跟他們走，举行游行示威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群众面前愈益暴露出来，而且右派分子在群众中日益孤立了；看来右派分子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訓，反而歪曲事实，企图重温旧梦。）并上書省委及党中央表示抗議。

.....
你們何不作政治（課）选修的斗争呢？我們正在进行此事斗争！不过我无点火之意，你們可三思而行之。

近日社論讀之論（令）人作嘔。“鳴放”两字今天有新义在云，有“放”則有“鳴”，不“放”安能“鳴”哉！

.....嘉勉書于六月十三日晨

邱永春：再論在社会主义时代的 群众自发运动

探討当前的运动中爭論的几个問題

按：邱永春系武汉大学数学系学生，这个材料是根据省委整风办公室提供的材料选編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几个新的論点，这就是：（一）当前在我校掀起的运动的性質是在中央正确方針的指导下，广大知識分子（大学生）自发地要求协助党整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維護社会主义法制的群众运动。（二）这个运动发展本身要求党委具体领导，武大党委到現在还没有把运动好好领导起来，党委的決議給运动带来了强大压力；（三）这个运动发展本身并不硬性排斥大民主（游行示威），是否一定要搞大民主这取决于武大党委。（四）党委的正确态度應該是認清运动的性質，从而大胆放手地把运动推向更深更广方面去（不是到工厂、农村去）。（五）运动的美滿結局應該是既达到党的整风的目的，同时又爭取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維護。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討这样几个問題：（一）为什么說我校运动已越出了整风范圍？（二）“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制度問題。（三）武大党委为什么沒有领导好这个运动？（四）保卫馬列主义、維護党的最高利益。

（1）

辯証唯物主义告訴我們：“对于物質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

們認識事物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黨目前在全國範圍內所開展的整風運動基本上是在黨領導下的人民群众的自願協助下的以和風細雨的方法開展的整風運動，這是矛盾的一般性。

但是，在武大，情況比較特別，徐懋庸時代給武大創造出了一套完整的統治方法，徐懋庸走後，江魯又加以修正和發展，以致在武大這個小天地形成了解放以來的長期的黑暗統治，尤其在“三反”和“肅反”時期許多教授被鬥受冤，其中例如聞名世界的原子核化學家鄔保良教授，物理學家桂質庭教授等，許多教師工友和同學被無辜地送進武大禁閉室（如段桂棠老師，我系趙志鰲同學等等）給以甚至比集中營還要殘酷的肉體與精神上的摧殘……耳不忍聞目不忍視……社會主義法制（尤其是莊嚴的憲法）被破壞人權被剝奪，這是矛盾的特殊性。

劉真同志到武大來了，武大師生員工（尤其是同學）寄以很大的希望，在大家當中享有較高的威信，因此在這個運動一開始，同學們要求協助黨整風的善良願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劉真同志使人失望了，他不是走在運動的前面指導運動，而是在群眾的後面約束運動，阻礙着它的進展（當然這不能完全怪劉真同志，因為他要服從黨的紀律啊！黨委會里的委員有很多是“三害”錯誤的同志，他們絕不是那麼積極的），於是同學們向武大黨委提出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權維護莊嚴的憲法等口號是很自然的了。這就是說運動越出了整風的範圍，形成了在黨中央正確方針指導下的知識分子自發地協助黨整風，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擴大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群眾運動。

（2）

“三害”是現象不是本質，它的產生根源是制度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的國家機關中的部分環節制度的不合理，社會

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面的缺陷”〔注一〕如当前学校中的党委負責制、人事处制度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給了那些有“三害”錯誤的人以犯“三害”錯誤的营养料。因此要鏟除“三害”根本問題是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日常性質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証不犯錯誤了呢？問題沒有这样簡單。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無論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証工作中不犯严重的錯誤。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問題就在于是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注二〕。这就是說与实施制度的人的品質和作风有关系，“三害”也不例外。

武大“三害”产生的根源也是制度問題，正是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給徐懋庸这种具有“农民的粗暴性”〔注三〕的人以胡作非为的条件，所以說武大的“三害”是徐懋庸时代的“杰作”，江櫓集其大成而发揚光大了。

从已揭发的事实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武大“三害”为什么那么严重呢？（特别是表現在“三反”和“肃反”时期），这与解放以来法制的健全有关系，“肃反”时中央的方針是正确的，有反必肃，有錯必糾，但是中央并没有叫武大的“肃反”負責人大胆假設，粗心求証”啊！（本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証”〔注四〕，而这些干部是粗心而不是小心！）当然，現在武大肃反余留問題沒有总结，我不了解詳細情况，但是从已揭发的事实中可看出武大“肃反”犯的錯誤是很严重的，如果說以前法制不够健全，那么我說現在正是要健全的时候了，是保卫我們庄严偉大的宪法的时候了。遺憾的是，現在有許多同志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問題，甚至是爹把問題推到儿头上，儿把問題推到爹头上，不認錯，甚至

有的人(如我系齐民友)竟認為斗錯了也是成績! ……等等。

总之，武大“三害”的产生是三方面造成的，这就是制度（基本制度下的部分环节制度）不合理，黨員，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問題，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

因此，要解决问题必从这三方面着手，要把运动搞好就得领导上坚决果敢地领导起来，要那些民愤极深的人作出事实表现来，消除群众一切顾虑，让大家大鸣大放起来，立即着手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肃反余留问题等，群众起来有什么可怕的呢？从十几天来的经过中可看出大家是很有理智的，与那些有“三害”错误的人比起来有理智的多！

(3)

首先让我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党中央始终走在运动的前面指导运动，英勇果敢地提出大鸣大放的办法来支持和指导当前的运动，这是馬列主义的新创造。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很敏感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指导，从而自发地起来帮助党整风，掀起了这个运动，但是武大党委呢？始终处于被动地方，被群众牵着鼻子走，形成了一个“思想真空”（我的定义）这就是口头上空喊“支持”大鸣大放（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说）已经过时了的教条中抽出它的“法宝”来压在运动头上从而使运动受到阻碍。

武大党委的这个思想真空（也可说是理论真空）是怎样造成的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领导干部思想水平低，对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学习得不够，对教条很感兴趣，其二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中去听取呼声，对群众的信任不够，认为大家起来就会出“大乱子”（刘真同志说过），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党委除了一些自身有“三害”错误的同志以外，整个常委会，包括刘真同志在内至少有“两害”，这就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4)

近来，在刘真同志报告以后，竟有些党员同志公开大叫“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党的最高利益”等口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他是党的忠诚的儿子，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然而他们除了喊了这些口号以外，就是“从胡风集团的材料可看出肃反的必要性（？）”“运动一开始就是党委在前面领导着”“现在有了纸、笔给你出大字报，还要争取什么民主呢？”这些颠倒黑白，不合逻辑的证明，对于我校的“三害”严重性竟全然无知或不想讲。

我班的“刺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积极，在运动后期起了阻碍作用，发表的全是对揭露事实的人，积极的报刊品头评足，后来越来越嚣张，甚至登出的消息有些是捏造的，在全系学生大会上除了把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几乎全背出来和加上两句“我们完全同意刘真同志的报告”“刘真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据说是对党负责，对运动负责。

在运动中竟有些党的负责同志（学生中的，如甘师昭、王侠等人）说我们的兄弟报刊和同志是“别有用心”的“有政治问题”等。

其实，我们的兄弟报刊（那些被骂的兄弟报刊），我们的“别有用心”的同志是在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好风，办好人民的武汉大学！

这些我不能不说是一股逆流，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有“三害”错误的同志是有害而不利的，我深信党，人民将会公正地作出评价，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卫者，谁是党的最高利益的维护者！

〔注一〕 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

〔注二〕 同上。

〔注三〕 据已揭发之材料是徐懋庸自己对自己的作用而说的。

〔注四〕 胡适：实用主义。

古希天的右派言論

按：古希天系武汉水利学院水建系助教。这里选編的材料，是他在大鳴大放中向党进攻所写的文章的一部分。

一、“正視錯誤，提高威信”

在毛主席的报告中，說到我国肃反工作既不象苏联左，也不象匈牙利右。听说在毛主席报告中，講了1950—1953年間鎮反杀掉的数字，大得惊人，我不能不怀疑，是否真的不左不右，是否杀掉的这一大批人都是該杀的而沒有枉杀的。就拿我家乡广东梅县、兴宁、五华一带來說，1950年冬1951年春开始鎮反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一批拉去杀的，有时甚至有一大卡車載着二、三十个面上毫无血色的人。据我知其他各地也都差不多。难道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反革命真有这样多么？听说中央曾派人到广东兴宁檢查过，发现大部分案件是錯判的。現在事情已过去几年，杀的杀了，社会秩序也安定下来，反革命基本上压下去了，但是否有許多好人被枉杀了？我沒有掌握任何資料，不敢随便肯定，但却打了个大問号，希望共产党中央認真对待这个問題，認真檢查过去判死刑的反革命案件。

一提起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靜下来，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最恶劣的事件，旧社会我正在童年时代，听过許多比这罪恶百倍的事，可沒有亲眼看到。而1955年，解放后六年，共产党竟会做出严重違反自己亲手制定的宪法的事来，实在是莫大的遺憾。不經任何法律手續即大量扣押人，严重侵犯人身

自由，一切既可气又可笑的事都出来了，下面我举几件事实，还得说明，我是一个呆在書房的書呆子，沒有对这个运动进行什么調查，同时肃反时也有着—套森严的紀律，而我确实知道下列事实，这就說明它代表的广泛性：

武汉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一个外科专家，因与院长有个人嫌隙，被院长拿作“老虎”斗争了，当然，禁闭起来不在話下，在被斗争中受了許多下級人員百般污辱与冤枉。該副院长亦曾向上級申訴，但他不是黨員，又是“老虎”，而院长大人是党内高級人員，誰会理会“老虎”的申訴，結果該副院长自杀身死。院长还立即召开全院會議，給已死的“老虎”再加个罪名——破坏运动，此其一也；湖北医院某天下午把全院职工集合到礼堂，由几个公安人員进职工宿舍进行大搜查，把一切書信文件搜索一空；甚至有几个同志平日一起买东西吃記的帳也被搜走，以至无法算帳的。搜查进行了几个鐘头，职工一直是被关在礼堂不許走动的，此其二也；广东潮汕粵东人民医院医生梁騰熹因此院长有个人嫌隙，被斗了，被关进监牢里劳改了几个月甚至强迫他写信給他的儿女要罵他反革命，此其三也；北京一个基督教会負責人員王明道，他不仅在国内基督教内有相当威信，国际上也知道他的名字，听說杜勒斯在日内瓦會議时誣蔑中共杀傳道人，就曾提到他被杀，他是个正直的傳道人，只因他拒絕参加“三自”，肃反时就把他逮捕起来，当局捏造了許多罪名动员基督教徒斗争他，关了几个月后，无罪釋放，此共四也。肃反中被枉斗而自杀的，决不是一个二个，也不是十个百个，而是以千以万計。无数被关起来的、被斗的，更是不計其数，搜查信件也是普遍的事，更有无数森严的“紀律”如：不許任何人（当然，恶狗般的領導是不在內的）走出本单位（学校、机关等）的大門；不許和“老虎”說話等，領導經常动员群众对“老虎”要火力大，呼口号，拍桌打凳，大喊大罵，对“老虎”的斗是采取疲劳战，一場群众斗争后，是几个領導开庭审讯，“老虎”被斗不过，只好全部承認罪状，还另給自己捏造些罪名，經過

一番調查，全是虛空，演了一場捕風捉影的滑稽戲，令人啼笑皆非。形形色色的卑劣手段都出現，也都深深在人民內心留下了痕迹。啊！原來共產黨是這樣做事的！這些手段縱使對待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何況被鬥的絕大多數是人民！最可惡的是那些借機會利用職權報私仇的，這樣的事決不止上面舉到的兩個例子。基督徒更是普遍的作為鬥爭對象，據我知，大學和機關的青年基督徒，大多數是被鬥過的。這裡，我順便提一下，幾年來對基督教的一些歧視和壓迫：1954年在北京考大學的沒有一個基督徒被錄取，他們中大多數成績都是很優良的；許多中小城市和鄉村，教會被以土改為名禁止禮拜，到現在還有許多未恢復禮拜的，禮拜堂被占用，甚至有許多被用作關牛馬的！必須提醒共產黨，國內基督教、天主教人士雖然不多，世界上却很多，這些做法，應該考慮其國際影響。

肅反過去了，被鬥的鬥過後也釋放了，自殺的死了，而共產黨卻一直是吹噓肅反的輝煌成就，從未提到過錯誤，僅僅由各機關向被鬥者作了個別的極膚淺的“道歉”，死者則石沉大海，“偏差”由各下級自己負，中央則是“正確”的。這怎么能叫人心服！設想：一個小學教員把犯規的學生禁閉了一個鐘頭，人民會以怎樣的憤慨指責他！我就看過報上登載一個教員誣一個學生為賊，被狠狠的批評了一通，而肅反時禁閉的不是一個二個，而是幾萬幾十萬！不是小學生，而是大學教師、醫生和專家！不是一個鐘頭而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是暫時失去自由，而是永別人世！難道共產黨稱這些事是正確的？！

這次共產黨讓大家“放”，許多骯髒的、黑暗的事都擺到陽光下來了，追溯這些事的根源，就是共產黨的專制，把持一切，黨已經騎在人民頭上，若不趕快大膽承認錯誤，及時改正，後果必然是嚴重的。黨取得了政權，幾年來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聽到的是歌功頌德和自吹自擂，黨中央的100%正確性是從未有人敢懷疑過的，因為黨中央過去從遵義會議後一直都是最正確的。然而，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面临了一个新时期，新的考驗来了。过去受反动統治压迫，共产党不能不紧靠人民大众，今天当了权，是否还紧靠人民大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在許多主要方面，党是經得起这个考驗——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而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未能經得起考驗，犯了些錯誤，給人民做了些坏事，尽管八年来党給人民办的好事是輝煌的，是最主要的一面，但正因为六亿人民的苦乐掌握在党手中，即使很小的錯誤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共产党口口声声說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也确实把它看作自己的党，有理由对它提出严格的要求，党也常說不害怕承認錯誤，承認錯誤并不意味着丧失威信，相反地，更加提高威信，我但愿能看到这些話付諸实现。

（原載水利学院“学习簡报”第14期）

二、古希天的答复(部分摘录)

……我敢下这样的結論：“我院肃反錯誤是全部的，成績是接近于零的。”据說被斗者158人（未包括小斗者）中只有7个反革命，而这7个是現行还是历史反革命呢？院长沒有向群众交代，听說7个中罪恶大的一个是当时未斗他而他假坦白，当时领导上还为他宣揚如何坦白，后来公安局掌握了材料才把他逮捕的。听說7个中也包括过去已交代的历史反革命。假如7个中并未在斗中找出新材料，那么成績就是零。

从全国范围来說，我是个渺小的公民，只看到极其局部的事。但据我听到的，水利学院并非唯一阴暗的角落，类似的情况在許多地方都有，只不过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市二医院副院长，外科专家，被斗自杀，湖北医院并进行全院大搜查。55年的“肃反运动”錯誤是极严重的。宪法已于54年公布，却遭到严重的破坏。过去历次运动均有一些錯誤，以往党对成績夸耀得多，对錯誤正視得少。其后果是在国内三害滋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人心。在国

实际上其影响也不会小。目前社会主义阵营还未占绝对优势，西方人民并未100%贊助共产党。幸好，党中央及时提出整风，如能認真批判錯誤則將贏得国内外广大民心，党的威信将大大提高，社会主义事业会前进一大步。我不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績。但我敢大胆否定肃反运动时采用的那种斗的方式，应该发动群众检举，公安机关或各单位领导人認真調查，然后由法院审讯，而不应该違反宪法采用恐怖的斗。

最后讓我談談对目前我院除三害运动的看法，我認为群众是自觉地鳴放起来，而领导却一再拖拉和回避群众所揭露的問題，我現在冷靜地等待一星期，假如領導上再沒作出什么令人相信他有誠意的事来，我即辞去学委职务，并即向上級控訴。我現在正着手搜集揭露違法乱紀和三害的事实，希望群众支持我，能把你所知道的材料供給我。听说院长給同学作肃反报告只口头認錯，对具体問題不处理致有部分同学向法院控訴，我支持他們，并建議联合起来控訴更有力。有人說，整风是党的事，党不整就算了。我認为办好学校，要民主，是事关我們切身，党不整，我們也要干，有人老愛拿和风細雨作擋箭牌，我認为，違法乱紀者不能和风細雨，就应法办。

（录自水利学院“学习簡报”第10期）

陈柏华：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

按：陈柏华系武昌实验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这是他在今年7月11日写的一篇文章。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到处可以看见，到处可以听见，并且还有许多人以其“社会主义立场”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他们所引以为荣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一样是反动的、罪恶的东西。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它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它骗得许多人丧其理智忘其根本，它骗得许多人服服贴贴俯首听命，它也骗得许多人象哑子一样无法说出自己的苦处。对于这种骗人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加以揭露，让它的本质暴露于公众之前，让大家去处理它。

所谓“社会主义”我们只要分析一下社会财产的分配制度就可以把它的本质赤裸裸的暴露出来。

社会财产的分配制度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自古以来都没有得合理的解决。有人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上，这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人们都清楚地看到，1949年中国共和国的成立，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更朝换代，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统治代替了一个旧的统治。在共和国里人民仍然处于无权受人奴役的状态。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领导”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只能象那讨厌的噪音一样鼓动一下听众的耳膜。人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人民指挥统治者，相反的都是统治者指挥人民。人民

不服从統治者的意志，統治者就以“造反”的罪名加以鎮壓。人們看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勞苦大眾的生活比政府官員的生活好。相反的，政府官員比勞苦大眾生活得好却成為古今中外“天經地義的合理現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衣衫襤褸的農民和大腹便便的老爺的對照、赤貧者和富有者的對照、幸運者和悲苦者的對照，依然那麼明顯，那麼坦然自得地存在着。當人民反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時候，政府人員就用國家貧窮、生產落后、不能在一个早晨提高生活，我們必須艱苦奮鬥等話語來抵制人民，人民不服，反詰道：既然國家貧窮，生產落后，不能在一个早晨提高生活水平，那麼為什麼許多“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人民勤務員”却偏偏能夠提高生活呢？要艱苦就大家一起艱苦。到此那些說話人就以“絕對平均主義”“反動”等罪名加到人民頭上。但是什麼是“絕對平均主義”呢？如果要一個勞動得多而一個勞動得少的兩個農民所得的勞動報酬一樣多，那當然是絕對平均主義，那當然是反動的。可是人民要求平等，要求消滅特權是絕對平均主義嗎？人民要求官吏不應該得到較多的報酬，要求名符其實的同甘共苦共同奮鬥是絕對平均主義嗎？“為人民服務的”的官吏們，人民要質問你們，你們有什麼理由使自己的收入比一個普通的勞動者超出幾倍、幾十倍或者更多呢？你們有什麼理由可以用政權的力量限制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每天的生活費用僅能維持再生產的热量消耗呢？你們說你們的貢獻大些嗎？即使你們有貢獻，你們的貢獻來自人民，你們的貢獻只能通過人民的社会活動才能體現出來，如果你們不用奴隸主的眼光看待勞苦者的話，你們的性命決不比一個普通勞動者更寶貴。既然你們要人民用質量低劣數量不足的生活性質維持性命，你們自己也不應該超過這個限度。一個國家的皇帝、主席或總統，如果他一離開君主的寶座，他一離開國家機器，他就無任何作為，如果他不耕田種地，他不但不能再過皇帝的生活，就是衣牛馬之衣，食犬豕之食也不能夠。如果為了維護特權

而強調個人作用，說作用大的人應得的報酬多，這正是反人民的历史觀點。“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不正是不平等的罪惡的社會的寫照嗎？這些成功者應該生活得比人民好嗎？

中國历史上的秦始皇起過統一中國的作用，但是他應該比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生活得好嗎？以“革命者”自居的人們，不得不說不應該，同樣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官吏也不應該生活得比人民好，這是“革命者”所無法否認的；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官吏的生活不應該生活得比人民好，這也是“革命者”所不敢否認的。可是當人民說我們國家的官吏也不應該生活得比人民好的時候，這些“革命者”却極力反對，這時候，官吏不應該生活得比人民好的“普遍真理”就不適用於中國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原來，官吏應該比人民生活得好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世界各國的官吏都不應該比人民生活得好。可是通過“革命”之後反而革出了官吏應該比人民生活得好的國家。好不荒謬！“革命者”不但不自覺其不成“革命體統”，反而不擇手段地製造官吏應該比人民生活得好的謬論去反對人民的平等要求。語言文字不頂事就動用專政的工具——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無產者決不反對平等。所有的勞動者是不平等的堅決反對者，他們反對不平等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社會的存在的狀況，他們本身的存在狀況，就是他們反對不平等的原因，這種狀況不改變，不論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人民一律反對，不管它五顏六色，五花八門，本質的東西是掩蓋不住的。資本主義不能用它的經濟繁榮掩蓋住它的本質，社會主義也不能用它的工業發展避免其事實的暴露。把詞彙中所有美妙的形容詞用在這些主義的前面都不能發生永久性的欺騙作用，有人想用“按勞取酬”的字眼來掩蓋住社會主義的本質，其實無濟於事。

生命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在戰爭中，一個普通的士兵失去生命的机会比將軍長官失去生命的机会多；在平时的練兵中，一個士兵所花的勞動并不比將軍少，僅僅是勞動的方式不同，但

是士兵所得到的報酬却比將軍少。所謂“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不是什么“按劳取酬”。而是一脉相傳的按地位取酬，地位越高賺錢越多，过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資本主义美国如此，社会主义苏联也如此；国民党如此，共产党还是如此。

按地位取酬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最大缺点，其次是按机会取酬，按地区取酬和按知識取酬。

有人为維護这种制度說：“非这样不可，理想不能脫离实际，誰要一个用木犁生产的农民所得到的報酬比用拖拉机生产的拖拉机手所得到的報酬多些或者一样，那就是反动，农民的報酬必須比拖拉机手少，因为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比拖拉机手生产的东西少。”我們說反动制度的辯护者錯了！农民在劳动中所花的劳动不少于拖拉机手，农民劳动的强度及其艰苦性并不亚于拖拉机手，并且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往往有过之无不及，这是众人皆知之的。农民生产东西少，并不是农民懶惰怠工，并不是农民不努力，而是因为农民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是落后的农具，而不是先进的农具，如果农民所使用的工具是先进的农具，是拖拉机，那么农民用同样多的劳动可以生产較多的东西。由此可見，农民生产的东西，并不是农民的罪过，只不过农民把使用拖拉机的机会給了拖拉机手。

拖拉机是工业成品，在它里面包含有知識分子的劳动，有工人的劳动，也有全体农民的劳动。拖拉机是公有财产，全社所有的成員都有同等的权利使用拖拉机，都有同等的权利受教育掌握使用拖拉机的技术。但是在拖拉机不多的情况下，既不能大家輪流使用，又不能大家一起使用，更不能搶得打架，只能分配一部分人去使用，其余的人只能使用木犁。可是誰去使用木犁呢？誰應該去干那吃力不討好的事呢？誰該死些呢？沒有誰，因为公民一律平等，这样一来分工的問題不能解决，怎么办？那只有平等农民和拖拉机手的劳动報酬；农民劳动得多就該农民多得，拖拉机手劳动得多就該拖拉机手多得，这样就不存在誰該死誰不該死

的問題了，在勞動者中間隨便哪個去做拖拉機手都可以。

如果還有人堅持說拖拉機手的報酬應該比農民多，那麼我們說這位頑固不化的“社會主義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即廣大的人民被關在科學的大門之外，科學為少數人服務，科學成就被少數人占有的這一社會現象，如果“社會主義者”承認科學應該為全民服務的話，他就不應該堅持拖拉機手應該比農民得到較多的報酬的意見，因為拖拉機是科學上的成就，是科學家的發明創造，科學家為全體人民服務，科學上的每一成就應歸全社會每個成員的平等的權利占有今天我國農村基本上與原始狀態相去不遠，這就是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使科學成就被少數人占有的結果。

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的維護者轉移話題繼續辯護道：“你們所想象的這種平等是不合理的，實際上不是平等，誰要土地貧瘠地區的農民和土地肥沃地區的農民的勞動報酬一樣，那就是反人民！那就是貧瘠地區的農民剝削肥沃地區的農民，肥沃地區的農民就要反對！”我們說今天的農民都是被剝削者，肥沃地區的農民決不會反比自己更不幸的貧瘠地區的農民，人民並不象那些狡猾的、惡毒的剝削者那樣不講道理。肥沃地區的農民知道平等不但對貧瘠地區的農民有利，而且還對肥沃地區的農民有利，肥沃地區的農民要求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也希望貧瘠地區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他們希望貧瘠地區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自己的生活水平保持在同一高度，為什麼？因為人們都知道，在整個社會生產中，貧瘠地區的農民所花的勞動並不少於肥沃地區的農民所花的勞動，貧瘠地區的農民不能生產出較多的農產品，不是因為他們的主觀努力不夠，而是因為土地貧瘠，貧瘠地區的農民在肥沃地區生產，他們可以用同樣的勞動生產出較多的農產品，然而他們不能在肥沃地區生產。因為那里已經有人，和前面所說的拖拉機是公有財產一樣，肥沃地區的土地也有公有財產，任何人都平等的權利生活在肥沃地區。在進行全社會的分工和生產配置的時候，如果不使勞動報酬平等，不嚴格執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

則，將沒有人心甘情願地分配到貧瘠地區去。

如果還有人堅持說貧瘠地區的農民應該比肥沃地區的農民生活得更壞，那麼我們說這位腐朽的馬列主義者根本不懂得科學的價值學說，或者為了維護特權而明知故犯存心騙人，我們認為正確的观点必須把社會生產看成為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把各個地區、各個階層割裂開來，不能孤立地看每個人所創造的價值，全社會的某種產品的價值決定於全社會對於這種產品的平均勞動，在全社會的生產中，誰花了較多的勞動，誰作了較大的努力，誰就在社會財富的生產中作了較大的貢獻，如果孤立地看每個人所創造的價值，並以此確定勞動報酬的多少，那麼自動工廠的生產者將成為擁有大批財產的富翁，其實自動工廠的生產者本人知道，他們在勞動中所作的努力並不比一般的工人和農民特殊。

再例如：在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里，一部分人專門經營甲塊土地，另一部分人專門經營乙塊土地，勞動在甲乙兩塊土地上的農民，每人都花了同樣多的勞動，每人都做了同樣多的勞動日，但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原因而造成甲塊土地上完全沒有收穫的結果。如果根據討厭的馬列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甲塊土地上的農民沒有生產東西出來，因此他們沒有創造價值，他們既沒有創造價值，他們就不能得到報酬了。這樣一來，在甲塊土地上勞動的農民非餓死不可，如果辯證地看這個問題，就要作出如此完全相反的結論，即在甲塊土地上勞動的每個農民應該得到與在乙塊土地上勞動的每個農民一樣多的勞動報酬。因為在甲塊土地上勞動的農民雖沒有直接投入勞動力於乙塊土地上，但是從整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看來，乙塊土地上所收穫的農產品仍然是勞動在甲乙兩塊土地上的全社農民所共同生產出來的。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此，一個國家又何曾不如此呢？

由此可見，貧瘠地區和肥沃地區的農民的生活水平應該保持在同一高度。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應該保持在同一高度。工人和農民誰勞動得多，誰就多得多勞動報酬。

反平等者接着說道：“如此看来，受灾地区的农民也应该和非灾区的农民得到同样多的报酬了！”我們說当然應該，难道灾区的人民應該飢餓，應該死亡嗎？可惡的反動分子如果還沒有墮落到野兽的地步的話，他應該受到良心的責備，我們認為哪里发生了灾难，那就是全国各地各不同职业的人民的共同的灾难，那就是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識分子以及全体青年学生的灾难，如果政府人員不愿被人民一脚踢开的话，那也就是政府人員的灾难。如果大家平等的負担自然灾害所給予我們的压力，那么天大的灾也不成为其灾。但是正当灾区人民遭受到厄运的宰割的时候，却仍然有許多人的生活不受影响，每月照样領取着巨額薪俸，在这里連“同志关系”的影子也找不到。

当人民不滿的时候，当道者就把那些坏透的、討厭的历史罪状搬出来抵消人民的不滿情緒，“你們看！过去多坏，現在多好！”以此把罪恶的现实大大地夸耀一番，并引起那些趨炎附勢者的歌功頌德，大唱而特唱其“人民幸福”的贊歌。但是，人們知道，討厭的歌声并不能掩盖住凄厉的慘叫声，人們知道，吹拍者連一个美丽的泡影也吹不出来。

对于灾难，人民事实是在互相救助的，人民交到国庫的粮食棉花以及工商业稅收就是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支援物質，如果政府不給灾区人民足够的生产物資，而讓他們处于飢餓状态，那就是政府在变相地克扣支援物資，那就是政府扣发灾区农民应得的劳动报酬。

罪恶的社会制度的辯护者恼怒了，到了最后，辯护者不得已把知識分子当作擋箭牌迎了起来，大喝一声：“胡說！一切都平均，一切都一般齐，难道知識分子也应该和农民平均嗎？难道知識分子也应该过农民那样的生活嗎？誰要說應該，誰就是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劳动，国家沒有知識分子还能象个国家，反動！反革命！反社会主义！”

好一副尊重知識分子的嘴臉已經一清二楚地显露于公众之前

了，既然尊重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把知識分子和廣大的人民分開，既然尊重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把知識分子特殊化，知識分子討厭別人把他們看成不同凡胎的人。

在知識分子中，除了用“點滴進步”的反動論調反革命反人民的胡適及其他靠權勢吃飯的走狗奴才無耻文人之外，其餘每個為正義事業而辛勤勞動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必須受到尊重，他們的人權和其他勞動者一樣不容侵犯，知識分子的勞動和農工生產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並不能因此使知識分子的勞動報酬超過一般勞動者，這用知識分子自己的感想和生產可以說明。

知識分子之所以能成為知識分子，是因為知識分子經過了學習經過了受教育的緣故，知識分子獲得了全體人民都應該獲得的受教育的權利，而農民的受教育的權利則被罪惡的社會制度所剝奪。

當知識分子正在學習的時候，正在過着比較愉快一些的小學生生活的小時候，那些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的農民正在風里雨里或酷熱的太陽下死受，農民用自己的血汗無聲無息地供養受教育的人。受教育者既成知識分子之後，他們不但擁有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知識，他們還可以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過着較舒適的生活。但是那些無辜的農民却是勞動一輩子，貧窮一輩子，勞累終日不得溫飽，遇到了天災水患，離鄉背井，流落街頭，借宿於公共廁所，以草根樹皮充飢還往往難免一死，只剩下一堆悲辛的枯骨。人！生而平等，沒有誰生來就應該是幸運的寵兒，沒有誰生來就應該遭受厄運的宰割。

有知識的人和沒有知識的人比較起來，專就知識而論就已經不平等了，再加上勞動報酬的不平等就更不平等了。

在這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面前，在那些為特權而辯護的老爺學者們面前，那些高談闊論辯証法的先生們裝聾作啞保持緘默，讓那些花言巧語滿天飛舞。

今天當道者正在以“艱苦奮鬥”“勞動光榮”的口號訓戒着農

民、工人和青年学生，鞭策工人农民忘命的劳动，把劳动强度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叫失学的学生参加劳动，但是大多数学生都不甘心参加劳动，其根本原因何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反动的、与资本主义制度并无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践踏着劳动人民。学生不愿参加劳动，并不是他们不懂得劳动的意义，而是他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自发的反抗。这个被反抗的社会制度就是那些幸运的“天之骄子”所引以为荣的“社会主义”。

当人民看到劳动被贱视的本质以后，就隐约的或明显的看出欺骗性的存在，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就在于此。

如果为了消灭矛盾而去隔靴搔痒，那只能进一步的暴露政权的虚伪性。要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必须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来一个根本的变革，来一个彻底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彻底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彻底实现自古以来人民所渴望的平等。

社会平等了，特权消灭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合理化了，大家以举国一致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精力于生产，大家通力合作力求精神与物资的发展，这岂不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吗？

究竟谁反动？历史证明，反动的不是要求平等的人民，而是特权的维护者。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是在平等思想中破产，相反的，平等思想曾给太平军造成深得人心的号召力和不可被战胜的战斗力的，直到太平天国的后期，平等制度受到破坏的时候，太平天国就在特权思想的泛滥中土崩瓦解，最后以失败告终。

如果谁还要强辩，说平等了就没有人做官了，平等了就没有人研究科学了，我们说如果官吏的存在，不但对人民没有好处，反而和历代统治者一样顽固地维持特权，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那么官吏被消灭了岂不大快人心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现在居然有许多这种人：他们成天要那些已经苦不堪言的劳动者勤俭节约，而他们自己却每天每日消耗着高价的生活物资——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如此讨厌，讨厌！

如果說政府人員和其他勞動者一樣是社會分工中所必要的話，那么在平等以後，政府人員的位置決不會空着，如果有人因為占不到便宜就罷官辭職，那么他的“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就暴露無遺了。

是不是平等了之後就沒有人研究科學了呢？是不是就沒有發明創造和技術革新了呢？不，持有這種意見的人，不但不懂得平等並不撒開對於科學發明和技術革新的獎勵，而且他們還污辱了“人”這個光榮稱號。科學事業的從事者並不都是一些為物質利益而奮鬥的功利主義者，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家和創造者，真正為在學術理論文學創作上取得偉大成就的人決不鮮見，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仍然有，並且將越來越多。知識分子一生無所作為，有愧於人民，作出了成績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合理的社會應該建樹一種社會輿論：一個人，尤其是掌握了知識的人，如果在科學藝術上沒有作出自己的成績，這就是人生中的恥辱。——平等的社會，決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停滯不前。任何反平等的言論都是占不住腳的，現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人民的覺醒，如果還有誰想繼續維持特權，叫人民向後看，并用和那騙人的“來生”并無區別的“未來”拖延下去，誰就要最後被消滅。插上了“社會主義”標籤的美麗的未來，屬於全人類，它決不是社會主義者所私有的東西。我們反對歷史以來的、形形色色的統治者、剝削者用“未來”作為誑騙人民的工具。

誰不自動地放棄特權，人民就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消滅特權。

李雨三在全院师生員工 辯論大会上的发言

按：李雨三系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这个材料是根据武汉体育学院所整理的材料选編的。

第一个問題：十五人小組的名单、計劃、綱領是什么？

当同志問我“十五人小組”这个組織的时候，我当时感到非常詫异的。这样的組織我怎能知道呢？又說：“这是欧阳雅老师从北京来信說的”，我这才回忆到过去給欧阳雅写信的内容来，因为欧阳雅、戴士娟两位老师到北京学习去后，都會不只一次来过信，我迄未复信。因为学院党在整风运动中，要求群众大鳴大放，同时又不只一次的有人告訴我，我已被推定为大会主席团之一，因此我在給欧阳和戴老师写信时，順便把鳴放的事告知她們，并說明有意見可直接提，也可由我代放或轉达，大意如此。至对于主席团問題是怎样写的，我已不能想起。这里我想提出一点，即学院鳴放問題，是否在外学习的本院同志不能放？再說，主席团原是在学委会招集教师小組长的會議上推定的，我也并不是組长。后来被取消了，在中型組会上，不是还有人（郭素文）問过为什么取消么？如果“十五人小組”是指主席团說的，至今我連主席团的名单都不曉得，也湊不足十五个人，同时在×处长参加的那次教师大会上，我沒曾表示过任何意見，学委会怎样布置怎样听从。为了搞清楚这一是非，我請求学委会把原信由欧阳处調回来，公告一下，我自己也可以明白一下。

第二个問題：我相信不相信共产党，打了一个（？）問号？

首先我必須声明，我只划了問号沒有点的鈎，这次提出問題，替我加上一个“点”。

这句话是在水上和游戏合組會議上，专就××××改正官僚主义來說的。当时我还开玩笑的說，李浩老师手有力，把这个鈎子搬直它！使这个鈎子变成肯定的符号那就好了，我并没有“共产党”三个字，而这次提出后，又替我加上了。我为什么只划鈎子不加点呢？我的根据是，官僚主义必会脱离群众，这对党的事业上，只有坏处没有一点好处的，因此，我曾向×××不只一次的建議，待人冷冰冰，对誰來說也不好，尤其领导人这样更不好，×××說：“我实际并不冷，但我遇到同志沒有話說。”我到副院长屋里談过，×××来我屋里也談过，并且介紹过其他院校首长干部們种种作法提供×××参考，我对×××的感觉，他在这方面，改进得并不多，他在东湖学习中，曾回来几次，每次遇到他并没有热乎乎的表现，起碼我无此感觉，尤其在他回院办公的第一天，我去他办公室，向他汇报“五一”工作时，表现出帶理不理的神情，当时我感到很突出，过后我也曾向副院长提过意見，我感到副院长官僚主义的架子，越来越大了，我認为副院长他是一院之长，在过去他是唯一的领导人，他應該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群众，把自己結合在群众当中，做群众的朋友，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能这样才能关心群众生活，才能领导群众前进，但是副院长并不这样，因此我才在这次发言中給副院长对于改正官僚主义划上一个鈎子不点“点”。

我的看法：副院长是党员，他是代表党贯彻执行上级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說副院长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副院长提意見，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見，說副院长官僚主义，就是說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党与个人能够这样代表么？因此“問題”中不應該替我加上“共产党”三个字，也不該替我在鈎子下面加上一个“点”，我認为这才是叫做“扩大”！

至于对副院长在官僚主义改正方面表示相信的不够，这只是

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見，同样也不能拿我代表了全国教师或者全院教师，但是，我在提法上是錯的，因被我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员們的特点，——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最进步的，最英勇的，最优秀的，最出色的先鋒队员，是世界上最觉悟，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有正义感的人。并富于組織性和紀律性，他們并且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最容易成为专家的。（具有的特性的原料，在馬列主义的熔爐里，經過認真的加工，并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千錘百炼而成的一种特制品。）光荣的党员們不但能够虛心傾听群众的意見，接受意見，更特殊的改正缺点特别快，变成专家也快，因为他們是能够样样带头，所以一言一行，时时刻刻都在教育着群众。我以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看法，对副院长表示不够相信，这是极其錯誤的，我愿在大家面前，低头認錯，从此改过自新，并向副院长和所有的党员同志们道歉！正由于你們各位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并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对我的錯誤，定会給予原諒的。

第三个問題：共产党如果相信知識分子，把权交下来，什么权？交給誰？

这句话是指着本院个别科室，我发言中并没有提“共产党”三个字，資料汇编上也沒有，七月五日上午×××指出要我記下来的問題中，也沒有这三个字，但这次的問題中，又替我加上了。

先說交什么权？

我所說的交权，是交代理权，例如楊副院长，刘副書記和范主任三位去京开会时，副院长把权交給白森主任，刘副書記权交何人未通知，范主任权交賀科长。我認为無論那位領導，各級領導走开时，可以把权交給任何人，只要这个人領導上認为可以，現在不是把整个学院的領導权由上級出明令交給民主人士——孙院长么，孙院长也是受党領導的。孙院长不仅是知識分子，并且是高級知識分子，我說如果信任知識分子把权交下来，能說上級党把权交錯了么？

再談交給誰？

干部選賢與能，應該適當調整（林詩存在中型組會上之發言），這話是正確的，這屬於積極性的建議，有哪儿不對呢？至於我說中級干部去學習的辦法，真的去，同樣也要把權交下來。因為絕對不可以請楊副院長劉副書記來兼科長或代理科長，也不能把權帶着走。何況各科室都有適當的代理人。例如周殿學同志去學習由任喜德同志代理、任是知識分子。張學鵬同志赴京開會，把權交給黃國佑同志，黃也是知識分子。人事科就可以交權給周雲飛。因為他始終在愉快的工作着，我未聽到老周鬧過不干，周也是知識分子。周如去學習，同樣可以交周玉英同志，周玉英同志也是知識分子。本院知識分子中，什麼人都有，怎麼不能交權下來呢？難道過去交錯了麼？

如擬把權交給教師中之知識分子，教師中有黨員、有團員、有盟員，還有認真負責積極工作的群眾。嚴格的說可以交權給羅偉民、阮立本、黎德仁、陽佩新、陳慶雲、李秀貞等好數位高級知識分子。再說過去教學設備科不是請顏學恕老師代理過科長麼？他當時連盟員都不是，他不也是高級知識分子麼？顏代理得很好，我認為以顏老師的本領，領導上也明白這一點，除人事科外（因為人事科不缺代理人）我認為他干哪一科都可以搞好的，事實都擺在眼前，只要領導上信任，交權給誰都可以。假如說過去交權交錯了，交不得，根據“有錯必糾”的指示，那麼首先應該請孫院長不必再來了，范主任早該撤換。況且中級干部需要學習的話，可以在本院組織學習，或者在職學習，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因此我認為我在想法上並不錯！

第四個問題：不推翻共產黨，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出路？

這一句話，大字報上最初是說李雨三和范宗先一起走路時說的，並且是在下班的時候，經我說明之後，第二天就改說是我自己在走路時說的，並且是個人私話。現在我要求醫務檢查，是否我有神經病？一個人自己走路，邊走邊說，竟能說出這種該死的

話來，沒有神經病的人能這樣么？我堅決否認。

再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並有了自己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黨，早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生活中的決定因素。沒有它就不行，由於黨英明的正確領導，在短短幾年之中，已經有很多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們的史冊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每個人早已認識到光明的前途了，我在舊社會受到痛苦最多，我在新社會得到很多的自由和幸福，在貫徹知識分子政策中，我並且得到過許多優待，因此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中國共產黨。不可以因為我對於一個黨員或幾個黨員表示相信不夠，或者有些意見，就說我反黨。我是衷心擁護黨、靠攏黨的，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所指“不推翻共產黨，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出路”的話，誰有勇氣說的，就請他來承認吧！我沒說，我不能承認，並且我堅決否認，我堅決否認！

第五個問題：共產黨前途暗淡哪一黨前途光明？

我在發言之中只提“前途暗淡”四個字，上面沒有“共產黨”三個字，同時我是在搬用“離心離德”四個字之後，又接着搬用“前途暗淡”四個字的，都是搬用成語，絕非我自己創造，這個問題不能單獨來談，並下面問題中來談，現在我就談下面的問題：

第六個問題：離心離德前途暗淡。

這次犯了錯誤，這兩句都是報紙上的。

我的原意，是從黨員幹部鬧不幹，青老教師鬧走才提出的。中級幹部多數鬧不幹，最初我是聽范主任說的，他並且在全體會上也提出來了，教師中有鬧走的，是教研組長向范主任匯報工作中聽到的，都是那些人，范主任可能還記得，也不一定，因為時間已久。再一次，任司長來院作報告時公開宣布的，這裡應該聲明，任司長來並未找我談話。以後，教務處組中心發言人（蕭學博）說：“白森主任，朱青山科長，田國安科長，張學鵬團委書記，這些人都鬧不幹，不安於本院工作，賀國干科長鬧不幹了多年。”田

徑大組中心的發言人（石壽曾）說：“本院同志多是离心离德的”，又說：“不仅老师，干部也如此。”他們二人的发言是代表了多少老师！陈有源老师在水上游戏、球类和学科大組会上說：“中級干部連副院长的話都不服从”等等，这都是有紀錄可查对的，难道說这都不是事实么，这都是李雨三捏造的么？

就老教师說，从旧社会里来，不知帶來了几多肮脏的东西，但是，党仍然付給你們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又怎能“毒害青年”呢？又怎能不懂装懂呢？（教务科通报章瑞麟老师教学是毒害青年，章老师在教授座談会上曾提出早就想走，大字报批評我是不懂装懂，我也鬧走，并載記錄中）別位尚不清楚。就大体說，鬧走都是不應該的，但是，一个毒害青年，一个不懂装懂，同意他俩走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們仍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对体育专业思想又是巩固的，何况調动工作地点，不是常事么？并不希罕。

就青年教师說，你們都是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有的人連中学都是新社会的中学毕业的，党对你們費尽多少心血？党对你們寄予多大的希望？不是公費，就是津貼补助，毕业后又不叫你們自己去找工作，还照顧一定的志愿，寒暑假又不必担心被辞失业，連你們去工作崗位的車船票行李票都替你們安排的妥妥当当，到达目的地又不須自己到处找房子住，去时有人欢送，到时有人欢迎，如此等等，試問鬧走的老师們，你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这岂不是怪事么？老年教师在旧社会未曾受得共产党員的教育，我認为尚且情有可原，而青年教师就大大不然了，想走的青年教师，真的昧着良心去干么？

再就党員干部來說，你們是先鋒隊員，你們在过去为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你們为人民群众的生存，什么牺牲都是在所不惜，甚至于个人的生命，你們是最光荣的人，你們是人們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你們不是时刻在教育着我們安心搞好工作，教育学生服从組織分配么？据說鬧不干的已非一月了，这能說对么？为了以

后更好的领导群众和教育群众，我請求鬧不干的几位黨員干部再不要鬧不干，可以嗎？

通过上述的情况，教师要走的大有人在，而中級黨員干部鬧不干竟占多数，同志們，同學們，我們就事論事，象这样如成事实，能說我院前途光明么？事实上，几个人不干，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上級党会另派賢能来的，誰也不能对党要挟，何况你没有什么理由来要挟呢？

我通过大家的帮助，認識到錯誤，从今后再不鬧走，不把学院搞好，誰也不能走，誰也不能鬧不干。

第七个問題：在鳴放中扩大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企图何在？

官僚主义是一种剝削階級思想作风在党內的反映。它是資产的階級腐蝕我們的温床，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不是反对一般坏作风的問題，而是一个政治原則的問題。是一个划清剝削階級思想作风和无产階級思想作风的階級界綫問題。党之所以要坚决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因为‘它給党和国家、人民所造成的損失，确实很大。不可否認的，官僚主义在本院某些地方仍然存在，虽已通过几次整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并未根除，損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事件仍然存在，所以党中央提出对官僚主义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并且这次整风中特別邀請党外人士帮助。

反对官僚主义的办法，不外乎充分发揚民主，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通过群众路綫，認真而深入的檢查工作，整頓机构，健全制度，精簡人事，克服忙閑不均現象，以及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紀律，和加强党内外群众的思想教育等等。

克服官僚主义，既然要通过群众路綫，充分发揚民主并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党又特別邀請党外人士协助克服官僚主义，这是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多么严肃負責的态度？党对人民既然如此，人民群众对党能够不負責么？人民群众肯提出意見，这正是对党負責，对个别黨員同志的热爱，因此不管是自己觉察到的，遇到的，以及別人說的，都应打消顧慮毫不保留的提供领导上参考，

这才对头。至于意見提的多或少，那是不成問題的，領導上分析研究，自会有則改之无則加勉，不可以理解为对个别領導人、对个别黨員或几位黨員同志多提些意見，态度又不够好，就叫做向党进攻，甚而叫做反党。我基于这样的認識，所以我不仅把自己覺察到的，遇到的，看到的，別人說的，新的以及旧的，全部呈上外，并且写信給欧阳雅戴士娟老师，而在了解游戏問題的同时又談談有关鳴放問題，以便从多方面可帮助領導克服官僚主义，这不能理解为到处放火（一共才两处），因为領導上的官僚主义克服掉，我們的学院就办好了。这就是我的企图。改不改官僚主义在領導，提不提意見在群众。我的意見是提了，缺乏事前的仔細考虑和分析。在方式、态度上，均未注意。有則有，无則无，把領導上的官僚主义扩大或夸大，对領導來說，都是絲毫无損的，因为領導时刻在为人民利益着想，又是时时刻刻教育着群众之人，他絕不会把提意見的人，当作坏人，不提意見的才是好人。这次整风运动中領導上叫我們提意見，是提領導上的官僚主义，不是叫我們专提优点，因此专提缺点，不等于否定了优点，因为这两种东西，都是客观存在，誰也掩盖不了，誰也抹杀不了的。我当时提出的意見，在情緒上确实不够正常，因而在效果上成为对黨員的恶言攻击了，但是，我想領導上会实事求是对待这个問題。

第八个問題：你承認是右派分子的帮凶，作了誰的帮凶？
做了哪些帮凶的事？

在我准备发言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有該打倒的右派分子。

我的发言之所以有某些部分是屬於右派的言論，是因为有了右派分子出現，并經過大家帮着分析之后，我才明白的。如果没有右派分子，即使有，他們不做有計劃的反动活动，我也檢查不出我的发言中会有某些部分是屬於右派言論的。通过反复的分析批判，我才認識到发言中某些部分屬於右派的言論，无意中成为右派的俘虏，成为右派的帮凶，就因我发言中的某些部分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有不謀而同之处。这都是道听途說、人云亦云、引用

成語、過甚其詞的結果。因為右派分子是反黨的、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言論是反動的，我的某些部分的發言既然屬於右派分子的言論，當然就變成反動言論了。但是我並未反黨，更未做到反黨的工作。我是擁護黨的，因此我不承認我是右派分子。

（我這樣的發言，大家仍會不夠滿意的。是不是要我承認：“不推翻共產黨，知識分子沒有出路”是我說的。“十五人小組”是我組織的，“取消黨委制”開過會並且是我主持的，這樣，才能滿意呢？）

是就是，非就非。實事求是，任何意見與批評，我都考慮。我承認說錯了，並且早已認錯。我今天當大家面前，再一次的認錯。

這次反右派分子運動，對我進一步的思想改造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我再一次衷心的要求，要求大家大力的幫助，使我对大是大非得到更好更多的教益，使我在認識上得到提高，從而糾正我的糊塗思想，使我的無產階級立場得以鞏固下來，以免將來再犯錯誤，以便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感激大家的挽救，我想大家也是愉快的。最後我要高呼：

打倒右派分子！

黨委制不能退出學校！

毛主席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封章諫：自我檢查

按：封章諫系华中师范学院学生，这个材料，是根据华中师范学院“学习快报”材料选編的。

写在前面

(一) 我的思想是被認為“落后和反动的”。有些人日夜追逐我之“反动言論”，不惜东拼西凑，甚至无中生有，歪曲伪造侮辱。为了便于同學們分析和帮助，也免于某些人的辛苦，特将我向来对某些問題的看法公之于众。

(二) 欢迎具有高見的先生們帮我分析，批判交談，交換認識，以求真理，但决不接受摆弄，大力的批判者胡砍乱斬。

(三) 欢迎記者訪問，乐意回答我認為值得回答的問題。

(四) 本人住四幢一樓一号。

(1) 肃反时被批判的言論

1. 思想：

“思想是存在的反映，是人腦的产物。存在是客观的，大腦是人人具备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有思想。

“思想是屬於每个人的，它不应由別人的腦中盲目搬来，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硬塞入別人的腦袋。”

2. 自由：

“人，应当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的劳动創造，也可以自由的思想，但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妨碍別人。”

* * *

“严格說来，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因为必须受自然规律的约束，比如說即使你飞到天空，也摆脱不了地心引力。”

3. 党、社会发展：

“党就是社会上的政治集团，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实现其政治主张。”

* * *

“可能有这样的党，它不拥护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

* * *

“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不見得就是反革命。”

* * *

“共产党不一定是最好的党，共产主义也不会是最终的社会。就发展的观点来看，更好的党是可能出现的。也决不会停留于共产主义阶段。”

* * *

“一切流血斗争都是残酷的，应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2) 对肃反的看法

1. 肃反采取了法西斯手段和思想狡辩等；……
2. 许多斗争是无根据的大胆怀疑的结果；
3. 到处私设监狱法庭，是过去少有的。这污辱了祖国光荣的历史。

4. 肃反的错误应由中央负责，因为风是从那处刮出来的，群众是它发动的，做法是它指示的，把错误归于群众和下级干部是不公平的。

(3) 对社会生活问题的认识

1. 国家对农业发展关心不够。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发展重工业，但是我国是以农为主的国家，工业应当注意提高

农业生产技术，如我国目前能制造飞机，却不能生产拖拉机，是令人遗憾的。

2. 军队太多，浪费了劳动力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和平时期，要如此之多的军队，是令人不解的。这实在大大地超出了巩固国防所需的实力。如果要发动战争，这又与我国民族性格不相容，我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3. 干部太多，这不但支付了不少财富，而且由于机构庞大，重重迭迭，妨碍生产。

4. 搞运动和开会太多，浪费了生产者的时间，对生产是一种不小的损失。过多的运动破坏了生活的安宁，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紧张，近年来神经病患者激增是值得注意的。

5. 社会主义高潮是某些领导人脑中的产物，客观实际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国不分地区不看条件地推入社会主义。目前的许多困难（特别是农民问题）是与这种主观主义有关的。

6. 农业合作化有两大好处：

① 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工业（建设社会主义）；

② 训练农民的組織性、紀律性，有利于战争（保卫社会主义）。

7. 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之不合理的现象：

① 政府收取过多的利润，使工业品价格提高。

② 各种商品貿易机构太多，层层取利，使商品流通与价格的合理性不得保证。

③ 工人的工资不合理，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就相当于农民一年。难道其劳动价值竟相差如此之甚？照我看来，支付工资高于产品，自然要贵些；所谓劳动价值是需要研究的。

④ 过分强调工农生活环境是不恰当的。现在的农民生活所需除粮食菜类是自给之外，那样不是城市的商品。强调生活环境，实际上是说：“农民，生活得该差些”而已。

8. 我国存在着强迫劳动的形式吗？

这个问题我尚未得其解，我提出这怀疑是这样来的：

本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組織第十四届大会上研究和通过“关于取消强迫劳动形式的公約”其全文如下：①作为政治上的强制或教育手段或作为惩罚的手段来对付持有或表示反对现有社会政治或經濟制度的政治見解或思想意識的人；②作为动员和利用工人的劳动来发展經濟的一种方法；③作为维护劳动紀律的一种手段；④作为处罚罢工者的一种手段；⑤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方面的歧視的一种手段。均为强迫劳动，应取消。

(4)对“鳴放”运动的感想

1.不放則不鳴，放則鳴，表示人們的思想已到僵化程度，思想言論被控制了，这真是对思想言論自由的莫大嘲笑。

2.不少人由于思想僵化脑筋不灵活或由于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对事物真相缺乏了解，往往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这对于国家民族都是很危险的，我們应急不及待的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增进知識，允許人們思想自由鼓励独立思考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办法：

3.思想問題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能只靠群众运动解决的，借助于命令或群众运动，都不是充分依靠群众的表现，只能說是领导缺乏自信与无能，和不負責任。

4.人非机器也，所以想控制人是做不到的事，要想控制人的思想更是荒唐，思想是存在于人腦的反映，要解决思想問題应从存在及各人的具体情况着手，企图用暴力控制別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这种所謂控制思想，不如去摧毁作为存在的物質世界和砍掉产生思想的脑袋好了。

(5)对国际一些問題的見解

1.世界的緊張局势是双方造成的：

①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的論調：a社：“帝国主义(即

資本主义)存在一天, 战争就不能避免,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国防”;“第一次大战出现了苏联, 第二次大战打出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第三……”。b. 資:“共产主义威胁着自由世界, 为了安全, 为了防止进攻, 必须加强实力”;“共产世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必须解放他们!”。資社(合):“和平要以强大的物质力量(实力)为基础。”

结果是导致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把人民一步步的拖到战争的边缘。

②打着和平的旗进行挑撥性的恶意宣傳, 使地球的領地陷于不可耦合的分裂, 人民的思想趋于可怕的敌对。

③制造假象形成紧张空气, 利用人民和平的热望准备战争。

④緩和局势以取得真正的和平应该是讓各国人民互相了解。讓他們互相交往, 自由通訊, 取消一切顛复性的活动, 这是任何具有和平誠意的政府所該做的事。

2. 現代帝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出現, 新型帝国主义是以思想奴化为主的。

3. 苏共20次大会宣布了共产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

4. 波匈事件揭露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經濟上、政治上都有严重的矛盾, 苏联除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外, 对波兰的煤, 匈牙利的铀也是很感兴趣的。

刘清源：看看党员

按：刘清源系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人员。

解放八年了，一些党员的言行却仍是老一套，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和谁谈生活问题时，老是说：“艰苦点，在过去革命的时候，我们比你还困难得多哩！”要是和谁谈思想问题，就是两句话：“要不断地提高觉悟，靠搞组织。”和谁谈一些个人问题时，就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为人民服务嘛！”如果看到谁有意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认定别人是对党不满，政治上有疑问。说不服别人就乱扣帽子，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说是“封建残余思想”。对人缺乏客观的估计和应有的信任。但是，他们自己却是个人利益第一，对于住房、生活福利费等等要与与众不同，连买个馒头都要拣大的。这些党员可说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相加的总和。很显然，他们已经落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后面了！

不懂硬装懂，外行充内行——一些党员一窍不通，却装出一副博士相。光要求别人提高政治觉悟，自己对于“八大”、“再论”反而不认真学习，连“候补党员”改为“预备党员”也搞不清楚，对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本质区别也不甚明白。许多党员常被“功劳归于共产党”这句话冲昏了头脑，说：“功劳归于共产党，那么也有我一分。”于是骄傲自满了。一些刚提升了的党员，就高视阔步地瞧不起群众，既忘了从群众中来，更忘了到群众中去。不少党员的文化低、知识浅，却又不努力学习；在夜校上课时，往往不是嘻嘻笑笑，就是谈天睡觉，有的甚至无故缺席或迟到。但是，我们国家正是在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是“技术决定一切”

(斯大林)的时候了，光是一些空洞的“主义”，沒有高度发展的科学知識，是根本建設不成社会主义的。列宁同志說过：“共产主义是苏維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难道一脑子的“主义”能使全国电气化嗎？我奉劝这些党员踏踏实实地学习，赶快带头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能設想只要一千二百万党员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象上述的那些党员，再多也无济于事。毛主席說得好：“虚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以为，驕傲自滿的党员一錢不值。难怪有人說，党中央和毛主席是英明偉大的，就是某些党的基层組織的一些党员反而不如群众，实在令人厌恶。我同意“党员也有坏材料制成的”（王任重）这句话。

在鳴放开始的时候，不少党员反常的縮手縮脚，躲躲閃閃，这与党的领导人也有极大的关系。韓温甫副院长曾在几次会上說：“这是新的运动，党员很难表示态度，很难带头。”請問：党中央的整风指示是怎样說的？党员不带头誰带头？党内的一些可以鳴放的事情，誰还比党员更清楚？党员李必成粗暴地压制群众鳴放，很久以来，党支部在群众的憤怒下，直到前几天才讓李必成写了一个所謂檢討書，态度十分不誠懇，強調他“思想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而党也不表示态度。又請問：这一些和党的领导所說的“你們大大的放，不要顧慮，我們絕不报复，誠懇地接受批評”这些话有无抵触？但是党的领导人却口口声声說“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真的嗎？我說現在还放得很不够，群众还是有顧慮，有的顧慮还是在运动中新产生的。同时，领导边放边改也作得不深入、不全面。然而，韓温甫副院长說下星期(17日)要开始鳴了。我看放还没有充分放够，就开始鳴，鳴什么？鳴得起来？希望党多加考虑，也希望党员同志积极带头鳴放，拿出往常的积极性来。真金不怕火炼，“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斯大林），就要經得起考驗，任何得过且过的作法都是行不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活动，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过程。現在的整风运动比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有利得多了，人民群众可以大力帮助党整风。

胡善恒：牆壁問題

按：胡善恒系中南財經學院財政信貸系教授。

現在一般人談到黨與非黨之間關係，就說這裡有一道牆壁存在，非黨方面這樣談，黨也是這樣談，都說牆壁是有的，是客觀的存在，這道牆壁要不得，應該取消，各方面的意見是一致的了。

在我們學院里也認為牆壁不好，有人說這是一道無形的牆，應該努力把這道牆推倒。究竟這道牆壁是不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或是眾志成城地把它推倒呢？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但是事情恐怕未必是說得那樣容易罷？

牆壁有各種多樣，有的是紙糊篾扎，一拉就倒，有的是銅牆鐵壁，則不是一推可倒的。如果是“萬仞高牆”，“萬里長城”那就更不是可以推倒的了。現在黨與非黨的隔牆有多麼長，多麼厚呢？我們可以从一些事實來衡量。現在黨員有1 200萬人，團員有2 300萬人，而中國人口有6億人，那麼這道牆壁是存在於6億人口之間，是個很重大、很複雜的問題，而不是乍看起來那樣的簡單。按照存在決定意識來說，人人在思想上都會有道牆壁，這種思想還會不斷發展的，往後人民之間的隔閡也必是時間愈久，隔閡愈深。

我們再說牆的深度。過去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長期間受反動統治的迫害和壓制，不能公開活動，於是數十年間養成了秘密活動的習慣，若非如此，即難存在，這是事實。同時正由於有保持機密行動的習慣，黨的組織力量才能够發展得很大很強，也能够在革命事業進行中，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這種嚴守機密的習慣曾經是黨員的一項必需的鍛煉，已經深入人心，因而黨員

走到那里牆就設在那里，非党的人走到那里，那里就不免要“碰壁”，有些人知道牆壁是无法可碰的，于是只好“到此止步”望望而去之。現在的形势不同了，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全国人民已經表明过态度，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一致拥护毛主席，接受党的领导。在全国这样的情势下，大家都了解用不着設牆壁。然而由于过去数十年認為是好的习惯，解放后又获得很大的发展，党员們站在牆内，又确实享受过一些不同的待遇，現在要把这道万仞高牆推倒，那就不是容易办到的了。

牆是肯定的要拆掉的了。不拆就会妨碍人民的事业。牆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牆容易看出，无形的牆，就需要搜索、发掘。现在拆牆已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需要大家动手。凡是能够多多指出牆壁、发掘牆根的人們，便是社会主义建設的优良工作者。

王圣麟：一点“謬論”

按：王圣麟系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201班学生；这个材料摘自华中师范学院“学习快报”。

其所以說是“謬論”，則是因为下面話对党利益有損害，故按共产党的意义（所謂語言階級性）曰“謬論”。

目前我国是共产党在专政，这是肯定的，至于硬要說成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就讓他去說吧！反正就是那样，反正語言有階級性。

我国几年来在这种制度下，誰也不可否認确实国家富强起来了，真是“国家建設一日千里，国际地位直綫上升”，这是成績，也是主要的。

但是也有一个不可忽視的一面，我国内部存在很多問題，“三害”越来越重了，党联系群众也越来越坏了（这里不談到几年来的共产党的策略措施——象三反、五反、肃反的正确性与否），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实，在这事实面前，共产党怎么說呢？“經驗不足所致”，此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我認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否則越来越減輕了，党群也应更密切了。有人說：“过去的任何制度都存在三大主义（三害），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也可）則最能克服它。”这好象是說“三害”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而是外人引起来的，而共产党专政来克服它。如果話的原意真是这样，則完全錯了。“三害”，尤其是宗派主义，外人是不会带进来的。如果硬要使这句话正确，仅能理解为过去制度是“三害”的“源头”，共产党专政是小(?)的源头，更不能說共产党专政是三害的沟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这个制度的具体情况（我們不能按着書本上所講的无产階級專政的意義去理解，書本終究是書本）。我完全同意儲安平の“黨天下”意見，事實上，不管大小机关、科或組要用一个共產黨員（系科或組可能用親信的團員）做頭目，即或有非黨員担任，也是有職无权的。固然虽有政权，但黨組織职权都能超过的，因此这样的非黨員同志，无非是一个扩音器的工具，这种黨天下正是“三害”的源头，“黨群”关系变坏的因素。

这些话不一定是屬反对共产党專政，因为这里沒有指出是否有另一种政权形式比它高明一下，如果真的有話，我是贊成用这种形式来代替它，至于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倒还是一个可以深思的问题，虽然我現在不能表明（材料不足）对它的态度，但是我同意把这类问题当做一种社会科学的问题，讓社会科学家討論研究，得出結論，不能什么共产党的意見怎样就怎样。自然問題能够这样，社会問題为什么不行呢？

我也同意“照明彈”社的大胆怀疑，但其怀疑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怀疑之后，我們要用新的事实材料得出新的結論来，也就是說对于过去的結論（是否大家接受，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要做重新估价，因为新的事实可能推翻过去的旧結論（这样的例子在科学領域上屡見不鮮）。

最后，还想接触到与这有联系的一些具体问题。

* * *

宣傳机构的作用：近来愈来愈感觉到我国的大部分报纸是沒有發揮自己的作用的，我很怀疑报纸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现实，如現在的所謂反对右派言論的宣傳，我們每天从报纸上确实看到了很多反右派言論的文章，使一些人看到（沒有主观的人）好象大家都在反对一样，其实值得怀疑的。

写这样文章的人是些什么人，又有几个？写反面意見的文章登了几何？这不难理解，宣傳机构掌握在誰手里，就为誰服务，它可以作为掩盖事物真相的工具，可以把自己所欢迎的东西，加

以吹嘘；相反的东西加以压抑。

* * *

关于对語言的理解，对毛澤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講話”，最近有人在作文章說些文艺工作者由于錯誤理解論点，使得許多文艺事业遭到很大的損失，最后他指出应该怎样理解相反的，如对流沙河的“草木篇”，这些閣下們要按着另一方式解說他有变天思想，这里暫且不談它的正确性，不过却使我得出一点教益，大人物說話越抽象灵活，使人模稜两可就越好；而对于小人物却越坏，他們應該說得具体明确才行。

* * *

錯誤的宣傳方法：我記得心理学上好象有个这样結論：要儿童热爱（或討厭）某件事物，要把这种事物与过去他已經是热爱（或討厭）的事物联系起来，将会收效很大。这一点，共产党及其宣傳机构可能理解得很深，如共产党专政硬要說成是无产階級专政，要求入党入团就是进步，什么道德美……腐朽资本主义……等等。对于所欢迎的事物，就加上一些好听的詞汇上去；不欢迎的，則恰恰相反。

* * *

成績是主要的，現在往往作为一些人来判断事实好坏标准了。現在不是有人說这几年来我国成績是主要的，就說共产党是好嗎？这种判別标准是不对的，我們判断事物的好坏标准应当是在实现該事物的具体条件下，有所可能实现的事物中是否它是在优缺点比較起来是最好的。

* * *

我記得毛澤东同志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一文，在很多自然科学的学术刊物上刊载过了，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最后，談一談我的动机，我并不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还是一个年輕的学生而已，我之所以說这上面的一些話，只是为了能够使人們及自己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幸福，不是滿足于现状，

我是非常拥护能够使人民得到最大限度的幸福的制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幸福不要那么狭隘（注——王圣麟就是这样写的）理解，这一点大家会相信的。

我这些意见是很欢迎大家批评的，但是希望不要在沒有充分事实根据，就乱戴几个帽子，干叫几句，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理的，最多也只是笑一笑而已！

（抄自6.25.南湖大字报，对若干错白字作了改正。）

前哨(楊林): 无名小卒十八問

按: 楊林系中南美专三年級学生, 这里是他写在墙报上的一稿稿子。

亲爱的公民們: 当你們看到此問題的提出时, 可能很为惊疑, 認为我是个“反党分子”, 請放心, 我們的共同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一致的, 但也不必諱言, 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主張我不是无条件拥护服从, 对他的正确的对国計民生有利的政策我坚决拥护, 并愿为他的实现而献身, 对于一些我認为是錯誤的, 我也应提出来反对, 我認为只有如此, 他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真正公民, 也只有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建設得好。

下边这些問題, 本来是向共产党中央負責人提出, 請求賜教的, 現为了广大公民都能对此問題加以注意, 并发表意見, 特公布于此, 是“鮮花”是“毒草”愿受社会人士审判。

(1) 中国共产党是屬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屬於中国共产党的?

(2) 中国共产党是否要把将来的中国人民变成清一色的共产党人?

(3) 今日中国各大小机关, 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 多由共产党人来充任, 我認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創造的一党专政的基础, 你的意見如何?

(4) 一个中国公民誕生以后, 到九岁加入少先队, 到十八岁加入青年团, 到二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否則此人便是落后分子, 或其他类份。这种社会輿論是否正确?

(5) 就上題情况, 請問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党派向何处

吸收成員？民主黨派的壽命是否應該終結？

(6) 根據第四題問所述情況，中國民主黨派只能吸收中國共產黨認為“落后”而拒于黨外的或中國共產黨所開除出黨外的，這樣下去，中國共產黨怎麼能夠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呢？

(7) 在今日中國，凡提到“黨”“我們的黨”都知是指中國共產黨，這樣簡稱無形中把中國其他民主黨派都搆掉了，以至使中外很多人士不知中國還有其他黨，這種排他性的簡稱，所造成的後果應由誰負責？

(8) 中國共產黨每次代表大會都有公報發表於世，而中國還有民盟、民建、民進、民革、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他們為什麼沒有會議公報？是他們不曾開過會討論過國家大事嗎？

(9) 中國向外國派遣的留學生，多是共產黨員，這是否意味着高深的文化知識只能由共產黨人掌握而其他人不能也不應該掌握？這與憲法第九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不是有矛盾嗎？

(10) 在今日及以後的中國，評論一個人的進步與否，是以他無黨証而定，還是以他為祖國建設所作的貢獻的大小而定？

(11) 假設有一種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祖國，願為她的建設貢獻一切，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某些政策、主張是好的，願幫她實現，但也有他不贊成的政策主張，提出反對，這是否是革命隊伍中的“動搖分子”？

(12) 中國共產黨提出要培養“德才兼備”的幹部，這“德才兼備”的“德”字的內容是否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証？

(13) “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青年團員的稱號是光榮的”，這兩種說法是否有科學根據？請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上的實例求証之！

(14) 在封建主義的中國的大小官員是分封而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的某些官員是委任而來，二者何別？

(15) 中国共产党外的人士有了錯，可以“整”“斗”，而其党内人在犯錯以后在内部秘密批評，其根据何在？这样做能否提高党的威信？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十九条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决定或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在肃反运动中，有很多所謂“可疑”的公民未經法院、檢察院批准而受囚禁，这是違反宪法的事，中国共产党对此事如何視而不見？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中国报纸杂志除少数为民主党派掌握外，多被共产党人掌握，报刊不能自由发表不同言論，至于游行、示威也只能对敌，不能对中国政府，很多首长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反对大民主”，我認为这与宪法精神不合，您的意見如何？

(18) 十八世紀英国产业革命是从“使农民破产”开始的，而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后，城市与乡村經濟情况悬殊，农产品价低，两者有何不同？

凌曉光的右派言論

按：凌曉光系省服務廳烟酒處工作人員。

一、凌曉光在6月14日的發言

(一) 原先我無顧慮，現在有了懷疑，為什麼呢？從“不平則鳴”說：我黨群之間有各種各樣的“牆”，有重重的“牆”，有更高大的“牆”，過去說“當家三年狗也嫌”，何況黨領導臨近九年（當然狗也嫌）。未必沒有矛盾和缺點嗎？我不相信！必須要大家動手拆“牆”填“溝”。過去大家習慣用“狂風暴雨”現在是“和風細雨”，不習慣這種說法，我認為是錯誤的，陳處長報告說：大家希望“放”的時候到了，這中間我有懷疑，我要問這是什麼態度？還是滿足大家要“放”呢？還是要幫助黨“整風”呢？因此我有懷疑。前天小付同志說曾與陳科長開句玩笑說：人事科出來的都是“痞子”，結果來個三查，引起我“不寒而栗”。陳科長身為人事科長，對幹部不了解，心中無數，“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這樣一來，我為小付同志“庆幸”如果是個出身不好的人，就會扣上什麼地主出身呀！什麼仇視共產黨呀！妄想資本主義呀！的帽子。其目的我不理解，我為這些問題“顧慮”“不安”，經過了許多改變（指鎮反、肅反、土改等）還是這樣對待同志，以一成不變的歷史眼光來對待自己的同志，為此我很“憤恨”我出身於工商業兼地主的人，不得不考慮。如果小付問題發生在我身上，恐怕要進行六查，同時我憤恨我自己不會投胎，為什麼不投身於工人家庭。

(二) 我不能沉默，我要為“蚌兵蟹將”抱不平，我出身不好，

又怎样不怕呢？不是“懶蛤蟆，打呵欠”，但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可是“不平則鳴”，我还是要“放”，與其說，不如不說，我要求在座的同志為我作証，我並不是拉攏落后。譚惠芳在漢口站有一載相處，李允瑾其名不知，不是這次發言不曉得，說明我凌曉光在專賣公司一直是沉默的寡言的，但我為李允瑾、譚惠芳也流下了同情淚。

我對公司黨組織不信任（有些是好的），有不少的黨員是賢明正直、鐵面无私的，“作風恶劣的”，“盛氣凌人”壓制民主的，起麻煩作用的大有人在。不能完全不相信，起碼說不敢太過於信任。

（三）我們機關內部存在什麼矛盾呢？我未調查以前不能“捕風捉影”，現僅就我所見所聞談一下：

1. 漢口站×××同志，武斷專橫、壓制民主、還有侵犯人權。

2. 工資制度“按勞取酬”不符實際，不是用人唯“才”，是用人唯“皇親國戚”，使用幹部凭嘴、會拍會吹的人。我這些人愛說，簡直是“廁所的板子”——又臭又硬，吃了虧。

（四）×處長領導作風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不深入人間苦疾，“飽人不知餓人飢”，領導眼光是勢利的，看大不看小，把人不放在眼下，由於他是一帆風順爬起的，“飽人不知餓人飢”。一向對我看法不好，為什麼要冷眼旁觀呢？落井下石嗎？不談話呢？他對知識分子輕視的，排斥的，黨員胳膊粗，有娘兒，黨對无娘兒無處傾訴，“落井下石”的踩知識分子。在這裡介紹一首詩“三變”（文中的“她”，指×××同志）：

有事找她談，臉譜有三變，對人不對事，不信你且聽。

群眾找她談，鼻子來答言，哄！哄！哄！又來找麻煩。

同事找她談，搖頭把氣嘆，哼！哼！哼！我可無法辦。

領導找她談，連聲把頭點，是！是！是！我一定遵照辦。

這詩在專賣公司太恰當不過了，在這裡，我要用這首詩來概括：詩曰：

君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百口难声辩，含泪且低头。

领导上层好，中层领导少，下层干部乱搞。

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学习，我是完成任务了的，别人开知识分子座谈，专卖公司没有知识分子吗？我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居，但我以高级知识分子后备军自居，不能以高级知识分子后备军自居，以中级知识分子自居，不能以中级知识分子自居，以小知识分子自居。我看是没有知识分子一样。

在机关中有的党员“功臣自居”、“骄傲自满”，因而产生了特权思想，如陈处长一人住三间大房子，这说明官大房子多，秘书科看人对待。解放多年来，直到现在，还有原则干部，是“赶面棍吹火，一窍不通”，一两年还可以原谅，还是与众不同，有特殊照顾，有特权。干部不懂业务当科长，“两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占到个茅厕不掏粪，这是用人唯“才”吗？这情况表现在党内，我实在不平！实在不平！（大声）。我说专卖公司知识分子的潜力未挖出来，专卖公司的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失败了，是人事工作的一个漏洞。

×××是抱娃娃的科长，不懂物价而搞物价，说明他是个党员。人事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干部最少提一级，他们都是三头六臂吗？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工作七年一级不提，我提半级，或者少一点，只要一颗粒胡椒顺口气吧。就是当学徒也只三年出师，我不是争，而是生活不能解决，真是气死人，人事工作做的如何，要我搞，我搞的不比他们好，到茅厕里死了它，这样说话，有些刺人，说了收不回，但我要为“虾兵蟹将”抱不平。一个大学生就这样背时到极点，我在学校里不是说红的发紫，也是淡红色，可是我呢？……自那次以后，不要补助，要有骨气，只有稀饭我就喝稀饭，当然“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什么革命大家庭、新社会，我看与旧社会一样，仅是孙悟空翻了一个跟头，归根结底，我的生活不能解决，叫我如何工作，别人在登峰造极……，我在省专卖公司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我申请转业，去当教员，闭着眼也

摸47元，我愿作人民教师，清高一些，免得看到这些事嘔气，脹不过，我看这是不是存在决定意識呢？我要求上級可怜我，把我調走，免得嘔气，我呼吁。我要求有正义感的同志們，包括少数黨員同志們，鉄面无私的同志們，你們要支持我。

再一种是把入党当着“鯉魚登龍門”，“身价百倍”，入党以后可以盛气凌人，可以先得提拔，有些同志一哄而入喇，提拔控制数，先提党、团员，多余数字給群众，一句話，党内宗派主义严重，对党外知識分子单纯使用不管，死也好，活也好，不聞不問，我看雇佣观点是有的。人情面子还有沒有呢？从关系上有“皇亲国戚”朝里无人不当官。

另外向全党提点意見：即工資待遇不合理，級別越大，差額越大，干部越大越肥，越是海海越高，“虾兵蟹将”是屋檐沟下滴点水，共产党是吃苦在前，功劳在后，我認为这是一句空口說白話，还是肥的肥，瘦的瘦，这样长期下去，会引起新的貧富不均現象，說什么新社会“老年人越活越年輕”，我为什么是：未老先衰，其原因呢？

我的話，語重心誠，作为党整风参考。

二、凌曉光貼出的大字报

“群众哭凄切切，含怨忍泪，語不成声，充言难解心头結；
党员笑喜洋洋，快乐逍遙，装聾作哑，一直穩坐釣魚台！”

附注：这究竟是算副喜联还是副挽联？讓党内賢明、正直、大公无私的党员同志們，以及党外一切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同志們来共同回答这个問題。如果有人确要問我，我的回答很简单——假如烟酒处党内整风不是在虛应故事，空走过場，就請党内也要多少端正一下态度和群众一样积极投入运动，至少也希望不要老是在群众后面要群众拚命地拖，自己还躺着不起来，能这样，那么所写的就是一副喜联，否則干脆那我所写的就是一副挽联，我要

为烟酒处的党内整风致哀，我也为党内的无娘儿——党外的知识分子和党外的群众，洒下更多的伤心泪（重点原作加的）。

一个被烟酒处党内遗忘的高級知识分子的后备軍(?)6.15”

（凌曉光另一次貼出了上述同样的对联，并作了下面的附注）

“附注：听说有几位党员同志看了墙报以后满不在乎地竟对来自党外的意見付之以輕蔑地一笑，我感到很遺憾。这次党内整风既然是欢迎党外人士参加，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意見，早已提出了一大堆。从党内來說，对党外意見，好象充耳无聞，毫不理会，这也无怪乎某些党员先生們过去歧視群众，今天也仍然在歧視群众啊！因一时感觉有援笔書此。

一个被省专卖遗忘的高級知识分子的后备軍(?)凌曉光

6.15

某些一貫对別人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对別人苛求，对自己寬从——責人严对己寬的党员先生們，某些一貫只对別人傳道說教，不知自己尊重檢点，只顧‘我在上面打你在下面必須通’的党员老爷們；由于真理和正义的呼声激发了我而我身边又沒有帶紙，因而借用了公家一張信紙，信笔直書，这里我知罪，不該貪污這張紙，特先行檢討，省得麻煩你們对我来个‘我打你通’因为我早已通了啊！”

三、凌曉光6月17日下午的发言

从“匿迹消声”来看本单位的青年监督崗。以往的运动是党团员身先士卒，现在是整党，青年监督崗不应这样“匿迹消声”而應該象包公一样的鉄面无私，但回头来看它，它只督下不督上，督小不督大，換句話說：对小干部确是鉄面无情，对大干部象我一样是有顧慮的，首先說我的两个感觉：毛主席正确、英明与偉大，中国共产党是正确、英明偉大的，烟酒处党支部，嗨！嗨！嗨！

（摆头冷笑）党看到了中国几年来的矛盾，这次不同于任何一年

的整風，如果黨中央沒有這樣的號召，我的苦水無機會傾吐，我這不是空喊口號，這是我的第一點體會。第二點，“自私”“偏袒”“頗不平”本單位是這樣的，表現在那裏呢？從揭發的問題不少，事實已經回答了，我不想保持沉默，我還要說，我聽說開支委會，我歡迎又有点把發愁，我歡喜的是黨內整風通過研究可能有起色，對群眾哭黨員笑可能有良心發現。我另一面愁，因我自己是個泥菩薩過江，我“放”得多，是研究我的“放”嗎？我有些心寒，“怕”發“愁”的我，自己壓不住自己。

有些黨員看了牆報之後，付之一笑，引起我的懷疑，這不是善意的笑，笑有冷笑、嘲笑和哭笑，黨員老爺們對來自無娘的群眾的意見，他們是屬於那一種笑呢？可能是歡笑，再可能是屬於冷笑，反正我們是有娘的兒、有黨支部，你們這些是無娘兒，你們說話不過是放屁，但也可能是苦笑，黨內也在放，他有他的苦處。這說明這幾位黨員老爺們對運動中的群眾還是歧視的，如果這種現象不端正，會引起群眾的不平，人不傷心不流淚，我說這次運動，黨內的工作作的不够，究竟什麼值得笑呢？還把我搞糊塗了，這不對，這是歧視群眾，否則“牆”、“溝”成了銅牆鐵壁，內部矛盾會加深的，我說愈是笑，我們在這裏越是哭，我們在這裏是無娘兒，也許在黨外找到我們的親娘，北京有我們親娘，我們親娘就是毛主席，大家不要有顧慮。

肅反問題一打就是十幾個，但結果如何呢？這些被打過的人結果呢？不是黨中央英明偉大，還是閉口不開，黨外人只有歌功頌德。

另一面，從批評表揚來看本單位，受批評者，雖不完全是黨外人士，至少是黨外人士占多數，受獎者是黨內占絕大多數，群眾少得可憐，這公道不公道，難道黨外人士是草包嗎？不錯，黨員比我們進步，受過鍛煉，難道黨外人士出娘胎就落后嗎？這公道嗎？合理嗎？這完全說明對黨外人士不是一視同仁的。至少從現象上有些不公平，這是以×××、××為首的，只顧黨內升官

发财，美其名是国家需要，量变质未变。我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说明本单位某些党员老爷们，三害是存在严重的，特别是宗派主义，我们应该负责任，对党负责，应该铁面无情，否则很可能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我们要共同拆墙填沟，如果只动群众，党内不动，那就不可能想象乐观了，我们不应有顾虑，否则对不起北京的亲娘——毛主席，我们所负的任务应该负担起来。

李文咸的右派言論

按：李文咸系湖北省合作干校教学工作人員。

一、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的綜合

①我根本不同意什么肃反是正确的，成績是肯定的，中央規定的肃反比例是狗屁不通，下面硬要根据中央5%比例来肃，这是什么政策？什么作风？中央根据什么确定5%？脑子里想个5%就硬搞5%，我們学校也是这样，到底几个打对了呢？不过是历史問題。

肃反扩大化，中央既有教条主义的色彩（仿效苏联），也有主观主义的阴影（比例数字），因此肃反要重新估价。

②我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提到的“我們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从法律上看，我們选举制度是不完全的，許多人被剝夺了选举权，还没有直接选举和完全采取秘密的投票、这怎样能說我們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呢？如果不是故意夸張，那就是他（刘少奇）的健忘，因此我国的政治生活不仅比不上苏联，而且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比不上。

党员和党的领导如說党搞“清一色”則沒关系，而非党人士說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吓呼其吓、“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美国在不違犯資产階級根本利益下两党可以唱对台戏，我們在不違犯社会主义原則，为什么不能唱对台戏呢？我不同意說：“唱对台戏是資产階級民主”。

我們領導的民主作風不夠強的，往往在執行民主之後倒使人感到獨斷氣息的深濃。領導大家學習的組織應由大家來決定，然而我們某些領導對他的組織成員大感興趣，不厭其煩的挑選成員，為什麼要把作黨的工作的同志選到學委會去呢？福利委員會，作息時間都是不民主而是假民主。

③幹部標準不如封建時代，辦事員、科員、輔導員、教員、主任到底以什麼為標準，封建時代當知府、知縣，還有他一定的標準，還要考一下，現在是倒退了，是領導高興就提，所謂“德才兼備”也只是看你是否親近領導，真是“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領導上看人不看德才，只看自己愛惡以及與自己的親疏。提拔幹部時黨團員有股歪風，少數黨團員為了迎合領導企圖，很少採取正派態度，真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纏”。

黨對群眾不信任：其一，聽報告總叫方、劉科長去聽，回來傳達“牛頭不對馬嘴”，為什麼不叫那些能記和有傳達能力的人去聽呢？這是領導相信小圈子。其二，每次值班上總是黨團群一起來，這是為什麼？黨員要求學習送黨校，非黨群眾要求“置若罔聞”。

學校發展黨員不是光明磊落，是鬼鬼祟祟秘密的吸收，真不知道為什麼？學校的領導大大小小我是一個也不滿意的。

定息的性質我認為根本是過去剝削的，現在定息是執行祖先一筆財產存在銀行是一樣的，不能算剝削，如果算，有的人存一萬元，比資本家大，這又算什麼呢？看一個階級存在從所有制上看，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上變為公有，怎麼說作為一個階級存在呢？應隨情況變化而言。

二、李文咸的“反右雜感”

他們都是在反右的名義下，各自打算著自己的如意算盤：
有的是借運動泄個人私憤，

有的想在斗争中一举成名(入党)，
有的为了是向领导大献殷情，
有的是为了晋级职位又高升。
他们有的是为了将功赎罪，
也有的是为了苟且偷生，
也有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
又有人是为了解除领导上对自己的不满。
他们都各有各的美梦来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
斗争！

* * *

这场戏我看得差不多了，我应该归去！
吾名已受辱……

.....

我很骄傲归去，因为我为大家争取了民主，
没有胡风在文艺上放一炮！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提出。

没有我们在民主问题狠狠放一炮！大家是不会取得很好
的民主生活。

我是以一个纯洁之身来到这个人间，
我将以一个清白之身与这个美好的人间脱离，
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点什么痕迹的话，
那就是我曾经也作过共青团员。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头巾，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洗吾泥足。

欧阳咸禹：我的思想檢討

按：这份材料是欧阳咸禹在地質局內部反击右派高潮时，用“我的思想檢討”形式趁机向党发泄其刻骨的階級仇恨，他的檢討完全是一个騙局和花招，根本不是什么改过自新的表現。

从这份材料中，充分說明了欧阳咸禹作为大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賢孙，怀着仇深似海的階級仇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何等敌視，反革命立場是何等坚定。他不仅内心对党和革命是势不两立的，而且对整个人群都充滿了深刻的仇恨的。这里发表的，是他的思想檢討第一部分摘要。

关于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想問題。有些同志專門吹毛求疵，夸大人家的事实向上級汇报，我很不滿意这些人，我平生最討厭这些不正派的人。另一方面此时我对党也感到不十分亲热了。并对某些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意見。如：所有的重要工作只有党团员才能担任，留学生必須是党团员才能充当，对这个問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这样做，我認为任何人都愿意为了建設新中国、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應該把有能力的人推举上去，讓他去發揮才能。

其次，我对仅仅依据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过去的历史面貌而不依据现实情况和真实的思想本質把人的政治品質分为上、中、下三类，我有意見。这样只有使人人家失去驕傲感和光荣感，沒有人格上的灵魂。我認为我的家庭出身，历史上的污点，仅仅是个历史的外壳而已。特别是把好人說得一切均好，砂糖沒有渣，坏人一切均坏，褲子沒有底，如果要提那个人，就故意把他的那怕是极其微小的成績和优点夸大起来，而且前前后后写出一个完整

的体系的作法，我更有意見。另外，我对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也有一些很小的意見，如我对当时的統購統銷政策，認為这个政策是正确和及时的，但粮食的統購数字搞大了，沒有照顧到当前的农民的实际情况，脱离实际，很多农民不滿，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騷动。

.....

1. 在1950年夏季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我产生过不滿党的思想情緒，我認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样的。国民党是一場糟，把中国搞得一場糊涂，共产党也是說的好，做不好，也是一場糊涂，我既不相信国民党，也不信共产党，信我自己的党。我并同別人說了一句笑話，馬克思著了一本資本論出了一个共产党，孙中山著了一部三民主义，出了一个国民党，我今后要創立一种学說，立一个主义，成立另外一个党，比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好。

2. 1950年下期的减租反霸运动时，农民喊出口风要我也要出一百万元錢，我也产生了不滿情緒，我認為运动搞得太糟了，搞得天昏地黑，不分青紅皂白，乱搞一頓，要我也出一百万元，真是岂有此理。

3. 我的恶霸父亲（鏹共委員）枪毙后，我見到罪状上所公布的事实有些不是真的。我認為要杀人也不應該如此，不要任意加重人家的罪名，不要搞些“莫須有”的事情。日后在报上見到公布关于这类事实的时候，我总不大相信，觉得总有点不真实的成份，总有些夸大或写作。

4. 1951年秋，由于我酒醉了，信口喊了肖大禎为狗腿子，当时我不愿認錯，于是农会罰我替軍屬家砍柴，感到了失掉了階級的痛苦，感到实在受了委屈，很气憤，产生了严重的不滿情緒，当时并把心情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希望国民党卷土重来。我想到：好，如果国民党有一天打来了，那时你們就会認識我了，我要进行一次大屠杀！

5. 1955年2月間在原中南地質局411队清队运动的过程中，我

也涌現过不滿情緒，涌現过托派思想，具体說来就是胡风思想。其原因是：第一，我在第一次交代历史时，大家胡乱的熊了我一頓，說我什么态度，語气不好，要重交代。我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我想到我有这历史污点就連說話都要受人家的气。

第二，我当时結合了以前人家对待我的很多事实和情况进行冷靜的分析了一下，我才明白我以前在学校里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假的，并不完全存在，社会不同学校，学校只要是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說，可以做，社会不同了，人家在另眼看我，是站在不同角度来看我。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共产党人也是喜欢阿諛奉承吹吹拍拍的人，对于認認真真的人，他們不仅不喜欢，不高兴，反而加以另眼看待。今后我要装傻些，装温順些，装得比任何人都要温順些，表面上做出迎合你們的样子，然后鑽到你們肚子里去，瓦解你們，橫豎你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自此次后，我感到革命大家庭不温暖，不亲热，我很不愉快。

6.在北京学习时（1955年）人家問我看不看电影（注：为了配合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組織上組織的看“不能忘記这件事”影片），我順口溜出了有些电影是公式化，概念化，我不爱看这些电影。这句话更主要的内容是反映了我当时对党不滿意的心理状态，它表达了我内心上对共产党一切的感受。电影中时常把一个人由落后到转变，由转变到进步，最后把一切都归功于党，我認为这也不过是宣傳政治的偉大政治的作用罢了，实际上我認为这种說法有点吹牛皮。

当報紙上連續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时，我察覺共产党又要借这个“典故”搞什么大的名当了。（原文如此，将典型写为典故，名堂写为名当。）

在反胡风运动学习阶段我确实不大高兴，原因有两：第一，我对搞这类的政治运动不大感兴趣，我想到一搞这运动又要我当众說些問題。第二，运动还没有开始，党内有些同志就在注意我了，放出了一些冷箭，后来，大家在黑板上做了一首打油詩把我

哄了一頓，因此我更不高兴。

.....

运动开始后輪到我时，一开始就是尖銳的斗争，就是扣大帽子，就是层层进逼，层层无中生有，造謠生枝，当时我思想上的抵触情緒很大，非常不滿意。

后来由于我大无畏的說出了我曾經参加的那个派别的上級领导是CC派，斗争就更尖銳更激烈了，大家把我作反革命，前前后后包围起来，圍剿我，監視我，并尽量的威胁我的心灵和精神，此时真把我气死了，气坏了，这时我就与大家对立起来了，我的这个反动立場把我拖得紧紧地。在这时我就产生了性質不相同的反革命，反党思想了。我上既无父母，下又无儿女，沒有左顧右盼，我要与你們干一場大的。革命也沒有什么巧，也不过是在一定的政治綱領之下，組織一些人，领导一些人，团结一些人，打倒和消灭一些人，我要做一做反革命工作，与你們共产党打一場。在第三次斗争时，我很想就公开的交代承認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坐在牢里利用那个形式去搞反革命工作，我要在牢里写好反革命的理論基础，思想基础，組織基础和策略基础等东西，然后再和你們干。

在运动的斗争过程中，我認識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肃反运动有三个作用：

第一，御外必先安内，外有蔣介石集团盘据台灣，又有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侵襲和包围。为了强有力的防御外寇必須首先安定内部，澄清内部，我認識到这次运动就是为解放台灣事先在国内作好政治思想动员工作。

第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性彻底灌輸到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灵深处去。

第三，提高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领导威信，消除潜藏在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心灵深处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某些不尊重或者是輕視的态度。除此以外，沒有其他。

在北京运动中，我考虑了很多原因，沒有把内心思想活动說出来。由北京回队之后，一些表面現象使我更进一步的理解了，北京和这里原来是相連系的，是配合起来搞的，到花魚岭工地后，我是完全知道組織上把我放在花魚岭工地工作的企图的。此时我就更深刻地認識了人群了，我的思想感情起了深刻的极坏的毫化（变化），矛盾轉化了，階級立場已不端正了。我感到世界是冷冰冰的，我是睡在冰窖里，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我很害怕，此时我感到共产党人是老爷們，他們不仅是打击人，而且是压迫人，使人家抬不起头来。他們要杀人人家，毁灭人家的灵魂，毁灭人家活的生命。此时我的思想体系与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思想体系相吻合。我感到是在被流放，在西北利亚矿坑的深层。此时我知道階級的恨和階級的爱，我的爱憎观点和感觉十分明显了。此时我对党有了仇恨心理，我的整个思想情緒与社会形成了抵触，感到一切都不合我的口味，都是虛伪无情的，我的心已經不是同党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敌人联系在一起，我的斗争意志最坚决，我很想到法庭上受一次审讯，我要在法庭当面对理論来否定人家的理論，指穿人家的虛伪，如果要枪决我的话，我絕對从容地走赴刑場，我要高喊着：共产主义者，被共产主义者所杀害。我要用我宏亮的音声去沉甸人家的枪声。

这时我不知为誰而死好。为国民党蔣介石而死吧？首先我認識到不是为真理正义而死，再方面我也沒有受过他絲毫的恩惠，蔣介石也沒有叫过我為干儿子；为共产党毛主席而死吧，我又感到我无限的忠誠坦白（？）换来的严重的打击，誠懇（？）換来了虛伪，因此我不愿意。为自己而死又觉得太渺小了。因此这时我的思想感情是万分忧愁苦悶的，我曾填了这样一首詞，来刻划当时的思想感情：

春去冬来卅岁，
人生半世忧；
聞說三里（地名）酒尚好，

也似游一周；
只恨三里葡萄少，
燒不了內心愁。

当时我是以烟酒来刺激我的神經，麻痹我的神經，使它什么也不知道，最好是不知道一切为好。

在周总理的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之后，我在思想极其混乱性情极其冲动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材料交給領導。当时我唯一希望組織上領導上根据实际情况对我这个人来一个具体的說明，因为自运动之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感到好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紗布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不能分辨人家，也不能分辨自己，衡量自己，因此我要求組織上对我的过去的情况来个說明。至于历史問題，永远不作結論也沒有什么关系。我以前还怕沒有交代清楚影响参加組織。但自运动以后，我这点要求沒有了，我沒有这点欲望了。我永远不参加任何組織。我彻底認識了党派斗争的殘酷性，我深恨那些利用党群关系来打击人、压迫人、污辱人的人。我深恨我生长在这个党派斗争的时代，当然我也恨自己在蒙混之中参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派別，我交代自己的历史不是对共产党負責，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負責，对全国人民負責，自問我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我非常心安理得，因此我不需要什么形式上的結論，我再不需要这些心灵上的安慰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情况和愿望。

在看了陆定一部长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之后，我的旧病又复发了，一发展就到了最高峰。此时我感到共产党人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对人一套，对自己一套，理論一套，实际一套，自己的人有了錯誤不愿說，別人有了錯誤狠狠的打。只許人家說他好，不許人家說他坏，实实在在我感到共产党是个宗派的集团。这是第一点感觉。

第二点我感到现实社会不是什么真理社会，不是根据真理的标准和客观的事实来判断是非，来判断人，而是根据你出身于那

个阶级来判断人，而是依据你出身于那个阶级。他们可以放火，人家不可以点灯，一切只有毫无条件的服从。此时我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很不自由，我感到并没有什么民主，一切都是假的，我产生了极不满现实的心里状况。

第三我感到没有为共产党服务的必要。我的服务观点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共产党人不仅待人不平等，连人家的精神都要毁灭，都要统治，他们设想任何人都是向他们求饭吃的，没有他们人家就不能生活，人家只有毫无条件的向他们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其他的权利，他们把人家当奴隶看待，因此我非常感到没有服务的必要。

在这个基础上，我的思想感情就猛烈地向前发展了，一直发展到关于反共的探讨和企图。

此时我仇恨共产党的心理已达到了最高峰，几乎连这几个字我都不愿看，在自己的本子上我是坚决不写“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的，平时与人交谈时我也极力避免说这些，我设想如果早年我知如此，我已成了一个反共专家了，也不知多少共产党人的头颅在我手下变成齑粉，我绝不能混七八眼读这么多年的书，我要自幼小就学反共，就成一个专家。此时我产生了十分后悔的心情，如果依了他（哥哥）的话跑到台湾去就好了，我设想，假如我到了台湾或美国我就要发表广播演说共产党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如何对待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如何的等。这时我认识到我是生活在现实的空间，既然这样，那么让面对现实，改革现实，不要回避现实，浪费时间，只有用斗争的方式来求得一切解决一切。我是主张改革现实的。因此这时我就产生了反共的探讨和企图，我要改革这个现实。

我十分坦率的承认，当我的仇恨心理和气愤程度达到了顶点的时候，我确实考虑过如何进行反共的问题，因为共产党人太无理了，太专横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权问题，以前我不甚了解其意，根本不要注意这个问题，此时我不仅有了理性的认识，

更严重的是有感性上的認識。当时我理解到仇恨和气愤都是眼光短小，气量狹窄的愚人的心理氣質，是政治家发动愚者自杀和为他們而死，所玩的教育。而目光远大气量寬宏的大政治家本人是絕不会出现如此的愚昧心理氣質的。不見得毛澤东深刻地仇恨过蔣介石，也不見得蔣介石深刻地仇恨过毛澤东，因此我决定行动起来，但是經我再三冷靜的考虑和分析这个問題时，則又認為毫无必要与可能了。为什么呢？

第一，革命动力問題，無論进行革命或反革命都必須依賴社会自然存在的由自发轉为自觉的階級力量和社会力量，否則就革不成。在今天中国的环境內我詳細分析着是沒有这种階級力量和社会力量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已圓滿地滿足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了。人民再不需要什么革命了，虽然我估計到現今的社会在某些角落里，还存在着一些黑点，还存在一些与共产党与这社会制度相对抗的力量，还存在有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是我分析起来，这毕竟是一般渺小的，沒落的，沒有斗争力量的东西，是一股邪气和歪风，很不稳定容易瓦解，絕不能与强烈的宏大的持久的階級力量相对抗。一旦他們一些暫未能滿足的欲望和要求滿足之后，就会即刻烟消云散。

在这里我就确实是不存好心腸的人，我希望共产党的缺点和錯誤巩固和发展；广泛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滿，內在的引起大家对你的仇視和不滿，等你們自己把干柴装滿了車子的时候，我就要很巧妙的擦一根火柴把你們的車子焚燒起来，把它燒掉，但是我又从我亲眼所見到的共产党是能够克服缺点和錯誤的，而且是有信心和决心的，党中央的领导确是正确和英明及时的。因此我分析現今的中国已沒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力量了。

第二，人民的支持問題，任何革命和反革命沒有人民力量的支援是絕不能取得胜利的，蔣介石之所以失敗，主要是与人民沒有联系。在这里我只怕沒有人民支持的力量，我不怕中国共产党有一千多万黨員和直接掌握着的几百万軍队。

第三，建党和建軍問題，現代的社会生活都以階級斗争为軸心，而階級斗争的具体表現就是党派的斗争，但是在現今的中国是沒有建立这个大政党和强大的军队的任何因素了。

歸納講來，这个时候是我判定走革命的道路或反革命道路的时期，走革命道路吧！大家說我是反革命分子，把一頂綉有魔鬼花样的帽子戴在我头上，連革命者的灵魂都消逝了；走反革命的道路吧！我亲眼見到任何大大小小走反革命道路的人，都是沒有出路和下場的。因为想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一般不是以人們的意識为轉移的，因此我判断走反革命的道路是走不得的。

事实上这也不过是由于人家硬要明目張胆的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再三逼我交代什么反动思想，明的斗了，暗的鬧，故意搞出一些麻煩來，使人家心里不安，增添了一个念头和想法罢了。

实实在在那种不講半点真理，不依据半点事实，翻來复去，这也說是什么目的，什么企图、什么动机，那也說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別有用心把同志作敌人來斗争。特别是那种胡說八道的思想刺激，模稜两可、是非不明，吹毛求疵的分析和左右都不对的意見，只能引起一个人头脑阴沉思想模糊，引起一个人的心灵上的恐惧，产生极度的思想混乱和反常的心理現象。

但是这个时期我总的內心上与共产党形成了尖銳的对立，充滿了深刻的仇恨和敌意。（下略）

赵基高的右派言論

按：赵基高，男，現年27岁，貧民成分，本人店員出身，1950年5月参加工作，51年12月入团，52年9月入党，53年3月轉正。参加工作后历任沙市百貨公司營業員，百貨站文書、股长、秘書科副科长、科长等职。54年調省工业厅，10月份調往中南財經学院学习一年，現在省工业厅干部訓練班任班副主任。

一、当官要当大官

“鎮压反革命时，小蘿卜头都杀了，程潜、傅作义等人，过去杀了不少的人，現在由反革命变成革命了，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也不杀，不杀这些是有个人因素在內，这些头头与我們的头头有旧交。”

二、三反錯誤很大

“三反的根本錯誤在中央，当时的口号是：‘有山必有虎’，‘深山藏大虎’，提出大湖怀疑，省委袁振到沙市要交30个老虎的任务，結果层层布置任务，有的打死了，有的打伤了(伤了身或伤了心)，中央要負責，毛主席要負責。”

三、中央領導人物有严重名利思想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人的相片，每天都登在报纸上，翘起二郎腿，吃飯、抽烟、喝茶、走路握手都照相，誰沒有见过他們？”“荆江分洪工程是劳动人民作的，紀念塔上題字是毛澤东題，周恩来題，刘少奇題，李先念題，說明中央領導人物有严重名利思想。”

四、迎接外宾是劳民伤財、規模太大

“很多人还没有大米吃咧！欢迎伏老、苏加諾，用的錢拿去救

灾，是很大一笔数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为什么这样欢迎呢？这是为的礼尚往来，等毛主席到他们国家，也好让他们这样欢迎一下。”

五、选举是假民主

“选江岸区人民代表，我們根本不認識，是好是坏，也不知道，提好了名字，去了只是画圈，这是假民主，选省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也是这样，董必武是湖北的代表，誰选的他呢？”

六、工业厅的厅长分三类

工业厅有七个厅长，太多了，精簡机构，应首先精簡厅长，先减挂羊头，不卖狗肉的，再减挂羊头，卖狗肉的，再减挂羊头不必卖羊肉的，留下挂羊头的，必須卖羊肉的。”

七、胡风是香花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不知究竟有什么反动？我看‘它也許是香花，没有什么不好。”

八、人太残酷了

“雞是人杀的，被人吃了，它的血債应如何还？牛辛辛苦苦的耕种劳动一生，农民耕田是要的，結果人把它杀了，不仅牛肉拿去吃了，同时牛皮拿去作皮鞋，牛的骨头拿去作牙刷等，都是有用的。所以說：人是太残酷了，沒有人道。”

九、人活着都是为自己的看法

“无論这一朝代打倒那一朝代，这一朝代又被另一朝代所代替，都不过統治者的事而已，都是这些人为了做皇帝、大王、丞相、元帅、將軍才有什么革命，絕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为了自己，自己看到么朝么代的帝王好象在进行推翻旧的統治者时，打的旗号总是‘解黎民于倒悬，拯黎民于水火’，但最終是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目的。刘邦、項羽之所以相爭，为了爭夺天下，曹操、刘备、孙权之所以相爭，也是为了爭夺天下，但他們却都是打的‘为民为国’的旗帜，肖何之所以这样为刘邦卖力的干，也是为了奔跑玉带做个丞相。紀信替死，也不过是为了‘名垂玉帛，百

世流芳’，薛仁貴征东十八年，也不过是为了做个平辽王，博得个封妻蔭子，包文拯之所以严明廉正，也不过是为了要人叫做‘包青天’。所以，这种观点来看我們的革命，来看我們的领导者們。这样認為人都是为自己，沒有为別人的，即令是为了別人，也是为了自己，認為人都是殘酷无情的，互相勾心斗角的，沒有感情的。”

刘源清的右派言論

按：刘源清系湖北省工业厅工作人員，現为民盟小組長。

一、刘源清在鳴放中一些右派言論的綜合

第一，攻击党的領導：

1.“由于共产党好大喜功，因此头脑就不太清醒了，忘了群众疾苦。”

2.“党正在走向貴族化”“干部子弟学校和干部幼儿园实际是领导的子弟学校和领导的幼儿园”“不少领导關待遇、个人問題，住房享受，一切特殊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解放了八九年的中国，仍然还有。”

3.“农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向党講知心話，有人对党有恐惧心理。”

4.“領導之多，創世界先进記錄，真所謂‘大矣哉’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工业厅也有七个厅长，据說有的省厅的科也多到六个副科长的。这样多的領導，究竟有多少人作了事呢？当集体(多头)領導开会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发表了高見呢？”“三个臭皮匠，并不能抵个諸葛亮，因臭皮匠毕竟是臭皮匠不是諸葛亮”，“所謂集体(多头)領導，實質上是‘論功行賞’，把有汗馬功劳的同志，照顧、照顧罢了！”

5.“你們原先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的老干部們！希望你們快点清醒过来，不要忘了本，你們的一切，人民都已看到了，滿口馬列主义，行动牛列主义，党紀和国法都是不容許的。”

6.“我們領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称职的，如果說照顧汗馬功

勞，未可厚非，但是今天的政府畢竟是人民政府呀！不稱職的就是空耗了人民的血汗。我建議：把所有不稱職的領導者，普遍向下拉一級，省長拉到廳長，廳長拉到科長，科長拉到科員，這樣鍛煉鍛煉，推動他們迎頭趕上，看看他們鬧不鬧情緒，考驗考驗他們的馬列主義是否到家了。”

7. 有人攻擊肅反積極分子時，劉說：“肅反的責任主要在於領導，一個小小的黨員起什麼作用，如果不幫助領導，而去搞一個小小的黨員，還不能改進工作。”

8. “婚姻法的公布不過都是為了照顧老干部討小老婆罷了。”

第二，否定“肅反”運動的必要：

1. “肅反基本上打錯了，因此傷害了同志們的‘感情’和‘自尊心’”。“徐廳長是成績基本論者，要求修改廳的肅反總結”。“要求黨組召開群眾大會，公開道歉，恢復同志們的榮譽和自尊心”“否則，就不足以平民憤”，“其他單位也基本打錯了，專縣則更不象話，捆綁吊打，無所不有，比之奴隸主對待奴隸並不為過。”

2. “肅反根本不必要，因為共產黨的政權強大而鞏固，不搞運動，通過‘審干’也能解決問題。”

3. “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據我過去所知，我們是殺多了一點。”

第三，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1. “中央的政策不一定都正確，毛主席有時也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有些策略問題，中央有偏差，不應推到下邊。”

2. “‘四留’政策是正確的，但分配的任務不恰當，兩者有矛盾，說明政策不正確，或不够正確”，“歸根結底，還是中央政策在某些方面不正確。”

3. “中央或毛主席提問題時，有時肯定或否定一切，下面則隨聲附和，如：中央一有號召，隨即各地都是響應，報紙上也都是解釋性的文章，好象都是正確，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4. “計劃經濟有問題，我們企業的領導者，千方百計地研究發

展生产是不如資本家的，我們的計劃經濟实际有80%是自发的，不能起到控制作用。”

5.“我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是从貨幣工資計算的，再就是有些算进不算出，如：物价上漲了，取消了年終双薪，打开水也要收錢，这样抵消以后，恐怕提高得很少”。“穿花布是生活水平提高表现，是哄人的。”

6.“几年来粮食产量提高了，副业产量减少了，則农业产量提高了并不多，而我們对此事是盲目乐观，既然产量年年提高，农民生活为什么还那样苦呢？”

7.他同意有些“大知識分子”說的：“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人道”，“如：荆江分洪工程，虽然完工迅速，是用人命挤出来的，在資本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工程，虽然慢些，但会人道些。”

8.“三民主义中所說的土地照价收买，不致引起社会混乱，对我影响很大。”

9.“我国也可实行資產階級民主，采取議會制，民主党派参加議會。”

10.“当前人口出生率高的原因，主要是：人民生活水平低生活单調，人們的剩余精神只有性生活。”

二、“且鳴且爭”（文章）

基本上打錯了

“成績基本論”者的徐厅长，在初步总结肃反成績时說：“我厅肃反运动‘基本上’沒有打錯，沒有伤害同志們的感情”（大意如此），我說这个結論應該掉过来就是“基本上打錯了”，因为从所打的老虎中，絕大部分不是老虎，而是自己人，不仅我厅的結論是打錯了，其他各单位也可以这样說，不如此，不足以服人心，更不是事实，由于基本上打錯了，而且有的打得太狠，确实伤害了同志們的自尊心，象专县則更不象話，捆绑吊打，无所不有，比

之于奴隶主对待奴隶，并不为过，我认为整风中同志们的意见最大的就是肃反问题，要求党组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道歉，恢复同志们的荣誉和自尊，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为吴敬训等同志鸣不平：

在肃反运动中，却有一些同志过于积极了一些，象吴敬训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提醒同志们，吴敬训为什么这样积极，他是根据领导意图行事的，这就是说根本问题还不在于吴敬训，整风要搞彻底，不能舍本求末，根本还在于领导，希望同志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吴敬训同志入党虽然采取了一些花样，首先必须要有贩卖花样的市场”，这次整风主要是帮助领导，并不在于（或者不主要在于）个别的小小党员，因此我要为吴敬训同志鸣不平，如果这次把领导不提高，整了个别小小党员，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集体（多头）领导实质等于“论功行赏”

领导之多，世界先进记录，真所谓“大哉矣”，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工业厅共有七个厅长，据说有的省厅的科也多到六个副科长的，我们看看以我厅为例，这样多的领导究竟有有多少人作了事呢？当集体领导开会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发表了高见呢？“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我不同意，因为臭皮匠究竟还是臭皮匠，而不是诸葛亮，科长多据说是为了要实现“原则领导”，一个厅究竟有多少原则呀！以我厅这次揭发的科长来看，他们的“原则性”真强呀，我认为“推开窗子说亮话”，所谓集体（多头）领导，实质上是“论功行赏”把有汗马功劳的同志照顾照顾罢了。

不称职，普遍拉下一级，考验考验马列主义修养如何？

在我们领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称职的，如果说照顾汗马功劳，未可厚非，但是今天的政府毕竟是人民的政府呀！不称职的就是空耗了人民的血汗，我建议把所有不称职的领导者普遍拉下一级，省长拉到厅长，厅长拉到科长，科长拉到科员，这样锻炼推动他们迎头赶上，看看他们闹不闹情绪，考验考验他们的马列主义是否到家了。

貴族化了并不为过：

干部子弟学校，实际是领导子弟学校，干部幼儿园，实际是领导幼儿园，一个幼儿园的每一幼儿每月的开支三十八元（北京）等于一个农民一年的劳碌奔波的生活费，真是駭人听闻，不少领导闹待遇，闹个人问题，住房、享受一切特殊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解放了八、九年的中国，依然还有（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省委省长住在水果湖的房子与附近农村比较很不相称，我要大声疾呼你们原先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的老干部们，希望你们快点清醒过来吧，不要忘了本，你们一切人民都看到了，满口馬列主义行动牛列主义（容許我这样说），党纪和国法都是不容許的。

一人有福带到满屋：

“母以子貴”是封建社会的事情，我们不居然出现了嗎？楊厚海的父亲有什么条件参加工作？这真是“朝中无人不做官”。他有什么资格住高楼大厦？我們楊筱春同志既然已經住好了的房子，却被貴族化了，張九宏科长赶走了，我建議整风应把楊厚海的父亲赶出去。

死主观、死教条，工业厅沒有嗎？

明明政治空气薄弱，明明对待干部不講愛，同志们提意見，还說离开党群关系，党员們这样说，說是群众的尾巴，不承認事实，不是死主观主义是什么？美国为什么鬧不起革命，毛主席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一語道破了主要的一面，我們党支部宣傳委員李修文同志偏偏不承認美国生活水平高这一事实，不是死教条是什么。

三、“拆牆填沟”我們如何發揮助手和桥梁作用(文章)

我們厅里的整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已經开始了。为了协助党把风整好，克服三大主义，正常党群关系，借以

达到全体同志的亲密团结。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我們民主党派应该很好的发挥桥梁和助手作用。

② 我們认为：工业厅是一个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充分地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力量，应该是厅领导必须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过去厅领导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在团结、教育、改造等方面是不是作了很多工作呢？是作了很多的，但是，我們觉得还作得不够。比如说：技术工作没有中心，没有课题，技术人员自己主动去找（这是对的）才有事做，如果不主动就没有事做；对技术人员使用多，培养少，正如徐厅长所说，有事就使用，没有事就把技术人员丢在一边了；还有领导没有帮助工程师树立威信，有的同志戴着有色眼镜说工程师落后，不愿意接近工程师，有的同志还把工程师当“一般干部”看待，政治、物质、待遇等方面，不少工程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关怀。凡此种，不能说厅里的党群关系是完全正常的。

知识分子不希望在政治上进步吗？知识分子不愿意靠拢党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們有些工程师技术人员常常要求进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心里有积郁，也没有适当的机会可以倾诉，正如有的工程师同志说：“党团员有党团员的组织生活，民主党派成员也有自己的组织生活，而我们呢？工作之余，就是做家务，当保姆，又如何能进步呢？”一语道破了知识分子迫切要求进步的心情。既然这些知识分子迫切要求进步，为什么党群关系还不够密切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們有些党团员缺乏联系群众的方法——特别是缺乏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去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有时候态度还有一些生硬；某些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当党团员向组织反映的时候，甚至作了错误的表述，因之，引起一些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近党团员，不肯讲知心话，当我们民主党派去找一些同志们交换意见的时候，这些同志就说：“你是民盟的吗？讲什么我也没有顾虑，党团员来嘛，一点也挖不到我的什么东西去的”。这里不是说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间比党的威信高些，而

是知識分子有他自己的种种特点，由民主党派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則要容易一些，效果也会大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派能“长期共存”并有它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基本原因。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特別重要的一方面，我們民主党派沒有很好的主动去做知識分子工作，爭取党的領導，随时提出問題，我們联系群众，也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作风，沒有在知識分子的工作中起到应有桥梁作用，代表他們正当的意見、反映他們正当的要求。为了正确地貫徹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特別是协助党搞好这次整风运动，我們必須改进与加强盟务活动工作，并从而鍛炼自己。

民盟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以知識分子为成員的民主党派，它的成員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中、上层知識分子，在我們厅里，它的主要对象是工程技术人員，也可以相应的发展一些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識分子。現在厅里已經有了民盟的小組，我們究竟如何协助党整风呢？

第一，积极发展組織。現在厅里除了已有盟的小組外，还有它联系的一些同志，这些同志經過盟的启发培养，要求进步的愿望非常迫切，我們打算最近就发展一批，以增加盟的新生力量，只有組織发展了，才能运用組織的力量，协助党来推动整风运动和其他一些工作。

第二，大力开展盟务活动。我們的盟务活动，党是很支持的，現在已經作了一些工作，我們的工作，主要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工作。活动的方式，應該采取个别訪問、开談心会、組織专题研究等等，不論何种活动，应根据知識分子的特点，以便作到暢所欲言；我們的活动，都应充分反映知識分子的意見，代表他們的正当要求，真正起到桥梁和助手作用，从而發揮知識分子的潜在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积极爭取党的領導，要求党給工作課題。我們盟的奋斗目标，与党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因之，必須积极爭取党的領

导。厅里今后有什么运动或大的工作布置，在党内进行讨论的时候，也希望能同时交给我们盟的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使工作布置更加完善，另外，我们盟的组织也可据以事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更大的力量去完成任务。最后，我们还希望能够参加厅里有关工作安排的一些会议。

張芝田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張芝田又名振華，男，現年37歲，湖北鄂城人，家庭出身自由職業，個人偽軍官，高中文化程度，1950年參加工作，現為工業廳二級工程師（老級）。張歷史複雜，一貫的欺騙、隱瞞、偽造歷史和社會關係（至今尚未徹底查清其來歷身份），思想極端反動，參加工作後表現極壞，他一貫的仇恨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領導，挑撥離間，打擊積極分子，散布反蘇崇美言論，在政治上和技術上到處耍流氓，招搖撞騙。

一、惡毒的攻擊領導，打擊黨團員和進步分子，挑撥黨群關係，囂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

（一）“×廳長（工業廳黨組書記）是油條作風”見風軟，見油硬。正如“此地無銀三百兩，對門李四不會偷”的故事一樣。

（二）黨團員為什麼拍馬屁，因為老干部就喜歡這一套，你們記得今天擁護你們的人，明天不一定擁護你，今天說壞話的人，才是真正擁護的人，吳滿有不就是嗎？胡宗南來了，不就反對共產黨嗎？

（三）黨團員能起橋樑作用，但我們不要走私的橋樑，要武漢的長江大橋。要知道諸葛亮的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親小人，遠賢臣”。

（四）領導幹部好大喜功，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五）希望領導冷靜一些，市工業局積極分子不是打死了人，不入了黨嗎？

（六）希望廳里黨團員對同志要真誠，今天群眾覺悟提高了，你們對人民不要耍手腕，要真誠，你對我真誠，我就對你真誠。

(七) 朱工程师和我說得來，盧小松工业厅还說他懂設計，是外僑，我說不要認為他本領高能當工程師，他連油壓、水壓都不懂怎能當工程師呢？还那样照顧他，我說工业厅是台灣日本人有特權。

(八) 馬厅长今天把我象豬狗一样喚上樓去开会，会开完了，赶下来，把我們工程技術人員太不当人。

(九) 工业厅用人不当，刘文奎工人出身，沒理論水平，怎能當工程師，胡奇同志呢？这大年紀（还說可以做他父亲）还是一个技術員。

(十) 革命不光是共产党領導的，还有民主党派的支持才行，厅长、主任、党团员不要認為有政治資本，有資本怎么样？!你們要知道，现在的国际局势，是对你們不利的，美国人說过：“稍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就会崩潰”这話虽不正确，但也值得你們研究。

(十一) 你們的幸福是建立在別人痛苦上的，你們今天爬到厅长、主任、处长的地位，是用多少人的血汗換來的，你們不要鬧地位向上爬，要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可是你們的态度呢？是“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为之”。

(十二) 你們記住：“冬天过去了，春天是要來的，但春天到了离夏天也不远了，夏天的太阳是有些晒人的”，你們要認清目前国际局势。

(十三) 大家說有牆有沟，我張芝田是沒看見的，为什么呢？因为把我放在“堡壘黑暗”的地方，怎能看見“沟”“牆”呢？

(十四) 他在虞美人这首誣蔑党的詞中写道：“肅反平反忧未了，苦头尝多少，群众拥党起和风，正遇凌空高墙半天空。油条干部今犹在，須将态度改，劝君从早即回头，不若早图归作稻粮謀。”

二、攻击肅反，揚言含冤，企图倒算。

(一) 肅反把我当特务整，后来又放了，我告到北京、省委及市監委，都是官僚主义，不解決問題，省委張平化說：“你不要

怪他們，你要考慮你歷史的複雜性，群眾運動嘛，缺點是難免的”，還有李爾重也是不解決問題，一副官僚架子。以後我們的徐廳長，他見了我說：“老張，肅反結束了，就算了，”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我要問：運動是否可以違反憲法。

（二）我的問題（指肅反結論）解不解決？！不解決我找省委，省委不解決，找北京，北京不解決，去找我的校長——克拉克，他是侵朝美軍總司令（他在檢討說：克拉克講真理）。

三、崇美反蘇，認賊作父。

（一）黨內幹部只會崇拜廟宇，只知大廟的和尙會念經，蘇聯的什麼都好。技術問題談到蘇聯就對，美國就不好。怪！我碰到的蘇聯專家就是不行，我就是對蘇聯專家“不感冒”。

（二）蘇聯汽車不能滑行，美國車子就可以滑行，報上還登蘇聯的汽剎怎麼好，我真看不來。

（三）張平化的司機就說美國車子好，只說莫斯科人牌振動，車燒熱不能走，就不敢公開說：“不好”，大家也就跟着說好，這說明了共產黨的压力很大。

（四）蘇展館的12000多副展品，除電子計算機外，14年前就在美國都看過。還有高速切削是意大利發明的。

（五）捷克的“斯柯達”汽車設計不合理、振動，我寫信到省委，張平化說給我一輛車子做試驗改進，現在六個月了沒有音信，辦不到，就別放大炮，別用手腕，工程技術人員有經驗，懂得這一套，首長說話不算數真可耻。

（六）你們說我是美國貨，我就是美國貨（在檢討中說：美國人給我汽車坐，給我牛奶、面包吃，喝香檳酒，共產黨呢？只給我二級工程師，跛着腳騎一輛舊自行車——實際上是給的一輛全新的——喝的是南酒和汾酒。這怎麼不叫我留戀克拉克和美國呢？我希望未來的生活能成為過去的生活，我的思想就是崇美，我全家都是美國培養出來的，我五歲就上美國小學，當然我要說

美国好)。

四、鳴放中利用流氓手段，向群众进行煽动、拉攏、威胁，企图把运动搞乱。

(一)他在向党进攻之前說：你們要我放，我喝了酒的，說錯了別見怪；今天我說了几句話，希望你們不要在“放”的下面加个“屁”字，大家放的都是真誠的，希望党要真誠。

(二)他在虞美人这首詞中誣蔑整風說：百家爭鳴何時了，党組听多少？醉眠无雨怨东风，惜党爱国誰識丹心紅？打虎英雄今犹在，心腸何曾改，君將細雨記成仇，早晚淘尽百花付东流。

(三)厅里的整風是报銷式的，有如：“意見二斤，价洋两元”滿厅貼的紅紅綠綠的，省委来了人，你看我徐达三把运动搞得怎么样，多熱鬧呵？！其实，徐厅长是把滿厅大字报当作发票，向上級一張一張的报銷，还是不解决問題。

(四)提意見不如回家去睡覺，今天提了这么多的意見，未見解决一条。“厅里运动，我看不易开展，好象吃了飯沒事干”，女同志流泪提意見为了什么！为了爱护你們。

(五)厅里的运动本来很正常，但党团员确要引向歧途发展。連“长江日报”，新华社也是一种巧妙的方法哄人。如发出金嗓子周璇来表示“百花齐放”，周璇連发音就不懂，她是什么东西，我說她是“叫春”。

(六)你們不要听着难过，和风細雨是有条件的。

(七)有人提出要下厂，他煽动和漫罵組織說：“張良辞汉全身計，范蠡归湖远害机，下厂工作总相宜，君細推，我厅几人知。”

(八)他在一首詞中企图煽动两个工程技术人员說：“知荣知辱牢絨口，誰是誰非暗点头，詩書丛里且淹留，受苦也风流。”

(九)在右派分子提出公开档案时，他造謠說：武汉市工业局的人事档案公开了，雷局长对肃反錯打了的人，一人一鞠躬，叫我去我不去。

(十)在他的反党謬論在会上受到同志們的痛斥后，会后他

找到組織，拍案大罵說：我就是特務嗎？你們逮捕法辦嗎？指着提意見尖銳的同志向組長威脅說：有你在工業廳，就沒有我，有我就不能有你。我不干了。

易成的右派言論

按：易成系湖北省內河航運管理局工作人員。

一、“冤家哀鳴”

有詩為証，詩曰：

刑如利刃罰如鞭，枉入私牢四十天。

相見以誠除“三害”，暢所欲言似當年。

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藝術家，更不是政治家。如果硬說是“家”，那麼，就叫個“冤家”吧。拿這個稱號對照一下我在各個大小運動中的遭遇，恐怕並不算誇張，作為一個“冤家”，我要發出一陣“哀鳴”。

各個運動賦予我的感受，要首推“肅反”。它已經構成了我出世以來的、痛苦的和難予忘懷的經歷。

在55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中，我是民管處組里的主要鬥爭對象之一，也是一個重點。前後被鬥爭過9天計43小時又33分。在被鬥時，挨過3次打；罰過4次跪，計2小時，罰過5次站，計3小時又38分，被禁止抽煙2次，拿着繩子喊着要吊（實際沒吊）1次。另外，還被關入私牢40天。在被關期間，別的同志可以去歡度國慶，我則日夜被人民經濟警察與“打虎隊員”看守着，上廁所也不例外。在運動期間，來往信件都要按規定接受檢查，個人存放和使用的日記本，也被暫時接收與審閱。大家看看這份待遇吧，實在不亞于飽受壓迫的奴隸們對待壓榨成性的奴隸主。

也許有人會說：你抗拒運動，拒不坦白么，活該！對於說這

話的同志，我要首先向他介紹一下我的肅反結論：“运动前已作了交代，运动中又未发现新的問題。”就是說，我既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拒不坦白、抗拒运动；而是一个“大大的好人”，且早于运动之前全部交代了有关自己的問題。

究竟为什么会遭到各种苦刑呢？一句話：沒有滿足“怀疑主义者”（我之所以发明了這個怀疑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三者的混合产物）的要求。它怀疑你杀了人，你就不能說沒那回事儿，它認為你是政治破坏，你就不能說是自然事故……不管有无事实根据，不顧有沒有充分理由，只要你嘴里敢說出一个“不”字，馬上就被宣布为抗拒运动或頑固不化。从而，馬上就賞以体罰。体罰之后，再說个“不”字，又要賜予刑罰。“不”字越多，刑罰越重。碰到我这个“不識事物的人”，很不习惯于“临机应变”，結果，就創造了接受刑罰的空前記錄。

除了“不”字以外，在运动中給我带来不幸的，还有“当局”一詞。我在日記本上写着：对于搜查和体罰一事，我當場声明保留权利，以便将来向有关当局詢問其法律根据。他們問我“当局”是什么意思，我文化淺說不出来。他們就說我是誹謗政治部門。當場用刑罰教訓了一頓。經過这一肉体痛苦后，我仍然沒闡明白“当局”一詞的含意。一日，我去民众乐园观看罗天揚的奕賽，那个裁判（大概叫报局的）管两人下奕叫作“对局”，把不贏不輸称“和局”，坐在东面的是紅帅的“当局”，坐在西边的是黑将的“当局”。原来“当局”并非誹謗之詞，看奕賽本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沒想到竟引起了我的痛苦回忆：如果半年前能去看看奕賽，我那一頓也許可以幸免。

以上叙述并不足以說明动用苦刑时的規律。动刑的規律是什么？根据事实，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1）斗争形成僵局，互助組长面面相覷；（2）互助組长睁大眼睛，一齐投向組长，希望得到支持；（3）組长紧鎖眉头，立即离开会场，表示同意“搞”；（4）打、跪仍然不能扭轉局勢，組长回到会场出面当“好人”，作調停

工作。由此可見，使用刑罰并不是无領導的。

应当鄭重地指出，上述各種休罰、刑罰、私辟監牢、搜查與檢查等作法，在法律上都是非法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憲法，是早於運動誕生的。里面規定公民享有的民主與自由權利，他們可以睜眼不顧。當當事人聲明休罰、刑罰等行為已觸犯了法律時，他們不僅不聽，相反火惱着成怒，可見是知法犯法。

前不久，我榮幸的讀到“文匯報”上的一篇法律論文。文章介紹了現行法律中的刑事推定程序。程序規定：在法庭未正式宣判被告為犯罪分子以前，他仍然是一個公民，還享有公民權利；所不同的是：公安、檢察機關可以根據確鑿罪証依法先予拘捕。

我衷心擁護這一社會主義類型的民主法律，也嚴厲的譴責運動中對我的自由的非法侵犯。毛澤東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肅反運動初期完全違背了這一訓示，他們沒經過調查研究，不僅有發言權，而且有了打人權。我真不明白這是誰給的特權！

為什麼不先去調查清楚就優先給予粗暴待遇呢？是不是因為我平時對領導提出的批評多了點呢？我想，可能是這樣的。看吧：許多問題很複雜，年齡很大，平時歌功頌德，唯唯諾諾的人都不斗；而我這個胡子不太長的、平時愛發表評論的人，卻成了主要鬥爭對象。誰能不奇怪呢！

為了全面作好平反工作，根本糾正肅反初期的錯誤，在“哀鳴”之後，我提出一個願望三個要求，請領導考慮：

（1）呼叻領導上結束我這“冤家”似的命運；

（2）要求原肅反辦公室向了解過我的情況的親友同志說明：易成不是反革命；

（3）讓原肅反小組的所有參加者都明白：站、跪、打等作法都是非法的，今後要加強學習，樹立法制觀點，學會充分尊重別人的公民權利與自尊心；

(4) 党委会要明确承認自己掌握政策中的錯誤，不要輕描淡写，含糊其詞。

另外还有一个小事：把我关入私牢以后，公家发給我穿的雨衣帽被別人扯不見了，以后多方寻找无着，一年多来，我那雨衣一直沒带过帽子，下起雨来，我只好淋着。这一淋，又引起了我的痛苦回忆。因此，我提出个最低要求：如果公家收回雨衣，希望不要勒令我賠償帽子。还提出一个最高要求：最好給我补发一頂，免得引起我的痛苦回忆。

要求能否滿足，希望有个答复。

二、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能否改变

最近大家对使用培养和提拔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評，同时还摆出了不应提拔該拉下来的具体名单。对此我举起双手表示完全同意。

現在我想就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的問題与領導上和同志們共同研究討論一下。

在沒进入实际討論以前，我想先作个自我介紹。学习“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时候，因为我說了几句关于鉄托的好話，小組会的一位同志就授給我一个崇高的称号……“修正主义”。我对这一称号，象肃反时对待某些人称我为“胡风分子”一样，虽不敢坦然接受，但是，却感到非常“荣幸”。“修正主义”和“胡风分子”都是大知識分子，我这个初中二年級的小学生能与他們相提并論，岂不值得“庆幸”嗎！

現在我提出這個問題来是不是又叫“修正主义”呢？我是不敢保險的，所以，我希望得到批評，只是要求先別忙給我戴大帽子。

为什么要改变呢？我認为原来的政策与制度不够完整。如：原来对知識分子与留用人員（我既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留用人

員)和一般后进干部的說法是“爭取、團結、利用、改造”八個字組成的四個平列而相聯的動詞，試問讓這一部分同志听了還能有什么積極的想法呢？我看很少對主觀認為是進步的是新生力量的人則培養了又培養，提拔了再提拔。這樣做又能起多大的積極作用呢，我看不大。因為：（1）建設社會主義是六億人民的共同事業，六億人民已經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了，人人都正在以主人翁的姿態為社會主義的早日到來而辛勤勞動着。還要提“團結”和“利用”干什么呢？這一提就有賓主之分，與僱傭之別了。（2）改造這一詞並不完全是前一部分人的事，後一部分人同樣需要改造。大家都是要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人么，怎么不應該在改造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而偏偏要擺出一幅改造別人的人的面孔呢？所以我建議把爭取、團結、利用這三個詞取消，把提拔改為提高，并把改造與培養二詞加進去，概括起來就是“改造、培養、提高”。用它作為幹部政策，對待前一部分人與後一部分人都一視同仁。

關於人事制度，以往是單純的由領導提拔任命。往往難免不帶點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毛病。這次大家所列举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建議：在拉下那些需要拉下來的人，如果需要再提拔幹部，我認為最好是實行選舉、考試與任命三者相互結合的辦法。即：一個干部的提拔，必須得具備三個條件：（1）被職工群眾或職工代表所公認。（2）新任職務的知識考試及格。（3）獲得上級領導的任命和批准。三者缺一不可。為了避免三者之間發生矛盾，事前應制定出選拔干部的各項條件。領導上可以主動向群眾推薦一些人，群眾也可以選其他的人，領導上如果不任命群眾推選的人，應該充分說明理由。這叫選拔而不叫提拔。另外，原有各級負責干部，也要受群眾的充分監督。一旦喪失繼任條件，有權向職工代表大會建議罷免他。群眾一經對他表示不信任，領導上也不能勉強挽留。對於工作中存在一定缺點的人，一般不使用罷免權，只給予批評幫助。

現在，經過各項政治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群眾覺悟水平

已空前提高。敌我与是非界线都划得很清楚，我想是有条件实行上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人事制度的。一个国家的元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选举产生的，局、处、科、股长，难道还选不得吗？我相信，让群众参与人事管理，是只会搞好，不会搞乱的。

宋西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宋西（笔名金鷄鳴）系“湖北日报”社文艺副刊部副主任，党内右派分子，这里选編的是他在鳴放中所写的文章和参加会议发言的一部分。無論在他的文章中或发言中，都可以看出：宋西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不惜歪曲省委领导和报社领导的語言，对党的领导进行誹謗和謾罵，来达到个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这个材料，是由湖北日报社整风办公室提供的。

一、“地位不能代表真理”

在执行組織決議的时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下級应该服从上級……，但对待思想或学术問題，是不适于强制別人服从的。任何問題当然都是有是非界綫，但划分这个界綫时，却应采取自由討論的方式，决不宜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在討論过程中，参加討論的人不管官职大小，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我們党所提倡的这种在討論問題时的平等态度是真正为探討真理、发展科学所需要的。而某些官高爵显的“权威”人士，却偏偏不喜欢这个，或者不习惯这个。他們高傲地认为自己永远代表“馬家”，永远是党的化身，永远是绝对正确；認為別人只能服从他的意見，而不能和他据理力爭，好象一进行爭論就会动摇他的“王位”，影响他的“权威”似的。甚至口口声声把这些說成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說来当然并不简单。这些人在口头上并不是沒有說过平等討論等等的話，甚至比別人唱的調子更高，但实际行动是：遇到对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当这些“权威”人士发了“指示”別人不能接

受要求討論時，他不贊成討論你就討論不起來；不討論倒也罷了，由於他大權在握，可以在大會小會、里里外外，隨時隨地對別人東揸一句，西帶一句，左一棍子，右一鞭子，別人怕為一篇作品而違反他的“反黨”、“反領導”的組織原則，便只好忍氣吞聲、一語不發了。同時，這些人又具備經常接觸上級的“優越性”，可以根據自己的觀點的需要隨時選擇材料和語言，而上級又常常不以作品的實際為客觀，不以不同意見的雙方為客觀，而以他的片面匯報為客觀，進而“提高到原則的高度”，這就符合了他的主觀。於是他拿着雞毛當令箭，以大話嚇人，大帽子壓人，這樣，作品就被那種“個人的好惡”判決了。留給作者以至同情作品的編者的，只有難言的隱痛而已。

文藝問題是個複雜的問題。文藝要反映生活，生活是極其錯綜複雜的，所以很難僅僅以黑白兩個顏色來加以評判。人民內部的人，當然也包括那些有“權威”的人，都是愛護黨的事業、維護黨的利益的；人民內部的作者，也都是企圖為人民放出鮮花，而不會故意放出毒草害人的。但由於我們的作者常常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很難說自己的任何作品都是完美無缺，甚至在客觀上被認為是毒草；但到底是鮮花還是毒草，是要經過充分的研究討論，要靠全社會的鑒別才能逐步明朗起來的，決不是某一個自認為高明的人可以隨便下結論的。職務高、有“權威”的人，水平也可能較一般人高些，但也很難說就高到了與眾不同的地步。也許他們在某個問題上代表真理，或者在很多問題上代表真理，但不能說他們能在任何問題上都可以既不聽取別人意見，又不認真調查研究就可以代表真理。況且，一個人，對真理的領會也是會有局限性的。由此可見，發展文藝事業，對待文藝作品，運用文藝批評，萬萬不能採取簡單粗暴的個人裁判，而應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的廣泛討論。

（載1957·6·“橋”第三期）

二、5月4日上午在报社各部、組負

責人联席会上的发言

刚才余社长談到他自己最近以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我感到很好。余社长說：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个第四阶段？我很希望有，觉得很有必要来个第四阶段。我的意見是希望余社长明确一些問題的界綫：把党的組織、党的领导和个别领导人区别开来；把党的总的领导和处理某一具体問題区别开来；不要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我很同意楊平同志剛才說的，什么事情都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要一概而論。个别领导人处理个别具体問題，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譬如对文艺稿件的看法，以不同时期的政治概念来套作品，以自己的假想来代替作者的思想 and 作品的主题，我觉得这都不一定是正确的。领导人不要認为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問題上都是代表馬家，都是党的化身，不要認为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別人永远都是錯誤的。群众，是解放几年之后的群众，是受过党的四面八方教育的群众，是不断改造自己、不断进步的群众。在某个問題上，由于他們亲身参予、努力鑽研，其看法可能会是正确的，可能会比个别领导人認識的还准确。领导人应该好好听听他們的意見，吸收他們正确的意見，不要先在思想上下了結論：我是正确的，你們是錯誤的；要听或者要討論，也是为了批判你們、打通你們。这样看問題的态度并不是很好的。我感到，余社长常常表現得很自信，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信心是必要的，但假若过于自信，以至达到絕對化的地步，就不好了。所以我才迫切希望余社长有个第四阶段，即从实际出发对待一切事物的阶段。

（按：字句旁的黑点是宋西加的）

三、5月25日在省委召开的第三次 新聞工作座談会上的发言

我現在代表“弱小民族”說几句话。

毛主席說：有两样工作最难做：一是报纸工作，一是文艺工作。而我所担负的是报纸的文艺工作，这就更难做。

所以說它是“弱小民族”，就是說領導很少考虑到我們的特点和需要。在报社，稿子挤了，首先考虑抽的是文艺稿件；突击任务来了，首先考虑抽調的也是文艺干部。我們的“东湖”副刊，在創刊时領導上曾經向我們說，要保証版面，定期和讀者見面，但就在最近进一步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却連續停了三、四期，差不多一个月沒和讀者見面了。我曾經揚言：再不出就要到“人民日报”去告状，目的是想吓唬一下，今天書記和宣傳部長都在这里，希望給我們撐个腰。

再拿我个人說，我到报社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报社每一个部門的工作差不多都做了。我搞过工业报道：如重型工具制造厂完成季度計劃，軟木厂开工等；我搞过农业报道：如劳模会、苏联展覽館农业館等；我搞过党的生活的报道：如区委書記联席會議、省委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等；我搞过理論宣傳的报道：曾到省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理論宣傳处）找彭展处长研究和制定計劃，到华师找刘介愚等等約理論文章；我搞过政法报道：如省人代会、征兵等；我搞过文教报道：如扫盲、农村俱乐部等；我搞过卫生报道：如防治血吸虫等；我也搞过体育报道：如橫渡长江、乒乓球賽等；此外，我几乎包下了所有的外宾活动：其中有艺术团体，也有总統、首相等等。服从組織分配是必要的，我也一直在服从，但作为一个文艺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生活的机会却少有，学习业务的机会更沒有。現在，党交给自己担负文艺工作的任务，但自己很缺乏本錢，又缺乏提高的机会，这样是很

难胜任工作的。报纸个别领导人，曾经说：报纸没有专业，专业就是新闻。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我们根本不敢提文艺特点，要想在文艺方面成为内行，这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北京有些講習所、訓練班之类，但却没有我们的份。他们几次调人去学习，一定都通过党委，并且大都通过宣传部，以后请曾部长注意一下，照顾照顾我们。

誰沒有处在我們这个崗位，就很难体会到我們的心情。最近以来，很多人发言說党委干涉了他們的日常工作。但是我們巴不得党委給我們一点“干涉”。我們的副刊，原来是懸賞征求刊名的，經报社領導决定为“黃鶴”，許多县的小报都发了消息，并把獎金都給了应征的人。但在創刊的前几天，任重同志来信要改成“东湖”。这在別人看来，也許說成是干涉，但我們感到省委負責同志能够关心这样的具体問題，使我們非常兴奋。我还到处去吹，說“东湖”刊名是省委書記取的，想提高一下副刊的威信。我們希望領導上今后能更多地关心我們，支持我們。

下面我想談談指導思想的問題。任重同志在省文联主席团(扩大)會議上曾經談过，道琦同志給我的回信中也提到过。說党委在某一时期提出指導思想是必要的，从报纸來說，可以在消息、通訊中大力貫徹。文艺和通訊报道不完全一样，不一定完全服务于当前中心，不能象要求通訊报道那样来要求文艺創作。若要強調文艺必需經常服务中心，那永远是跟不上中心的。不能說一陣风来了，任何树旁的一棵小草都往一边倒。譬如我們面前的长江，我們常說是大江东去，这可比作党委的指导思想，比作我們生活的主流。但长江的一些支流，也有往南流的，也有往北流的，更有轉圈圈的。虽然最終都流归大海，流归大海，但行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說，我們的生活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文艺要反映现实，当然首要的要反映主流，但和主流不完全一致的支流也是可以反映的。不能說大江东去，而一切支流都是平行东去的。“談鞭打”一稿被認為是否定或批判合作化的，不合指导思想，

不予发表，这样决定不对。

由此，我联系到报社领导同志向我们提出的指导思想。說，副刊上表揚的东西多搞点，批評的东西越少越好，多搞点表揚的东西，頂多是公式化，概念化，但批評的东西搞不好就会犯大錯。我觉得批評要慎重，这是对的，但因噎廢食就不一定对。如果这样执行，文艺界一直反对的“无冲突論”就无法理解了。另外就在前几天，說要恢复“东湖”。領導上看到中央文化部开禁了一些剧目，叫我們組織表态，部里人不够，还拉了别的部門的同志去，叫我們“东湖”出一次专号，似乎与当前中心配合紧，但光登表态的，确实不象个专刊，我就建議把“东湖”的刊头取消了。

姜弘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姜弘系“長江文藝”編輯部理論組編輯。這個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中是以右派“鬪將”出現的，無論在他的文章中，或在他的發言中，都表現了他對黨的刻骨的仇恨，他瘋狂地對黨的文艺方針、武漢市文艺界黨的領導進行了惡毒的誹謗、謾罵和攻擊。這裡是根據作協武漢分會所提供的材料選編的一部分。

一、在大鳴大放中到處点火放毒的作品 和書信的一部分

1.“武漢春遲”發表在5月上旬“長江日報”“浪花”文艺副刊上：

有人說，目前北京上海的文艺界，象一江春水，波浪洶湧，滾滾東去；而武漢文艺界，却象一潭死水，不說前進的波浪，連大點的漣漪都沒有，毫無生氣的“長江日報”，正表現了武漢文艺界的死氣沉沉。近幾日來，“長江日報”上發表了幾則有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簡單消息，也許會有人以此為例，證明“春風已度武勝關”，但是我認為，這不過是“乍暖”，離北京上海那種“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濃春季節，還很有一段距離。

武漢的這種落后狀況，首先表現在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冷淡上。幾月來，各地都紛紛召開會議，學習中央的方針，研究具體問題，為“放”和“鳴”掃清道路。而武漢呢？不錯，報紙上也發了幾個消息，也有幾篇“表态”的文章，領導人也在會議上高喊着“要鳴”“要放”，群眾看得很明白，這一切，多少有點“不得

不”的勉强味儿，因此，就有人說这不过是：“敷衍爭鳴，点綴齐放”！

冷淡、敷衍，还只是消极抗拒党的政策。更甚者，是有意无意的用“冷气”冒充春风，以抵制真正的如水春风。譬如，在一个名为体现百家爭鳴精神的“学术討論会”上，有人突然以領導者身份出来訓話：黨員应如何，不应如何如何，不然就很危險，其結果，黨員再不想参加会了，而非黨員則更唯恐避之不及，誰还敢来“爭”，来“鳴”？又如，武汉市文化局巴南岡局长，在談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时說：“要‘鳴’馬列主义之‘鳴’，才能开出鮮艳之‘花’来”，說得不客气点，我看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的“馬列主义之鳴”。說不定它本身就是一棵“毒草”！在沒有“鳴”之前，你怎么知道別人肚子里的东西是非馬列主义的呢？在万籟无声的时候，就先喊出“非馬列主义不准鳴！”那結果就不能不变成“一家爭鳴”。这一家，只怕也不一定就是真的馬列主义。

也許有人会說，巴南岡等同志都是作为“一家”而鳴出自己的見解的，为什么不准人家“鳴”？这也有点道理。不过，請別忘了他們是領導，长期以来“領導报告，大家鼓掌”的习惯并未完全改变。你这样“鳴”，別人誰还敢“鳴”？突然飞来的“反領導”“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是誰都害怕的！

这都还算是好的，除此之外，武汉还有一种奇特现象：有些吓人的言論，多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好象空中的灰尘，感觉到它使人窒息，却抓不住，譬如，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百家爭鳴”的号召，我周圍有些同志互相鼓励，积极学习，准备参加文艺問題的討論。要写文章，当然是一人伏案工作了，当然不能众人共执一管笔。討論中，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展开了热烈的爭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半空中突然飞来一声嘶喝：“你們是受了波匈事件的影响，不要共产主义世界观，取消党的領導，提倡个人奋斗！”胆小的人被吓得魂飞魄散，胆大的人想除掉这些来路不明的帽子，却又找不到爭辯的对手，只好以无言对之。

上面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在武汉，摆出一付唯我有“政

治”、“唯我是馬列主義者”的吓人面孔的人并不少见，在这种人心目中，政治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你要不终日听他说话，向他点头，反而要去搞一些他们不大明白的东西，当然要使他们大为不满了。这种人又往往是些“惹不起”，惹了他们，头上就免不了要戴上几顶大帽子。

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庸俗机械论在武汉文艺界有很大的支配力量，文艺工作受了很大损失，今天要“放”起来，“鸣”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空喊几句“鸣响”“放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要使文艺学术真正繁荣起来，却要作很大的努力。这首先就要看领导有无决心，有无诚心，如果没有诚心改进工作，很多问题都可以用“难免”二字推之于“客观”的。至于上面说的“灰尘”，因为抓不住，也是尽可否认的。但是，否认问题的存在，或轻描淡写地哼吟一下，这种表现本身，只怕就是一种“諱疾忌医”的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也有他们的“独特”看法。按照他们的看法，党的方针在这里是贯彻得很够的，至少也是“差不多”的，至于那些有顾虑的人，完全是“庸人自扰”。当然，按道理，顾虑是应该消除的，应当相信中央的方针。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下，习惯势力不除掉，“冷气”和“灰尘”不除掉，不敢大胆的拆“墙”，只怕“庸人”还是要“自扰”下去的。

现在，春风不过刚刚度过武胜关，寒意尚未除尽，许多人还不能消除一切顾虑，摆脱一切束缚，大胆地“放”，大胆地“鸣”。要使武汉早日赶上其他城市，进入百花齐放的“浓春”，还有待于领导上首先消除对中央方针的怀疑和曲解，有待于领导人用中央精神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对的，就公开向群众承认，而不要再“諱疾忌医”，不要把医生——群众看得太低，有中央方针在，群众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也会消除顾虑的。

2.“且說常有理”发表在“长江文艺”1957年6月号上：

一个人活在世上，从生到死而不犯一点错误，这种“完人”只怕是古今少有的。“竟今是而昨非”，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

經驗。不過，也不盡然，有一種人就很特別，在他們說來，“今是”“昨也是”，無往而不“是”，即使到不得已非認錯不可的時候，他也仍然有理。本來你是批評他的，可是，憑他那“三寸不爛之舌”困困一轉，你却從“原告”變成了“被告”，結果還是你沒理。

趙樹理同志在“三里灣”中為這種人畫了一張素描象，並名之曰“常有理”。“常有理”能說會道，實會歪纏，死不認錯，永遠把自己說得通體透亮。

“常有理”如果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那倒也沒有什麼。不幸的是，我們生活中有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常有理”。普通的“常有理”，不過使人感到難纏而敬而遠之，如果是一個“欲遠不能”的“常有理”，那就糟了。我說的是，占據一定的領導崗位，而又有實權的“常有理”，在工作上、生活上，你不能不和他打交道，也不可能沒有矛盾，既然他“常有理”，那你就必然“常沒理”。

譬如，過去你按他的指示工作，一旦發現是作錯了，要改變過去的作法，那他就要來批評你。如果你聰明一點，老老實實跟着他“變”，也許沒有什麼，你要不知趣，偏要翻老帳，“常有理”就會說：“同志，事物是發展的，要學會辯證地看問題，要根據時間、地點、條件、歷史地、從發展上看問題。過去錯了嗎？也許，可能，很難說，這，這問題很複雜，你這樣片面、偏激是不行的……”於是，你又成了“片面”“偏激”；而他，又是最正確的了。譬如，前一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文學藝術界開始有了一點活躍，就有人感到很不順眼、很不習慣，大呼要“把緊關口”“壓住陣腳”，作出一付威風凜凜的“太守”狀。你要是想自由地“放”“鳴”，當然就是不“安份守己”了。曾幾何時，陳其通等受了批評，中央號召繼續反對教條主義，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於是，“常有理”瞠目不知所措了，不過，也不要緊，一夜之間，他們突然又變成了反教條主義的急先鋒了！而且，比誰都更激進。如果你不緊挨着他的屁股困困轉，稍微慢了一點，就又成了批判對象。和這種人在一起，使你總覺得後面有個專門

“鳴鞭”的人跟着你，不管你往哪边走，屁股上总免不了挨鞭子。

这种“常有理”之所以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依我猜测，恐怕是真有一些特殊本领：第一，精通“辯証法”；第二，善于“糾偏”，而且以“糾偏”为唯一职责。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本领，而又占据一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就时时刻刻“糾”别人的“偏”。他亲自布置的工作，会事后又来纠正别人。如果有一个不大合他的意的政策下来，他就会站在一边不冷不热地喊两句“干啊”，等待新“偏”出来，他再来“糾”。所以，他总不犯错误，即使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仍然会说一句“那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

这种“常有理”是惹不起的，惹了他，你总是错。所以，可以把“惹不起”这个绰号也送给他们。

这种人口里念念有词的那套“辯証”词令，已经比原来的辯証法大大提高了。变成了服从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服务的“道具”了。因此，那“辯証”，只怕已成了“诡辯”，虽然只是一字之差，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而且，好象和另一种哲学——“于我有利、有效的就是真理”——有点相象了。

为什么“常有理”呢？就因为他们貌似明白，实则“糊涂涂”。上级一个政策下来了，他们本不明白，对实际生活更不明白，只是闭着眼睛“贯”呀，“贯”呀，“贯”到“透底”。一旦新精神来了，始则愕然不知所措，继之又变成了新精神的化身。由此看来，“常有理”“惹不起”“糊涂涂”原是“三位一体”的——既然“糊涂涂”，又要时时保持尊严，就不得不强词夺理，于是就成了“常有理”。“强词夺理”加地位、权力，就成了“惹不起”。别人越“惹不起”，他自己越觉得有“理”，就越变得“糊涂涂”。

又是“常有理”，又是“惹不起”，又是“糊涂涂”，名目繁多，其实则一，如果这种人要填表，不知是否可以这样填：绰号——“常有理”，别字——“惹不起”，原名——“糊涂涂”，职别——“糾偏专家”，特长——精通“辯証法”，善于“鳴鞭”。

其实，大家早已明白，“常有理”“惹不起”的原名——实质，

就是“糊涂涂”，只是不肯明言罢了。现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阵春风，已经使得有些“常有理”开始清醒了，开始感到自己也有没理的时候了。不过，要真想从“糊涂涂”变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首先就要收起那种吓人的“惹不起”面孔。学习别人有理的地方，弥补自己无理的地方，把“常有理”变为“真有理”。孔老夫子早就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如果能按照这句话去作，那就会变“糊涂涂”式的“常有理”，为清楚明白的“真有理”了。

3. 4月9日姜弘给“桥”编辑部右派分子卢盛谟的信。（按：他在大鸣大放中给卢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最长的信，卢说遗失了，在反右斗争中卢只向组织上交出姜弘写的这一封，仅交出这一封信亦可看出一些问题。）

卢丹兄：

大札奉悉，閣下复信之及时，令人十分满意，然而拜读之余，却又有些不满足。

我挑出一块烂砖头，是想引来那怕一块宝玉的，而得到的却是一纸公文，连“支票”都没有！

我之所以急，抛出砖头，实际上是向閣下告急，求援于閣下。这期刊物准备集中发几篇有关百家争鸣、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短文而已，有的文件中（包括我的砖头），却与这些问题无关。一期刊物中的杂文，应当是一束“集束手榴弹”，否则，零星枪声是很难产生力量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论组成员，小弟怎能不急？

今天已九号，批发稿时间当有五天，希望这五天，希望这五天中能赶出一篇来，如贵部存稿中有不拟利用的好文章，也可转来。此事急如星火！急如星火！盼复。

拙作承以“不差”二字见赠，买则轻如鹅毛，提的问题也许不错，分量却很轻，化劳动不多，怎能出好东西？下期云云，可能是编辑的“术语”，如不能用，暂存兄处，不为难。既久同行，其

中奧妙，彼此都明白，不必考慮別的問題。我不會罵人的，下期能用則用，否則，可送給閣下擦桌子，我有底稿。

等待着你們的支持。

匆匆即行

大 安

姜 弘

4月9日

4. 姜弘給姚雪垠的兩封信。（按：據姚雪垠交代，姜弘共給他4封信，有3封姚雪垠說他撕毀了。撕毀的信中有一封長達九頁，是姜弘給姚雪垠攻擊武漢市文藝界領導的一些所謂“具體材料”。）

姚老：

前去一信，至今尚未見復，不知何故。

“打開窗子說亮話”一文在這裡反映很好，就在“文藝報”到漢口的那天，“中國青年報”“辣椒”，和“長江日報”文藝部聯合召開了一個青年文學工作者座談會，到會的就是作協和市文聯、劇院的幾個人，這次會才真正揭出了一些問題，齊克、李柯、沈沙等揭出了一些宗派主義的內情，正面提出了黑丁、李爾重的問題。會上也一再提到你和田濤、海獸、峻菁等。會上對刊物也提出了尖銳批評，說“長江文藝”“穩重有餘而創造不足”，“以不變應前變”，“長江文藝”的教條主義也是突出的。

回來我把會議情況向李蕤匯報了，李蕤要我們研究，怎樣改變刊物面貌，怎樣大膽鳴、放，研究的結果，是要具體的揭出一些問題，集中火力反教條主義。家裡，有人寫雜文稿名批評王淑耘等，周勃評“揚子江邊”，我寫“工人文藝”問題的文章。另外，有人寫批評省委和“湖北日報”的諷刺特寫。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定要請您和田濤、吳奚如寫一些文章，象“打開窗子說亮話”那樣的文章。具體一些，深刻一些，武漢這座教條主義大樓，宗派主義厚牆，不用力碰一碰，是不會倒的，非常需要你來動手。

近来看到不少报刊有您的文章，咱說（黑丁說）你來信給創委會，檢討自己，為何不復我一個字？檢討自己是需要的，但在武漢更重要的是：“揭開蓋子”！

等着您的文章，等着您的復信。

匆匆即頌

近 安

姜 弘

5月27日

姚老：

上午給您發一信，下午收到您的信，同時看到25日“文匯報”上關於作協整風的報道。從這個消息看，您的發言確很尖銳，徐遲發言想也很利害。

這樣看來，“長江文藝”越來越落后了，眼看趕不上當前大勢，怎不急煞人？

關於武漢的情況，報紙上已有報道，至今基本上仍是密云不雨狀。會也開了不少，大都是只能使人表示不愉快的“愉快的座談會”。比如，程千帆說要上中央告狀，指着李爾重說：“我就要告你！”告么？原來是怪李沒有作報告。我們都感到肉麻，這不是批評，而是“按摩”。簡直是花旦身段。李蕤同志發言也稀松平常，關於他的有職無權，長期不受尊重等問題，只字不提。當然，他有他的苦衷，——要反宗派主義了，突然把他拉進了黨內！身居領導地位，又入了黨，處處都要謹慎小心。

黑丁同志態度很不好，現在別人都摸不透他，有時也不冷不熱地發出號召：放啊，鳴啊！平常都很少看到他。遇到具體問題，又使人生氣——例如，提到過去武漢的“文藝為生產服務”等教條主義口號時，他只是說“很難說……在當時的情況下……”，總不正面接觸問題。又如，前兩天作報告，提到您的文章，說：“老姚的意見很好，大家應學他，無話不談，有的問題是我們的，有的問題要往上推，官僚主義大家負責，津貼問題等對作家照顧不夠，

不光是我們，全國作協也一樣，我們負不了責任……”這話叫人听了多泄气！（大意，不是原話）

這個局面要打开了。而打开局面，在武汉又缺人。有些人不愿多說話，这就难办了。昨天和李蕪商量，他說收到你的信了，你建議辟一栏，請一些过去受压制、受排斥的人写文章。这一点我們都很贊成。只是不用单立栏目。田濤要写。

我最近又“囂張”起来了，写文章、发言。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毫不留情。但发言时，仍不敢暢所欲言，有些吞吞吐吐，就这样，已經使我有些不太愉快了，說我“态度”不好，“气量狭小”，有“个人情緒”等等，至于我的意見本身，虽然“很好”，却“很难說”了。因此，我打算写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情緒”来反击一下。現在就是这样，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徘徊收放之間，值身爭鳴之外”，而散布出一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空气，讓人不知他們葫蘆里卖的什么藥，当然要顧慮。为了正面对教条主义开火，我打算写一篇論文，批評一下李尔重的“为生产服务”的理論。为了站稳脚跟，从关述毛主席的“講話”出发，付題为“再讀‘講話’”。正面探討理論，不涉及人与人之間的問題，想不会产生什么大的不愉快。

說了这么多，是为了使您了解武汉的情况。写吧，無論如何要写。您在武汉这些年，从自己的亲身經历來說，从武汉文艺界的前途說，都应写。李蕪同志一再交代，請您写。“打开窗子說亮話”虽尖銳，对武汉說，还不够。

随信寄上小文两篇，帮助您了解一些情况。

还有，于晴的“文艺批評的歧路”一文，我和一些年輕同志都非常喜欢，可黑丁同志却說：“好嘛，陈企霞培养出来的打手，过去打那一边，今天又打这一边，好嘛，多几个打手也好……”显然，他的同情是在教条主义一边的。

信就写到这里，請您赶快寄文章来，自己刊物如餓似渴，总比“文汇报”更需要支持。等着您的文章。

匆匆即頌

撰 安

姜 弘

5月28日

現在編輯部基本上“大放”了，黑丁全不管，淑耘根本不在，編輯部大家作主，李蕤管得較多，這群年輕人過去跟着“太守”跑，今天轉過頭來，需要支持。

14日開編前會，13日前寄到。

11日前付郵。信中意見請勿與外人道。李蕤知道。

二、大鳴大放中各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1. 5月22日在“長江日報”文藝部私下召開的青年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姜弘的發言：

沈沙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武漢的作家可以數得出幾個人來：海默在武漢默默無聞，現在是全國有名的作家；孫峻菁是上海作協的副書記；李景蓀（豫劇演員）誰重視她？為什麼到北京上海受重視？這是為什麼？還有蘇中，在文工團時是準備送走的，現在是“人民文學”理論組編輯組長。姚雪垠何嘗不是如此，在這兒整的不象話，黨員幹部還罵他是“老流氓”。

沈沙說劇院偷雞摸狗。作協也是如此，錢不敢放，皮包也偷。道德品質敗壞的人作協也有。問題在於領導，把這種人當成最好的幹部，作為黨的發展對象。兩腿直立的動物還是團的宣教委員。

黑丁幾年來只跟我談過一次話。而對那種人是經常關心的。××的事情發生後，領導上說看錯了人。他們是常常看錯人的。討論“工人文藝”問題時，李冰支持過我們，後來也說看錯了。很有意思，這些話我不願意談，因為有個人情緒，偏激情緒向我逼來，我的修養不好，但并不因為我的個人情緒，問題就不存在。

“長江文藝”是有問題，編輯有自己的苦衷。沈沙說有些作品

“长江文艺”不发，不好的倒发了，这是因为不得不发，因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結合中心”深入人心，所以認為不好的作品，象“爷爷一辈子”“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咬着牙发了。刊物上灰色平庸的作品很多，稳当。沒有創造性，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学术探討风气还没有开展。

发曾惇（原市委宣傳部长，現任省委宣傳部长——注）的“在八大光輝照耀下前进”，我是不想发的，但只敢提：“是否可以考虑不发。”不敢說坏和坚决不发，遇見有权有势的人物不敢說話，习性难改，还是不敢說。

“长江文艺”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严重，我又要說到李尔重。我与李尔重沒有仇，但因为例子突出。例如“粮食”編輯部認為不好，但发了。我不相信領導看不出来，不是的。“揚子江边”是图解工作方法，有人說是写工作方法的。駱文說：“工作方法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嗎？为什么不可以写？”我不相信他这样認識，但他竟是这样說了。这样評論作品是从人出发，这不是客觀的公正的来衡量作品，怎能叫人服气。

武汉市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是和粗暴的作风結合在一起的。

武汉市有个突出特点是：把政治問題与艺术問題混同起来，这是过去的。现在把学术問題与个人問題联系在一起。

我現在还有顧虑，本来准备不談的，現在忍不住談了，說不定回去晚上睡不着觉，又后悔各种流言蜚語使人不愉快。有人不敢暢所欲言，怕把艺术問題牵扯到人事糾紛。

为什么各地报纸都在将武汉的軍，說武汉“密云不雨”，会开的太多，“鳴放”是否深值得考虑。很多問題习惯了，同时也不敢鳴。第一次要你鳴放，后来就找一个小資产階級典型，以后是否糾偏？乍春寒还是有的。要解決顧虑就要接触具体問題，如艺术为生产服务的問題，李蕤当年就对这个“为生产服务”的問題提出意見，当年支持这个方針的人，现在却說：“这很难說，当时的情

况嘛!”将来是否又有新的情况，他们是懂得辩证法，会分析情况，而情况总是对他们有利。

谈诗歌传统问题有人谈，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就少，因为谈诗歌问题不扰是非。有框子——教条主义存在，我们就没有办法。现在应当谈具体问题。首先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副刊“学习”宣传教条主义起到很大作用。“浪花”(文艺副刊)太少。剧评影评象广告，高盛麟、李景粤发表了多少文章。歌剧院消息内容不尖锐。“长江日报”在文艺问题上没有力量，是道具。对文化局何其吝啬。“长江日报”总拿一些哼哼哈哈的文章没有意思。

编辑人员权力问题，过去编辑在处理稿件上权力不大，我过去认为“长江文艺”是编辑科，科长决定问题。这个情况不变，很难争鸣。

鸣不起来领导是关键。领导不放手，武汉市文艺界缺乏学术空气，一写东西个人主义帽子就来了，以为不务正业，由于学术研究少。所以现在鸣放拿不出东西来。过去有几人鑽业务，几个人谈一谈就是小集团，弄得六亲不认，现在问题是要空气彻底改变。

武汉市的作家不少，但他们之中很多担任领导工作，这些人不是拿作品与你接触，而是拿局长、部长、院长。

应该提出问题来斗争，不要光喊“你们要放手哇”，“还有顾虑哇!”过去运动中的问题可以谈，但艺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能不谈，不是我有仇我有冤，而是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有影响，为把文艺问题 and 政治问题混为一团，谁还愿意谈呢。

有人问我为什么骂巴南岡不骂于黑丁，并不是因为巴南岡好欺，而是因为黑丁在頂头上，巴南岡在旁边。再则巴南岡接受意见还不坏。

2.6月1日作协武汉分会党组召集青年文学工作者文艺座谈会上姜弘的发言：

首先谈谈我个人的态度、气量和情绪的问题，我的确偏激，

有小資產階級情緒，看問題，写的文章不一定妥當。我的缺點可以接受批評。但這一時期流行了許多風言風語：說我態度偏激，氣量狹小，情緒是個人的，一提起姜弘就說“姜弘這個人……”言外之意，到底如何，我不知道，強調我的態度、氣量，不管我說的問題，有些領導同志不談“鳴”“放”問題，而只談氣量等，則有口難辯。從這一點看，陳其通還算一個好漢。我們有人對問題不管，而對人與人的關係，則頗感興趣，打擊報復，我不怕，我相信黨的政策，但有一股暗流，使人精神上感到壓力。現在把我感到的問題談一談：作協武漢分會到底作些什麼？首先是團結作家問題，現在很多人想走，有人說只要下個命令要走的可以走，就會走光，過去孫峻青在這里創作上未受到支持重視，走了。海默在這里說不好，到北京去就好了。現在姚雪垠到北京也不想回來，作協離心離德，這很嚴重。看作品吧：例如“龍蝦”我很喜歡，有些人也肯定，但“長江文藝”不發。寄到“人民文學”發了。“祭頭巾”編輯部都同意發，後來給程雲同志看，他說是低級趣味。而“人民文學”發了。“買猴”遭遇不用說了，“新局長到來之前”批評是誣蔑了新人物。這些作品遭遇如此，另外李爾重同志“揚子江邊”我認為不好，刊物上又要評介，只得轉載“長江日報”的文章，這正如江雲同志所說的“奉命正確”。武漢作協對毛主席文藝方針是從什麼出發呢，還是從個人出發。在文藝上作了什麼討論呢，典型問題的座談會，領導上一再強調馬林科夫不一定錯，而對張光年的文章就感到危險。提到“揚子江邊”，有人引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文學是生活的教科書，工作方法為什麼不可寫呢？作協召開的“阿Q正傳”座談會有人說本身就是喜劇，在這座談會上有位會員說“阿Q”的典型意義是頭上有癩痢。“魯迅雜文座談會”，李冰同志的主席。介紹了雜文的戰鬥意義，有些人在發言中重複談了一下，有的人竟認為“朝花夕拾”也是雜文，太無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中，有人提到是“波匈事件”、“修正主義”。黑丁同志在會上說黨員應該如何，使非黨員害怕，周學南下來也說我

不参加了。这些座谈会如此。在业务上缺乏领导，是否把工作放在政治上呢？事实也不是。昨天莎蕪发言，我听了很惊讶，对待同志态度，令人寒心。作协也有道德败坏的人，乱七八糟，但还被认为是积极分子，这是不是注意了政治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政治有关吧，作协直到今天才开会，陈其通的文章发表出来，黑丁同志说“这篇文章从内容到态度我都同意”。周勃写了文章，以后领导还说不让不健康的东西在刊物上发表。黑丁同志没有真正体会到党的精神，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现得很冷淡。黑丁同志在上级面前的确很听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是好的，但太过分一点，无主见也不好。黑丁同志什么事情都管，连茶杯、沙发的事也过问，但作协的事务工作，并未弄好。对分会作家生活上的照顾也是不够的。因为整风，我只谈缺点，作协并不是没有优点。从上面情况看，作协的干部政策有问题，领导上不欢迎不同看法，而喜欢应声虫。为什么作协同志都很苦闷，领导上不喜欢有独立思考的同志，而只喜欢跟着他说话的人。黑丁同志鼓励过别人，但总的倾向如此，希望领导深思。许多人都感到领导冷冰冰，我有同感。我同黑丁同志一共谈过三次话，此外再也没有了，来这么几年是如此。一个道德败坏严重的同志，黑丁同志经常找他谈，信任他。培养新作家问题，分会实际上在鼓励一本书主义，如果出名，就特别照顾，未写出来就没有人管，遭到冷视。如果周扬同志说一句话，点一下头，那就不简单。我们作协培养新生力量有成绩，但不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多青年作家临走时说“别了，几年后再见”，这些地方也希望领导深思。最后我想谈谈我个人问题，我是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因为我不大听话，每次运动我都要挨整。我有缺点：自由主义、偏激、自高自大、激动这些缺点都存在。但有的问题是学术讨论，象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针我不同意，就被当成了重点整。1953年讨论时，我写了文章，也发过言，被压下来。到反胡风时，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被关起来了，当时罪状都是工人文艺问题，反对李尔重意

見問題，沒有別的。“文艺为工人服务”是毛主席提出的，也是对的。在武汉市就发展成为“为生产服务，結合本厂”、“通过文艺形式介紹生产窍门”。为生产服务有毛病，片面不确切，在执行中，有的把真机器搬上舞台当背景等等，这很明显表演生产过程。这个口号的毛病是不确切和片面，并不是全部否定。另外黑丁同志提出“所謂普及是普及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理論，对文艺和宣傳鼓动不大明确。1953年不是解放初期，陆定一同志也提过“一切文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不一定是文艺”。只要政治，不要艺术，我們当时反对过，我們反对得不准确，把一切反掉了，但从总的方向上是对的。培养工人作者，結果如何？曹桂梅、張良相、曾宪帮等有几个能站出来的。礄口区汇演，申新評为一等奖，“千个师傅一条心”，徐国华同志花了很多力量修改出来，都算在工人账上；“电纜翻身”有一部分是冒牌。工人完全能成为作家，問題在于如何培养，引导走什么道路。現在我們翻开“工人文艺”来看，有几个东西留下来，太少了。这确是道路問題，方針問題。我們感到有些意見，不是对李尔重、黑丁同志有仇。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不同意，肃反中却把我整起来，現在弄清了。我气的是把学术問題、工作問題，說是个人問題。我認为黑丁同志李尔重同志是教条主义典型，教条主义还没有动，我認为今后工作，要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方針办事，不要把領導同志一句話奉为圣旨。“长江文艺”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这主要是受了教条主义影响，有許多文章不是凭質量，而是生硬配合运动，甚至穿花衣服也要配合。有的是看人，李尔重的“粮食”，排成黑体字，原因就在于此，更可怕的是稿箋上的意見，有时也变成了反革命的罪状，給人很大顧慮。另外，領導上学习也不够，討論时不能說服人，在学术問題上希望領導要傾听意見。

3. 6月5日在作协武汉分会整风座談会上的发言：

我們机关在鳴放中这样沉寂，还說我們是偏激，照这样說来，那么武大、北大、川大、工学院、武汉师专那些人都該杀头了。

既然說偏，就是不正確，情緒在那里呢？領導所謂不偏激就是今天天氣哈哈。所謂“和風細雨”是和“無情打擊”對稱的，我說話有些形容詞，我說作協男盜女娼是實有其事，不是什麼偏激情緒。任何個人不能沒有個人情緒，每個作家如沒有個人情緒就不可能寫文章，個人情緒不等於從個人出發。我們不是為了增加兩塊錢而來提意見，而是為了工作。到今天為止，對待整風的觀點、態度，宗派主義還在起着作用，如林焰把材料交給陽雲看，支部書記杜能則說：“不要再給人家（指陽雲）增加材料了吧！”領導上的整風態度，還要考慮，這算開場白。

我自己怎樣由牆內人變為牆外人的，是因為觸犯了權威。這要從中南文學院談起，我在文學院、市文聯當青年團支委，我是站在黨的立場說話的積極分子，但到市文化局後，對李爾重、巴南岡提過意見，因此，我就被指責為“和黨不一條心”——這是張雲驤加的，“偏激”是李爾重加的。牆內人越來越少，張炎（姜弘的愛人）被推入落後分子堆裡，曾經還成為反革命家屬。我曾受過“刑具”（引自徐懋庸的雜文“武器刑具道具”）的無情打擊，根據材料是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總之，認為你還是有問題的，我可以公開告訴你們，我和宋謀瑒、劉若等交換了意見，我們原被認為是胡風思想影響分子，後來成為一般分子又成為骨幹分子；以後又逐步往下滑，由骨幹、一般而又變成胡風思想影響分子了。很多人與曾卓常來常往，為什麼不算胡風分子？黑丁不是也和曾卓來往嗎？黨既把曾卓放到市委文藝處長的位置上，我們為什麼不執行他的指示？張雲驤是站在我們頭上，直接執行曾卓指示的，為什麼又不是胡風分子？張雲驤這些人作了打手，把我們當成曾卓的工具，其實真正的理由、證據、起因，是我批評了李爾重、巴南岡，武漢一批年輕人碰了牆，觸犯了權，肅反就鬥爭我，逮捕我，沒有逮捕証（沒有逮捕過），搜查我，沒有搜查証，你們這是違犯憲法違犯國際公法的行為，在世界上哪一個文明的國家裡有這樣的事情？為了從宗派出發可以保護一些人，迫害一些人，

是毫无道理的。肃反有很多欺騙、誘供、詐供、逼供、騙供，什么卑鄙的办法都用上了，把些青年搞的糊里糊涂。肃反干部捏造材料，在我与宋謀場之間挑撥关系，使我們互相猜忌，不得不承認一些东西。现在看来，我的材料里絕大部分是捏造的，比如向我詐供时說：你坦白吧宋謀場已写了你的材料。我不信，老韓（韓柏村）拿了一迭很厚的材料說：你看这不是嗎？我一看真有很厚一迭。現在我們拆穿了，原来除上面一張是宋謀場写的之外，下边都不是。黑丁同志在思想建設时还欺騙，說文艺特質是解放初期提出的，实际上是53年提出的，这是任何小学生的算术也可以算得出的。难道53年等于解放初期嗎？其实文艺特質还是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呢。就是这样連起碼的事实也沒有，就把我們当成胡风分子，造成了追要党的年輕人的痛苦。毛主席的肃反政策是偉大的，作协是不是照中央精神作的？

江云的发言是非常击中要害的，关于“党性”的說法精妙之至，“党性”就是听頂头上司的話，提意見就叫大逆不道，悲剧就此产生。李冰在肃反前曾談过，同意我們認為周揚把文学分为工人的文学、农民的文学是錯誤的，但肃反中他說他看錯了人，我們也痛心自己看錯了人。我和董小敏談了一下，要研究工人文艺的問題，董小敏汇报給老韓，就認為我是反扑反案，我看錯了人。王采，我不反对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不反对嗎？批評了也联系起来看，說我對抗，今天看来，教条主义很严重。姚雪垠叫我有些事情不要說，說我的肩头太窄，担不起事。領導批評說，发稿时我拂袖而去，为什么不拂袖而去？我有問題，驕傲自大，个人主义，小資产階級思想，象我这样的人普天之下何其多也，这样有一半的人就要关起来。領導对有自己思想的人痛恨之至，×××、×××之流唯唯諾諾的却青云直上，都是好干部，不能令人心服。对这些人批判是沒有絲毫效果的，这不是抱怨，的确限制了人的积极性。有人說，我要翻身了，我要控訴了，其实我早已翻身了，我要控訴倒是真的。

报上关于人事制度的提法我很同意。在中南文艺学院，我因为看了“海上述林”、“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就被批評，写成鉴定装进了档案，好象只准看“王貴与李香香”。运动中我的檢討材料，有些是誠懇的，有些是糊涂的，有些是胡扯的，属于文艺思想方面过去批判的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是符合馬列主义的，不过不深刻而已。把我要求李尔重同志参加整风的意見，也放在材料袋里，××是党员，材料袋里没有什么东西，人家（指长江水利委员会）就要；李柯材料袋里連打油詩都有（此系捏造），当然别人就不要了。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找工作都困难，秘密材料袋今天是不需要的了。今天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們又不是俄国的“死灵魂”，为什么一个人的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也不准看？有人說人事科象公安局的派出所，人事干部都是些什么样人？文化局、作协我就知道，讓这些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很可怕！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國家，社会主义國家，是內部矛盾，我們都是公民，有什么必要把材料袋秘密起来？而有些人又可以看别人的材料。

我們领导同志是可望而不可及，脱离群众的。对我倒不脱离，什么运动都会照顾到我的。党内党外有一道墙，不仅是这样，一些党员被排斥在外面，一些非党的倒很接近。江云同志說的好，有业务研究的都不是好干部。吹吹拍拍的应声虫，都是好干部。吸收会员，使用干部都是如此。如具有创造性就麻烦了，领导僵化了，“英雄”得势了。黑丁同志对編輯部同志談起姚雪垠、田濤，对他们印象是不太好了的，似乎接近了这些人都是落后的。领导上編輯部划分开了，使我們不是同心同德，而是离心离德。不是两句話就可以办好刊物的，要允許同志們自由討論。“长江文艺”，按說我們是主人，可是我們是雇員，同志們自己倒沒有把自己看成雇員。我政治上沒有問題，拥护社会主义，应把同志看成自己人，领导不要把自己看成奴隶主，經常揮着鞭子的人。

我为黑丁同志忧虑。黑丁同志是老作家，兢兢业业，近年来

思想僵化，拿不出象样的作品和論文来，我不是譏笑黑丁同志，是替他焦急忧虑。

有些人成了文化紳士，不是白紙黑字，而是紅灯綠酒。做报告談話总离不开1938年怎样怎样。陈共通、馬寒冰的文章发表后的看法怎样？黑丁同志在美协成立大会上的講話，把木刻、油画說成是美术的各种流派，对搞文艺理論的，如周勃、郑秀梓等同志不支持，而把張云驥、馬汉章、方振益看成紅人。我認为黑丁同志的論文是报告，黑丁同志还发誓不給“长江文艺”写文章。老作家无新作。我們为什么不能看参考消息？別的地方的同志都能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什么立場观点？为什么宋謀場……都能看，我們就不可以看。摆着奴隶总管的架子！市委对文艺工作怎样看？市委書記为什么高不可攀？开座談会，宋謀場将了一軍，宋書記第二天才来，是不是头一天开猪肉會議去了？作家这样不值錢？意見不值得一听？談到高級知識分子就提到北京、上海，党把我們拒之于千里之外。参考消息一些文艺理論无知透頂的人还能看，我們反而不能看？过去我搞理論挨了打，受了迫害，为什么对刘真、吉学霈看重，是因为中央看重了，这是宗派主义。

作协机关化，机关官僚化。堂堂作协，只有一个田濤，一个洪洋两个作家。成不成立作协，值得怀疑。武大青年認为搞理論是死胡同，武汉市是密加凡这些人和无知透頂的張云驥这些批評家。柏林斯基、魯迅、高尔基知道会感到痛心的。北京可以把作家送到頤和园进行創作；而我們的作家姚雪垠却被猪肉鉤子挂坏了眼睛。可以考試一下，我絕沒有作官的思想。田濤想走，我也想走，叶魯有才华不想搞了，周勃也不想写理論了，刘岱想編连环画，总之搞理論沒有前途，过去受压制，現在受冷淡。沈沙說，有的領導同志写的理論文章，稿費應該发給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魯迅……。領導同志包括我們的党支部書記，只管什么人該用什么茶杯、茶碗，什么人該坐什么沙发，发言时看人家眼睛大不大。由于不懂文艺，居然說我們不要世界觀。党能領導文艺

并不等于任何党员个人都可以领导文艺。问题是领导干部要学文艺才能领导。领导上不要再红灯绿灯，吃吃喝喝，搞文化绅士、阶级服从这一套了。你们不要再在领导岗位上当盖子，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了。居然有人说杂文只能写正面歌颂的东西，那么就写社论好了，还要杂文干什么？要求市委和作协领导了解一下，作协是干什么，要求党关怀理论创作，如时间的保证，我最近想写关于“为生产服务”的文章，但李蕤同志冷淡地说：“写吧！”凡事只从科长、处长出发，马汉章、张云驥是十四级干部大官儿，过去我们还责备李文悲哀我们是过渡干部，万金油。武汉的党与柯庆施有多大的距离啊！“桥”编辑部决定选编委了，张云驥这样的人不会被选上是肯定的，听说张准备当四协联合办公室主任。张云驥、马汉章是盖子。

* * *

宋谋场这次过武汉，临时住在姚雪垠的房子里，使我回想起姚雪垠的创作环境，田涛也如此。姚雪垠白发苍苍，让猪肉钩子挂坏了眼睛，领导住的安静舒适，市委住的大楼，人与人之间何其不同！李冰的家属亲友可住机关的房子，可以和胡佐才的房子对比一下。你们的所谓“原则”“制度”都是打了引号的，不要说革命道德，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你们不脸红吗？李冰不拿水电、房租，老韩还来扯谎，吹、捧、拍、压，从“人”看一下，够不够格？如果不够，你们再考虑一下，怎样重新做个人，然后再拿党的精神考虑，想要搬到市委去，当然市委很舒服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住舒服的房子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这样不合理呢？

5. 6月6日在作协武汉分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机关是宗派主义大堡垒，肃反后对蔡明川的冷淡就与宗派主义有关，蔡明川和王淑耘的矛盾，人所共知，斗争的他抬不起头来。我的肃反问题的提出是从宗派主义出发的，其他曾卓问题是胡扯。我之所以被斗，是触犯了权威人士，我从党的文学事业出发，批评了李尔重，就被认为反党，因为他们不懂延安文艺

座談會的精神，庸俗社會學，反而鬥爭我，我沒有任何罪狀而被逮捕被搜查，還說是符合黨的精神，你們這種違犯憲法、違犯國際公法的行為，使我抬不起頭來。

“長江文藝”編輯部18人，被關被鬥5人，被懷疑5人，連上被搜查和反革命家屬，有80%。沒有任何根據去搜查別人，俞林宣布我是胡風的一般分子，我要求回答，根據是什麼？是什麼？可是男盜女娼的×××，却受到尊敬，黨鍛煉你們這多年，竟然這樣作，能對得起黨嗎？對幹部也是宗派主義，我兢兢業業整日耽心在角落裏監視我的眼睛，我不怕，我既沒偷別人的老婆，也沒偷別人的錢，我怕什麼？齊克那個樣子，可以到廬山去寫東西，統治者對他親信爪牙是這樣的，多可怕！他是這樣自在。幹部一部分揚眉吐氣，踩在別人頭上，一部分在人之下。這不是黨與非黨問題，而是氣味相投，有些人糊塗，上了別人的當。

黨與非黨關係，王淑耘和李蕤的關係值得注意，李蕤同志提出注意文藝特質的問題，淑耘同志勃然大怒，而黑丁則哼哼哈哈，順着王淑耘。之所以這樣是為了打擊排斥一個人。黑丁同志難道連政治和社會主義的關係都不知道嗎？採取那樣態度，淑耘同志甚至在會後布置黨員力量向非黨人士進攻，我們不敢發言。黨在作協是什麼作用？是小集團，排斥異己、打擊的作用，有些人是宗派主義者，有些人是跟着走的。姚雪垠說，李蕤都不行你還說什麼？不要說了。我看你們是打手，是宗派主義者，是集團，李蕤是全國出名的作家，還這樣，我們更不用說了。王淑耘說，我崇拜姚雪垠，我當然要崇拜，在作協象他這樣作家有多少？只有他一個人，象他那樣作品有多少？那樣有才學的人，我當然要接近。在鬥爭我的時候，說我的眼中只有一個李蕤，為什麼？是為了排斥李蕤。在不久前，王岩同志告訴我說，“李蕤入黨，李冰、淑耘都不同意”這種宗派主義不亞於陳山（注：上海作協主席），排擠有成就的老作家，可是在反官僚主義時，就急急忙忙的拉入黨內。“長江文藝”灰色平庸的作品很多，編輯部沒有民主，我們

都是雇員，干部提不高。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党的文学事业有多大的危害！有一次我提到发展会員不对，在党支部討論时，說我给领导难看。

应该回想一下，李季同志在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样，黑丁說风水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不好？想一下。黑丁同志批評我說，你的思想作风不改，到那里也要犯錯誤。現在我把这話拿来回敬你，黑丁同志如果不改昏昏庸庸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到那里也会搞得一团糟。作协要彻底改組，由作家治会，不管大作家或小作家，都参加治会，不要其它人，編輯部也是如此，不要大杂会。現在作协不是脫离政治，而是政治脫离了业务，会員两年不从事文艺劳动就要退出作协。猪肉部长×××、×××之流不合式的都撤下来，要根本改进作协的性質、机构、面貌。要真正改变的話，作协是会有新的面貌的。文艺思想不一致，不要紧，可以领导向一个方向走。

卢盛謨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卢盛謨（又名谷秀云、卢丹）系“桥”編輯部編輯，在大鳴大放中，他先后在“长江文艺”、“桥”刊上，向党向社会主义連續地发射了四支毒箭，“阴魂不散”、“究竟为誰服务？”是其中的两支。这两篇文章，集中的恶毒的攻击了党的文艺方針，抹杀和否定了党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成績，为资产阶级右派争夺文艺陣地。与此同时，他不放弃一切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并企图在“桥”編輯部取消党的领导。

这个材料，是由“桥”編輯部整风小組提供的。

一、卢盛謨的两支毒箭

（1）“阴魂”不散（載“桥”1957年第四期）

“文学刊物应当怎样贯彻‘鳴’‘放’方針？”这是近来文艺界的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問題。不管創作、理論，文章写好了，总得有刊物給你发表；刊物办得如果有問題，“放”“鳴”終究无法兌現，文坛上也永远出現不了欣欣向榮的气象。

关于這個問題，在近来的一片“鳴”声中，我听到了不少高見。这里面当然有許多是精辟的，而且可以說，发表意見的人，主观上也都是为了办好刊物；但我也发现在某些意見的后面又隱隱約約出現了一个我們老相識的鬼影——“一花独放，一家独鳴”不散的阴魂。

君若不信，請看以下两种論調：

其一曰“主流”論（又名“基調”論）。我虽不能对这种論調下

一个全面而确切的定义，但它大致不外这些内容：我們要貫徹“兩百”方針，當然允許各種不同流派、風格題材的作品出現，不過辦刊物嘛，總還得有個“主流”，有個“基調”。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對於探討其他創作方法，包括革命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論，以及用那些創作方法寫出來的作品，我們固然不排斥，但決不能和前者毫無區別對待，應當分個主次；我們刊物上發表的作品，應當主要是反映人民生活中我認為是先進的思想，以及當前重大題材，至於那些描寫兒女情、家務事，或是暴露、鞭撻生活中陰暗面和落后現象的作品，當然也可以發表，但只能占一定的比重。……一句話：任何一篇稿子想在我這個刊物上發表，就逃不掉我這根“尺子”的衡量，不能一視同仁。因為我們在刊物上要形成一股“主流”，定好一個“基調”；要放“社會主義之花”、爭“馬列主義之鳴”！否則，我們豈不失去“立場”了。

其二曰“標準”論。據說，這種論調是從“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發展”出來的。持這種論調的同志認為：雖然“百花”應當“齊放”，但具體到我這個刊物上，對反映各種不同思想的作品，取舍總宜乎有個“標準”。這個“標準”也頗簡單：凡屬我認為思想性“強”，教育作用“大”的作品（比如反映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它藝術質量的要求，可以從寬；反之，凡屬我認為思想性不“強”，教育作用不“大”的作品（比如反映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對它藝術質量的要求，則必須從嚴。換而言之，編輯部對來稿質量要求的標準，應根據它的反映的思想內容不同而有所區別。

這兩種“高論”乍一聽來，似乎也言之成理，但稍為推敲一下，就不難看出，它們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精神，是毫無相同之处的。

所謂“主流”論，實質上是宗派主義者所使的“障眼法”；主張這種論調的同志，正是頑強地用他的教條主義的眼光去看待文學和生活。

很明显，如果我们同意一个刊物对待不同的学术流派、风格、题材不能一视同仁，而要分什么主次，那怎地“齐放”得开？又怎能“争鸣”得响？因为你首先给别人安排的“位置”就不平等。这样做表面上似乎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穿了，不过是让别人来替你的刊物“点缀”一下版面，起着聊备一格的作用而已。再说，不否认生活中是存在主流与基调的，但这种主流与基调只有通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后可以在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中得到反映，决不应该坐在编辑部里凭着主观的“嗅觉”去定做一个框子来套作品、套生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那样编出来的刊物也许确有其“主流”，但那是教条主义者的“主流”；那种刊物也许确有其“基调”，但那是宗派主义者的“基调”。

也许有人会驳斥：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刊物看成一朵花呢？我这个刊物就算是“一家独鸣”，我提倡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写重大题材。你不同意，另外去办一个刊物，去提倡你的现实主义，以至浪漫主义；去写你的悲欢离合，儿女私情好了！那许多刊物加起来，不就是一所“百花园”吗？我想，如果有用这样的说法来反击我的人，那他不是闭上眼睛“死”抬杠，也就未免太天真了些。稍为正视一下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百花园”是不可能在我们文坛上普遍存在的。这道理就不必罗嗦了。不幸，我确听说过这类简单得“可爱”的论调。

如果说“主流”论者在宗派主义身上还披上了一件堂皇的外衣的话，那所谓“标准”论者，就是公开地以“卫道者”的姿态出现了。

我们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我们用来鉴别、批评一篇文艺作品的标准，决不能从这句话里得出把一篇文艺作品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对立起来的结论。因为决定一篇作品的价值是要看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程度怎样，而且，只有在承认它是一篇文艺作品的前提下，才可能用那两个标准去衡量。在整个地估价一篇作品时，如果先订出它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作品中不同的“比例”，那显然是荒唐之至的。

而且，同意“标准”論，就等于給主观主义者大开方便之門：只要我認你是“社会主义”的，那我可以降格以求，使你大放特放；如果你不幸被我認是非“社会主义”的，那我可以拿出高不可攀的艺术水平来要求你，使你永远沒有机会放出来。这样，結果还是我“一花独放，一家独鳴”，你且在一边“自慚形穉”去吧！

文章写到此处为止，最后补一句：一定要驅散这些阴魂！否則，我們的刊物无法办好；我們文学园地的百花也很难盛开！

（2）究竟为誰服务？（載“长江文艺”1957年7月号）

讀了李汉同志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艺刊物需要‘个性解放’”以后，不禁联想起一个問題：我們这么許多省、市的地方文艺刊物，究竟在为誰服务？

不要認为这是多余問題，刊物嘛，当然是为讀者服务呀！不，且慢下結論，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也不必在这里嘮叨了，可惜的是并不尽然。和李汉同志一样，我几年来也一直是地方文艺刊物的編輯，在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过这种滋味：由于刊物的領導（以至更高一层的領導）思想上不但沒有真正重視刊物为誰服务以及該怎样服务的問題，而且在某些并不正确的口号和简单化的領導方法下，使刊物脫离了讀者；同时，还苦了象我这样水平本不高而又搞具体編輯工作的人，我們浪費了不少精力，做了許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也浪費了国家許多財力。

即令我們在回顧过去工作的时候，“成績是基本的”并非假話，但是，难道那些缺点，当真是“不可避免”的？

請允許我摆一摆事实：

过去武汉市文联的机关刊物“工人文艺”一直是在“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針下，以“供給广大职工群众通俗文艺讀物，及文艺演唱材料，并培养工人业余作者”为已任的。

由于这个方針提法就有問題：“为工人”这且不去說它（其实这也經不起推敲：文艺作品，豈可以分門別类，指定这几篇是

“为工人”，另几篇是“为农民”……如此类推下去么？），“为生产”服务，确是貽害匪淺。既然为“生产”，那么一具体化就必然为鼓舞生产情緒，为解决生产困难，为提高生产效率，为介紹生产經驗，……等等目的而創作了。事实也确是这样：“工人文艺”上就发表过許許多多把新工作法行行加韵脚的“詩”；把技术革新的技术过程描述一番的“小說”；以及把郝建秀工作法分段配曲的“歌曲”。也有写人物的作品，但那也只是把劳模事迹加上一头一尾，主要内容还是他生产上先进的“事迹”而不是劳模这个人物。

我們长期以来，就是供給职工群众这样的“文艺讀物”和“演唱材料”。不否認，它們确也越俎代庖地为工厂的現場宣傳鼓动工作帮了一些忙，但作为文艺作品份内的职责——通过艺术特有的手段对人們进行思想教育，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塑造出有血肉的艺术形象，它們却扑了个空。所謂“內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絕非过甚其詞。

这結果是：我們主观上想为讀者服务，而客观效果却适得其反。写紗厂的作品搬运工人不看；反映机械厂生活的，店員工人不看。并不是他們有什么門戶之見，老实說，要求一个碼頭工人对一篇看不见人物艺术形象，而充斥着“断头率”“罗拉”“温湿度”等名詞的“作品”感到兴趣，也太苛求了。至于紗厂工人呢？一个每天八小时生产就尽在这些名詞和生产問題上动脑筋的人，闲下来想讀一篇小說，听一段相声，碰到的也还是它們，設身处地想一下，換我們自己，也未必欢迎吧！

可惜的是，长久以来，我們沒有正視这种情况，直到去年（請注意：是去年！）三月号的“工人文艺”为配合武汉市劳模代表大会还出了“劳模專輯”，在那上面把那一届市的特等劳模都一个不漏都包括进去，尽管題目花样不同，如訪問記，記劳模×××……而内容无非是把他們的典型事迹介紹出来。当然，也就基本上是这些劳模同志們在大会上为了交流生产經驗而作的发言。編輯部为完成这个“專輯”花了不少力量，但結果呢？这些“劳模

事迹”在大会期間的報紙上早已发表，而刊物却是半个月以后和讀者見面，明知誰也不欢迎，但为了“为生产服务”却一定咬着牙齿把那些过时的“新聞”穿上文艺作品的外衣，硬塞給讀者，可是讀者并不領情，那一期“工人文艺”銷售数最低，积压量最大；倒霉的是編輯部的人力和国家的紙張！

“工人文艺”是把“培养工人作者”为主要任务之一的。但却有这种怪現象：工人作者（甚至是重点培养对象）不看刊物，只有在一种情況下看一看某一期刊物，那就是当那期刊登了他的作品的时候。不能想象，刊物培养的对象竟对刊物毫无兴趣，那这个刊物除了滿足他的发表欲以外，能起什么“培养”的作用呢？

一般讀者不爱看；作者也不爱看，那刊物究竟办給誰看的？

过去，当我们提出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要有“文艺特質”的时候，立刻会有人給你及时地扣上一頂“脱离政治”的大帽子。当然，誰也不愿担戴这个罪名，于是就这么編下去吧！說句落后話：反正賠錢的不是我！

这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教条主义的理解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糾正，是于同行政方式領導刊物工作分不开的。这也就是說，决定刊物的方針任务以及具体的做法的，不是基于对党的文艺方向正确的理解和群众的需要，而是根据某些領導者的“看法”，这一些并不高明的“看法”就代替了党的文艺方向，誰有不同意的，就是反对领导；就是对党的文艺方向表示动摇。当然，这一連串的“推論”更是誰也承当不起的。这結果就是：刊物为某些領導者的个人的“看法”服务，而不是为讀者服务。例如前面所說的艺术“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口号，就是过去武汉市文联主席李尔重同志提出，而一直是認为是“无可爭辯”地正确的。几年来，我們这些搞“工人文艺”編輯工作的同志和其他一些搞群众文艺活动工作的同志們，也曾对它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希望展开討論，但結果討論是无疾而終，而这些不同的意見后来在历次运动中却成了反領導的“罪証”要你檢討、批判。刊物的領導一心一意为更上級領導

服务，而不去看一下那些卖不出的“工人文艺”，是怎样被收廢紙的部門称斤論兩地收买去！落空的当然还是讀者。

以上我提到的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事实无非是一些例子，我希望通过它們來說明过去象“工人文艺”这样的地方文艺刊物，并没有很好地注意为讀者服务的問題。而今天，我想是应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应当实事求是地了解一下，讀者究竟需要什么。比方說：一个文艺刊物既非扫盲課本或技术教科書，也不是宣傳鼓动材料，那么这个刊物具体的讀者究竟是那些人？仅仅提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农群众”在广告上也許可以，在具体編刊物的人思想上却不能如此揣統，必須心中有数，而这就須要靠深入群众去調查了解，不是高高在上能解决問題的了。

真正解决了刊物具体为那些讀者服务的問題，才可能考虑刊物的特点、风格等方面的要求；当然，这么做还得在一个前提之下，那就是：文艺作品应该也只能通过它特有的方法来起教育、感染人的作用；任何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片面、生硬或是含混的提法和做法，如文艺“为生产服务”等，都应该通过討論，得到澄清。

二、卢盛謨在“鳴”“放”中的右派言論(摘录)

(1) 对党的領導和人事制度进行攻击的言論

卢盛謨說，我認为人事工作有毛病，人事干部从来沒給干部做工作，很多負責首长的爱人都当人事科长，为什么人事干部必須是党团员不行呢？

卢盛謨同意“选举編委会，选举組长”的言論，并在會議上提出：“建立全体編輯成員大会，并賦予大会以选举、罢免編委的权利”的意見。当这种言論受到駁斥时，公然質問主編吕庆庚（“桥”刊編輯部主編）說：“誰来監督編委？”答：“省委宣傳部。”卢又質問：“誰来監督省委宣傳部？”

卢說：干事是会找到你头上来的（指找到群众），在外面出头露面，招搖撞騙的是另外一批党团员。

卢說：一件事情，总是党——团——群众，非要搞三道，我看沒这个必要，其实倒霉的还不是党团员，老張（原“工人文艺”主編）評七級沒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主任，是党员，真是一朝入党，身价十倍。党员的江山不是鉄打的。

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論后，卢說：党的政策很难捉摸，是不是又收了，除三害的消息一点也沒有了，反过来整别人。提意見不一定歌功頌德。党的气量太窄了，不能容人，章伯鈞的意見讓他发嘛，没人会同意。党估計群众的觉悟太低了。“言者无罪”怎么講？“人民日报”批評“文汇报”、“光明日报”太不謙虛了。开始鳴放它不积极，“卫道”倒很积极。

卢还散布这样的言論：人总是要发点謬論的，可是，发了还要磨你的棱角，唉，棱角磨光也好！“是非皆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再不写杂文了，写我的剧本罗。

（2）对社会主义制度及文艺方針的攻击

卢盛謨在作协鳴放上講：作协領導文学創作活动，思想上是教条主义，工作作风上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把参加青年文学創作會議的作者諷刺为：“这些人們虽系新生，并非力量。”說工人作者×××同志根本不开窍，没什么搞头。

武鋼上地文学小組有成績，但也有缺点。

卢盛謨說：到底文学小組有啥用？文学小組是沒有成績的。黑丁同志是否研究过。在反胡风时，因为曾卓提出要取消文学小組，就籠統地肯定它。張云驤（当时“工人文艺”主編——編者）也睜着眼睛說瞎話，写了一篇經驗介紹，天知道写的什么东西？主觀主义籠統地肯定是不合实际的。

卢說：“‘工人文艺’搞了几年，哪篇算是真正的作品呢？”“武汉市真正写戏的有几个？”“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沒一个能干活

的，就只吳丈蜀（出版社右派分子——編者）有板眼，17級干部，將來成立作協出版社，江云（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右派分子）搞思想領導，吳丈蜀搞業務。盧攻擊黨的文艺方針時說：李爾重讓我們的刊物為生產服務，確是貽害非淺。

盧說：“說我們國家有自由，為什麼不允許象香港那樣辦各種報紙？”“我們國家不如英國那樣民主，那里倫敦有個海德公園，你可以隨便去講演，誰也不干涉你。”

討論斯大林錯誤的問題時，盧說：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完全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把黨權政權軍權集中到他一人身上是造成個人崇拜的原因。又說：蘇聯不應出兵干涉匈牙利的內政。

反胡鬥爭中，張云驥只說個“我退出了陣地”就沒事了，這是因為有黑丁（于黑丁，作協武漢分會主席）同志支持他，這不是宗派主義是什麼？

吳丈蜀的右派言論

按：吳丈蜀系湖北人民出版社第四編輯室文藝組組長。這個材料是他在鳴放中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一部分。

一、5月24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民主黨派成員、 非黨科組長以上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社內黨員與群眾之間築起了很高的牆，黨員很少接近群眾。大多數黨員接近的是靠攏組織的所謂積極分子，黨員的接近群眾就好象害怕接近傳染病者一樣，這樣，黨員就更飄飄然，自認為是真理的化身了。積極分子從中挑撥離間，社內划了幾條鴻溝，知識分子看到這些感到很刺眼。中國的知識分子過去是“土可殺而不可辱”，知識分子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和黨一樣，但由於有一道牆，使知識分子不能暢所欲言。

解放初期，我認為黨員的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幾年以來我的看法是有變化的，起初是神而敬之，後來慢慢變了，因為我看到黨內也有貪污分子，腐化墮落、爭名奪利的分子，而我在非黨群眾中也看到有大公無私的。隨着時間的改變，我對黨的看法也有了改變。在社內也是一樣。值得我佩服的就佩服，不值得我佩服的就不佩服，儘管他也參加黨的會議，由此，我與黨的距離一天天遠了。

至於三害，我社是有的，尤其是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更為突出，知識分子好象是天生落后的，給他一碗飯吃，就是天高地厚的了，不論是什麼運動，幹部培養與生活上照顧方面，也是不平

等的。如分配房子無論需要和职务都應該在社內分給我一間房子，如果說是肅反未作結論，說我該槍斃、該勞改都可以，為什麼在結論作出以後還不分配我房子呢？我認為這只有用宗派主義才能解釋。編輯人員的安置也大有問題，有的黨、團員文化水平都成問題，調來作編輯工作，這不是笑話嗎？其次，我感到機關衙門化、文牘主義，人多事少不能用人唯才，因此產生很多不良現象，看起來，我們機關是死氣沉沉，不是欣欣向榮的。

二、5月25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文 藝組第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到目前為止，哪些黨員在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我還看不出來。我很懷疑這些黨員的職務。如憑能力和積極性，和非黨同志換一下，非黨同志完全可以搞好。以朝鮮戰場上的英雄為例，邱少雲不是黨員，羅盛教不是黨員，但他們那些高貴的品質，仍可算作非黨布爾什維克。

我社黨支部發展黨員是唯成分論，唯歷史論。對知識分子注意不夠，尤其在舊社會呆過的知識分子更無希望。當然，這不等於要求凡知識分子都可以入黨，但黨應開始考慮培養。

社內對知識分子，某些人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所以，這些人都感到生活很孤立。

有些人為了追求進步，都願接近黨員，但並不是所有的黨員都先進，如錢洪山，我就看不出他的先進性。

我始終是唯“心”論，希望組織上糾正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並且要加強對黨員的教育。

領導上對積極分子的培養有問題，固然，積極分子中有積極分子，但也有人不是，而是混在裏面的，這就加厚了這堵牆。現在是和平環境，不易考察一個人，而要“路遠知馬力”。領導老是喜愛這些積極分子，但打開他們的靈魂來看，都很污穢，這是黨

的責任。

三、6月7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第三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以小知識分子的身份向黨支部提些意見。

中國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追求真理，願意為知己者死，重氣節，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但也有缺點。在舊社會，他和全國其他各階層人民一樣迫切要求解放，也願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得到改造。但是，解放後，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痛苦，知識分子受歧視，不被信任，以恩賜觀點對待知識分子，把它當成包袱。給你一個工作，一碗飯吃就夠了。

解放初期，我對黨抱有幻想，但幾年來，黨對我冷遇使我與黨的距離越來越遠。

關於聽黨課問題：我在1952年就向黨提出了入黨申請書，可是沒有人跟我談過話，受到冷淡，連黨課也不叫聽，思想上產生極大混亂，感到追求進步的資格也沒有了，黨把我追求進步的熱情也趕走了。於是我在政治上消沉起來，感到沒有奔頭，這應該由黨支部負責。

關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問題：保密檢查有必要，對加強了解、澄清問題有好处，但檢查時方法粗暴，尤其是具體執行檢查任務的魏啟元同志，態度很粗暴。我第一次感到冷酷無情，從他的態度深深感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自己平時以革命者自居，卻遭到了搜查，使我回憶當年特務搜查進步人士的情況，但當時受搜查是光榮的，現在是受辱。我當時冷靜地觀察搜查者的外貌，我想，我不能放棄這樣一個觀察人物的機會，將來有機會把它寫進我的小說里去。舊知識分子在運動中沒有問題也有問題。

我不願意當應聲蟲，不願意違背自己的良心說話，但往往匯報上去說我喪失立場，遭到一系列的打擊。如去年毛主席編的“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社一印三百多万册，我当时說印这多一定卖不出去，这个意見反映上去后，認為我的看法奇怪。現在事实怎样呢？据湖北分店反映，他們就积压很多。

我建議，以后对知識分子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缺点也要多加教育和帮助。这道墙要拆。

（吳丈蜀发言后，卢明生不同意他的发言中認為保密檢查有必要的看法，吳丈蜀即作如下补充发言：）

关于保密檢查問題，我剛才談的是，当时我在那个具体情况下的看法，領導上一直把姜宮魁当做积极分子培养，主要是因为此人貌似忠厚，其实内心是肮脏的，最近就揭发他有違法乱紀行为。另外，也因为他会拍馬屁，以奴才身份对上級領導，唯命是从，善于体会領導意图。他身为劳保委員，主动向梅社长提出补助，結果，連升三級。

和穆熙的右派言論

按：和穆熙系湖北人民出版社第四編輯室文艺組副組長，这个材料是根据該社整理的材料摘录的一部分。

(1) 关于国家制度

1. 我們的选举制度要考虑一下，等額选举制就包括了很多官僚主义。党通过领导人考察一个干部，过多的考察对党忠诚（对领导的态度）的一面，而对党与对人民的忠诚，大选举反正不認識，可是小选举也效法就……（以下缺）。

（和穆熙 5 月下旬在文艺組的发言）

舒相迪回忆和穆熙这次发言的内容道：“他認為我們的选举制度是不民主的，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也保护了官僚主义。他認為选举时应该有人竞选，我选掉了你来，你选掉了我来，这样才合理，才能充分发揚民主。他說，尤其討厭的是机关内部的选举，如工会、青年团也采用这样的选举，更是不合理。”

2. 在文艺組的一次整风會議上，他認為解放后人与人之间沒有感情，是社会制度和风气的問題。

(2) 关于贯彻知識分子政策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3. 我感到社领导对出版社的性質特点估計不足，对需要依靠什么人这一点不明确。至于我个人究竟算不算知識分子不管它。我感到社领导如何针对知識分子的特点进行教育，用和风細雨、諄諄善誘的方式做得很不够，而是用简单、草率的方式。这样只

会带来更多的反感。

(5月24日在科組長及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4.在生活里面也应该允許有百花齐放，領導上对一些小事情不要用放大鏡来看，这样就不好解决問題。生活的風尚也需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要使生活活跃。

(5月24日在科組長及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上的發言摘錄)

(3) 关于党团宗派主义

5.領導只是接触一些泡在酒精里的同志，認為这些消了毒的人才是最可靠。六七年的時間在編輯部只发展了一个黨員，对待迫切要求的同志，采取冷淡态度，有些同志写信竟置之不理。希望把視野扩大一些，不要小手小脚，梅社长就是如此。

(6月7日在編輯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6.領導上听取汇报是必要的，但深入了解下情更有必要。积极分子的流言蜚語不能全听。

出版社程和鳴入党时，我說他成份好，也受到批判。当时馬上有同志站起来說：程和鳴不仅是成份好，还有許多优点，事实上我当时沒有否認程有許多优点。

(5月24日在科組長及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上的發言摘錄)

7.提拔干部就看是否积极分子，党团员胡野提拔，卢明生不能摆19級，胡初中毕业也摆在19級就是應該的嗎？卢因工作不安心，被認為是落后分子，放在編輯部大会上來討論。他为什么起了那大作用，就因为他是团员，积极。

(5月下旬在文艺組的發言)

8.党内有无宗派我不知，在团内我是感到有些微妙关系，这是生活直感，具体情况我說不清楚。

(5月下旬在文艺組的發言)

9.我过去对青年团的組織生活感到不滿足，但却被認為是瞧不起团組織。青年团内也有宗派主义，团的工作把持在某些人的

手里。

(5月24日在科組長及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4) 關於省、社領導

10. 整風放、鳴階段，他在組內大放厥詞，說要為編輯爭地位，爭待遇。由他邀集組內一部分同志在6月上旬的一個晚上，舉行了一個會議（會議曾討論同仁出版社、編輯訴苦等等問題，有江雲和吳丈蜀參加），第二天，由和穆熙執筆寫了一篇為出版社編輯“鳴不平”的稿子，曾投往“長江日報”，未刊登。6月7日，曾部長參加編輯部門整風大會，和曾以同樣內容發言。以後，並將原稿送整風辦公室，打印在“意見彙編”第一號上。下面是這篇文章的摘要。

* * *

黑戶與大戶

——來自曠野的呼聲

兩點說明：

這是前些時寫給“長江日報”的一篇雜文。遺憾得很，它遭到了報社退稿的厄運。可見，連爭鳴也有等級之分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是一篇雜文，由於形式的限制，它不可能象一個“報告”那樣心平氣和，因此，字里行間許多迹近刻薄的尖銳，倒需要領導機關的雅量了。

——作 者

爭鳴的鑼鼓近來敲得是夠響亮的了。在文化界，離唱正戲尚有許多距離，但总算——不敬得很——已經開場了。君不見，作家、教授座談于前，記者、“編輯”（此“編輯”乃報社、電台之編輯）爭鳴于后，不才忝居斯文，而又濫竽編輯之列，照說，理應從這些“座談”和“爭鳴”的消息里得到鼓舞和慰借，雖不必因此而三呼萬歲，但至少應消除心“頭”之“不平”。“不平”既去，則“鳴”從何來，所以在目睹了省市文化界的爭鳴以後，我們似乎是无話

可說了。

然而細細想來，事實又並非如此。

(以下三段都是舉例說明領導機關不重視出版社編輯，均略去。)

過去有人說，在文壇中最低下的是編輯，而編輯中，報社居上，電台居次，刊物居三，出版社居末。其實這話並不盡然如此，居末雖不大光采，但畢竟還意味着出版社編輯在社會上的存在。現在的事實則是出版社的編輯根本並不存在。所以我們倒象是一門黑戶。

黑戶是人為的，我們要向王任重同志登戶口。我們同時要向作協武漢分會登記正式——過去有點象臨時——戶口。

“黑戶”一事且按下不表。現在再說一說所謂“大戶”。

如上所說，“黑戶”是人為的，儘管社會上沒有這一戶的卡片，但這一戶却畢竟是千真萬確的存在着。托國家和作家之福，這一戶稍微能賺點阿堵物——請恕我們“商人”習氣——，而且還有幾個不象編輯的編輯。於是吃大戶，罰勞役，出版社和出版社的編輯則是逃不掉的。(以下敘述出版社送書、送紀念冊，請作家吃飯等，說明作協等吃出版社的大戶)

.....

來自曠野的呼聲是微弱的，但愿這微弱的呼聲能療救這病症吧。

11. 他認為梅社長是不懂知識分子的，因為梅社長自己不是知識分子，他對知識分子很粗暴。

他還在組內談：“過去，我認為梅社長水平低，作報告也作不好，聽他的報告象是受罪，所以，我只有用溜掉的辦法對付，過去有人認為我是打擊領導，我現在完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

12. 梅社長對領導文化工作是不行的，有粗暴之處。找了幾個同志談了個把鐘頭，就算開了知識分子座談會了，這是形式主義。

魏啟元憑什麼當辦公室主任，就因為他是黨員。

(5月下旬在文艺组的发言)

(5)·关于积极分子

13. 整风放、鸣阶段，我社出现了一张大幅的画报，集中地对积极分子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张画报的诗和说明词就是和穆熙执笔的。

原文如下：

* * *

真正的积极分子，在今天——和往常一样——他们仍然闪耀着战斗的光辉，而那些披着××引号的积极分子们，在真理的巨风前，显露了他们的原形，……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可敬的人物发自内心的独白吧：

响应号召是我们的“天性”，
摇旗呐喊将使我引以为荣，
领导的意图我最能体会，
个人的好处啊
真是无穷无尽。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可敬人物的过去：

- (1) 不遗余力地……
- (2) 唧唧喳喳……
- (3) 尊经“卫”道
- (4) “拍”技多端
- (5) 批评乎？拍马乎？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可敬人物的现在：

- (6) 未雨送伞
- (7) 献上媚态
- (8) 用心良苦
- (9) 权衡得失

在未来的日子里

(10)搖尾乞憐，原形畢露

為存恕道，暫不点名，若再沉默，筆不留情！

* * *

14.反右派以後，黑板報發表了“攻擊積極分子對整風有什麼好處呢？”的社論，他很不滿意，追問舒相迪，這篇文章是誰執筆的。

陈家谿的右派言論

按：陈家谿系湖北人民出版社第四編輯室文艺組編輯，这个材料是根据該社整理的材料选編的。

一、5月25日至29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組 整风會議上的发言

是否可取消“积极分子”的称号。这样积极分子，对群众都不好。现在工作上說起来有领导，实际上沒有领导。

我对听党課也感到很神秘，有时我就不敢講我听了党課。因为：1.怕說出后自己表現特殊；2.党課沒内容，老一套，有的講錯了；3.通知听党課的人鬼鬼祟祟，故作神秘。

党发展濫了一些。应很好整頓。

工会和行政的关系是很痛苦的。群众有要求用錢的时候，第一个去找魏启元，絕大多数时候是一口拒絕。工会主席的地位非常尷尬。到使用你的时候，他可以利用的时候，就想到你了。我当工会主席象是一种刑罰，又象汉献帝一样，遭到許許多多的委屈，党政领导不重視，不尊重人。党团员的权力很神秘，虽然他們不是领导，我对他們是敬而远之。55年参加文艺会演，使我感觉到各地都如此。要解决問題，必須找党员的领导干部，非党干部說的話往往不算数。在我們这里，党团员对群众有些側目而視，好象我們身上有臭味似的。胡林茂这一类的人做了党和群众間这道牆的加高培厚工作。一点小事就向江云同志反映。

现在，总结、报告之类是形式主义的，公式化的。往往总结

得好，說得漂亮，而實況并非如此。我有一個朋友，他怕做總結，往往找到我，挖空心思找成績、經驗。總結寫好後即擱起來了，當成廢紙。討論總結時，先靜默五分鐘，空話半小時，然後通過。領導同志很欣賞這一套，認為總結可代替工作。我有一個朋友，過去感情很好，可說不分彼此，而入黨後即變了，只有冷淡，再無熱情。內弟是我看到長大的，我對他也很好，入黨後也變了，同他說話愛理不理的。

黨的發展組織可以遲一點，不必採取分批培養法。目前社里的培養方式很生硬。聽黨課的方式如不改變，本人表示退出聽黨課。

假積極分子固然不應該吸收入黨。黨外也可以具有高貴品質的人。為發展而發展大可不必，組織主動吸收也不必。去年吸收的高知（指高級知識分子），就有為發展而發展的情況。

二、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第一次 全體大會上的發言

6月3日：

職工代表會要鳴放，不能操之過急，想用解決某些具體問題來緩和緊張局面。所以說職工代表會只是邊整邊改，在目前還是不大切合實際的。工會還沒有和群眾講話，如果不是黨團員當一個工會主席是很可憐的；大家都知道，科、組長不是黨團員，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重要的工作、麻煩的工作都推給工會。去年開展先進工作者運動，要工會作報告。有許多工作得不到支持。特別是表現在魏啟元身上。領導上對群眾團體是有用的時候便用，如外面宿舍的分配問題，開始是用工會的名義，後來大家從新成里搬進來了，而我不知道（因為我是房屋調配小組），後來知道是魏啟元同志決定的。這是強姦民意。

關於聽黨課的問題，其他的機關都是公開的，征求大家的意見。我們是神秘的，鬼鬼祟祟的。有些認識淺薄的人自以為光榮，

有优越感。党課内容老生常談，甚至有講錯的地方。党課内容可以在电台广播，沒有神密的必要。

肃反中突然来一个反右傾，我感到很突然，又做得很激烈。有些被批判的对象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可靠的，使人昏头昏脑。有些会开得很沒有目的，好象領導上是为了沒有事而布置下来的。反右傾以前那样疲蹋，到反右傾何必那样緊張呢？

保密檢查有問題，进行时感到不大对头。明明是組織“搜查”，为什么要美其名曰：“保密檢查”。我是执行者，但我不同意。这是違反宪法的。这样做屬於公安局的范圍。这个事要反映到上面，如果做錯了，要公开道歉。現在群众都不敢写日記。肃反为什么不讓我們出去，使人失去自由，这說明一切片面都是以党代政。缺乏法制观念，到了現在，刑法、民法都沒有。

6月7日：

关于“偏听偏信”，几年来一直是这样，领导个人有好恶成見。造成的原因，是有些团員或某些同志喜欢向领导汇报，领导人也喜欢听人汇报。这个制度不是好事，如果汇报制度是中央規定的，要反映上去，重新考虑。江云說她沒有培养小人，但問題不这么简单。汇报人是否言行一致？不能說所有的团員和积极分子都是人道的，都有些人带个人动机。要依靠人民，不要依靠少数人，建議取消“积极分子”称号，总的行动說明了誰是积极分子。虽然党並沒有說誰是积极分子，但实际上是有的。有些同志講了几句积极話，就会被諷刺为“积极分子”，这不是一句好話。为什么把200多个人分为这么多等級呢？这样分法不需要。要明白宣布：沒有积极分子存在，或說都是积极分子。

三、6月13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共青团支部 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我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做法，不能以理服人，它給人們的印象

是收了，这确是会影响大放大鳴的。社論中还說如果有說是要收了的人，那就是“太无知”或“别有用心”，我們很多人有这个感觉，那么是否我們这些人就是“太无知”或“别有用心”呢？这簡直太容易、太粗暴了，实在很不高明。“人民日报”社論杀气騰騰，把肃反中用过的話都端出来了。群众是有分辯是非的能力的。前几天，我在街上看到武大学生貼的标語，群众看后就議論那条对，那条沒有道理不象話等，可見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葛佩琦、儲安平等錯誤、反动言論是不会把群众搞乱的。“人民日报”作法不对头，毛主席保証过“言者无罪”，“人民日报”不应该带头“圍剿”。“人民日报”社論常常是为中央政策的补充文件，因此应特別慎重才对。

儲安平在解放前办“观察”是很进步的，功績也很大，国民党恨他、通緝他。我記得他在“观察”上发表过社論，支持学生鬧学潮，反对国民党。他在解放前做了很多好事，我很崇拜他。因此，他今天講了“党天下”的錯誤言論，应该与葛佩琦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加以区别。

思想反动跟行为反动是有区别的。工人、农民也有对党很多意見的，可能还有比儲安平更反动的言論。工資低的工人有意見，有些农民合作化以后認為劳动强度受不了，过去能做点小生意，現在不能做了，不要天真地認為这些意見是来自富农，貧农也同样，有对党不滿的。所以思想反动不等于行为反动。

給这些人加上“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等帽子，沒有什么好处，只会带来副作用。

汪誠：領導者和黨員和非黨員

按：汪誠系湖北人民出版社總編室助理編輯，這是他寫給黑板報的一篇稿子。

有個非黨員根據工作情況和自己所學，要求調到編輯室去。他鼓着勇氣跑到領導者的房里，碰見了領導者，小心翼翼地道出了自己的心願。

領導者正襟危坐，說了一番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关系的道理，最後作出結論：“雖然你可以搞編輯工作，但應該服從集體利益的需要，何況編輯室並不一定差人！”

“不！”這個非黨員苦喪着臉，語音非常沉重地說：“如果工作離不開，編輯室不差人，我根本不會提出這個要求：這中間並不存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問題……還是請領導上研究研究罷！”

領導者生氣了，橫眉皺額地瞅着這位非黨員：“不調你去怎麼辦？你的思想真難打通！”說罷，還嘆了一口長氣。

非黨員沒敢作聲，沉默了一會，低着頭，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過了幾天，領導者的房里又有個人要求調工作，也是要求到編輯室去。這人是黨員，但水平却很差。

領導者異常親切，沒有等他的話說完，就笑咪咪地說：“好罷！現在教育方面可以安插人，把你調到三編室去，鍛煉鍛煉！”

“是不是……可以……重新考慮一下？”這位黨員慢吞吞地帶着難為情的口吻說：“我不想編教育讀物，我對文藝有興趣！”

領導者笑了笑，輕輕地點點頭：“可以考慮，你先去罷！”

.....

第二天，這位黨員的辦公桌，果然搬到文藝組去了。

一天，這個非黨員碰見了另外一個非黨員，委屈地道出了這件事，那個非黨員似乎也有同感，低沉地“唉”了一聲，接着勸慰這個非黨員說：“算了罷，人家是黨員！”

潘之辛的右派言論

按：潘之辛系湖北省文化局工作人員。这里选編的三篇文章，是在大鳴大放中，大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一系列言論中的一部分。

一、“整风杂感”

我这里的所謂“感想”是指感性認識而言，按照“实践論”教导，仅是認識的第一过程，因此不是認識的全部，因此就不是全面的，因此必然是片面的，但也必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想，任何一个問題，往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而且两方面可能都是对的，問題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待什么对象，用那些做法和制度比較好些，这个就是真理，举个例子来講，过去国民党要杀人，共产党也要杀人，从“杀人”来講，都不是好事，但从为了推翻黑暗統治，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講，那么共产党的杀人不仅是对的而且必須杀，虽然有不少被国民党拉来当炮灰的无辜劳动人民也被杀，也是不得不如此的。

以下就整风中所感到的点点滴滴，另另碎碎的問題发表一些感想：

1. 这次整风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于是乎全国上下来了个大放大鳴，是不是以前不存在矛盾？大家无意見？那不是的，只因为党中央还未提出来，所以对一些問題不敢“鳴”不敢“放”，所謂“不敢”就是无形中有了“禁忌”，現在开禁了，到处一片爭鳴声。是否

就“鳴”“放”一下，痛快一陣万事大吉？不是的。严重的問題是：如何正确地、及时的解决一系列带根本性質的問題，这就要看下文，下文做得好不好，大家在“长頸而望之”。

2.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共产党是个政党，政党是以它的政綱和实际行动来取得人民的信任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張和行动有利于国計民生，所以我們都拥护它来领导国家工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对某些地方、某些問題的处理还有一些意見，这本是不足奇怪的。但偏偏有些同志把共产党神圣化了，造成了带偶像崇拜的风气，到現在还相当濃厚。例如有些人認為：黨員、甚至高級黨員领导同志是有缺点的，但党是絕對正确的，不会有缺点的。但是我怀疑：南斯拉夫的問題，是整个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問題呢？还是只“鉄托”一个人的問題？匈牙利事件，是党的問題呢？还是领导者个人的問題？为什么只能向黨員提意見，不能向共产党提意見呢？現在反映出来的許多問題，是带全国性、普遍性、根本性質的問題是不是党的問題呢？我認為真理是相对的，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某时、某地、对待某件事物的正确做法取得暫时的絕對真理，对政党来講恐怕也不例外。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千年不变、万年通用的真理。

3. 我認為現在中国的政体，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人民代表大会是个形式机关而已，看几次全国代表大会討論問題，一致同意党中央提出的方案，充其量是枝节問題，在文字詞句上略加修改而已，帶有根本性質的分歧性意見，我还没有看到过，是不是沒有問題，我看也不是，这次整风各界人士所提出的意見，有不少是带根本性質的問題，我認為現在的选举制度也是有問題，別的地方如何，我不知道，就以我們的选区而言，选举人民代表是不民主的，完全是包办代替，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要选出代表七人，由某些机关、团体指定七人，叫我們这些公民們去画圈，非常抱歉，对这些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彼此不相識，我投了一票，究竟能否代表我的意志，那很怀疑。据說，如果你不同意，

可以全部选举別人，看来好象很民主，其实是說說而已，不信？你試試看。更妙的是，有人提出过意見，而党报上答复：“这是最民主的选举办法”，你不滿意，那么放弃权利吧，也不行，“人言可畏”，如果因而怀疑是个反革命分子起来怎么办？所以每当选举的时候，便不得不忍受着“民主被損害着”的心情，画上几个圈圈。不能怪，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日子里，人們的心情并不是欢欣鼓舞的，外边打鑼敲鼓是人为的假象。

4•有人說你似乎是要要求資產階級民主了，我也不承認，我是拥护共产主义的，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感到国民党可恶，共产党好，所以参加。我要求这样来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杀人尽量少杀一些，斗争面尽量狭一些，要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出发来进行革命和建设，要求有充分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的話，要高度尊重人的人格和意志。政治上能充分民主，經濟上能日益繁荣，文化上有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符合于我的愿望，所以我拥护，但并不等于沒有意見了，例如“三反”“肃反”随便把人关起来，就是違反宪法的事，报、刊、图书的出版完全被共产党一党所掌握，言論、出版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开国以来还未看到过一篇文章或一本关于不同政見的申述，以及机关生活普遍不很民主，也是时有感触的。最近一些言論自由了，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希望以后能保持下去，并且更加发揚。

5•人民內部矛盾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矛盾属于物質性的。我們現在的經濟生活比过去大大不相同了，提高了不少。但也不可否認問題也越来越多，基本的原因在于物質生产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确实是个困难問題，但是否在問題的处理上就沒有錯誤了呢？我想不是沒有，是否有些困难就是不能解决的呢？我想并不都是这样。由于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地处理国民經济問題，也人为地造成了一些困难，例如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国来了个基建節約方案，好处是的的确節約了一部分投資，但坏处也有，

相反地也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又如一九五六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步子放得大了一點，各方面沒有平衡好，也浪費了不少物資，造成不少損失，有的大型工程上了馬走不動，不得不下馬，也造成了一些浪費。既有浪費，那麼就是應該辦可能辦的事情卻沒法辦了，這就造成了一九五七年的緊張，增加了人民內部的矛盾。所以我想：輕重工業的比例問題，農業生產增長的速度問題，消費與積累的比例問題，是可以再反復研究一下的，如果能在這些方面作適當的調整，即使是一個小項目，一個小比例，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解決不少。

6.今年在教育事業方面是個人民內部矛盾之一，有許多學齡兒童不能入小學，有許多小學畢業生不能升中學，有許多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大學。根據報刊上宣傳，說這是正常現象，我也不完全否認是個正常現象，所謂“正常”是和歷史上情況比較而言，但小孩子不能入小學讀書，究竟不是好現象，有的農民講：“現在強調掃盲，年紀大了，此盲不掃也可以，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在新社會里當個文盲”，這種要求是合理的。再說，普及小學也是個國家的基本建設，好壞後果要十幾年以後才能見效，十幾年後我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了，到那個時候還有一大批青年是文盲，那是對國計民生不利的，或者說，現在讓小孩子成文盲，將來大了再掃盲，我看這樣做不好。我的意見，應該儘可能讓所有學齡兒童入學，不能入學的也一定要讓他們讀書識字，即使要國家再多拿出一些錢來辦小學，就是從重工業投資方面挖一點出來也是應該的，何況現在還有許多不合理的投資安排。別的不說，就拿武漢市新建大型歌劇院一項來看，投資150萬元，不建行不行，我看也可以。拿來辦小學，就可以解決幾萬個小學生一年的教育經費。

7.最近來，從上到下大張旗鼓宣傳節育、避孕，我却頗不以為然，倒不是說我要反對節育、避孕，而是不必這樣大張旗鼓的宣傳，對某些人來講是有必要，但這樣做如果是出於國家的人口政策，那就頗有懷疑了，我國向來以“人多地廣，物產豐富”自豪，

記得毛主席也以此自豪過，現在不行了，似乎有“人多为患”的灾难了。中國的人口密度在世界各國比較起來還不是密度高的國家，從經濟上來講，我國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約可增長6—8%，而人口自然增長平均每年約2%左右。現有人口的經濟生活少增長一些，節省一點給新增人口，何嘗不可以呢？如果象我們這樣的國家，人多了搞社會主義有困難，那麼日本、比利時就不能搞社會主義了。何況小孩子長大後還是個勞動力，增加財富的。我看問題還在於經濟建設的安排，開辟新耕地和農業機械化的速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在十年以後還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我看這個社會主義也沒有什麼搞頭。如果十年以後能夠實現農業機械化，二十年後能夠實現農業電氣化，那麼人口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在這十年以內，我們在經濟生活上少增長一些，工業化還是搞得起來的，節育避孕不作為全國性的政策來處理。從歷史規律來講，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是超過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的。不然的話，將來到了共產主義，就會發生人多为患，要鬧“人口革命”了。

8. 唯物辯證法是革命的法宝，也是官僚主義的法宝，因為辯證法這個玩意兒，運用得好是辯證法，運用不當就是最巧妙的詭辯，很能迷惑一批人的，而官僚主義者往往借用辯證法來為自己打掩護，說來說去總是他的有理，例子到處都有，例如56年事業發展的安排，明明是冒了一些，造成了不小的損失，但偏偏說是：“大發展肯定是好的，發展中缺點是難免的，損失的代價不大，而經驗是豐富的，所以是個便宜事。”損失的代價不大嗎？1956年多用了二十多億，我看不小。如果56年少用這几十億，放到1957年來用，可以辦好多事，發展速度也正常了，人民內部矛盾可以相對地少增加一些。再有，明明這個人是個吹牛拍馬的投機分子，却偏偏要說投革命之機還是好的，明明是這位黨員在各方面講還不夠當個什麼長，但偏偏要說是培養幹部。明明是這件事情不應當這麼辦，這麼辦是錯了，但偏偏要說在某個方面看不但沒錯而且必要。明明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問題，但偏偏說從歷史發展來看，

現在比過去改善得多了，所以是正常的等等，等等。

9. 在封建社會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寒窗十年，苦求功名，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好風氣。有出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萬物皆下品，唯有金錢好，因此，不惜投機倒把，傷情害理，只要發財致富，是當時社會的一種風氣。有板眼。現在呢？萬人皆下品，唯有黨員高，黨員提拔在前，不論他稱職不稱職，黨員可以換取愛情，所以許多女同志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黨員。黨員在生活上能得到優先照顧等等事實。因此也形成了一種風氣，爭取入黨是成為一些人為達到以上目的的必要手段，於是乎處處小心，暫時壓制這些見不得人的個人企圖，開口進步，閉口政治，運用一切時機，尤其是運用各種運動，十二萬分積極，再加点吹吹拍拍，裝出一副進步樣子，於是乎居然混進黨里去了，一旦入黨，就慢慢地露出尾巴來了。這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性的（當然不是說每個黨員都是如此），所以事實上是形成了一種風氣，但更妙的是發現了這個狐狸尾巴以後，也有其掩護，那就是：人都是從舊社會來的，殘余影響是難免的，黨並沒有要求所有入黨的同志都精通馬列主義。最後還有一個法寶：凡是人都是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作為人就不能沒有錯誤，共產黨員也不例外。這是毛主席說的，於是乎天下太平。

10. 最後一點希望：這次整風運動，是黨中央開了禁，所以敵人才敢鳴的，但並不希望只是要同志們“鳴鳴”，讓領導“听听”，如任局長所談：“大家都把意見‘倒’出來，‘倒’完為止。”以後呢，枝節問題上“改改”基本問題上不動。甚至是把這些材料都列入檔案里去，立此存照。可能以後來個什麼運動，便可用來“以君之矛、射君之盾”了。的確，還有些同志認為“鳴”了是“有害無益”的。

6月3日

二、关于儲安平等人的問題

最近一个时期的报纸上，各种各样的言論，五花八門，这是在思想战线上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許多人对于葛佩琦、儲安平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論很气愤，我認为倒也不必，問題在于駁斥。关于葛、儲等人的言論，我說很好，他們的言論是有功于党，有功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應該感謝他們才是，他們的“功劳”比傅作义、陈明仁等人还要大，如果他們能够接受批評，轉變过来的話，很應該看重他們。本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大家都拥护，沒有一批人来反对，那才是天真的想法。他們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談出来，总比不談好，何况这些思想情緒还是有其代表性的。党就可以把这个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尤其是对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階級出身的人。沒有他們，現在还不会提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界綫，还不能說明現在还有右派分子存在。那么在許多人的思想上还不会这样明确。我就是个，开头，我看到儲安平的发言，並沒有看出什么問題，相反的多少有些共鳴。后来一看，說是他的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的言論，这才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究竟很差。

因此，我又联想到言論自由問題，过去我認为言論自由應該充分发揚，但，要有个界限，就是只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論自由，不能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論自由。現在我認为不必这样限制，你要講什么就講什么，社会主义的言論果然好，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也可以，这样可以引起爭論，可以从爭論中教育人民，馬列主义既然不是牆头草，那又何必怕人攻击。不要不相信党的力量和人民力量。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客观存在，尤其是在过渡时期，沒有这种思想倒是奇怪的。对思想問題用行政命令，用压制的办法是不容易解决的。只有用爭論和說服的办法才能解决。在爭論和說服过程中，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也是收效不大

的，必須用事实來論証。

*

*

*

去年搞“私改”高潮，報刊上宣傳盡是資產階級如何如何擁護社會主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部分人經過歷史的教育，思想有了改變，拋棄了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全心全意擁護社會主義，是個事實。但是居然沒有一個人反對，我是很奇怪的，這樣的宣傳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我的看法是一部分人是擁護社會主義，一部分人是出於不得已，裝出來的，還有一部分人是反對的，但也不敢說。現在，有許多資本家發言了，反映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不滿，並且有的還提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辦法，有的甚至妄想黨會接受他們的辦法等等。這些要求和情緒是真實的。這些言論也是反社會主義的。但並沒有遭受到象對葛佩琦、儲安平等人的那樣反駁。雖然李康年等人的言論也遭受到一些反駁，而其程度上大大不如葛、儲。推其原因：是否是由于：葛、儲等人，本身不是資產階級，但其言論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以他們所處的地位來說這樣的話，容易模糊一批人，為害大焉，資本家代表他本階級利益發言，本來不足為奇，使人很容易看清楚。

*

*

*

儲安平在解放前是“觀察”雜誌的主編（就是現在“新觀察”的前身），章乃器是著名“愛國的七君子”之一，在解放前都是知名的進步人士，他們是擁護共產黨的，但是在解放後，已經有八年多了，國家建設這樣快的发展，而他們的思想却進步很慢，甚至變化了，變成了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的思想，這不能不令人奇怪。拿傅作義、陳明仁等人來打比，他們在解放前，曾經幫國民黨殺了很多人，但投降後，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進步比儲、章等人，似乎快些。在我的內心，的確有些為他們惋惜，有些不平的。這個道理，我曾相當長的時期沒有想通的。記得蘇聯的十月革命，有這樣一批人，在革命前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但革命後社會主義真的來到了，他們卻動搖了，甚至反對社會主義了，這

是为什么？虽然当时的苏联在革命成功的初期，有一个时期处于动荡不安，极端困难的时期，再加之过“左”的肃反，使这些人离开了社会主义，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他们始终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眼光短小，缺乏远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因此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要求就有所不同。儲、章等人是否也有此类似。

*

*

*

最近的报纸上到处是“谴责葛佩琦、儲安平的反共言论”“驳斥葛佩琦、儲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谬论”，把葛、儲同等看待的，我都不以为然，这二人有其共同点，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但是也有些不同之处。我的看法是：葛的言论十足是反革命言论，歪曲、诬蔑，穷凶恶极，有点象国民党反动派地主的面貌。而儲的言论，是反对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应该有区别的对待，也许有人要说，既然儲安平是反对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民主，难道就不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嗎？我认为这样看法也有对的地方，但也不完全对，如果教条主义地、机械地看问题，是不难得出以上结论的。可是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人的思想并不都是按照馬列主义公式来养成的，尤其是处在过渡时期的现在，更其复杂，有的人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思想，有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有的人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同时有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还有点儿地主思想。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是拥护的但对武装革命的办法是不满意的，最好是不杀一个人，不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和平平的进入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拥护的，但又不满意共产党决定一切，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社会主义里搞议会政治，对国家建设是满意的，但自己现在的待遇比旧社会反而降低了就不满意。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赞成的，但对自己的生活日用品受到限制就不满意，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仇恨的，但对于捕杀反革命分子多少有些不满意等等。从逻辑上讲，

这些都講不通的，但這些人的思想情緒就是這麼樣。要把這些人改造過來，的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

*

*

儲安平、章乃器等人的言論，在社會上是能夠俘虜一些人的，因此有他的壞影響，對於這些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的言論必須進行无情的鬥爭，才能捍衛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只有劃清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界綫，才能進一步更好地開展整風。通過兩條路綫的鬥爭能夠更好有效地教育廣大群眾，通過對三大主義的鬥爭，能夠更提高馬列主義水平，鞏固黨的領導，二條路綫和三個主義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但從廣義的講，除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外，這些都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戰綫上的矛盾。對待他們的方針還是“團結——批評——團結”。有人也許要問，難道對他們也看作人民內部的矛盾嗎？那我要反問一句，既然把資產階級列為人民內部的問題，而資產階級中有不少人也是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的（請看6月12日“長江日報”，“江岸區工商界人士座談”），是否就可以把他們劃列敵人那里去？我看資產階級是天生要反社會主義的，但經過黨的教育，是可以改造過來的，當然還有一部分人還不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對這樣的人，我的理解還是算作人民內部的問題，那麼他們的代表人物，如儲安平、章乃器等人，還是可以算作“人民內部”的人，不過他們是人民內部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經過批評、教育也可以轉變為左派分子的，如果把右派分子列為反革命敵人，那倒是對敵人有利，對黨、對人民是不利的。

三、“相對論淺解”

——兼復所有對我批評的同志——

倘若有人問：

相對論是香花還是毒草？

我将这样回答：

你認為是香花，

他認為是毒草。

而我——

認為既是香花，又是毒草。

即使对于你，

香花中也有毒草。

即使对于他，

毒草中也有香花。

甲、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論原理”的論文，在科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革命。相对論者認為不仅是用来观察自然界的現象能够达到相对性正确，而且用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活动，亦同样能够达到相对性正确。

乙、那么，你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性真理，一定是很精通了吧？

甲、不对，但也对。在相对論中沒有“精通”这个絕對的概念，只有比較理解，比較通，或是比較精通。由于人类的知識水平有限，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論的，还只是极少数人。同时这些人的理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由于事物的存在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人类認識事物也同样如此。知識对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是有限的；对于全人类的全部历史，包括过去、現在以及将来的人类来講是无限的。我也同样，因为要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論，必須具有相当高深的数学和物理知識，而由于我的知識水平有限，只能約略領会它的一些精神而已，还是很不完全的。所以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也可能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但是，在目前对我来講，我的相对論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

乙、那么，照你这样說，爱因斯坦的相对論，是否就是絕對

的真理呢？

甲、是的，但也不是。愛因斯坦本人也是由於各種條件所限。因此，他所認識的相對性原理也只是相對地正確，他所認識到的一點，只能說是對人類知識寶庫充實了一部分。所以也是有限的。同時，他所已經認識到的這一點，將會由別的人，或者是將來的人去充實它，發展它。不過，他所已經認識的這一點現在再講，還沒有人來為它充實的時候，他的相對性原理暫時是絕對正確的。要知道，如果相對論是永遠絕對正確的，那也不成為相對論了。

乙、既然現在是暫時正確的，那麼，現在應該是駁斥不倒的了。

甲、是的，但也不是。從現在來講，應該是駁不倒的。但是目前的相對論還只是處於萌芽時期，還不很完善，還不很鞏固。同時，由於運用它的人，也受着各種條件的限制，有時候可以被駁倒的。但，所謂被駁倒，也只是暫時的、局部的、部分的，到目前為止，在對於自然界領域內，還沒有人否定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然而相對論者認為，在將來某一個時候，他的理論也有暫時被否定的可能。這個被否定，也不可能是絕對地、永遠的、全部被否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被否定。而被否定的一部分，將從對方的否定中吸取養料，變為相對論自己的東西，將由更正確、更新的認識來補充，而得到再向前發展。在對於人類社會領域中，相對論曾暫時被否定了其中唯心主義的、不正確的一部分，然而，相對論依然存在，存在於唯物主義者的哲學中，在唯物主義者來講，他們認為相對論已經被否定了，實際上，唯物主義者又不能離開相對性原理，如果，馬列主義者排斥了相對性這一部分的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無法存在。可是馬列主義還不是相對論者，和相對論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乙、那麼，相對論究竟是什麼？

甲、相對論是人們用來認識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一種科學。它是把客觀物質世界中的已被認識的現象通過人的思維活動進行分析、綜合、肯定、否定，吸

取它的比較基本的活動規律，再用來觀察任何事物，以求達到對於事物比較全面、較為正確的認識，它是哲學上的認識論的一派。

乙、相對論者如何去認識世界呢？

甲、相對論者認為客觀物質世界充滿了相對性，例如“大、小”“長、短”“高、低”“快、慢”“多、少”“輕、重”“美、丑”“虛、實”“是、非”“黑、白”“香、臭”“父、子”“夫、妻”“上、下”“善、惡”“喜、怒”“矛、盾”“新、舊”“軟、硬”“相對與絕對”“肯定與否定”“數量與質量”“正面與反面”“唯心與唯物”“意識與存在”“形式與內容”“新生與死亡”“進步與退步”“先進與落后”“個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自由與束縛”“虛無與現實”“智慧與愚蠢”“擁護與反對”“戰爭與和平”“作用與反作用”“愛與恨”“好與壞”“領導與被領導”“剝削與被剝削”“奴隸與主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左派與右派”“優點與缺點”“經驗與教訓”“成績與錯誤”“真理與謬論”“香花與毒草”“生產與消費”“時間與空間”“靜止與運動”“主觀與客觀”……等等都是相對性質的存在，相對性質的觀念。這些存在與觀念都是相互聯繫，又相互獨立；相互否定，又相互肯定；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相對論者就是從這些事物的相互結合過程之中去認識它們。

乙、請你舉幾個具體例子吧。

甲、例如：我個人的存在，是在1957年6月21日下午3時30分於武昌湖北省文化局內。“1957年6月21日下午3時30分”就是一定的時間，“武昌湖北省文化局內”就是一定的空間。時間和空間是分不開的。沒有“時間”就無所謂空間，沒有時間和空間，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我們不能說：“我存在於湖北省文化局內”，那麼，在五年以前，我是不在湖北省文化局，在一百年以後，我個人可能已不存在了。也不能說：“我個人存在於1957年6月21日下午3時30分”那麼到哪裡去找我呢？任何人也不會發覺我的存在。但是我的存在，還有其他的條件，只是相對的，暫時的。有了你，才有我，沒有你，也就沒有我，我是你的客觀存在，也同時為你

所感觉到，我是因为有你这个客观存在，同时也为我所感觉到你的存在，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事物只有在“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结合过程中才能存在。现在的哲学家们，有的拥护主观的，唯心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有的拥护客观的，唯物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且都把自己所拥护的看成绝对的、永远不能被否定的真理，这都是片面的。他们总是努力去否定对方，但又不能否定对方，如果真正完全否定了对方，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存在。没有唯心论，也就无所谓唯物论；没有唯物论，也就无所谓唯心论；没有客观物质存在，也就无所谓主观的意识；没有主观的意识，也就无所谓物质的客观存在。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着，它们互相独立，但又互相依存，它们相对地静止，基本上不变，但在相对地运动，不断地变化、发展，甚至互相转化。所谓静止或运动，停止或发展，存在或不存在，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时间、地点而得到暂时的肯定。例如：静止和运动，运动是对静止而存在，运动也是对运动而存在，在运动的事物也可以得到相对地静止，静止的事物也可以得到相对的运动。都不能看作是绝对的。我们所意识到的、研究着的一切运动的物质，都是指某一物体对于别一物体的运动。例如，你站在河岸上看到河中有轮船开过，当你相对地静止在河岸上的时候，在你的意识中得到的是轮船在运动，但是在轮船上的人们，在他们的意识中得到的是你也在运动的感觉，或者你说，这是他们的错觉，你确实是静止不动地站在河岸上的，可是相对论者认为，你是相对地静止着，但在相对地运动着。因为你虽然认为自己是静止不动，这也是你的错觉。要知道，地球是在对着太阳相对地、不断地运动着的，你所占住的空位地位，在一分钟前或一分钟后是不同的，所以你也正在相对地运动着。你如果永远静止地站在河岸上，你也可以从早晨进入中午，中午进入晚上。更不谈你身体内部各种细胞、神经、血液都是在运动着。

再如：你我两人各搭一輪船等速前进。从我所在的輪船上去观察你的輪船，就是靜止不动的，只有从别的相对靜止的事物——例如河岸、树木、房屋等去比較，才能观察到你我所在的两只船都是在运动。

因此，运动和靜止都是相对地同时存在的，沒有相对的靜止，也就沒有相对的运动。現在的哲学家們，有的認為事物是永远靜止的一成不变的，有的認為运动是絕对的，靜止是相对的，都是出于对事物的片面性認識。

乙、以上你所解釋的，大都是自然界現象，相对論者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活动的呢？

甲、首先我对你这个問題作个解釋，所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是相对地在互相結合的过程中存在的。沒有自然界，人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沒有人类社会，自然界是沒有意义的。因此，观察人类社会活动的現象，也不能不同时考虑到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如果孤立地来看待人类社会活动的現象，那么他所認識到的正确程度将要小些。

任何一个人，他从出生以后，都是在追求生存，但同时也是在追求死亡，当你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也同时在接近死亡，任何人都是在追求“好”“美”“善”和“有利”等等正面的东西，因此他就同时反对“坏”“丑”“恶”和“有害”的东西。可是“生、死”“好、坏”“善、恶”“美、丑”“利、害”都是相对地在互相結合的过程中存在的，都是相对的，沒有生，就无所谓死，生是对死而言的。沒有坏就无所谓好，好是对坏而言的。沒有丑就无所谓美，美是对丑而言的。沒有害就无所谓利，利是对害而言的。所有正面的东西都是可以轉化为反面的东西，所有反面的东西都是可以轉化为正面的东西，正反两面都是在互相排斥，相互吸引，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因此任何事物都是互相否定，又互相肯定。人类的社会活动既沒有絕对的“好”“美”“是”“利”等等正面的东西，也沒有絕对的“坏”“丑”“非”“害”等等反面的东西。因此，相对論者

認為任何人或問題也都是：有好必有坏，有美必有丑，有是必有非，有利必有害。是好又不好，是美又不美，是对又不对，有利又不利。因此，对待任何人或問題，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然而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時間、地点的情况下，对于某些人或問題只作相对的肯定，或者是相对的否定，所謂相对，是在一定的場合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程度，就是对某些人或問題認為是：“比較好”“比較美”“比較对”“比較有利”或者是“比較坏”“比較丑”“比較不对”“比較有害”等等。

乙、是否可以举几个具体例子來說明呢？

甲、就从最近的国内时事來談吧，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左派与右派斗争得相当激烈，这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相对性原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会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如果没有反社会主义者存在，社会主义者也就不会存在，如果没有右派分子，也就无所谓左派不左派。反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來講是不利的，但同时也是有利的。社会主义者猛力回击反社会主义者，对反社会主义者來講是不利的，但也是有利的。你現在所認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一定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同样，你認為是反社会主义的人，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的，左派可以轉化为右派，右派也可以轉化为左派。

乙、为什么講反社会主义者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呢？

甲、反社会主义者利用了共产党的缺点和錯誤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共产党。同时少数右派分子的公开进攻，这就是对其他右派分子的号召，帶領他們，組織他們向共产党进攻。同时也有可能使一部分群众，尤其是过去由于因某些共产党员或干部的工作上缺点和錯誤造成一些損失或产生一些不滿的群众，倒向右派，这就相对地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

但是对于共产党來講，右派分子現在露面了，使得更容易向

他們作斗争，这比較对付暗藏的右派分子更容易些，同时也会使大部分群众看到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从中得到教育。因此，也同时更其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并且使党与人民得到锻炼。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乙、为什么講，两条路綫的斗争，对于右派分子也是有利又不利呢？

甲、两条路綫的斗争，暴露了不少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双方的力量和形势，从左右两派的力量对比來講，显然是對他們不利的，結果，他們是要失敗的。所以說，对于右派分子是不利的。但是这同时是給予右派分子的一个很好的教訓，暂时可以糾正他們的錯誤，对于还未暴露的右派分子來講，也是一个相当寶貴的现实經驗，使他們能更隱蔽地存在下去，待機而起。这就是对右派分子是有利的。

乙、为什么說拥护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反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者呢？

甲、上面已經談到，除了已暴露的右派分子外，还有隱藏着的右派分子，在这个时候，对于他們比較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起來反右派，以表明他們是左派，采取这个策略，一方面以此保存自己，并且能够暂时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还有一种人，两条路綫的斗争，對他們來講，是个較好的表現自己，騙取信任的机会，以求达到个人目的。这一类人，虽然在表面上使你認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實質上并非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在你沒有覺察到的时候，总是認為他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为什么反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者呢？这就是要从認識的发展过程來看待这个問題，有这样一类人，他們是比較拥护社会主义的，但在旧社会里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熏陶，而并不自覺，并且还認為这种民主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他們就有可能发出程度上不同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論，这种人是右派，也可能是中間派，但是經過批評、教育以及斗争，可以轉

化为左派的。

乙、那么你认为两条路綫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敌我矛盾？

甲、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又是敌我矛盾。两条路綫的斗争，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拥护党和反党，是對抗性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是作为思想斗争，馬列主义与反馬列主义的斗争，則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分子现在还是人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其中可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者这些右派分子跑到反革命那里去，在他們被发觉了的时候，跑过去以后，那就是敌我矛盾。因此，我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又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又是敌我矛盾，这是依据一定的条件、时间、地点而轉移的。任何对人民内部的不利，对敌人就是有利，因此在客观上也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其作用的大小，有时可以远远超过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作用。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可以看作内部矛盾，也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广义的講，都是人类内部矛盾。

乙、那么，人民这个定义究竟应如何解释？

甲、人民这个定义是不稳定的，有它相对的性质，它所包括的范围。也是随着一定的条件、时间、地点而轉移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既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包括了地主、富农，甚至国民党员。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所称为的人民不包括资本家，而中国现在的人民包括资本家，可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中的人民，如果是包括资本家在内，那是違反了毛主席的本意了。同样，“为工、农、兵服务”中的工、农、兵如果包括了恶霸、工头、富农，和反革命军队中的士兵，那也是違反了毛主席的本意了，所以这些口号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资本家是人民，但也不是人民，地主不能算作人民，但也曾經算作人民，将来也可能是人民。在我看来，你是人民，而在蒋介石看来你是敌人。蒋介石是敌人，但在他投降过来后可

以算作人民。

乙、你認為共产党好不好呢？

甲、你大概是指中国共产党吧，如果是这样，也是不能理解的。把中国共产党孤立起来看，那就无所谓好不好。而是要从中国共产党与其群众的关系上来看，与我个人的关系上来看。所谓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其基本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对于群众有利，对于我有利，而且不仅是共产党人主观上認為有利，而且在客观上，群众和我也亲身体会到确实有利，那么群众和我就會認為中国共产党好，而且会拥护它。如果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及其实施，对群众和我是有利的，那么就会認為不好。不但不拥护它，而且要反对它。所谓群众与我，并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就是指什么人，例如中国共产党主張消灭剝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为此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去实现，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能有不断的提高；那么，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对剝削者是不利的，因此，劳动人民就認為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拥护它。而剝削者則認為中国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就反对它。如果我是个劳动人民，我就会拥护它；如果我是个剝削者，我就反对它。所谓好不好，有利或不利，也是相对的，从比較而来的。只有比較好，比較有利的事情。沒有绝对好或绝对有利的事情。例如，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国民党好。因此，虽然是中国的民族資本家，从他們的阶级本質来講，應該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們的方针政策，既比較国民党好，也比較十月革命时苏联的共产党对待他們的资产阶级的办法为好，所以中国民族資本家就有可能認為中国共产党还比較好，因而拥护它。就拿劳动人民来講，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是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但是在过去和国民党进行战斗的时候，就必然会使一部分参加战争的劳动人民（不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或是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人来講）因战争而死亡，这样对于这些

死亡的劳动人民来講，也是相对地不利的。因此，可以这样来答复你的問題：中国共产党好，但又不好。

乙、那么，你主要的是沒有站稳階級立場。

甲、对，但也不对。相对論者認為所謂階級立場，仅仅是一种理論上的武器，是为一定的階級服务的，因此，立場問題也是相对的，共产党人要求劳动人民站稳无产階級立場，但是又不希望資本家站稳資产階級立場。反过来也是如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員怕死，向敌人投降，但又欢迎怕死的敌人来向他投降，这都是帶片面性質。因此，无所谓立場問題，但是当我現在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而且認為解放后比解放前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的时候，那我應該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場上来看待問題，因此，我也認為自己是比較站稳了中国人民的立場的。至于你認為我並沒有站稳立場，或者說我沒有立場，那是你的主觀認識問題，或者是我确实沒有站稳立場，或者是根本沒有立場，那么請你具体地指出来，以便我糾正。或者是你主觀上的錯覺。

乙、但是，我感觉到你有一种虛无主义的思想 and 态度。

甲、对，但也不对。前面我已經說过，从相对論者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来講，似乎是有些象虛无主义，但是相对論者在一定的条件、時間和地点的情况下，对某些人或問題是相对地肯定的，或者是相对地否定的。我也同样，从中国共产党主張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来講，在我看来，那是比資本主义好，中国共产党在政策方針上比国民党好，因此我就暫時肯定它，拥护它。但不是說，我从小就拥护它，所以小时候的我，並沒有拥护中国共产党，倒曾經是拥护过国民党的，将来呢？也是不能肯定的，如果，在我的思想向右轉的时候，或者中国共产党变了質，变成了象南斯拉夫那样的共产党，那我就不会拥护它了。

乙、那么，你也只是暫時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岂不是沒有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共产主义前进了嗎？

甲、是的，又不是。从我目前暫時拥护中国共产党来講，是

暫時的，不是永久的。但暫時擁護的連續，就成為相對地永遠擁護。從時間上來講，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是暫時的，有限的。然而一天一天的連續，就成為永遠的，無限的。而我只能生存一定的時間，比如說50年，100年，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說是“相對地永遠擁護”。不可能有絕對地永遠擁護。因為我在50年、100年後會死亡的，那我再不會有感覺了，所以也就無所謂擁護不擁護了。所以，如果你要我說是：永遠擁護共產黨，在邏輯上看，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乙、啊呀，和你談了半天，我還是糊里糊塗，記不清呀，叫我去怎麼去研究呢？

甲、也好，我教你幾首口訣，你去體會、實驗和應用吧。

(一)

你說此綫長，我說此綫短；既長又既短，既短又既長；長中也有短，短中也有長；有長必有短，無短就無長；究竟是長還是短，你要去較量。既是去較量，只有比較短來比較長。

(二)

你說此物大，我說此物小；既小又既大，既大又既小；大中還有小，小中還有大；小中也有大，大中也有小；有小必有有，無大就無小；究竟是大還是小，請你去比較；既然比較了，只有比較大來比較小。

(三)

你說這是2，我說是2不是2；你說一定就是2，我說也許是個2、2、你說 $1 + 1 = 2$ ，我說是2不是2；你說一定就是2，我說 $1 + 1$ 可能 $= 3$ ，也可能 $1 + 1$ 還是 $= 1$ 。你說是多少，我說你去實驗就知道。

(四)

你說此事好，我說此事坏；既好又既坏，既坏又既好；好中也有坏，坏中也有好；有好必有坏，有坏必有好；究竟是坏还是好，請你去比較，你去比較了，只有比較坏来比較好。

1957年6月21日

張章的右派言論

按：張章系武汉市話劇院演員。

(1) 对新社会对革命队伍的誣蔑

“旧社会还有几个知心朋友，现在阶级感情模糊了一切人的真实感情”“革命队伍人与人的关系是虚伪的，组织领导是冷酷无情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党的组织领导人是这样，群众也是这样。”

“理论谁都会讲，实际不是那样。”

“领导都喜欢讲原则大道理，是因为他处在那样的地位，我处在那样的地位我也会讲漂亮话。”

“要求进步的同志迟早会后悔的，不要求进步的反而更加真实。”

“我落后我犯错误，是我自己暴露了，你们只不过是没暴露。进步的是包着的，装进步，其实思想里比我还差。”

“我错了是因为我暴露了，其实你和我一样，只不过你还没有暴露罢了。”

“我偷东西进行公开批评，是因为我过去得罪了人。”

“刀把被别人抓住，就挨批评，挨整，一旦我捉住别人的刀把我也会整人。”

“群众对领导的意见大，领导就拿我来开刀。”

“抗美援朝，禁止原子武器的签名，只是表现一下热情……只是一种方法，只有我才看穿了……真的热情争取去朝鲜的是傻瓜。”

虛偽的積極性。”

(2) 仇視和誣蔑黨

“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希特勒也好，美帝也好都是一樣的，蔣介石不是也嚷嚷革命嗎，希特勒也不嚷愛國嗎？美國也不是說為了正義的戰鬥嗎？今天共產黨號召抗美援朝不也是和過去一樣么？只是政權不同了，我看穿了這一點，所以我不會有什麼熱情了。”

“在鎮反中逮捕了陳垣，同志們都很憤怒（對陳的罪行）。我却很冷靜，並且同意這種說法，過去共產黨被國民黨殺了，今天反過來殺國民黨這是自然的，蔣介石不也喊革命？”

“黨也是勢利眼，過去黑丁、巴南崗理都不理我，得了一等獎，老遠就過來握手。”

“過去是落后分子，得了一等獎，忽然變成進步的了，讓我參加黨代表會，讓我參加黨支部會（注：均系应邀列席）。黃毅讓我在宣誓大會上講話，可笑的是莎萊同志對我沒有遞過申請書竟然不知道。”

(3) 腐朽的人生觀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利人利己的可以作，利人不利己的不作，損人利己的事可以做，損人不利己的事不作。”

“生活就是享受，演戲謝幕都是扯蛋，而希望的是，有小汽車坐，有姨太太來接，舊社會未達到此目的，現在希望實現它。”

“人啊！都是為自己活着，與我有利有關的我就管，與我無利無關的我就不管，誰都是這樣，例如：天上的星星你管嗎？因為對你沒關係。”

“長江大橋雖好，跟我有什麼關係。”

“人與人之間就是賽跑，把別人撈下來，我好上前。”

“愛情是扯皮，男女關係是建立在需要上，女同志的感情是不真實的，找愛人都是為了地位名譽、金錢、漂亮，還有更惡劣的……”

赵光华的右派言論

按：赵光华系湖北省圖書館工作人員。从十二岁起，他在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培养之下，使他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帝国主义走狗和梵帝岡的信徒。解放后，仍念念不忘要做一个宗教的牺牲者，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辯护。大放大鸣中，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右派言論，对党、对社会主义显示了刻骨的仇恨。这个材料，是根据湖北省圖書館提供的材料选編的。

(1) 反对馬克思主义

“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意識推动的，社会意識則产生于大学問家，所以說历史是由人創造的，不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社会是有发展規律的，馬克思不过是把社会划分成几个阶段而已。”

“在学术領域里，应取消以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原则，象斯大林那样成熟的馬列主义者，在具体問題的領導上也犯了錯誤，一般領導和群众，因这种主导思想的限制，会造成一种教条主义的迷信，学术不能发展，这和‘百家爭鳴’有着根本的矛盾。”

“馬列主义是个很好的学說，但是过时了，在馬克思的时代工人文化水平低，这个学术还有用，現在因为工人的水平提高了，有辨別能力，而任何一个国家，又以工人人数为最多，他們可以把自己的人选到政府中去，因此可以通过議會斗争夺取政权。”

“国家不是階級对另一个階級专政，而是各階級联合起来爭辯道理的机构。”

“高級知識分子，专家学者，不应先有立場，应根据材料，来做研究工作，得出結論，得出真理来。”

“人是有潜在意識，对是非有着本能的見解。”

(2) 誣蔑丑化党团员和靠攏党的积极分子，
煽惑群众，反对共产党

“进入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共产党的领导，不一定要用共产党的办法，在經濟建設上共产党的組織能力强，能突飞猛进，但是建設成就是模仿与抄襲资本主义国家的。”

“领导体制的寡头政治有改革的必要，就我館过去的领导方式，是由党和行政实际是党支部，不分行政和业务，一攬子包下来。”

“在各次运动中，沒有民主党派，党取了绝对领导权。”

“党天下的提法，不能說沒有事实根据，例如‘人大’不过是表决机器，实际上中共中央提出成品。”“党的宗派主义促进了右派分子的滋长，起了助长作用。”“宗派主义三害是党本身产生的。”“共产党在每个机关里放一个党员，有些党员如同土皇帝一样，什么事情都管，別人都怕他，我們圖書館的老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都怕他，再以后就不敢这么样了，若再作威作福，群众就要斗他們，打他們。”

“共产党员沒有自由(但又說是受到約束受到限制，不是說沒有自由)因为他要維護党的利益，不能反对党，不能提反对意見，因此馬克思主义也不能发展。”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因为下面鬧得凶，全国有××个城市都举行罢工罢課，党中央不得不这样作，这是被动的，由下而上所引起的。”“罢工罢課，这是社会发展到现在阶段一定要出現的現象，在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初期都有罢工罢課的現象，在共产党搞革命初期，也有罢工罢課現象，当然奴隶、封建社会沒有这現象，共产党领导这政权不得人心，所以有罢工罢課的現象。”“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是由胡风思想打开的，胡风提意見，比他們(指右派)更尖銳些。”“今后的社会改革，当然

并不一定是武装斗争，象这一次党里面提出整风是迫不得已，整风的结果，一定改变政府组织机构。”“鸣放的结果，是要改变组织机构，改变党的领导，还要修改宪法。”“如果共产党接受这些（右派）言论，和民主党派平分天下，我就有前途有出路。”

“你们鸣放有什么作用，都不是大问题，说到不如不说，大可不必，是盲从，是投机，党叫你们说，你们就说，不叫你们说，你们就不敢说。”“有一种人很市侩，大多数人是没有头脑，头一种人看领导上的脸色，后一种人是绝对服从，决不会对领导上提的措施有不同的意见。”

“整风不应由支部领导，应由工会和民主党派领导，共产党领导，你们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你看整风时，党团员都不发言，他们内部搞一些什么谁知道。”“老孙早就知道我是思想问题，不过是小题大做，想把我当政治资本，整一顿，向文化局汇报，将来有好处。”

“根本问题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才引起社会分配的不合理。”“目前国家的物资生产并不少，是因为分配的不当，一般说来，党员在工作中或明或暗的起着主导作用，工资也要比一般人高。”“工资改革有一定的比例数字，领导干部提得多些，提一级等于小干部提两级或三级以上，在分配上是有问题的。”“简直象奴隶和牛马一样的工作，工作和别人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这么低，反正我在那里慢慢跟他磨洋工。”“高级干部吃穿那样享受，而乡下农民么样，二两油。”

“党员没有主见，象×××这个人根本没有主见，我真看不起他，简直是拍马屁起家的，以前是个倒渣子的，现在却入团入党提升为干部了。”

“什么保证书（整风开始时×××写了保证书，表示愿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简直是共产党员的软抗。”

“人是自私自利的，人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样就发生矛盾，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共产党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根本

沒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人。”“人為了生存互相競爭，互相排斥，從我們圖書館這個小範圍來說，平時是一團和氣，可是暗地里却在互相勾心鬥角，他們在會議上大喊共馬列主義口號和為人民服務等等，可是一到工資改革時，互不相讓，你罵我，我罵你。”

“現在有些要求入黨的人是為了名譽地位金錢。”“1949年以後要求入黨的人，因為不打仗，沒有流血犧牲的事；為人民服務的事，值得懷疑。”“我不願意做違背良心的事情，而去爭取成為黨團員，我看現在很多黨團員，他們的積極，不是出於自己的覺悟，而是有一種不可告人的企圖在支配自己。”

“白國安多幼稚，隨隨便便的批判宗教，他有什麼理由證明世界上沒有一個神，可恥，那還不是老孫搞的鬼。”

“中國的團也會象波蘭一樣，完全瓦解，白國安還要入團，真沒有遠見。”“陳柏華（實中學生，退團分子）這個人很有才幹，遠在1953年就考取北京師大，是個初中生就有這樣高的政治眼光，能夠大膽的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真不錯。”

（3）反對促進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阻止團結無產階級來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宣揚反動的階級鬥爭熄滅論

“人是一種生存競爭的動物，這種本能，也是社會活動的本能。”

“對於社會主義是贊成的，同意財產公有，但是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組織形式可以改變，把全國的主要財產，如鐵路，礦山等，由工人同資產階級說理，政府用贖買的政策買回來，其他小型企業，可以由資本家在貿易上競爭，發展商品的市場。”“馬克思對資產階級過低估計了，固定的看資產階級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家雖說是消滅了，但在資金上要保存比工人多，資本家在企業中仍應投資，有競爭，產品才會優良，雖然有經濟危機，但容易解決。”

“在組織工人的工会，应该是同資本家协商的机构，也是改善工人福利的机构。”

“为了提高工人农民对民主自由的觉悟，应该受教育，因为经过教育，工人农民就能善于理解和掌握国家政权。”“胡适所谈的中国五大病根是对的。希望国民党一手来搞，先从教育着手，我对于胡适所提的民主政府和好人政府很感兴趣。”

“我倾向于人民资本主义，美国工人生活提高了，美国的資本，也有工人的一分，这就是集体所有制，美国可以采取议会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我赞成人民资本主义，美国可能走人民资本主义道路，自然而然的就变成社会主义了。”

(4)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

1.“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是不是过时了，应该采取议会斗争，更合适些。”

“我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专政，就没有民主自由。”

2.“工人农民在知识上不可能对政治理解。”“说无产阶级专政，也等于说一党专政。”“我不同意一党专政，一党领导，这样会造成一个党派的政治见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要求下，会成为错误的行动，所以我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组织机构的不完善，没有与斯大林相反的政治见解的党派存在，造成了斯大林在思想上工作上独断的作风，这种错误不能及时制止，我同意政治设计院也是这个道理。”“政治设计院不能说完全不好，吸收民主党派参加国家管理，会更好些。”

3.“我否认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因为工人和广大人民不可能都实行（意即指掌握）专政工具，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生产

关系和生产工具的轉变，階級的矛盾只产生思想意識的不同，国家政府机构不能作为专政的工具，而是各階級或党派說理的地方。”“工人农民在知識上不能对政治理解。只能讓知識分子来领导国家政权，然后等工农知識文化水平提高后工农与知識分子同化，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4.“人之所以幸福，是要建立在精神与道德上，对于事物有了真正的認識了，才能真正的幸福，所以即令物質滿足了，但思想意識沒有滿足，还是沒有幸福。”

5.“自由与民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問題，离开了它，社会談不上发展，我們看一个国家的强盛，也要从这点上来看，不能光从經濟基础上看。”

6.“斯大林的錯誤，是苏联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說无产階級专政实际上是否某些人在专政呢？”“匈牙利該比中国解放的早罢，只說无产階級专政好，为什么工人階級也反对他們呢？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認為社会主义国家在言論、思想自由方面是有缺陷的，我主張在学术上（包括政治和自然科学）应有絕對的自由，不应以馬列主义在一切学术中作主导思想，党也不应在一切学术中占领导地位，这样会造成以行政命令限制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不应以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要絕對自由，允許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能自由发表，允許組織同人报社、書店，不由共产党领导。”

7.“资本主义国家在报道黑暗方面比我們要民主些。而我們国家里却不同，只准談好的一面，却不能談坏的一面。”

8.“对于灾民，你不能以感情来看这个問題，这是个社会現象，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即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些不合理的現象。”“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統治者与被統治者，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有坐小汽車的有餓飯的。”

“南斯拉夫很好，他对于好的制度不管是社会主义的或是資本

主义的都接受，而对于坏的东西都不要，不象中国一样，只有苏联好，美国也有好的东西呀，这一点你不能否認。”“鉄托的作风很了不起，对問題有独特的見解，不听斯大林那一套，当斯大林准备对南使用武力的时候，他不但不怕，而且也很有准备，象这样一个小国，自己能制造飞机、汽車，那是很不简单的，这不能不归功于社会組織机构。”“从南斯拉夫的组织机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要比我們好，中国說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也說中国是修正主义，誰是真正的馬列主义呢？这就必須要实际来証明。”

(5) 詆毀中伤，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

“看問題应该从理性来看，建設是时代发展到这个地方，必須要这样作，这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长江大桥不过是为了軍事上的便利。”（赵光华說他在談大桥在軍事上的便利以前他記得他談过大桥在經濟上的意义，白国安同志坚持說：“他絕對沒有說过大桥在經濟上的意义。”）

“对于长江大桥的問題，这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認的。我被动的承認了經濟价值。我对新事物，思想上就是不愿說他好。”

(6) 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希图反动統治者在中国复辟

“世界局势很緊張，世界大战可能从从而暴发了，現在報紙有看头了，你應該每天看报。”

“匈牙利教友多，可以說是公教国家，这一次暴乱主要是天主教徒，如果中国教友很多的話，說不定也来了个匈牙利事件。肃反的时候那样整我們。”“我进去沒有問題，只不过是出于宗教事务处要我到两湖大修院去做宣傳工作，我不去，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逮捕了。”“我們进监狱是宗教事务处搞的鬼。”“如果不通过肃反，不通过1953年取締圣母軍运动，我們的公青，到現在可能有不少的公青了。”“把公青組織起来，現在只有共产党具有地位有前

途，我們這些人是被壓迫的被侮辱的。”“從這本書（捷克公審梵帝岡間諜案）上根本看不出這幾個天主教神父，有什麼罪行，搞得嚇人，間諜案，這還不是借着這個帽子將他關起來，你看中國也是借着劉和德反革命集團關人，有些問題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們也沒有什麼政治背景，隨便就加一個間諜和反革命的帽子。”

（7）卑污的靈魂，梵帝岡的忠實走狗

“我一切都抱着容忍的態度，這樣做的結果是很好的，你看同志們都認為我好，彼此關係也不壞，其實別看我表面上很好，而我內心是表面的叛徒。”“我基本上相信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就是美女、地位、金錢。”“有了金錢就有了一切。”“金錢、老婆、地位這三種合起來，就是幸福。”“我對我的父母，只能從理性上承認他們，看見了和路人一樣，產生不出一點感情來，這是受了教會的影響。”“我對梵帝岡的理論和它對我的培養深深不忘，我並私自許願終身效忠梵帝岡的組織，堅決走梵帝岡的路線。”“誠實如白鴿、明智如狡蛇，這是帝國主義分子給我的，對梵帝岡要誠實如同白鴿一樣，不能有三心二意，對共產黨不要相信，對於共產黨的言行要如同明智去考慮，就如同狡蛇走的道路是彎曲一樣，我一直把兩句話記在心裡作為我處理思想問題和生活問題的指南，這也是劉和德告訴我的。”“以不變應萬變。什麼是不變呢？不變就是對梵帝岡的忠誠，萬變是指共產黨各種言行的影響，我看不進新的理論，看不見新的事物，也不願意去看，這是帝國主義告訴我不要相信共產黨的言行，所以我要作一個時代的叛徒，精神的隱士，滿懷大志，一心一意為梵帝岡效忠。”

沈会葵的右派言論

按：沈会葵系湖北省实验歌剧团艺术室音乐组创作人员。这个材料是由该团党支部提供选编的。

（1）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员和积极分子

“储安平真有板眼，敢跟毛主席提意见。是嘛，为什么一个单位要安个党员做头头？国务院一个非党员副总理都没有！”

“一些单位总要安插些老干部，其实他们水平又不高，占位置拿钱，具体工作要大、专学生做，那当然会养成堕落腐化！”

“象我们这样的剧团，设个把党团干事有什么作用？”

“剧团党的领导象枯柴，榨也榨不出油水来。矛头要对向省委和文化局。”

“过去我有意見心里闷得想杀人放火，但不敢提，领导的发言绝对正确化，积极分子看领导眼色行事！”

“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批判斯大林的文件上说‘既然斯大林有这样多的错误，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没人提呢？那是因为他的威信太高，说了就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我说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对剧团的规划、评级我都有些意见，但过去只能谈正确的。积极分子何尝不有意見？对缺点、对黑暗的一面不提，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领导上说的‘绝对正确’化也不是真理。党在政策上何曾没有错误呢？1955年的统购多征了粮做错了，但下面不敢说，这不是‘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知冤枉杀死了几多好人，很多革命的党员被杀，当时还不是认为正确吗？人都死了，现在再叫冤枉有

么用？领导說的不見得都是对的，不一定要听。”

“只有领导对而没有群众說話的余地，这个政权就不需要了。”

“歌剧团的党员都是吃政治飯的！”

“党不懂业务，不是艺术的实践者，对剧目太多行政的干涉，最好是不要党的领导，讓歌剧无拘无束的自由发展……”

“紅色专家，紅色政权，这无非是在强调党员是特殊材料。党员里面也有叛变的，非党员中还不是有很忠于革命的。这是造成党员特殊化，在政治上高人一等……”

“上街游行我同意，我就喜欢搞大民主，歌剧团回了也上街嘛！怕么事！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不这样整一下还解决问题？”

“对官僚主义采取粗暴的行动还可以警告警告，有好处！”

“識时务者为俊杰，看风轉舵，說两句順水推舟的話，到落得个积极的名义，这些我都看不惯。”

“我见过好多虛假的人，可他们都得了便宜，这些难道我看得順眼？”

当剧团轉入反右派斗争后，群众对他的右派言行进行了揭发后，他却說：“这是拿我开刀，不搞我怎么显得出运动的高潮来。”

“党叫别人鳴放，后来又都推在别人身上……”

“现在整右派分子，其实右派发言中还不是有对的！”

“现在說話要随大流，他们（指领导和群众）怎么說，你就怎么說两句，他们說萝卜白菜就是萝卜白菜。”

“现在刀把子捏在他们手上，捏在我手上我还不是曉得整他们！”

（2）仇視社会主义制度

“把工农群众当‘阿斗’……与工农結合、为工农服务是招牌打得好。”

“新社会沒有旧社会自由，旧社会不搞可以走！”

“现在社会沒有过去好，过去沒有好处，现在也沒有好处。”

“虽然我还是为这些事冲动、开火，但是有那样一种势力經常使我感到可怕，行政的权力呀，官僚主义加主观爱好呀！……我經常感到我没有力量去冲破这些。”

“只要工业化，不管人的死活，連吃肉都不自由，把人都弄死了看你要工业化有什么用！”

土改中他父亲被斗后来信說他弟弟被农民打死了（事实上是跌伤后伤发死的），他認為“弟弟不是剝削者，土改法令上都講明保护，孩子何辜，竟遭慘死，我觉得当地干部和农民是不能不負这人权責任……”

“人們何尝不有他美好的理想，何尝不希望有实现他的理想的优良环境与条件，但这一点也看不到，我有时會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旧社会，我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合則留，不合則去’，一是用暴力推翻旧的。但是現在都不行了，恰恰我現在身体又不好，正象鳥困在籠子里一样。”

“缺点是我自己的事，总结也只要我自己作了就得了，这无非是领导上的一套把戏，整你一下，以一警百而已。”

“批評与自我批評，无非是你打击我，我打击你，打击別人抬高自己！”

“……集体剝去了个人自由，他必須使你丟开个人的兴趣而去从事別的活动。”

“过去几年中，天天总是那么整呀整的！的确也整的够受了，現在时代一天天的飞跃发展，国家方針也不是恢复时期那样的方針了，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也当努力向新的事物去追求，而不应当再沉悶在思想改造的圈子里，整天整呀整的了！”

（3）资产阶级的文艺观

“我是作艺术工作的，作家的党性、人生观等主要是通过作品去表现出来，那么你就不必追究我在各方面的表现怎样，一切都看我的作品好了！”

“要看性格，我覺得作品內所蘊藏的才是我真正的性格，而我現在的表现，我始終是不承認它是我的性格！”

“音乐工作者不象搞戏的，因而在体验生活的方法上便要有所不同，音乐工作者只能从民歌中才能体会农民的思想感情，而日常生活的一切以及他們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則不是我們的事。”

“知識分子与艺人合作早已过时了。領導強調与艺人合作是剝削別人的劳动果实。”

“中国一部好歌剧都沒有，西洋歌剧是好！”

“現在的电影沒有什么看的，不但中国如此，拿苏联來說也是如此，不是英雄人物呢，就是爱情；不是爱情呢，就是集体农庄，反保守及反特等等，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沒有什么好看的！”

“音乐里面加打击乐器，搞这种創作是合乎潮流，这是戏改，不是創作。”

“我写东西只照我的需要，演不演是你們（指剧团）的事，条件不够跟我放着！”

“評功表模是空虛的东西，鑽研技术才实际！”

“为工农兵服务在城市里也是一样！不一定要到农村去……”

王冀民的右派言論

按：王冀民系湖北省工农中学語文教員。这个材料，是由該校学委会提供的。

(1) 在“花园”和教工黑板报上所登載的稿件

第一篇題目是“鳴放”語林

以前的各种运动都是党团员带头，这次該誰带头呢？——奉劝党团员們不要太“謙虛”了。

每次运动都有大批的“积极分子”入党，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能入党么？

每次运动后的总结都是“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希望这次也不例外。

斗争某个群众容易，向领导提意見大难；无“的”放矢容易，有“的”放矢大难；背后牢騷容易，当面批評大难。——此人人該舍难而求易也。

有人說：领导征求意见，譬如商业投資，“一本万利”；我說：群众批評领导，譬如活期存款，“另存整付”。

有些人是专门“整人”的，有些人是专门“被整”的；有些人只会使用“批評”武器，有些人只配使用“自我批評”武器。

“党”是脑筋，“团”是眼睛，“行政”是嘴巴，“盟”是眉毛，“工会”是髻子的耳朵。

“鳴”“放”也有代表——有人不愿当代表，有人想当代表而又怕当代表，有人自己不当代表而极力劝別人当代表，有人却悄悄記住代表的名子。

有人說：建黨有三個“面向”——面向數理、面向工友、面向青年；我說：入黨也有三個步驟——一是聯繫群眾，二是拋棄群眾，三是騎在群眾頭上。記者當然不及“部長助理”重要，因此就應該“滾出去”。——我佩服左葉的豪語。整別人是“雷厲風行”，整自己却要求“和風細雨”，——我聽到徐懋庸的哀鳴。

第二篇題目是“鳴放”雜談

(一) 談“要臉” 知識分子是要臉的，然而今天却都不要臉了。

兩宋不殺士大夫，士大夫有罪，止予“充軍”（謫貶），因此，宋亡時，殉難死節者以萬計。明代侮辱讀書人，宰相有過，當殿打股，因此，李自成進北京，沒有一個殉節的。——此其故安在哉？

蓋“冠雖敝不可以置履”，“知耻”乃庶幾乎近勇也。

溯自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來，知識分子之挨“整”者，亦無慮萬計。當時自己打嘴巴，抹黑臉，不惜選擇最丑惡的字眼來痛罵自己，甚至辱及祖宗三代，亦不為怪，蓋非如此，不得“過關”也。有人說：思想改造譬如吃大菜，吃一道，自己掌嘴一次；菜吃完了，嘴也打腫了。余亦云然。

第一次挨整者，有羞惡心；第二次挨整者，羞惡心漸泯；第三、第四次以後，則臉皮既老且厚，恬不知耻矣。你看我打自己嘴巴，覺得好笑；然而，且慢，明天便會輪到你。於是，彼此同病相憐，烏龜不用笑話王八，大家相習成風，反以“清高”為多事矣。

(二) 談“阿諛” 彭玉麟巡閱江南，立誓要殺盡阿諛之輩。聞某知府屢以阿諛得官，怒而召之，勢且誅斬。某叩頭曰：“卑職雖善阿諛，然所諛之人，均系喜人阿諛者。至若彭大人，剛直廉正，卑職縱善阿諛，亦何由進？”於是，彭大人拈髯而笑，并手擬將該員提升一級。不知已被該員阿諛得昏昏欲醉矣。天下之阿諛者及受人阿諛者大都類此。解放以來阿諛之風日熾，阿諛之術亦

极尽其多样化。有职业汇报家、有职业鼓掌家、有职业响应家、有职业保证家。反之要提意见者辄斥为有“反骨”，代群众呼吁者则诬以“篡夺领导权”。夫人孰不欲“明哲保身”，何苦被人讨厌？于是，“谈者皆马屁，往来均屁精”，臭气遂充斥乎天地之间矣。

然则何以正之，曰，请出子路来，使人“闻过则喜”；请出大禹来，使人“闻善言则拜”。

第三篇：寓言三则（原稿已交花园编辑部，时值“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本人立将“尾巴”缩回）

老虎提拔干部

山中一只老虎，有天想在动物中选拔干部，第一次来的是喜鹊，老虎一见他“唧唧喳喳”一定要提意见，于是不要。第二次来的是雄鸡，气概高昂，不好领导也不要。第三次来的是乌龟，既不好提意见，又好领导，于是提它当了干部。

只讓自己鳴，不許別人鳴

狮子在山中大声吼叫，无一人干涉，突然听到后面又来了叫声，它估计这一定是很大的动物，于是调回头一看，原来是只青蛙在鸣，狮子说：“你这小东西也敢在我面前鸣？”于是将青蛙一脚踏死了。

山猫同家猫学经验

山猫想向家猫学经验，一天来到家猫家里，随家猫体验了三天生活。第一天家猫把主人饼干偷吃了，主人还未发觉，家猫便跟主人说：“老鼠把你饼干偷吃了。”山猫认为家猫有板眼。

第二天家猫把主人的玉瓶打破了，主人发觉后它说那是公鸡打破的。山猫称赞家猫真能行。

第三天家猫在主人床上撒了尿，主人便问家猫是谁撒的尿，这时山猫正为家猫担心，认为这次一定无话可答，谁料家猫说：“主人热水袋昨晚漏的水，哪里有尿味呢？一定是你鼻子伤了风。”

由此，山猫学到三点經驗：①要搶先汇报；②要会冤枉好人，③要善于利用主人的缺点。

第四篇：談汇报

“汇报”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人专门以汇报为事，甚至靠“汇报”取寵，就难免令人厚非了。

譬如說，有的人和别人閑談（甚至主动找別人“閑談”），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見，有时还附合別人的錯誤意見。但不到半天，領導就“了解”了这次談話內容，据說“別人怎样不滿領導，而他又怎样怎样解釋”云云，——因为他早已搶先汇报了。

譬如說，有的人在小组会上是不爱发言的，他只慣于做义务記錄，把別人的話砍头断脚地記下来，然后向煞有介事地去汇报……

譬如說，有的人已經没有什么群众了，群众一看他老兄来了，談的也就不談，笑的也就不笑，于是，他老兄落得一无所获。——然而汇报材料还是有的。他可以神秘地向領導說：××对領導气色不順，××有抵触情緒，××等一定有小圈子，云云。

譬如說……

这一类汇报专家大概是不不少的。他們自命为領導的耳目，領導也就信任这些耳目，于是，群众与領導間的“牆”便筑起来了。

割掉这些“耳”，挖掉这些“耳目”，斯其时矣！

（2）在党委会召集座談会上的发言（摘要）

1. 八年来，我們知識分子的心情是沉重的。思想改造的方式不妥当，將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一扫而光。中国三千年以来，每个朝代的变革首先吃亏的是知識分子，秦始皇焚書坑儒，清朝的“文字獄”都很殘忍。新社会与知識分子的关系和历史虽有所不同，但思想改造、肃反，大批知識分子都卷进去了，弄得体无完肤，甚至使其本人不了解其生存的意义。这比历史上对知識分子的面都大，我每个运动都是对象，体会特別深刻。“刮風”期間我弄得

鼻青臉腫，口口声声罵我是反革命。我若是光干的話，我就自殺了的。解放后，我學古典文學的原因，第一是原來喜愛，第二是因為逃避現實，我這種思想代表了八年來被動的人的心情。

2. 吸收黨員面向數理，是否數理教師好領導會歌功頌德呢？黨喜歡的當然應該是善於聯繫群眾的人，但是看來仿佛喜歡年青意見不大的人。發展的十幾個黨員究竟起了那些作用呢？我認為象我這種類型的，還是可以起些作用的。當然我並不是“毛遂自薦”。

郭笑云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郭笑云系湖北日報記者，黨內右派分子。這個材料，是由湖北日報社整風辦公室提供的。

(1) 反動的詩：高山牧笛

按：高山牧笛是郭笑云師流沙河幽魂作的一組詩篇，寫於1957年6月。這個時間，黨中央宣傳會議精神早已下達，並且指出“草木篇”是反動文章，進行批判，但郭笑云還挺身而出，充當右派分子的打手。

松

活着，一副硬骨頭，他沒有冬天，風雪也休想動他一根汗毛。詩人畫家都替他祝福：萬年常青。死了，還是一副硬骨頭。連屍體也不肯隨風泯滅，用凝固的鮮血，在枯屍上重新滋養出生命的花朵，那便是人們所珍貴的銀耳。

鷹

他，不知疲倦，不知飢餓，終日盤旋在碧空，懸崖是他的家鄉，白雲是他的棚帳。飛呀！飛呀！他呼喚着狂風暴雨！飛呀！飛呀！他忍受着酷暑嚴寒！穿過千層雲，飛過萬重山。用犀利的雙眼，尋找地下的寶藏……

泉

象一把明閃閃的利劍，將黑山劈為兩半，潑珍珠、撒碎玉，銀帘直垂三千丈。他熄滅身邊的烈火，他掀掉胸口的岩石，拚命的從地心中噴出，用自己的乳漿灌溉着百花……

栗

她，沒有野葡萄那樣誘人，更沒有山梅那樣醉人，渾身長滿

利刺，从不靠外形和顏色招引蜂蝶。但里边却藏有香甜的果实，貪嘴的狐狸只好干瞪眼。象庄真多刺的白玫瑰一样，愿把純洁的愛情献給披荆斬刺的人們。

野葡萄

她的眼睛亮晶晶，她的顏色紫莹莹。象宝石，象銀星，迎風向人們輕佻地撒嬌，連清教徒見她也要垂涎三尺。总以为她是一滴香洌的美酒，但誰只要碰碰她，便会酸得裂牙挤眼睛……

矿石

压在太行山下，总有五千万年。他默默的承受着沙埋石压，火燒水淹，但他从沒有眨过眼，叹过气，埋怨自己的命运。还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縱有一天，他被爆炸了，他也要把紅心再放到熔爐中考驗……

水牛

夜，狂風更兼暴雨，山洪暴发了，波濤滚滚，漫天盖地而来。慣会看风色的小鴨，拍拍翅膀，随波逐流的浮去。他虽然在惊濤駭浪中滾了几滾，但还是昂起了头，始終把握住一定方向，穿过回水，冲过逆流，朝着熊熊火光的高处駛去……

牧童

再高的山也比他低一头，再快的风也比他迟一步，用笛儿放着白云，用鞭儿叱哪着雷閃。虽然他还没有成人，但他敢和貪婪的豺狼搏斗。他仰空长嘯一声，凶猛的虎豹也要讓路，只因为他是弱小的保护者……

1957·6·10·深夜

(2) 言論摘录：

1. 鳴、放期間，郭笑云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恶毒的攻击党委机关报，企图摧毀报社党的領導陣地，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

(一) 报纸沒办好，搞記者不光彩。工人說报纸报导农村，不愿看。农民說，报纸光教訓我們，不喜欢。干部說还好，登了

几篇省委指示。报纸就是这些指示在起作用，成了“官报”，真正来自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和意见，很少发表。党性太强，人民性太弱。提倡绝对的“新闻自由”。

(二) 报社有宗派。编辑象亲儿子，记者被推出去不管。

(三) 领导官架子大，是“暴君”，“不学无术，还要耍点官架子”。被领导是“奴仆”。

(四) 领导是“官”，当了“官”就有了官架子，当了“官”就有了“特权”了。“领导之间为了一顶乌纱帽就互相争权夺利”，这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干部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的不好，过去党员是吃苦在前，现在都当了“官”了。

(五) “只要政治上会投机就有办法，入了党就是本钱，不贪污，不搞皮鞭就会被提拔”。

(六) 郭笑云呼喊：“编委、部主任要由群众选举，选不上的降下来，还要降薪。”“升不上去的‘老党员’、‘老革命’，每月可给他适当照顾，但不一定要升上去，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按劳取酬。”

2. 郭笑云很反对党的纪律，并恶意的诬蔑共产党员、党组织。

郭笑云说：“什么党员，党员就是‘紧箍咒’，拿着这个‘紧箍咒’，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当社会上的右派诬蔑我们党员是用鲜血染红自己手的时候，他说：“是的，我们党内是有用鲜血染红自己手的，积极分子的手就是用鲜血染红的。”

党组织是争名夺利、僵化堕落的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北冰洋的气候还冷。

3. 狂热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郭笑云热衷一本书主义，他说：“平生无大志，只要一本书。”

他坚持稜角论，要做一个有稜角的人。还说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傲态不可有，傲骨不可无”。

蔡培元的右派言論

按：蔡培元系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

一、向誰去嗚咽訴不平！

夜深了，萬籟俱寂，人在睡夢里，我在怨訴中，怨而今，悔當初，恨報紙，怪整風，搞什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逗得我心痒難挨，不由得我亂炮一通，真是數年默忍的功績，廢于一旦，好吧！既已成了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

* * *

法院油印的介紹信，在填寫姓名空白欄後，括上一個員字，本是為了填寫黨團員用的，有些非黨團員同志，計莫奈何，只得填上審判員、更有的填一員或二員，所有這些窘相，都掩蓋不了，別人知道你不是黨員，肯定的，別人看到這號介紹信，就知道你這號非黨群眾，當不了家，解決不了多少問題，自己也難堪，別人也談得不帶勁，這個意見，在年關小整風時，我提過了沒得到解決，現在我要請司職此事的領導，挖一下思想，法院的工作是否黨員能全部包干，是否必須黨員，才能搞法院工作，我親愛的領導同志，這樣作沒有好處，只會給工作帶來損失，只會造成黨群間的隔閡；這是宗派主義的情緒，這是黨天下，清一色，脫離現實的錯誤思想（請不要誤會我否認黨的領導，但不應將黨天下和黨領導兩者混淆起來）。報紙上說×中央機關，已廢棄了這種不合理的介紹信，究竟我們怎樣呢？領導考慮吧！

* * *

解放以後，由於對舊知識分子，沒有正確的估價，所以在某

些方面旧知識分子是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視，旧知識分子沾染旧社会恶习較深，应經過长时期的思想改造，这是事实。但旧知識分子体会旧社会的罪恶腐化，却也最深刻，我在旧社会曾考虑过自己是否有做亡国奴的危險，也曾幻想过能做一个强国的老百姓，該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因我幼年成长在較典型殖民地的九江，看到那些洋鬼子在中国的势力，尤其是对于外国兵艦到了九江，中国兵艦还要放礼炮数十响表示欢迎，我很引以为耻）。解放前和解放后事实的对比，旧知識分子是会算这笔賬的，因之應該拥护誰，應該反对誰的道路，旧知識分子是会選擇爱国的道途，然而作为体现党的政策的部分领导同志，在思想上老是認為旧知識分子不可靠，立場有問題，我这个旧知識分子对这一点很感到不黑气，我为自己解放前的历史曾算过賬，我参加过国民党但仅只領过一張党証，既未填表，也未宣誓，沒参加过任何會議，无任何具体联系，我曾投奔过解放区，因怕吃苦，未接上关系，中途折返了，这些都是我有愧于党的地方，但我解放前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因我毆打特务学生的导火綫（因特务学生阻止我們搞学生运动而引起毆斗），造成了当时北平的五·二〇惨案，数百名特务将学校圈困了一昼夜，許多同学被打成重伤，还誤伤了一个清道夫致死，这一次事件对在校的一千多同学教育很大，認清了特务的真面目，因为憎恨特务的横行，許多同学飲泣过，当时我的名字在国民党許多大城市的报纸也曾宣揚过，只在武汉将解放的前半年，我因再次投奔解放区被国民党特务捉住，还坐了几天牢，这些事实只能說明我想投革命之机而已，但最少可以說明我在解放前是反对国民党的，而是一个思想愿向共产党靠攏的人了，說到这里我很感到惭愧，許多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鋪平了坦途，却默默无語，我这一点只能算得是个人打算的好事，那还值得表功，問題在于那些作为体现党政策的领导者，专好对旧知識分子算旧賬，既然要算旧賬就該公平的算一下，我为自己算了一下賬，是功較大，过較小，两下相抵还有結余。

* * *

解放以來，只許歌功頌德，不准對領導或對黨工作中不健康的現象提出批評，以致六親不認，見面打呵呵，我看到現在有許許多人都學會了說假話（我有時也說假話，因沒象別人說得那樣多，心裏還是不服氣）。為的是怕惹是非，為的是便于別人了解自己的思想進步，甚且有的事情竟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初解放時我對革命的热情很高，對於黨真是一股赤子之誠，對不健康現象，對違法亂紀的行為，只要是我見到的，我敢於作鬥爭，無奈我太幼稚了，太天真了，自己所得到的結論，往往將我與違法亂紀作鬥爭的行為，看作是反黨反領導的行為，這樣的打擊，叫我如何受得了呢？

* * *

我以上放了許多，放的時候倒很痛快，但我在庭內是唱的獨腳戲，運動完了，戲收場時，把獨腳砍掉，沒腳了，看你还唱不唱戲？！關於報復打擊的問題，有人提到所謂維妙的報復，我所怕的報復是定身法，合理又合法，只可以會意，不可以言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黨的原則，但掌握原則的，是具體領導的人，在許多領導中，只要有一个人，有不正確的看法，就該你消受的了，對此事我有深切的體會，難道我到現在還只是書記員嗎，我早曾定過職，僅未宣布而已，現在又要來一個折中，所以我處在真空的狀態，我這些話，是對領導說的，只可以會意，不可以言傳，言者無罪嗎，請莫又抓我的辮子吧！

* * *

那怕肚子里有天大的意見，最好不要提，有人問我，在肚子里，會悶死人，消受不了，我認為，只要堅持服從領導，不提意見，自有消氣維妙途徑，而且是釜底抽薪的辦法，氣消了，且可不再長氣，若以提意見批評的辦法，當時看來似乎消了氣，隔不了多久，會生出更多的气，為什麼說不提意見可以消氣呢？因為順從領導，可以提拔可以入黨，大問題解決，还有什么意見呢？！

我曾說過，十個大炮，十個吃虧，錢院長批駁了我的意見，我還不敢完全相信，我準備再在實際生活中体味一番，有人叫我問問庭內的同志，問問法院的同志，我認為這樣問法，不解決問題，官樣文章桌面上的話，許多人都學會了，拿我們法院解放後吸收的黨員看來，我找不出一個敢於對領導，敢於對工作中不健康的現象，提出真正尖銳批評意見的人，有時看來似乎能提些意見，那是水面打花，為了裝飾其有黨員的戰鬥性而已，當然不可否認的，這些同志在過去運動中，表現對敵的鬥爭是堅定的，在當時情況下，考慮吸收黨員，應以此為衡量的主要條件，但今後情況變了，人民內部矛盾，將占主要地位，黨員的戰鬥性，應該表現在，如何能發現不健康現象，而向不健康現象作鬥爭，請黨支部考慮，對你們已吸收的黨員，應多教育他們向不健康現象開火，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悲觀得很，黨員在這次運動中的表現，遠遠落後於非黨群眾，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家丑不可外傳嗎？不！黨中央號召，大開門整風，那麼究竟為什麼呢，我看是想從中撈一把，利欲熏心了吧！我再向法院上層領導幹部（庭長、主任以上的幹部）呼喚，你們天天作動員報告，叫大家大膽放，大膽鳴，你們領導間沒有一些兒矛盾嗎，一團和氣就是大矛盾為什麼不帶頭放呢，不帶頭鳴呢，你們若真沒有顧慮，寫些真東西，貼在黑板報，羅羅們自然圍上來了，大道理的動員是沒有用的，我認為現在不能真正開展批評，在社會上，已成了一種風氣，我認為在解放前的大學生，確有很多敢放大炮的，否則解放前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是搞不起來的，我在解放前，對在籍的特務學生，我敢於公開罵國民黨，但解放後，我卻不敢對不健康的現象進行鬥爭，但解放前敢說國民黨壞話的人，只有在籍的大學生，因他們有組織，其他的人是不敢多說，請同志們不要誤會，我認為國民黨好，應該肯定的說，在本質上有所不同，舊社會罵國民黨是詛罵他早日壽終正寢，現在想發牢騷，是希望缺點得到改進。

*

*

*

法院黨員耻矣！

所謂“內外夾攻燒三害”燒了些什么呢？只燒了一些“發展黨員的問題”“提拔徐運芬的問題”和談了幾個具體案子，凡屬能牽涉到具體領導和稍帶一些刺激性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來，是這些黨員同志察覺不到其他較大的問題嗎？可以肯定的說個“不”字，因為群眾已經燒了幾天所公布的材料當不下數十萬言，就是跟在群眾屁股後面撿渣子也可以撿到不少東西，其所以問題沒有擺出來，就是這些黨員同志較之群眾更善於揣測領導意圖，更善於為個人利益着想。

前幾天還到了三、四級風，經過了法院黨支部的內外夾攻已變成了一級風，前幾天我所提出的“搞真的搞假的”的問題現在更使我相信是搞假的了。

黨中央的號召大放大鳴，結果你們跟在群眾後面拿出這些騙人的東西，欺黨欺？欺毛主席欺？欺群眾耶，抑自欺耶，黨員同志們自己考慮吧！

最後我要問問法院的黨支部和全體黨員同志，你們公布“內外夾攻燒三害的材料”用意何在，是否要群眾向你們看齊？既然你們已經向群眾表示了態度，自今日始，可以休兵矣！

蔡培元

1957年6月17日早晨

李肇基的右派言論

按：李肇基是民主建國會武漢市副主委、武漢市工商聯執委、長航副局長。

一、6月4日在中共武漢市委員會召開 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他在座談會上說：他看到報上發表的鄧初民和儲安平提出副主席中為什麼沒有一個非黨人士的談話後，想到了民生公司的秘書過去也說過這麼一句話，結果是先被調到診療所開收據，後來被授意寫申請退休了。他還說鄧初民說統戰工作只“統活不統死”是正確的。他要求弄清楚前民生公司總經理在三反五反中自殺的案件。

李肇基說有位知識分子研究了黨的群眾路綫以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即黨的群眾路綫有兩種，一種是硬的，是壓制；一種是軟的，是說服教育。軟的群眾路綫的眾字是簡寫的“衆”，意思是只限於三人，硬的群眾路綫的眾字是“衆”，筆劃多些，意思是必須用多數人來辦。黨有時是用一種，有時一種不行，就用兩種。

談到黨與非黨的關係時，李肇基說希望黨對非黨同志親近一些、親信一些或者平等一點，他說現在的關係就象四川戲“張菜子薺豆”里的唱詞：“這邊落雨那邊晴，一樣青天兩樣心，你說嘔人不嘔人！”他還舉出魯迅在“故鄉”中寫的魯迅返鄉，和兒時最親密的朋友閩土見面時，閩土叫他“老爺”的情景來比方某些黨員同志遇到了過去在地下時的朋友的情況，他說：“過去是知心朋友，甚至

胜过骨肉，可是現在見面，按原称呼都感到不便了。”他提出如果黨員能以在地下时联系朋友关心朋友的心情来对待非党同志，拆墙填沟是可以办到的。（根据6月6日“长江日报”）

二、6月10日在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

第三次座談会上的发言

今天談公私共事关系問題。市民建在4、5二个月以来，多次收集成員座談的意見，并将这些意見分批交代給有关各方面，这些意見中最突出的是共事关系。今天我根据檢查5月份文件中所談的問題，归納一下，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見。

从5月份的材料来看，好象一般同志对公私关系正常的談得很少，我們不可能根据个别材料断定，我們市內的一些单位公私共事就不正常。但是这确是个突出的問題，值得党和有关政府部門注意。

这些材料中所举事实說明了：1.如果領導上重視公私共事問題，一般关系就較好，或者是上层关系容易好，中下层比較差。2.領導如不重視或重視不够，一般关系就相当坏。根据材料反映，一般关系不好的，虽为个别事例，但值得指出来，大約可分为以下八点：

一、把私方人員看成国家包袱，国家拿飯你們吃，已是仁至义尽了，少数单位从上到下都有这种看法，而一般中、下层有这种看法是很普遍的。

二、对中层領導如科长，常常指揮不动。特别是从前这些科长是管过他的，現在他又做了这个科长的領導，这个科长就常常一肚子气。

三、某些会和他有关的也不能参加，或参加了中途又叫他退席。

四、同样的錯誤如果私方犯了，就一定公开批評，工人犯了就一声不响；又同样一个工作，如工人来作是一种工資，私方来

作，又是另一种工資，而私方的工資要少得多。如一个紙厂同一工作，工人来做是每月七十元，私方来作就是三十几元。

五、工作和社会活动兼顧困难，压力很大，形成内、外夹攻。有的专业公司領導上表面上支持私方参加社会活动，如有个公方負責同志貼出一个条子：“私方人員如不参加社会活动，一切后果由其負責。”但他的心里和条子相反的。因此，成員們說：“起早了得罪了丈夫，起晚了得罪了公婆。”

六、一部分文件看不到，有时商量事情，或向公方代表請示，常常得不到答复，或者当面就給他下不去。

七、部分私方形成挂名，沒有事做，呆得难过。

八、常常強調階級关系，对私方关心不够，好象路人。如一位私方人員病在医院里，无人管他，后来有人去看他，但只是为了問一件工作，对病情根本不問。

根据我的分析，这八方面比較突出。这些情况民建同志、工商联的同志們过去都陸續反映过，但反映后結果不好，他們說：工商联、民建解决不了問題，充其量只能作書面反映一下，反映上去也多无結果。他們对这組織看不起。他們又感到区统战部、市统战部是衙門化，区统战部更差，常常忽視或歧視他們的意見，使工商业者感到苦悶，影响其积极性，感到在企业中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是困难的。

原因何在呢？我觉得公私双方在思想認識上有距离，其次双方在工作方法上存在些問題，特别是領導方面的三个主义，又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首先从思想認識上来說，对于和平改造的现实意义与国际意义，不仅私方，就是有些公方也沒有彻底弄清楚。同时对公私共事关系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在認識上也有距离。我自己認為公私共事就是把私方改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进行教育的过程。有些公方說私方是包袱，安排是照顧，根本沒有向他們学习的必要。而有的私方人員却強調自己是財富，強調自己的进步性，否認有两面

性。还有另一部分私方人員又感到自己水平低，工作赶不上人家，有强烈的自卑感，处理問題常从个人利益出发，不从具体利益出发。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从公方來說，有的公方在私方人員来企业以前，就对党、团员进行了公私共事的教育，但有的却没有搞，因此一般干部对私方人員的看法就不正确。当私方到企业来，从材料上看只有一个公方代表开了会，介紹了一下，有的連个别介紹都沒有做，这是共事教育注意得不够。第二，私方到了后，一系列的联系工作做得不够，讓私方自己去問，自己去撞，自己去鑽。活跃一点的还能硬着头皮联系，有的就感到伤脑筋。第三，有了共事关系后，公方人員应定时了解一下私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感觉怎样？但很多单位却不如此，来了就算了，对問題主动了解研究不够，有时私方人員提出了問題都很少答复。第四，通过共事关系，公方如何贯彻中央的精神来逐步提高，也沒有做好。在私方方面，他們到新崗位去后，常常对职责范围不清楚，也不主动要求弄清楚，这样怎么能贯彻守职尽责精神呢？許多应该有的制度，也沒有搞。再一方面，有好些私方朋友們在搞工作当中，常常感到首先最敏感的是阶级关系，感情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沒有抓住应先搞好工作关系，才能搞好阶级关系，如果他抓住了这个重点，就一定会积极联系群众，努力鑽研。第五，有一些私方人員对加强自我教育，运用批評与自我批評，不熟悉，只留恋旧的一套，对新的不大学习或学习不够，常把个别工人的特性，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共性，常常自高自大，有时遇到問題来了，他也不提意見，有时提了意見沒被接受，又无勇气繼續提，直到搞清楚为止。再一点，对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認識不够，仍用旧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問題，沒有認識到资产阶级的思想要起“位移”作用，相反的对它还舍不得，因此共同語言不丰富，对公方代表了解不够，有的不成問題的也成了問題，小問題也成了大問題。

因此，我建議第一，統战工作应加强，特别是市、区統战部

和市、区民建之間的关系应加强，而且对工商联、民建反映的意見要重視，要有答复。如及时答复就能提高他們的积极性。第二，有些企业单位的党委同志对公私共事工作不重視，做得不好，对有些严重問題也熟視无睹，市委应予注意。第三，公私关系好不好，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早、迟、好、坏与社会主义建成有密切关系，人代会与政协应設专门小組，每季度或最多两个季度，由这个小組到有这种关系的企业去檢查一下，作出总结，这样就可以引起企业公方同志的注意，领导同志也会注意，同时参加的人也能对此問題有了解，有認識，这对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帮助的。（根据6月11日“长江日报”）

三、在长航党委两次召集的民主党派、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座談会上的发言

（1）在会上积极点火，要求召集“特种人員”會議向党进攻

6月8日在座談会上李肇基說：星期五晚上是民主党派活动時間，現在搞鳴放，民主党派活动時間需要解决。

民建市委決定在鳴放时期，每周和工商联联合召开一次座談会，征求意见，然后向市委、统战部反映，出席座談会的成員回去对群众进行发动，广泛征求意见。所以我的意見在鳴放时期要充分发揮民主党派組織的作用，为党整风收集意見。

李肇基認為要召集特种人員（未說明何为特种人員）會議，不要受時間限制，把話講完为止。

对一般小組的組長，党委要加强領導，使他們学会掌握會場，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历次运动中被斗錯的，在鳴放中言論可能要激动些，开始可能乱些，不要怕，讓群众去駁斥。大专学校就是这样。我們机关里黑板报最近不活跃，据说因揭发了某些領導人員問題受到压抑，这样不好。

最后說，群众不敢鳴放，怕今后不好入党，怕提拔晋級，分配工作对他不利。

(2) 企图組織人事管理委員會篡夺党的領導权

在长航党委邀請的座談会上說：很多人对人事制度有意見，干部升、降、調遣很少征求非党領導上的意見，很多矛盾就是由此产生的。今后人事工作應該組織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人事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

李肇基在董事会上提出：

(1) 要求給卢作孚作出結論是否为反革命。要为卢的死追究責任。并写了万言書拟上訴中央。

(2) 要把过去处理的人（三反、五反、鎮反后处理的）都收回来，名之为归口（翻案之意——注）。

周庆余的右派言論

按：周庆余系武汉市江岸区百貨区商店副主任、百貨同业公会副主委、民主建国会會員。这个材料是由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统战部整理的。

反对党的稅收政策，誣蔑“五反”运动，不滿社会主义改造，要向党反攻倒算。

“解放前我看到武大新聞（地下）說是对工商界不歧視，要保护，但是进城以后二、三年变了样，不是不摧殘，有些大資本家跑了而小的走不了，稅务局我們是不敢去，稅是統按15%利潤評的稅太重了，我在中央开会时提了意見，才退了稅，我現在还是有意見的，几年的賬簿还存在，款可以算清楚，如联和也說，大家都有意見，意見大，国家虽收了十万多元完成了任务，政治上受了很大損失。我的意見收高了的要退，現在稅局橫直沒有事，可以搞退稅工作，退了我們好定息，以挽回造成历史上的錯誤，只有这样共产党才是真正偉大。

‘五反’中我們另售商，不應該叫別人交代家当，特別不應該說是漏稅，我們的店子一下子都垮台了70—80%，‘五反’以后又搞漏稅，什么在途材料稅，我有意見。”

“說‘五反’是对抗性的矛盾我不同意，工商界无武器，只是为了錢，要錢，对任何政府是沒有对抗性的，工商界也沒有抵抗性，要錢，老干部也有的。”

“定息确定的本金就不大适当，按合营时就不对，那时就花了不少，而应按‘五反’以前算，現在算全国只有22亿資金，我看不对，共产党要再算一下，多退少补，才算英明，过去国民党的老

賬，股票都算一下，定息、企业應該有挖費，不要的也要看自願态度，才叫合理。”

“共产党說工商界是朋友，朋友就不能叫他死，‘五反’中死去的工商界是冤枉，應該追悼一下，这才够朋友。只有反动派才叫他死，他是敌人。”

“共产党要算旧賬，那就應該把这些賬算出来。”

“用干部只是口語上，实际上不信任，一切都保密，連倉庫內的灭火机也要保密，我們那里人多，有浪費，提意見，党的积极分子不同意，就不能提了。”

“我們商店里……人員又不能調（要公安局批准），物价也訂得那么死，費用又大。”

“二千元以上的資方无医疗費照顧要去看病将来扣股息，也是不同意，管得太死。”

“安排私方人員輔助劳动力不当，私方家屬每月只 20 元什么都要作。”

（以上均是周庆余在 6 月 8 日武汉市江岸区委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誣蔑工人階級，謾罵党和党的干部。

“現在大家都談‘百家爭鳴、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否过去我們对胡风的問題处理太左。”

“听到有人說：我是資产階級你是工人階級，为什么你不做資本家呢？如果沒有資本家，你們不知到那里去生活。”

“店員不是純粹工人階級，所以說企业改造同时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是包括店員在內。”“我要求党用‘三反’的手段来整风。”

（以上是周庆余在民建組織生活会上說的）

有一次在百貨区商店学习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时，周說：“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为什么他們沒有‘鳴放’，是因为他們愚蠢，沒有文化。知識分子和資产階級之所以‘鳴放’，是因为他們聰明、敏感。”

“我認为党現在整风是迟了一些，已产生偏差一直錯到底。”

“这些錢（按：指国家稅收）搞建設的是太少了，很多老干部拿去驕奢淫逸、花天酒地花了，吃好穿好，小干部也在学，难怪农村妇女不愿嫁农民。干部对別人不管有錢无錢都要刮一刀。”

“老干部在解放前，在农村里要团结农民，城里要团结工商界，不然国民党就要杀人，今天就不管那一套了，反动派有抵抗性，工商界是无抵抗性的。”

“現在是移风易俗，我看完全照旧，上梁不正下梁歪，現在又在这样移了。”

“‘守成不易、創業維艰’（司馬光語），我也看了‘毛澤东选集’大小事都要为人民，过去要守成，現在不守了，将来危險，当然，打天下是不容易，老干部进城以后腐化了，我們中、小工商界每月只有十元的开支自己有病还要付，現在是社会主义有信心，但目前生活不能解决，还要买公債，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要为家嗎？老干部是住的寬楼大厦汽車代步太享受了。”

“推銷公債是层层督促，不是自愿量力，我認为老干部未必做到自愿量力，我是怀疑的，老干部是不是都做到十元的生活。如这样长期下去，人民不服气的，老干部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住那好，把房子退出来給伤病員住。”

“中小學生不能上学”，“我看共产党将来不認識字是不行的，我們要把小孩教些書，不然将来会有新的共产党来反对这个共产党。”

“以前剪头是‘万国’，洗澡有固定的地方，而現在是2角5分剪头要排队，我的意見：請每个老干部自己去亲身体会一下，买一下乘搭公共汽車是个什么痛苦。”

“我們只要均，不要不平。”

“改造是痛苦的，老干部要住小一点，我們就是十几个人住一个房子，老干部的錢賺的太多了，这样影响不好，自己不服气。”

“意見我們要提，但提了要改，不改，我提不起勁来，那就不

听共产党的听别人的了。”

（以上均是周庆余在6月8日武汉市江岸区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鸣放以后在区商店周对干部说：“过去某些地方不是从六亿人口出发：1.上公园工人进去钱要得少，资本家进去钱要得多些；2.入党入团都要考虑家庭成分，对资产阶级不同。”

厉无咎的右派言論

按：厉无咎系民建中央委員、民建武汉市委会副主委、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委、汉口申新紗厂副經理、申新、福新汉口两厂副總經理。

(1) 誣蔑党，反对党的領導

厉无咎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党员骄傲自滿，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保持謙虛堅韌的精神”。又說“共产党是領導，我們應該服从，可是人都是平等的，这是宪法上所規定的，为什么有些党员不遵守宪法，把我們党外人看成低人一等呢”？他在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在改造高潮时积极，現在不积极的問題时說这是因为党的領導“偏听偏信”“不明是非”，因此有些人“不愿再搞工作，感到沒有奔头”。

他还說“解放后武汉市党的領導，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得是有偏差的，比如公債、稅收等方面，比之其他大城市，武汉工商界的任务是比較重的。……这不能怪稅局的同志，他們是根据任务办事，問題在武汉市党、政領導上沒有深入了解工商界实际情况。当时，我們也反映过，但是沒有被重視，还怕人說你落后，說什么階級共鳴，許多帽子压在头上，使人不敢啃声”。并認為各方面对工商界“不信任、歧視”，这也是“党的責任”。

又說“对于中、小工商业者放弃定息和‘摘帽子’的問題，毛主席指示得很明确，可是武汉市的領導就是不执行，既不替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仍然以資本家对待，一年拿几元、几十元定息，自愿放弃的也不讓放弃。这样，許多中、小工商业者覺得再努力也不能入工会，大大影响了他們的积极性”。

(2) 美化資產階級、模糊階級界限

厉无咎說“武汉市工商界这几年进步很大，他們有觉悟，有認識，應該相信大家不会有李康年的看法”。他一再反对組織工商业者討論李康年、吳金萃等人的言論，說“報紙上不應該組織這些問題公开討論，这会拉长資產階級与工人階級的距离，報紙在制造矛盾，唯恐天下不乱”。今年五月他在民建組織生活会上也說“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上海報紙过分渲染突出，李康年会感到自卑，群众也会发生錯覺，是不是有意出洋相”。

他在分析当前的矛盾時說“我看当前工商界和党的根本矛盾在于：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估价还不够恰当；同时，社会上对工商界的观感也还不大对头。……通过改造高潮，在工商业者思想上划了一条綫，大家都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們与工人階級已經从朋友的关系变成同志了。因此，用不着再不信任大家了。……可是，現在不管工人也好，公方代表也好，社会上其他人士也好，对工商界的观感仍然和‘三反’、‘五反’前后一样，以1956年以前的老眼光来看1957年的工商界，工商界当然就要受到歧視啊！……这当然不能怪工人群众和社会人士，这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工商界进步的一面估計得过低的緣故，因此造成了大家的錯覺”。

(3) 否認工商业者还需要脫胎換骨的改造

厉无咎說“章乃器有些意見并不完全对。……我知道他，他与我是多年老朋友，这人很聰明，可就是主觀性强，所以他爭的意見中也有些主觀。……但是章乃器否認工商业者的改造还要脫胎換骨的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如果現在还要脫胎換骨，那么党这几年对工商界的教育又摆到哪里去了呢”？

否認两面性，提出消极因素“客觀論”。他在給汉阳区工商业余政治学校講課时就說“上海的荣毅仁是一匹磨子勤勞起家的”。

他在市民建会討論資產階級的两面性時說“我是以工資起家，不是以剝削起家的”。并認為“沒有原始資本就完全是剝削”。意味着有原始資本的就不完全是剝削。還說“我認為無論公私勞資雙方都是平等的”，不承認公方和工人的領導。

他否認两面性，說“工人農民都有两面性，工人是計件打冲鋒，計時磨洋工，工資改革搞不通。農民是土改分地時很積極，分地后連會也不開了”。在北京開會時說“對骨幹分子關心不夠，只解決思想問題，而不解決具體問題，要解決現實問題才能解決思想問題”。國務院四、五、八辦召集工商界座談會時他說“湖北、湖南、武漢工商界的情況，高潮以后是好的，如武漢市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的私方人員占50%以上，得獎勵和表揚的近半數。所以总的情况是積極的，違法的只是少數，而且也多由客觀原因造成”。他在漢陽區工商業業餘政治學校講課時說“如果要發揮私方人員的積極性除非黨政要把所有全部的私方包下來，否則不能以理服人”。又說“資產階級的两面性都是客觀因素所造成，應由黨政負責幫助工商界解決，否則是不可以避免”。還說“要從經濟出發，漢陽的經濟很小，两面性根本談不上”。

市工商聯召開三屆會員代表大會他作两面性發言時說“听厭两面性是進步的表現”。他在全國政協開會回來以后，說中常會關於公私關係文件中所指的消極性“不符實際”，“即有消極性也与武漢不同”。

他在湖北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向全省工商業者放毒，說“資產階級消極的一面是客觀因素造成的，不能強調階級本質”。

他說“千家駒不了解工商界的情況，光從教條出發。比如：把工商界的消極一面完全歸之于階級本質，這是不能說服人的。當然，工商界的消極面有些主觀原因，不過當前由於客觀原因而造成消極面的情況就更多了”。

客觀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他認為主要是當前中、小工商業者許

多人生活相当困难。他說“全市工商业者平均工資收入每人每月是52.6元，其中每月50元以下者占工商界一半，100元以上者只有3%。……象陈經老每月也只200多元的收入，比起上海大资本家每月收入1000多元的差远了。因此不仅中、小工商业者生活困难，就是上层人士有时也不免有拮据之感。……也許有人認為工商界生活虽然困难，总比工人强一些吧！他們还有定息可拿。对，應該承認这一点，可是中、小工商业者就不一定。据我們了解，中、小工商业者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少的不在少数，……今年工資改革时，武汉市又死扣中央的指示，增加的幅度最多不能超过20%，这样弄得現在許多負担八、九口人的工商业者，每月还是只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此外，他又提出了历史原因。他說：“武汉过去是轉手碼頭，生产落后，工商业資金原就很少，加上抗日战争时西迁的損失，胜利后国民党的压榨，元气根本没有恢复。因此，解放后，武汉工商界的底子已經很空了。”又說：“解放后，武汉市党的領導，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得是有偏差的。比如公債、稅收等方面，比之其他大城市，武汉工商界的任务是比較重的。这样，造成了工商界生产、經營上許多人為的困难。”

最后他归結說：“由于这些原因，弄得当时私营企业十分困难。工資发不出，资本家只得自动降薪，而且把家里衣服、家俱等出售，維持企业和自己的生活。……工商业者現在沒有奢望，只想吃飽穿暖，可是現在很多人起碼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他怎么能安心工作呢，所以劳动勁头不大，甚至挪用公款等問題都出来了，难道說这些消极面不是客观上造成的嗎？”

彭一湖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 座談会上的发言

按：彭一湖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武汉市委员会委員、武汉市人委参事室副主任。解放前曾任过广东省府秘書长和衡山“实验县长”等伪职，是湖南岳阳县的大地主。

彭一湖認為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頂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的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

他对中共提了意見，他說整风前中共有一个缺点，并着重說明“我不是說个别黨員，而是指中国共产党”，喜欢人說好，不喜欢人說坏，党内批評还好，党外人批評党的缺点，提意見，或者表示了一点不滿意，就認為这个人有思想問題。仿佛承認缺点就損害了威信，伤害了自尊心，以为党不論什么时候总是正确的，黨員总是好的。接着他提到他在1955年曾經写过一个报告，报告中談到两个問題：第一，他認為1954年購粮时，农村口粮留得太少。以湖南岳阳为例：每人一年只留粗粮四百五十斤，粮食不够，人民飢餓，妨碍生产，沒有飼料，打击了养猪副业，对肥料来源，猪肉出口，人民吃油都有影响。其次，他認為有些区、乡干部作风不好，毫无民主气味，應該加强教育。后来湖南省委对他談到的两个問題提出了反駁。彭一湖說：“我不能同意这个反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肃反时，有人把他的报告印发到各肃反办公室，并且有人說他的报告是“口头为农民說話，实际为地主說話”，“是胡风思想”，他很气憤。他說：我看这个报告中並沒有反动思想。后来周总理和刘少奇的报告中都說1954年多征了七亿斤粮食，为什么要說我为地主說話呢？

彭一湖在会上詳細地談到了农村留粮食的問題。他說：他問过很多人，一个全劳动力的农民，每天需要細粮二斤左右，每年要粗粮一千斤光景（按：一千斤粗粮約合七百斤細粮），至于农村的平均口粮，他認為每人每年不能少于六百斤，如果有七百斤就更好了。

后来他談到自己的感想。当他剛听到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时，还以为是毛主席怕民主党派泄气，有“烏尽弓藏”之感，所以提出来鼓励鼓励。他說：“这次武汉整风运动揭发出来許多丑事，我看見有些双料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员和腐敗透頂的国民党員沒有不同，才覺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安慰話，才知道毛主席是了解情况的，确实希望民主党派尽一份責任来救共产党。”他又說：“誰也不否認，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中国。党不好，国家就要腐化，民主党派應該‘同舟共济’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認為“整风是救党自救。民主党派要监督別人，首先应提高自己”。因此，他建議民建應該仿中共整风的精神，自己也来个認真的整风。

最后，他以为这次整风虽然是“和风細雨”，但不要全都是“和风細雨”；对有些藐視宪法，逼出人命的人要依法处理；对違法、营私、舞弊的党员也要严办。他的希望是：“中共拿出‘三反’时的精神。这样才能救党，也才能使天下人心服。”

李华庭的右派言論

按：李华庭系市机电局机电公司江岸办事处主任，现在市委党校学习，这个材料是他在鳴放中的右派言論摘要，由武汉市委党校提供。

(1) 仇恨咒罵誣蔑領導

“領導干部官官相卫，互相包庇，互相拉攏，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

“我們領導干部中的确有不少‘陈士美’，这与过去多妻制有什么区别，对下講的是仁义道德，自己做的是男盜女娼。”

“我很难看到一个領導干部不怕別人提意見，对提意見的人，都是采取打击报复的态度，我头一天提了意見，第二天把我送来整风（其实总支早已确定了来党校学习的人，机电局二月十九日就填了入学登記表），总支找我談話时，还昧着良心，說是系統的学习‘八大’文件，这都是我不覺悟，不提意見什么事都不会有了。”

(2) 歪曲党的干部政策

“国家把干部当商品出售，国家是奸商，干部是商品。”还說：“就这么多錢，干不干？不干有人干。”

“我們提拔干部的尺度是吹牛拍馬，能吹的是好干部，提拔的快。‘敢說敢为’，‘好提意見’的人是坏干部，得不到提拔。”

“領導上对你的看法不好，給你鉴定几条‘工作消极，反抗領導，調皮搗蛋……’，好了，算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因为他掌握了你的生命。”

“我非常同意武大教授栗寄滄提出的档案公开的意見，只有公

开，才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和监督领导上的打击报复行为，消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

(3) 敌视党的各项运动

“……革命革了自己的命……悔恨当初不该参加革命。”

“共产党喜欢搞运动，所有的运动搞起来是‘宁左勿右’，搞的儿子不认老子，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人’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

“肃反五人小组是非法组织，如果说执政党可以随便成立组织，那就是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五人小组没通过‘人大’，‘人大’没有授权党中央，所以是不合法的。……合不合法争论没有什么价值。事情过去了，党是否能向全国人民检讨呢？”

“鸣放时期，在大街上贴‘打倒共产党’的标语，是人民内部问题，如果把它当成反革命问题，就是压服人家，只让人家拥护共产党，不让人家反对共产党，只让人家讲好的，不让人家讲坏的……。游行‘反对共产党’也是放的形式。”

“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批判储安平等的社论，我认为这是收，不叫别人提意见了，实质是压制放和鸣。人民日报发表支持卢郁文的文章的社论不对头，影响大家的鸣放，是给别人以迎头打击。……”

“来党校学习的有三种人：‘一种是专门整人的，一种是真正学习的人，一种是挨整的人’。‘童××是挨整的，李××是学习的，我自己就是整人的’。”

“党校只让我们出出气（指对领导上提意见），出了气就不了了之，我认为‘放’是领导要从中了解我们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就算了，否则应向我们说清楚。我们必须要有个目的（？），我们现在失去了方向（指听了杨青同志传达宋侃夫同志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报告），好象在汪洋大海之中……。只要目的（？）弄清楚了就好谈（指讨论鸣放中的十一个重大问题），我

想現在大鳴大放告一段落，整風正式開始了，我們的領導用‘科學的腦袋’想出了這十個問題，叫我們看看究竟是不是思想意識的改造是主要的。”

“中央整風指示中，要求幹部參加體力勞動並不是為了丰收，不過是叫我們出出汗而已。”

(4) 唯恐天下不亂

“有人動員我在會上去放，我還要保持每餐六分錢的飯呢？我不了解他們（指在會上放的人）為什麼這樣作，我才不去當那個傻瓜，遭那些只會喊共產黨萬歲的人的謾罵。我看×××反駁韓紹斌‘農民生活苦’的發言，真是‘胡說八道’。”

“一班二組揭發市委的補助問題，我看×書記、×部長講的一套，做的又一套，他們忘記了自己講的共產黨員‘錢多也干，錢少也干，沒錢也干，掉頭也干’。我要求組長組織大家表示支持一班二組的大字報，小組有人反對，我認為這是‘牛科長’‘喊共產黨萬歲的人’。一班部為什麼將大字報迂回班部，一支部書記應作檢討……，這樣的‘牛科長’是需要打擊的，應該撤他的職。”

“二班八組呼喚‘拿起鋤頭，鏟除毒草，培植鮮花’的大字報，這是誰寫的，真他媽的假積極、出風頭。”

“在辯論‘陳士美’問題時，有人說主席、副總理都是‘陳士美’，有人聽了一晚上都未睡着覺，我看，‘又出了吹牛拍馬的牛科長’。有人說‘今天的陳士美’這張漫畫是反動的，我認為這是扣帽子。我是經不住這個考驗的，假若是我，就捆起被子回家去了。”

周世瑞的右派言論

按：周世瑞系武漢市委初級黨校的學員，這個材料是該校提供的。

(1) 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干部也变坏了

周世瑞說：“当前社会存在的現象是干部鬧級別、鬧待遇、鬧离婚、两性关系、生活腐化墮落等等，这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識。”他又說：“小干部意識坏是大干部的影响，大干部意識坏是国家不合理制度养成的。”又說：“社会主义的工資制不好。”“工資制不如供給制好，而鬧級別、鬧待遇生活腐化，过去供給制时是沒有的，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識，制度不合理才产生了这些問題。”

攻击我們对干部实行統籌兼顧的原則。他說：“統籌兼顧适当安排是不对的，大干部走遍天下鉄飯碗，天下財產都是他的。”他認為老干部特殊化、貴族化，这样造成干部質量上、数量上的矛盾。数量多、質量差，現在的絆脚石已經不少了，“再統下去会造成更多的絆脚石。”他为了把老干部赶下台，他說：“絆脚石牌位要掀掉，从生活上养起来都可以，但不能从职务上照顧，因為他們（指老干部）到哪里都是絆脚石。”

紧接着他又从我們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上来进行攻击：“合法的事情不一定合理，現在是女人吃亏了。”他又說：“現在出了很多陈士美就是沒有包公。这样一来还不如过去多妻制，多妻制时代的女人也沒有現在的这样痛苦。”

(2) 共产党提拔干部不是根据德、才标准，是官官相卫，朝里有人好作官，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分别

周世瑞說：“当前干部政策不具体，德、才兼备这个标准很高脱离了实际，共产党员都不够这个标准。”他提出：“行政管理干部可以重才（意思就是不要德），这样才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当他提出修改干部政策之后，便对领导干部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把老干部說成一团糟。他认为领导干部掌握了大权，在执行干部政策上造成了严重的宗派主义。

他說宗派主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调皮捣蛋的撤职训练”，他又講“拍馬溜須連升三級”，“和领导看法不一致就触犯了龙顏打入冷宮加上鎮邪符的法宝(鉴定材料)作为永久不能提拔的根据”。第二，“宗派主义还表现在提拔干部上有裙带风”，“官官相卫作风”。“过去我們罵国民党的裙带风。可惜，今天我們也染上了这种坏作风，领导同志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虽然不全是，起碼也是身居要职，入党快，提拔快”。“现在有的干部鬧地位鬧待遇，就是因为他們把升官发财看得太容易，这就是党内的宗派主义造成的，这和旧社会叫做官官相卫或‘朝里有人好做官’没什么区别”。

周世瑞說明了以上情况后，竟公然提出要搬掉絆脚石，誰是絆脚石呢？“（大干部）一字不識身居要职；有的处长黑白不分；有的經理幸灾乐禍等等都是絆脚石和牌位”，因此他就恶狠狠的提出能力弱的老干部、工农干部都要搬去这牌位，并极力支持开放干部自由市場，搬除这些絆脚石。当他搬絆脚石之后，又假惺惺的施行他的寬大政策。他說“有人为老干部鳴不平，不是平不平的問題……而絆脚石、牌位一定要搬，不能从职务上照顧，有的可采取調动的方式，对那些有汗馬功劳的人，可用資格費来照顧，甚至养起来都可以。”对能“保留下来”的老干部，也作了安排。他說：“不称职的、文化低的、思想健康的老干部，可以讓他作财务工作、作总务工作。”除了上述的办法以外，还感到还不能把老干部

都搬完，他又說：“禍國殃民的干部該杀！”他所謂的“禍國殃民的干部”是哪些人呢？他說：“一字不識身居要職，枕邊密語禍國殃民的”，這是“禍國殃民的干部”，“該杀”。比如農村生產減產區鄉干部就是造成減產的“禍國殃民的干部”，“該杀”；“廣西省餓死了人，省委書記，省長是禍國殃民的干部該杀”；陝西等醫院院長不同意眼科醫生給別人醫療眼睛，有99%的把握也不採納“該杀”。嚴重的官僚主義、壓制科學創舉、品質極端惡劣、違法亂紀的干部都“該杀”。

(3)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同樣能完成工作任務

1. 在企業中不應設立黨委。他否認企業黨領導的必要，他說：“只要中央指示正確，行政同樣能完成任務，何必設立黨委呢？如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科學都很發達，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同樣能蓋成高樓大廈。”他又說：“黨的干部不懂業務，領導不了行政，黨委總結就是抄行政數字而已。”

2. 反對黨搞肅反運動。他說：“機關肅反不宜搞群眾運動，肅反成績是次要的，缺點是主要的。特別是5%的估計不對頭；新聞封鎖限制過嚴；我們放的都可以登，我同意這些看法。”黨外右派分子陳銘樞提出：大專學校要取消黨委制，他說：“他們不是不要黨的領導，而是我們有嚴重的缺點和錯誤，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小毛孩子領導老教授、科學家，怎么能行呢？”看了章乃器的文章後他又說：“工人階級也有兩面性這句話很反動，但從內容看他說工人分子也有兩面性，我認為是對的，我認為應當考慮他的對的一面。”

錢鋒的右派言論

按：錢鋒系武漢市委初級黨校學員，這個材料是由該校爭鳴報編委會提供的。

(1) 抹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叫喊投靠帝國主義

中國人口多，出生率大，生產力落后，消費多，生產少，阻礙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我國人民內部矛盾最嚴重的一個問題。中央對這一問題重視不夠，認識不足，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思想僵化。中國一年淨有 600 萬人失業。十年就是幾千萬人沒有飯吃，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否則很危險。

解決這個危險問題，單靠內部積累則無法建成社會主義，必須依靠外援。

蘇聯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我國在建設中所存在的缺點錯誤都是從蘇聯學來的教條，蘇聯很小氣，給我國的貸款很有限，大約有五十億盧布，而我國又把这些款無償的送給朝鮮和越南，因而蘇聯的幫助並未得到什麼實惠。

依靠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行，因為他們國很小，資金也很有限，不能幫助我國解決建設的困難。

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依靠帝國主義英、法、日本等國家來我國投資辦工廠，和向他們貸款。這樣作對我們有莫大的好處，一搭橋兩頭好。資本主義國家資金雄厚，它有向外輸出資本的要求，這樣作不僅可幫助我國解決勞動就業問題，同樣可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困難，不必擔心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

(2) 主張成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聯盟、与民办報紙等來和黨分庭抗禮，一心向往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和自由”

可以把民盟、農工、九三、民進四個同性質的黨派合并為一個黨，名曰“社會主義聯盟”。

還需有和黨報唱對台戲的民办報紙。因此，除全國所有黨報以外，每個大城市都可以辦一、二個民營報紙。“這個報紙應明確和黨報不同”。因為，“黨報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呼聲”，民報可以在宣傳上起“社會輿論作用”，又不受黨報的限制，可以辦得更好，以便和黨報相互比賽。不這樣作就談不上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

我國的國產電影沒有一部是好的，都是公式化，概念化。蘇聯的電影更是充滿教條主義。所以今後我們應該讓資本主義國家影片放寬尺度來我國上映。

(3) 企圖取消黨的領導，打倒老干部，排斥新干部，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台

過去在階級鬥爭中選拔干部多從鬥爭中的積極分子着眼，確實有問題。

首先，對年紀大、文化程度低、能力和體力弱的老干部和“占着毛坑不拉屎”的領導干部打入參事室、政協去當參事和委員。第二，現在的領導干部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國家行政與經濟管理機構臃腫龐大為世界各國所罕見，因此應把中央的干部下放到省、市，把省、市的干部也要抽調一部分到縣、區和基層單位去“輪流鍛煉”。第三，青年婦女干部不能作領導工作，黃毛丫頭居于領導地位，是猴子坐天下毛手毛腳，這對下面干部是一個侮辱；25歲當處長，不管是什麼特殊材料制成的也不行。因此要求對這些提拔快的干部加以調整。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憤。第四，要把文教

系統的工农干部全部撤出来，他們不懂得知識分子的感情，伤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党沒有文化不能領導科学。第五，同意楚天舒的文章，积极分子是“倚牆为生的人”，是“媒婆”和“太监”是播弄是非的小人，因此，应当重新加以审查。

在干部标准上他說过去的德才兼备只适用于階級斗争时期，不适合現在的經濟建設的要求。要代之以“德、才、知、体”的干部标准，使那些有文化有科学知識的旧知識分子担任各級領導职务，要开放干部的自由市場讓干部有自由应聘、自由申請辞职等权利，不如此，就不能發揮干部的所长与工作积极性。工資制度也要进行根本改革，高干和解放軍軍官工資太高，造成了三大矛盾，解放軍变了質、沒有战斗力，会調轉枪口来打我們，中央在工資問題上犯了錯誤，如不解决，会走太平天国的老路，我們是要人民，还是迁就軍隊。

韓紹斌的右派言論

按：韓紹斌是武漢市委初級黨校學員，這個材料是由該校提供的。

（1）共產共壞了？農民的土地不翼而飛了

“解放前農民吃糠咽菜挨餓受凍是由於地主的壓迫，現在解放了，合作化了，而農民的生活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全國性合作化是毛主席的命令冒進了，是叫群眾沒有梯子上牆。”“群眾不願合作化，感覺自己的土地不翼而飛了，好像做夢一樣。”“合作化後，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紅，農民的實際收入減少了。”“合作化後，是光記分，一季才分一次錢，實際上還是拿不到錢，若靠常年勞動，無其他收入的人，連買鹽、煙的錢也沒有，再過幾年農民連人民幣也認不得了。”

“糧食、食油、豬肉、棉花、棉布的供應量太低了，農民吃不飽，只好用地瓜、干菜、野菜去充飢，買糧吃，農村黑市又猖行，反正吃虧的是無錢人，要錢無有，要糧無着。”“這是因為黨的政策有問題，一切計劃供應；收購價格太低了，不合理；政府對農民流入城市做工限制過嚴過死，這些都直接影響了農民生活的提高。”“過去農民養豬吃大豆、高粱，現在是人吃大豆、高粱，有時還吃不上，過去買糧沒錢可以借，現在是借了錢也買不到糧吃。”“耕畜既沒飼糧又不能殺，不殺又喂不起，現在兩頭牛還頂不上從前頭牛力氣大，農民心痛，群眾不平。”“要求黨中央改變對農村的政策。”

“農村幹部是土皇帝，說城市幹部特殊，農村幹部更特殊，

他們在农村說什么是什么，好大喜功，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自私自利全备”，“他們利用职权可以吃喝享乐，群众无錢，他們有錢，群众吃糠咽菜，他們吃米、吃面、吃酒、吃肉。所有这些，群众則是敢怒不敢言。”“共产党比日本鬼子还坏。”

（2）党中央的領導是偏听偏信，明一套，暗一套

“在个别社中确实是提高和改善了农民生活，增加了收入，但这是个别現象，我認为大多数的合作社，生活不但沒有提高，就是原来的水平也未保証，因此，典型社不能代表一般社員的生活水平，不能把个别和一般混为一談。”“我們的上級領導机关（指党中央）就是只了解这种典型，宣揚这种典型，乡干部和共产党员們报喜不报忧（只說好的不說坏的），就是只向他們上級汇报这种典型，上級机关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并在宣傳时只宣傳好的不宣傳坏的，用它去代表一般，这是不公平的。”

“共产党是明一套，暗一套，表面上对人（民主人士）尊重，实际上是不尊重。”“民主人士提出取消党委制，为什么引起大家共鳴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有問題。”

“共产党只是口头上講民主，但实际上呢？还是領導上說啥是啥，不采納大家的意見，这从形式上看是民主的，可是呢？是假民主。”“民主应是以大家的意見为意見，如果党的決議不符合实际情况就不执行，否則就是不民主。”

馬伯鵬的右派言論

按：馬伯鵬系湖北黃岡人，任湖北省文史館館員。他在1927年參加國民黨軍隊，歷任干事、總隊副，中校副員、參謀、上校科長、隊副、團管區司令、上校監察、少將參議等偽職。1949年因國民黨大勢已去等原因，離廣西桂林跑到上海找黃序周介紹工作，後經中南統戰部派往重慶策反，但去後未進行活動。重慶解放後參加西南軍大學習，後動員回家生產，但在家不勞動，又找統戰部派到文史館工作。他與馬哲民聯繫頗多。

(1) 誣蔑民主制度，仇恨共產黨

“我們是民主主義革命，人民民主專政，但走到一些機關，嗅不出一點民主氣味來。”“今天黨紅得發紫，將來是不是要變黑呢？”

“今天我們機關是四部曲，先是黨員，次是團員，再是培養的黨團員（黨團發展對象和積極分子——注），再才是一般群眾，由黨團員決定，公布命令。”

“×××（黨員副局長——注）在文化局當權，×局長不能決定問題，既然以黨代政就行了，為什麼還要政府組織形式呢？”“主席、總理沒有黨外人士，即令有也等於零，以前有幾個副主席，不如今天的×副主席，實際上是擺花瓶，為了宣傳給人看的。”“一個領導黨，一個政府，不說真話，不作真事是很危險的，群眾會拿鋤頭挖你。”“以前我有個天真的想法，政策不能出天安門，一出天安門就變了質，現在我才知道，還沒出天安門就變了質。”

(2) 歪曲事實，混淆黑白

“有人未入黨以前有自卑感，入黨后就六親不認，脫離群眾了。

一入党升官发财就保了險，黨員应是群众中的一个，不应有特权。”

“現在的干部升級，不問才华，只看是否党團員，黨員是狗屎也要升級。”

“人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人民服务是为党服务”，“人民的需要就是党的需要”，“以党代替人民，光凭黨員是建設不了社会主义的。”

(3) 夸大缺点，恶意攻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难兄难弟，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人，不搞宗派主义，他的威信就建立不起来。”

“三大主义不是个别的，而是在全国全党存在，不然不会在全国整风。”

“民主人士都是旧公教人員，黨員对这些人都有历史成見，格格不入，有的認为民主人士是革命的包袱，我觉得关系应该改进。宗派主义，黨員包办一切，亲戚朋友和同乡都是宗派的形式，党应针对这些情况进行教育，至少要限制他的发展。”

“耿伯釗的发言很对，滿清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只用滿人，国民党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只用嫡系，共产党如不整风，将不堪設想。”

(4) 为地主、富农叫苦

“农村有矛盾，据我所知道的，农民的意见是产量提高了，四留落了空，这是党做的，农民說是劳模做的，致令他們吃不飽飯。”

(5) 說卢郁文的发言是阿諛奉迎

“卢郁文的发言，如果是民革中委的話，我百分之百的拥护，但他是国务院的秘書长助理，是否在替党說話呢？人們有怀疑，因此有人說他的发言是阿諛奉迎。”

“自整风以来，我無論在那里都是第一炮，但我的发言，走社

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领导是肯定的。自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我讲话就有考虑了。从前的发言也可能有些右派思想，今天主要是划清思想界线。我不能说刚才念过的那些文件，一点对的也没有（系指尹肇雄、耿伯钊、马哲民、龙云、黄绍雄、罗隆基的发言），问题是他们不是善意的，变成了敌人的代言人，鸣放失了方向，一定要说右派要把国家搞垮，那是不可能的。民盟想平分秋色，如说他们想把共产党打倒，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一定在做这个梦。”

(6) 对统一战线工作，大加诬蔑

“文史馆是属于统一战线的组织范畴，但文史馆的组织却流于形式，党外人士馆长，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有职无位，而党员馆长×××包办一切，处事凭情感，个人喜怒出发，在这样统一战线的机构里，尚且有职无位，无怪乎在国家的一般机关中当然是有职无权，以党代政。”

“假若文史馆不是党员干部领导而另换党外人士的馆长来领导的话，那么很可能形成无娘的孤儿无人过问。这是由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中间隔着一道墙，墙外还有沟。”

诬蔑统战部不懂统战工作，想与党平分秋色。

“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民主人士是动员了一切的积极因素和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因为这样党才给与民主人士的政治和工作的权利，这是正确的，也是奋斗得来的，不能单纯的說成是优待或照顾，我认为应该是人民革命在共同奋斗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共产党人享有同等待遇，而统战部对这一点却认识不够。有人说晏老（道刚）太优待了，我认为还不够优待，晏老自西安事变后，一直站在反蒋方面为统战工作而奋斗，未必今天吃点饭还过分吗？”

(7) 借检讨，向党进行反扑

马伯鹏在检讨中说：“我为什么对党不满，就是参加革命有六

年不給我工作，還把我推來推去推向農村似勞動改造似的，使我在情感上很抵觸，為什麼別人都有工作而我獨無，甚至有些人通過一些不相干的关系而搞到很好的崗位，而我从广西回来的这一举动，又通过了党和各种革命因素，就可一笔抹杀不算嗎？就算我没有功劳，然而我由武汉拖到四川这一笔苦劳也不算嗎？我抱着满腔热情和极大希望，由广西不顾一切跑回解放区，想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我应尽的一分力量，为人民的祖国做些事情，不料参加革命后足足有六个年头，大家都热火朝天的工作，而我却没有位子座，把我推到农村連飯都沒有吃的。”

他說：“假若我是黨員的話，那麼我不僅是有工作，而且是要擔任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不是我妄自尊大，我確有这个自信力。这就說明有些黨員不稱職他却有特權，又有些民主人士牙牙汚他却享有很高榮譽。”

又說：“我講的話有錯誤的，可是也有正確的一面，例如‘無產階級領導權是不可否認的，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正確的’，如果把这些話一概抹殺，專鑽那些錯誤的話扭住不放，因而我不服氣，才引起抗拒情緒。我既然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為什麼說我有右派思想的言論呢？思想弄不通，對記錄有意見，認為同樣的話別人先講，有時引述別人的話，別人一點問題沒有我就偏偏這樣嚴重。”

又說：“有些人還不如我，或者和我的情況相同，黨對他們那樣重視，舉之卅三天（九天云里——注），象這一類的幸運兒，或先入為主，或憑印象主義，或私人援引，或宗派聯繫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我卻成了無娘的孤兒，無人過問。”